

少年中国评论文萃

第四期

少年中国评论编委会

REVIEW. YOUNGCHINA. ORG

二零一四年十月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特约评论员 邵钟萍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要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灭亡，剥削、压迫仍然存在，无论统治阶级使出怎样毒辣阴险的招数，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都会像烧不尽的野草一般，冲破重重的暴力镇压和洗脑欺骗而不断死而复生，仆而后起，弱而转强。

但是，正如列宁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工人运动不断经历高潮与低潮。工人运动发展的周期性又导致周期性产生策略分歧。如果我们放弃对自我的神化，而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包括工人阶级自身在内的一切事物，那就应该理解，每个新的时代下成长起来的“新兵”加入运动，他们不可能完全接受运动各阶段的教训，也不可能霎时间就天才般领悟新的形势提出的任务，因此，有的同志重犯历史上曾有的错误，或将陈旧的斗争方法削足适履地运用到新的条件上，这都是难免的。我们期望，通过同志式的辩论，团结工作，将这种“训练”新兵的成本降到最低。

我们应当从塑造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目标出发，来考察当前形势的各种要素，估量各种势力的力量对比，调查各阶级阶层的新变化，进而解决当代的核心政治难题：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把所有积极力量有效地结合而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所以，运动的形式是微不足道的，目标才是一切。历史只以成败论英雄。罔顾具体的条件，神化某种特定的斗争形式，而回避、贬低甚至否定当前核心的政治任务，无论其动机如何，打着多么革命的“实干”旗号，客观上都是在助长机会主义倾向的发展。

没有坚强领导，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的工运，往往被工联主义或自由主义俘获；没有政治旗帜，没有全局统筹的理论论战，也往往沦为空想主义，成为主流社会的高雅装饰。

时代已经赋予当代社会主义者的迫切任务，是尽快形成使阶级斗争各种形式都具有强大后盾、宏远规划和政治指导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有机联合的成熟形式。

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通过长期而深入的讨论，形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共识；同时，以各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核心，摸索接触、吸引和团结最广大群众的形式。只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才是最可靠的，也只有人民才会赐予我们力量。低潮时代的战斗，或许默默无闻数十年如一日，但请同志们铭记列宁的教诲：“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



少年中国评论

网站:

<http://review.youngchina.org/>

新浪微博 (@少年中国评论):

<http://weibo.com/youngchina/>

人人网 (@邵钟萍):

<http://www.renren.com/35220>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youngchina/>

微信二维码:



少年中国评论编委会
投稿、合作、咨询、建议
请发信至:
youngchinaassociation
@gmail.com
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来意
投稿请用附件的形式发送

卷首语

调查研究

打工记	01
一次跨年打工经历	05
昆明实践活动总结	11
反思与启蒙——记昆明之行	15

中流击水

论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21
对左翼青年进工厂问题的思考	27
是小资, 还是脑力劳动无产者	31
漫谈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层	35
所谓精英主义和机会主义	45
对当前运动中若干问题的看法	49
查韦斯的资本主义大锅饭还能吃多久	59
背负婊子的骂名也要走这条路, 因为贫穷是更为深刻的耻辱	79
纪念毛泽东	83
阶级和富士康工人	85

理论视野

哲学的党性——列宁哲学的一种辩护	91
自发性与自觉性	97
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创制学	10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民族	111
教育与就业: 阶级再生产	121

文艺评论

《中国梦想秀》是个神马玩意	133
无法忽视的声音——新工人艺术团印象	141
劳动者的休憩时刻	145
“我想将你们尽可能地引向远方” ——伊文思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149

译文选编

对皮克提“资本论”的事后思考	155
停滞与金融化——矛盾的本质	159
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哈米德·马吉德·穆萨访谈	181
红色孟加拉邦的兴衰	187
鲁哈尼政府代表谁的权益?	205
德国共产党与世界革命危机	209
《走向新社会主义》导言	225

书目推荐

232

調查研究

Investigation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1.28.-1895.8.5

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

毛泽东
1893.12.26—1976.9.9

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

打工记



: 蜉蝣

昆山，是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市。记忆中，近十年来有大批的家乡人前往昆山打工。仅我们王寨镇汽车站每天就有两趟车接送务工人员。每当节假农忙时节，小小的汽车站都挤满来来往往的昆山打工人员。

八年前，我爸妈也加入了南下昆山打工的行列，于是每年的暑假我都要去昆山度过，也开始了八年的“留守生涯”。八年中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上学将来上个好大学，找好工作，你爸你妈就不再受苦受累了”。亲戚邻居们每次和我聊天都会提及这句话。暑假期间和父母住在一起也少不了唠叨：认真读书，考个像样的大学将来好找工作，在城里买房子才能娶到媳妇！娶到媳妇才能让父母的彻底放心，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些话语似乎每年暑假都要重复，平常电话里也是不间断轰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辈子吃苦受累为了下一辈能够在这多变的社会里成家立业多不容易。可惜高考结果惨烈，父母希望破灭，作为“惩罚”把我安排到他们厂里干暑假工，说是让我尝尝吃苦的滋味，看看究竟是上学好还是打工好。

一、工厂的基本情况

之前几年里我也到过他们厂里看过，这是一家生产加工电器里的电容器的工厂，系台资企业。

处理好高考之后的事情，我便一头扎进车间开始生产！这几年我那保安老爸积累了一些人脉，和工厂的厂长关系好一点，但也是建立在 money 上，老爸告诉厂长不能把我安排到有有毒的流水线。但是，在其他流水线上没少受折磨。

先介绍介绍工厂的一些情况。话说这个厂老板是台湾人，常年住在厂里，据说是便于监督工人干活。工厂的经理即厂长天天到车间溜溜逛逛，遇到工人偷懒或不合厂规的地方就大发雷霆像老虎一样，但没对我发过火。厂长手下有 7 名二把手，这些人整天坐在办公室吹空调，写写画画，这 7 名二把手手下又有大约 20 名主管，这些主管里又有等级，如大主管，二主管，三主管（这些是我平常叫他们的称号）。小主管下面就是我这样的小喽啰了，工厂有 46 名小喽啰，这些人大部分来自河南、安徽等地区，尤其是小喽啰们大都是些年龄和我相仿的退学的学生，也有几个比我大的。年龄大些的基本都是主管或是坐办公室的，年龄再大的是保洁、保安、食堂刷碗工等人，另外有 3 个维修技术人员。我老妈负责厂长和老板办公室的卫生，上下两层楼都要打扫，老爸则是另外两名老保安的“领导”，我姐做材料采购。

工厂占地也就八九亩地，车间厂房却占了绝大部分地方。工人宿舍非常小，一间宿舍住六个人。员工的生活用品摆满了整个宿舍，仅留下一个过道。一层楼一间小厕所。员工洗澡室特别简陋，五根水管且没有淋浴头，只能把水接在桶里洗澡。洗澡室放了两台洗衣机，本来以为是老板发善心，谁知道洗衣机要刷卡付费！再说门卫室，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因为每次中午休息我都要去的地方，门卫室也是除宿舍最热闹的地方，这里有普通员工、司机、保安、保洁、部门经理等一些人。为什么这些人喜欢来这里呢？是因为门卫室里有三个空床，

能吹空调，有电视看。在这里可以愉快的休息，愉快的在一起扯淡，有时候厂长会过来“凑凑热闹”。门卫室的三个老头保安很是和蔼可亲，平时和来门卫室的串门的员工聊的很嗨。我记得我爸和保安老王经常和司机、包装车间经理、食堂大厨还有车间的小伙子们一起在休息时间里一起侃大山开玩笑，打牌，喝酒。到晚上下班，更是热闹，成群结队来门卫室看电视。我爸和这些人最能聊的来，也经常帮那些员工补自行车胎、给电动车充电，充气，他们都说我爸是微容电子厂的活宝。

说说车间吧，这个工厂有三个大车间，第一大车间分成三个小车间，第二大车间也有三个小车间，第三大车间没分开。老板对车间尤其在乎，吩咐保安每天晚上都要围着厂房查看一番，确保财产安全。

说到这个电容器生产加工历程，分工相当细，电容的两极先要正对在一起，用不知道什么材料把它合在一起，然后附纸带上进行打线即安装导线，再进行涂装即涂上颜料，等风干之后再打印规格等字符，随后要用高电压测试电容的耐压值是否合格，还要测容量等，最后就要去纸带包装了。在这些过程中，每一小步骤都要责任到个人。如有不良品，由出问题的个人掏腰包买下。（我有一次买了好多好多，呵呵～）

我是编外人员，就让我在印测部门帮忙，有时也到包装，反正经常调换工作，有几次被安排了四种不同的活计。有一次到据说有毒的车间去找材料，发现那里气味很重，温度有45度左右，不一会就汗湿了衣服，怪不得老爸不让我在这里干活，一般人受不了。回到印测车间，这个车间有两种打印机器，一种激光打印机，另一个是镭射打印机。如果用激光打印机就必须全天站在机器旁，算上加班时间要站立13小时，否则就坐在机器旁13小时，期间一直在重复同一个动作，还很容易打瞌睡，如果被发现就要挨骂。印测组还有一个坑爹的地方，就是一个人要至少看三台机器，因为当时人不够（我看一个机器都费劲）。可见我们这些小喽喽有多忙，多累，还要挨骂！调到测试耐压车间，这一些活不是很累，但是危险系数高，400V电压近在咫尺，且没有保护措施，必须时刻注意。有一次师父在教我测试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探针，啪的一声，她的手指甲黑了，幸亏没大碍，但也被主管骂了一通。

在我第一天开始进入生产状态时就遇到了加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我辞工还在加班！而且周六周日也要加（对此我表示气愤）！加班就算了，每天加班到11点，这是平均的时间点，有几次加到了11点半（我表示鄙视）。更甚者，有6次中午也要抽出半小时加班，报酬是2包泡面（请允许我使用不文明语言，TMD）。话说刚上两天班，就拜了两个师父，一男一女，两位师父特别热情善良，遇到麻烦会帮我解决，让我避免了二主管的责骂。说到主管不得不提，她和我姐关系很好（我姐以前也在此上班），但她不认识我，被她骂了好几十天，最后才知道我的身份，对此她很不好意思。但为时已晚，我快要离开了。

二、工厂内的等级制灌输

厂规厂纪令人反感，有这么几条是这样的：1.住在外面的员工在进到工厂的时候必须下车推着走，否则一经发现扣款50元。2.车间的空调未经主管同意不得开启，否则罚款20元。3.食堂就餐不得带出，一经发现视轻重罚款。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他的不一一列出。这些厂规厂纪都是厂长规定的，因此平时员工们见到厂长很是害怕。**就是在食堂就餐都要离他的专座好远才能愉快的吃饭，食堂有二十套桌椅，其中一个是为厂长设置的，其他人不能用而且这张桌子擦的非常光亮，食堂里有一消毒柜也是为这些领导准备的，普通人用不了。**有一次我坐在厂长的对面吃早饭，旁边的同事很是惊讶，回到家老妈告诉我下次不要

坐在他对面怕影响不好，但我依旧坐在他对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吃我的他吃他的，有什么影响不好的？吃个饭都把人搞得不爽，还能不能愉快的生产了？

食堂做饭也要分等级，每次吃饭前食堂工作人员首先给领导们准备好饭菜，接着才能为下面的员工打饭，老板和厂长顿顿四菜一汤大鱼大肉，普通员工只有少少的一荤两素。这是咋了，天天累的要死的只能吃这么一点，不干活的却大鱼大肉吃成大肚子。这何其逆天！

至于其他的小喽啰我接触不多，上班不准讲话，下班我就蹿了，也说不上几句话。但从平常休息的言谈举止中，他们对厂里的一些人和事很无奈，敢怒不敢言，尤其对那些主管们更是讨厌。可能因为产量或其他原因，厂长骂主管不会管理，主管无处发泄，只能对准底下的小喽啰，小喽啰们无可奈何只能默默忍受低头苦干。主管骂人可谓恶毒，有一点错误都要骂上半天，做出样子给厂长看，厂长随时可以通过安装这车间的摄像头观察主管和员工。如此等等，也不怕遭报应。

在工作十几个小时之后还要无偿贡献半小时留下打扫卫生！（请再次允许我使用不文明语言，尼玛！）还不准提前走，否则扣钱，全程有三个主管监督。刚开始我还不跟他们顶撞，这些人和我爸妈关系都还不错，没好意思。但后来我还是顶撞了，因为实在忍无可忍。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几个大学生，他们在受到责骂时也不吭声，只是事后才和同事谈到不合理的地方。没办法呀，出门在外只能忍了，斗又斗不过人家，大家都这个心理。

三、老员工欺负新员工

提一下我那俩师父，大师父是比我大俩三岁的帅气小伙，善良讲义气，听他说过他的故事，从小家庭情况不怎么好，又调皮捣蛋。好不容易上到初中二年级，又因为打架被开除，在社会上鬼混了几年也没混出样子，就幡然醒悟进厂打工，来到这个微容电子厂。**刚进来就受到一些老员工的欺负，那些老员工仗着工资高一些、资历老一些常常在生产中故意出一些难题刁难他。**比如故意把一些产品弄坏然后在车间里大声喊：某某，你怎么搞得，产品都成这样了你还站着不动！故意让主管听到然后骂他，以此来取乐。那几个技术员也常常没有好气的欺负他，有时因为他没有及时更换零件或给机器上油而导致机器不能工作，这些技术员就得来修理，不管碰上什么样的问题，首先责怪他朝他翻白眼然后说一些难听的伤人自尊的话语，等技术员进行完这一系列令人讨厌的行为动作之后才会去修理机器，更可气的是还会报告给主管，主管听到技术员们的小报告就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来训骂他。

他说刚进厂的时候，每天要被那些老员工尤其是那些技术员故意捉弄取笑，而后还要被主管骂好几次。他说他很伤心，不想被人家这样对待，期间也想回去继续读书但又不可能了，怎么办呢？不能总这样受人白眼吧，就努力工作自学一些维修技术，他已能处理一些专业维修技术人员碰到的常见问题，很受上层领导重视，他说他这四五年在二主管的苛刻要求下自己钻研的这些维修技术，同时也在辛苦的劳作，在劳作的时候逼自己熟悉操作技能，他可以独自操作6台打印机，非常不容易，以前瞧不起的同事现在都对他另眼相看了，他在给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很是感动。

四、个人奋斗的幻想

我问他以后咋个混法，他说他现在已存下几万块钱，再加上父母的积蓄准备明年回家讨个老婆，在家乡开个维修家电的店铺，不再在外面打工了。他对我说外面的世界不好混，

这世道就是弱肉强食，谁有钱谁过得好，还告诫我回去一定要认真读书，读书改变命运，千万不要走打工这条路。这些话经常听到，特别是出来打工的人经常会对他们的孩子说这些话，他们认为孩子只有学好知识考好大学才能不像现在这样受累受苦的给别人打工。小师父是个比我年龄还小的小女孩，一出外打工两年了，可能孤身一人在外，在厂里也总是受人欺负，记得每次主管责骂她的时候她总是在默默劳作，像是不把主管的放在心上，事后会在同事间发发牢骚说要过几年找个有钱的男人嫁了，也要活的自由有尊严不要天天看人家眼色。诚然，大小师父的这些想法貌似很实际，但现实情况不允许他们实现他们的想法。

每次想到这些就气愤，想到官方的宣传更是气愤，“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何处？

算了，不再回忆那些令人气愤的事情了。我们没有时间为这些感到愤怒，毕竟我们地球人以后还要愉快的生产，还要愉快的玩耍！



一次跨年打工经历



: 小白

2014 年即将到来之际，身在学校里的我萌生了一种想要去远方打工的念头，一来是为了给自己挣点零花钱，二来是为了体验真实的社会，真实的艰辛。给不放心的父亲匆匆电话里说过之后，我们俩都约好不告诉身体不好的母亲，只说是去学校组织寒假实习，是必修学分。现在回头想来，工厂这个亿万中国人搏命的地方，给我好好的上了一课。

这类的操作工招工，因为春节将至，南方工厂面临大面积丧失劳动力的压力，所以还是很好联系的，经过学长的女朋友的同学的同学联系，我如约踏上了去往江苏——这个国内最大的制造业集散地的旅程，和我同去的有 200 多名周边学校的大学生。怀着复杂的心情，我上路了。

经过了夜，经过了梦，经过了 18 个小时大巴的颠簸，经过了厂方大小车辆的接力运输，我们来到了一处厂方安置的集体公寓，宿舍很简陋，不过还好，临时给我们装了空调。这点很好。至此，我们对厂方的感觉还是蛮好的。最后，我们发现，他们不过是有钱而已。这个厂很大，有上万员工、三个厂区。

什么都是第一次体验——体检，劳务派遣公司的培训，厂方的培训，厂方的考核（很水的那种，所以大家都过了），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考核的时候只要回答“能”就万事大吉。紧接着就是岗位的分配，女生基本上都去了焊接这类体力要求不高的岗位，而视力不好身体好的男生就去干体力活了。我当然去搬砖了，因为焊接的东西有刺激气体，所以我就算累点也不会去干焊接的。

在此期间，我结识了几个可爱又好玩的小伙伴，他们分别是强仔，娇姐，葛二蛋，甜甜，当然也结识了几个车间里的大哥小哥，彪哥，黄毛，马帮，胖丁哥，白脸哥，关羽哥。女工是通过这些大哥小哥认识的，倒没说过话，这点到后面谈到有些人感兴趣的女工问题时候再提。

且说一进车间门，就是工人了，想挣钱就不要惹麻烦，不要慕自尊而处实祸。我深谙想在恶劣的环境里生活的滋润就不能太把自己当人，也不要太不把别人不当人这个道理。所以，刚进去的时候，我还是十分的老实，师傅也好，线长也好，线长小助手（“书生”）也好，说一不二，因为车间里暂时不缺人手，刚开始让我们打扫卫生，我们就拼命的打扫。特别提一点，车间里面的中央温度控制做的挺好，寒冬腊月的，都是穿短袖上班，让我们感到了春天般的温暖，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南方室内的湿冷。最开始教我的师父脾气不太好，看我学不会，讽刺了我两句，倒也正常，反正他说刚来学不会是正常的。结果后来我才发现我是被提前放到这里学习，等到大家都到这里学的时候，我的岗位已经变了。第一个带我的老工人就是刚才说到的胖丁哥，干活那真的是没的说，30 多岁上下，有时我帮他去食堂给他买点上夜班时候早上要吃的东西。胖丁哥对我挺好，并不是他想要占什么便宜，我无论问什么不会的东西他都会耐心的回答。我和他都是老实人，他觉得我干活老实，他虽然看不上我干活的质量，但是对我的态度还算认可的。其实我干的活很简单，就是把板材销边，在一个旋转的支架上完成这道工序，只是得不不停的销，要是一个人干，一天得销 1200 块，如果一块板子得销 6 米，那么一天下来就得销 7200 米。胖丁哥是个好师父，我从不给他摆大学生的样子，

他也不给我摆老工人的架子，他已经在这里干了一年。他经常会给我说些工厂的工资问题，也会给我说些之前学生工的情况，因为我关心我的工资所以经常问他有没有绩效。他只要是知道的都会说。而且如果我干的太卖力他就会及时制止，因为那样会让他跟着受累，而且显得他很懒，这样对他的绩效并无好处，所以慢慢地我也从他那里变得机灵了，线长只要没来我就慢慢干，线长来了我就正常干，有时候还表现一下。

书生是线长自己的私人助手，负责安排一下人手。他因为具有了工人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所以心里面总是担忧摆领导架子其他工人看不惯，所以经常和工人们套近乎，细皮嫩肉的他经常在没事的时候来和工友们吹吹牛，开开心心，以此来彰显自己还是站在工人这一边的，我想线长也乐意他这样做，一来便于管理他们，二来消除不亲民的负面印象。谁知道呢，我觉得工人们都是实在人，像书生那种“我来努力的帮你干活，你歇一分钟”已经不能用来讨好工人了，给根烟都比那虚的强。

黄毛大哥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至于为什么能干，因为他干起活来让人感觉他很卖力，虽然不是我师父那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但也还是非常利索的，他跟我说，他才 19 岁，然后到这里来干活不到一个月就转正了，不过他干活的时候经常偷懒，而且衣服也不好好穿，总有一种把欲望都写在胸上，写在脸上的感觉。他是投机取巧的一个典型，只要线长没来，他就找机会玩手机，找机会和姑娘聊微信，有时候甚至不管不顾一边干活一边聊微信，经常睡眠惺忪的来上班，然后找到一个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用包装废弃的纸盒子把自己掩护起来，只教我们给他站岗放哨。黄毛之前对我和几个大学生其实挺不忿的，除了经常讲讲荤段子，问问有没有和女朋友那个、什么感觉，谈论金钱和性至上论，还会问我一些问题，经常他把我叫过去问，“眼镜！你知道朱元璋是哪朝的皇帝？中国有多少个省？”我感觉这些东西都是小学时候学的，但是他说他初中也上了的。黄毛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挖苦我，说现在的大学生能咋，大学生还不是有出来卖猪肉，出来摆地摊的么。我说这现象有，但是不能说明上大学没有它的意义。“只要一有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就揶揄我，说：“你都大学生了连这个都不知道的啊？”话说教授还有不会做小学数学题的呢，不知道不是很正常么。其实我没有什么大学生的架子，也没有趾高气昂，当我进一步表现出没有大学生的架子之后，黄毛说话倒是客气了多，“其实大学生也不容易，找工作也得抢，还是得好好读书！”我说：“嗯，本来就是啊，你以为读书简单啊。”

还有一个彪哥。不得不提，彪哥经常在干活的时候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但是跟他好好聊了之后发现他还是挺有文化的一个，经常告诉我很多道理。他说，“知道我为啥来这不？因为我考研没考上！没办法，和我一起的人家都考上了。难的又干不来，只好干这个。”我说，“大哥，那你累不，我们刚进来都累的不行，一天一直站在那，受不了了，你们干了这么久，应该适应了吧？”他当即表示“你去问问另一个人，你问他累不累。”最后我才知道，这车间里面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真切，一样的累，那是一种心碎的累，一种无可奈何的累，无关乎新老。彪哥说他有一个工友，原来在这个厂里努力工作，老婆也在这个厂里，想着在这干上几年挣点钱结婚回家盖房，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老父亲生了大病，家里欠了 20 万，最后人也没救过来，挣的钱转眼间成了九牛一毛，最后又坚持着干了几年，把钱还了，然后攒了点钱回家另谋出路的。彪哥告诉我说，“这地方只能攒点钱，给家里的老婆孩子谋个生路，想谋个出路，还是省省吧。”车间里像彪哥这个岁数的人很多，都是一个拼命养家糊口的岁数，省吃俭用给家里每个月寄去三四千块钱，自己留个零头当吃饭钱，生活相当节俭。我只是想，他们这样辛辛苦苦，没有白天与黑夜，每天除了吃食堂的饭，抽不怎么好的烟，都是为的哪般？而那些留守在家里的孩子们又不是省油的灯，妻子们文化程度较低也是常态，不会教育孩子也是常态，孩子们不知道父母辛苦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以后

如果不能考个好大学又来到他们现在的地方上班，这些事情，我想他们不是没想过，电视上也不是没播过，只是因为，他们想了也不会有所改变，只会愈发痛苦，还不如尽自己的一份力，无愧于当父母的心，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勉强生存下来，至于后来的事情，诸葛亮也没办法预测了，只能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我们每个人在一段时间内都是别人的徒弟，而过一段时间随着别人的离开，我们就要承担起师父的责任。小小的生产线，其实门道可大了，要是不留心，一个小小的故障就能延误生产，甚至造成事故。在这方面对我帮助很大的莫过于一个少数民族的小哥——“马帮”，是回族的一个分支。他对食堂的饭菜很有研究，给那些新来的回族小弟们说哪些饭是有猪油的，哪些饭没有猪油，那些饭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他都一清二楚，而且他的这种性格让他在干活方面也很有优势，对于机器的并行工作拿捏的很好，不会产生耽误也不会盲目浪费自己的体力，所以和他一起干活的时候很长进很快，我特别感谢他能潜移默化教会我很多东西，而且我和他也经常探讨一些生产线优化的问题，总而言之，他是那种特别认真干活，十分想转正并留在这里好好干活的人，也是很能干活的人，可是这里干得好不奖励不表扬，干的差一句话就让你心灰意冷毫无热情，恶语伤人六月寒，只是偶尔一次的他人因素导致的失误让他挨了线长一顿骂，这个失误就像是服务员在桌子上碰翻一杯水但旁边没有客人那种失误一样。明明已经接到了转正通知，此刻毅然决然选择离职，这也可能是他在外打工九年依然飘无定所的缘由吧。在一个活很少的时隙里我问他，你为啥不回家过年呢？“没脸回去，一个村子的，别人有车有房，但是自己却什么都没有，不想回去。”我就没再问下去了。

白脸哥是个不地道的家伙，他这个人干活犯了一个线长刚强调过的错误。结果趁我不在线长跟前诬陷我干的，还好线长是个机智的少年，把我叫过来当面对质，这才把白脸哥搞的浑身不自在。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我的小伙伴强仔身上，他不仅被陷害了，而且还被线长罚了 100 块钱，因为半成品在传送带上的时候突然破了，而我猜测线长为了要和老工人保持和谐相处也只能表面不说但心知肚明，作为学生工的我们来说，也必须心知肚明无可奈何，不然最后对谁都不好了。

还有一个关羽哥，因为脸总是通红通红的，我心里面清楚关羽哥对谁颇有微词，因为他看不上的那个老工人在车间里是个混子，没事了打扫一下卫生，专业酱油几年有余，但是却深得线长的信赖，带学生工熟悉环境，去收拾车间的垃圾这种轻松的活准是他的菜，但是平时却没有固定的岗位，总是到处瞎晃悠，这样线长都能默许，他俩也经常因为一些蝇头小利互相猜忌，比如刀片不见了，就会怀疑是对方拿的，其实他自己也经常拿我们学生工的东西，我在一个岗位干了一周要调离别的岗位，车间给我发的护具他直接就给我要走了。虽然他后来并不干这个岗位，他也没有返还给谁。唯一记忆犹新的话就是他说的，“这个车间里能一直干下来的不是精英，就是痞子流氓”。我觉得他和那个他鄙视的工人都不能算作前者。

一同来的女学生工们认识的有娇姐，甜甜。每天白班下班后和他们一起回公寓总能被她们的一些言谈逗乐，也算是枯燥生活的调剂吧。娇姐经常说的就是，“你们猜我今天干了多少个，5 个！”“我昨天也干了 15 个呢！越来越稳定了呢！”“我们线长今天看我干的多，直接把别人没干完的给我拿过来了，结果我今天焊了 17 个！早知道就不这么卖力了，就不能表现的太卖力，又不多发工资。哼！”其实，干焊接的女工属于那种干产量的，他们的产量是一个车间产量的关键，所以他们经常因为产量的问题而不吃饭，不休息。到饭点了就让人拿着饭票去食堂买几个能带回来吃的小零食，上厕所也是跑着去的，生怕完不成任务被骂被扣绩效。这样一天干下来，不能好好吃饭，不能好好上厕所，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保证不了，产量真有那么重要么。我感觉还是绩效比较重要，因为在一个月的工资里，绩效占了

五分之一，计件工资把女工们都折磨到这种程度了。下面是一个女学生工和我后来闲聊的时候说的话，字里行间确实能感受到很辛苦。原话如下：“在里面，有过痛苦，也有过温暖，痛苦使我难以忘怀，曾有的温暖更是记忆犹新。每天上班虽然很累，但是上下班都有朋友们的陪伴和问候，心里的温暖也就油然而生，不会觉得那么的辛苦。”我相信身在异乡打工的女性们，可能都有她类似的感觉吧。工厂繁重的任务让女性失去了健康，车间里焊接处会有刺鼻的气味需要带工业口罩，也让他们失去了和恋人共处的时间，有些情侣一天中最盼望的就是脱下工作服，换上自己的精致的衣服和恋人手牵手度过食堂里的两个 45 分钟，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太过于奢侈。曾经看到在车间门口的一对小情侣，男的在解释着什么，神情尴尬，女的摘下口罩，吮吮嘴，“说好了给人家买的棒棒糖呢！”说罢脖子一斜，那样子一定十分可爱吧。

我不知道在处处谈论金钱和性的工厂里，还能有多少真情，但是我能知道的就是，有更多的人死心了，泪干了，认清现实走上正道的女性，踏实干活，不再幻想自己是灰姑娘，努力寻找吃苦耐劳的另一半，而伤的太深的，自甘堕落的，她们的名字、电话、长相、住址、岗位地点、几点下班，则被我那些大哥们所熟知，被更多的男人所熟知，而此时在全国各地的乡下，有更多的女性抱着养家糊口的期待，才刚刚上路。

下面说说我们的线长，那个不苟言笑的男人。每天上线下线点名不管有事没事不把你训得跟狗一样那就没有仪式感，不管今天干的好干的不好，总有一款错误适合你，总会杜撰一个神一般的工人，一个人能够 **carry** 几个人的工作量，显然他吹得太假了。哪有一个人能顶三个人的，经常嘴里就挂着一句，“你们把我逼急了，我用 **XX** 的规章制度来整你...你们下次干活的时候给我有脸色点，让我看到几个人聚在一起吹牛逼，同时去休息室里喝水，让我发现了，我就把你们干掉！”私下里和其他线长却是嬉笑，“为啥我的 **iphone** 发一个微博不显示来自 **iphone** 捏？肯定是设置里出了问题嘛，要不然就是山寨的。”诸如此类。值得一提的是，据老员工们反映，这个线长比之前那个动不动就破口大骂的线长要好很多，因为起码骂人这个事情他已经没有了。线长经常会去厕所，车间外面看看谁在抽烟，谁在因为抽烟而影响工作，有个后来调过来的不幸的大哥本来就想指望凌晨四点抽支烟来放松一下结果就撞到线长惹得被训了一通。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都去喝水，恰好碰上线长巡线，看到这边一个人都没有，顿时到休息室把我们教训了一顿。我因为出来比较早，没被教训上，里面那三位就比较悲剧了，要写 500 字检查，还被强制早退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工厂除了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停机了以外，一直都是满载运行的，也是那一天，线长给大家一天的好脸色。

在这边干活，如果刚开始不老实不勤一点，就会得不到线长和他的心腹的欣赏，就容易被搞到比较辛苦的岗位上，而过于老实和吃苦，则容易在春节老工人回家之际被当成救火队员，懂的越多，让你救的火也越多。我自己就因为盲目采用了老实听话战术，被小头领使唤来使唤去，有好处也有坏处，偶尔还在养老区干上一个星期什么的。一旦哪里出了问题，就巴不得你也会处理。好歹我也知道深浅，这样下去自己被玩死，所以我也开始懂得了老工人常说的投机取巧，偷懒，装不懂，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我得以避免了自己陷入事故和问题多发的工作区域。

上过夜班的人都知道，倒班最辛苦的是头几天，即便是有春节三倍工资鼓励着我们，即便是大年初一上班，我仍然难掩心中的困意与无聊，没事干的时候就看着表，感慨时间过得太慢，干着干着就瘫倒在地上。然后一个机灵赶紧扶将起来，还好没有人看到。干过很多类型的活，最累的莫过于抬半成品，和大哥对半抬，流水不停，抬板不止，直抬得人双臂

发酸，恶心反胃。一块 2 米 5 的板子多少也有 30 斤，最后又好心的大哥把我换了，过了两个星期我的双臂都不能伸直。而且车间里面非常的热，因为有发热设备，所以大冬天里大家都是穿着短袖干活，那段时间我染上了湿毒，胸前背后全是血红色的疹子，自己去买药都没有治好，平时工作时间让我连洗个澡的时间都没有，而且大家对于公寓洗澡一分钟 1 块钱的收费制度很不满，但是又没办法，去外面太远，所以我想好好洗个澡都得请假，我问老员工你们怎么洗澡，他们说凭劳务公司的工牌，原来澡堂子对不同劳务公司的态度是这样的不同，怪不得我们这么贵，原来是劳务公司人不行啊。

在车间里干活困的时候就聚在一起扯扯淡，线长来了就各自散开，吹吹牛时间过得倍快，无聊了就找点事情自娱自乐是想要在这枯燥无味的环境里工作的人必须学会和掌握的技能，要学会吹牛，学会自嘲，有些人说这叫自嘲，宣泄压力，也可以这么叫吧，总之，我在工厂生涯快结束的时候，才感悟到，不要太把自己当人。你就会像机器一样去思考，就不会关心时间，关心自己的感受，失去思考能力又怎样，要是我在乎这些，干嘛还来工厂工作，我们就是用时间来换金钱，用血汗来换金钱，用健康来换金钱，甚至用未来，用下一代的教育来换金钱，再用金钱去换教育。这样时间就过的快了，也不要太把别人不当人，因为几个工友在一起总能获得一个人无法得到的快乐。

每次走到食堂，我都会感到一阵轻松，那是个可以吃饭补充能量的地方，然后我又不感到轻松，我的饭是为谁而吃，米饭可以管吃饱，就像用不完的血汗一样，还有水果送让你觉得这里比学校的食堂更人化，春节还有餐补够我买两箱牛奶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自此我明白了，和吃工厂第一顿饭心里获得的踏实感不同，我现在只是觉得工厂只是有钱，而且我们所创作的财富和价值肯定比这些补给，营养品要丰富得多。如此大方的让我们吃让我们喝让我们住有空调的房间，只能越加证明我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之高，也证明了用工荒造成的损失和多发的工资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临走的时候，拿着 30 天还算不错的 3800 块钱工资，一路回想着少数民族小哥说的那句话“你最终会成为这里的一个过客，这些记忆你最终会淡忘，而他们仍然生活在这里”，是啊，我为自己赚的是零花钱，而他们赚的则是妻儿的活命钱，我走的潇洒风尘，他们不得不久处不厌，再恶劣的环境与，只要是为家人，咬咬牙也要坚持，再少的工资，为了妻儿，也要节俭，再好的发展机会，只要和钱无关，统统都不能考虑，没那个时间，也没有后路。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去哪里，但是我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后还会是工人，他们的后人，仍有继续这样痛苦生活的可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既不能指望一个人，一个群体的自我觉醒，也不能指望天上掉馅饼这种事情发生，救世主注定是遥远的。发动最广大工人们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的生存状况才能有质的提升，我们的下一代，才能不会忍受如我们今天一般的苦难与折磨。



昆明实践活动总结



: 荼靡月下香

“火车即将离开昆明这个纯净美好的城市，离我来昆明的时间相差了6天。但我感觉这6天有一世那么长，却又感觉稍纵即逝。

当我来时脑海中充斥着火车上的记忆，略显排斥地“挤”入昆明这个城市，而现在火车载着有满满回忆的我即将离开这里。所有的不舍、依依惜别都将在最终时刻被无奈地搁下。”

这段话是我在回家的火车上写下的，在结束了昆明的活动之后，我们就各自准备整理行李开始另一段旅程。原本以为可以将离别看得很轻，可是不知为何总是不想离去。夜晚再次走在昆明那条我唯一比较熟悉的小路上，头顶上星光闪烁，脑海中竟又回到我们刚来这里的情景，意外地直到那一刻才体会到了时间的飞逝，一切仿佛如昨日一般。但我们又都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和刚来时的不一样。现在我们即将各奔东西，但无疑我们都是充满斗志的。

这七天的实践真的让我收获到了很多，因为前辈们的指引和孜孜不倦的教导，让我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段时间里我因为自己的鄙薄而自卑、困惑过，也因为前辈们的付出而惭愧过，因为和同组成员之间交流有了收获而欣喜，偶尔也会有苦恼的时候。但正是因为体会过了这些，才明白我们之间的友谊那么真实、纯粹，大家让我有了很大的动力。

现在距离活动结束时间已将近过了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困惑如何对这次活动进行一次总结，当时一直想着要将它写得完备。但是考虑到目前我所知甚少，如果硬要追求完备，恐怕完成的日子是遥遥无期了。所以姑且把它算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其中可能还会有一些错误或思虑不纯熟之处，希望读到它的人能够给予一些指点。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通过与昆明机床厂、200号军工厂老工人、造反派老人以及知青的交流了解到了很多文革的历史。上述的所有人对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毛时代十分怀念（甚至连文革十年也包括在内）。他们所描述的毛时代是平等、民主的，工人干部各司其职，干部为人民服务，没有“厂长负责制”之类资本、权利集中的制度。当时的工人们工作热情高涨，他们坚信劳动是为自己、为子孙后代、为未来，他们对于毛泽东怀有一种信仰。或许很多老工人对毛时代的怀念是仰仗当时他们所处的周身的小环境。但对于造反派老人而言，他们始终追随毛泽东，革命失败后遭到迫害仍无怨无悔的原因则是他们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创举的动机的理解。正如他们所描述毛泽东是“跳出当时社会框架的人”。毛泽东把共产党官僚政治看作是巨大的弊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中老人讲到的一个史实让我十分吃惊，我通过历史书所读到的那些烧杀抢掠的红卫兵其实不是文化大革命真正的主角，而是由刘少奇、邓小平组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充当先锋的保皇派红卫兵。他们大多是高干子女，叫嚣着反动的血统论，打着文革的旗号，实则是为了保卫自己父母的地位。原本是冲击官僚主义，却反而在自上而下斗群众，这也体现了中共领导的国家机器逐渐开始脱离群众。而后来真正履行这一义务的是毛泽东在发表《炮打司令部》之后出现的文革造反派。



文革最终以失败告终，老官僚全面恢复统治。毛泽东能够用来遏制自己创造出的官僚体制的唯一措施就是依靠自己的个人声望和个人力量。日益衰老的毛泽东对于遏制官僚体制已是无力回天，而他所留下来的并未包括反对官僚统治的体制保证。

文革造成的伤害我们不能忽视，但是对于现在流行的将文革作为毛泽东人生以及政治生涯的污点的标志，而对于其他细枝末节就一概不提，甚至于扭曲历史，声明坚持要守住否定文革这条底线，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悲。这何尝不是一种剥夺人的自由的行为，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媒体宣传的信息等等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来支配社会。

但当我们回溯这段历史时，我们都能从中收获到能量。“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文革对于后世来说是具有示范意义的，它以如此激烈、果敢的方式向人民昭示着他们的权利，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心中都种下了平等、自由的种子，它是如此珍贵而又娇弱，但却被赋予了茁壮成长期待。

老人们对于毛时代的怀念、对于毛泽东的信仰背后都有着其沉重的意义。但我想我们的想法、历史的车轮也不会止于此。毛时代有很多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尝试，毛时代的人民有着极强的政治热情和凝聚力，毛时代是实现了公有制的时代。但是毛时代也是寻求社会主义途径在现实中的失败的经历，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与起初的社会主义目标背道而驰。而我相信历史不会是有有一个小插曲就带来全局性颠覆的进程，所以毛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早随着国家机器凌驾于社会之上、官僚体系的日益庞大已悄然埋下伏笔，并随着毛泽东的逝世终于被统治阶级推上历史舞台。埃里克·欧林·赖特在他的《指南针：指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一文中提到“革命政党也许是在特定环境下颠覆资产阶级国家的有效的‘组织武器’，但当建设一个民主平等的替代性制度时，它们却成了非常无效的工具。”类似的例子有苏联发展出的“威权国家主义”，其核心组织原则是国家主义，举这个例子我不知是否恰当。

我们对待那些曾流露过美好本质的历史，除了些微的热忱之外，更应以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事，其背景已经和现实不融洽了。因此我们更需理性地对待，有“古本”可以分析，对于我们思考关于可行性的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的方案大有裨益。

后来我们还听了中戏老师关于戏剧知识的讲座。其中讲记录式剧场时有讲到其中一个来源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政治宣传剧，另一个是1920年代艾卡温·皮斯卡托的戏剧实践。政治宣传剧主要是起到左翼政治宣传的作用，而艾卡温·皮斯卡托的戏剧特点主要是打破移情作用。对于移情作用的例子有好莱坞影片的虚幻场景，当人看电影时，会把自己幻想成电影里的角色之类，造成暂时性的与社会脱节，而回到现实之后更加无力。对于这样的经历我很有感触，很多时候电影片面的情境下所构造的观点总是会让我无法分辨的采用。

每天进行完活动后大家会进行一次交流讨论，主题是当天进行的活动收获，而我对于社会现象的本质的了解就主要来自于学长他们的指引和解惑。讨论过程中我们总会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对于文革和社会现状的了解的基础上，让我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产生了很多疑惑。我们讨论了诸如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价格高于我国？为什么我国的贫富差距如此大？为什么分田到户之后农民会觉得生活较之以往要好？另外还谈到了关于福利彩票的作用，国企如何改制的问题等等。这其中我们对于社会现象所透露的本质有了一定的了解，但

是还是由于自己理论基础不够，所以缺乏独立的思考。有时通过学长的帮助有了很多了解，但是脱离了他们，自己就不能够全面地分析。这些都昭示了我们存有的不足，也是我们以后需要克服的地方。我之前应该算是一个懵懂无知而不自知的大学生，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热爱这个社会，却不会表现出热情。但是通过这次活动我可以为这个社会奉献出我的力量，至少是努力。

很贴近现实的是我们拜访了昆明市内的 NGO 组织，以及与昆明知名维权人士进行交流。那是一个关爱流浪儿童的 NGO 组织，我真的很敬佩他们。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从衣食住行到教育（一般为礼仪教育以及适当的文化教育，有意愿读书的孩子会被送往类家庭中，可以享受教育），但这些都是基于儿童自己的意愿，这也就让人想到了学长提过的义务教育的问题。流浪儿童大部分都是义务教育的对象，但流浪儿童的教育得不到保障，而这样的一种“自愿”原则不免让人觉得有一种放任的感觉。但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太多深入的了解。

在紧凑的活动安排之中，我们还是有了去参观革命胜地的机会。我们参观了西南联大旧址、云南大学、李公朴遗迹、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讲武堂和胡志明故居。在参观过程中，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了解到了很多有趣的史实，以及一些云南的从过去到现在的变革。那一刻，一种时代变迁的感觉交织在我的脑海里。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历史积淀，而以前我所关注的东西都太过形式化。这种经历让我有了触及一个城市的灵魂的感觉，感受到了自己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回顾这一段时间的实践活动，我想我们都应该具有共产主义理想。拥有理论基础才能够对现实社会进行系统性的批判，而通过维权人士的作为让我明白我们应该要将理想付诸现实，不管它体现在社会中多微小的方面。这也是力量的积累，很多事情只有经过实操，才具有可复制性。



反思与启蒙——记昆明之行



: 蓓蕾涅槃

探求历史疑问、汲取知识的日子对于我来说总是过的很快——这就是兴趣的力量，如果放在一些同学身上，这样的实践日子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非常难熬的。而如果让我整天看着韩剧类的肥皂剧我也是会如坐针毡似的发疯的——这也可以体现人的独特性吧。

这次为期五天的“彩云之南”昆明实践是在学长的强烈要求下去的，最初目的在于提升自己。之所以选择 YCA 昆明活动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神秘感：传说中的香格里拉，美丽的滇池，闻名的普洱茶……种种小资情调使我无比向往着此次享有“春城”盛名的昆明之行。

实践的实际过程是这样的：第一天上午与昆明机床厂老工人座谈，下午与 200 号军工厂老工人座谈。第二天与几位云南造反派老人交流。第三天参观西南联大、李公朴殉难处、云南地下党活动旧址、陆军讲武堂旧址等历史遗迹，倾听中戏左翼老师的讲座。第四天参观家馨社区儿童救助中心并与老知青交流。第五天与云南知名维权人士交流。每天晚上分小组对当天的活动进行讨论，再选代表进行总结。与原计划相比少了关于跨国阶级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政策分析以及社会调查方法讲座和经验交流。不过五天下来东奔西跑，学习交流，每日约七点半起床，日日彻谈到晚间十一时左右，后面两晚上连公交都没了。虽辛苦，却也获益不少。

先说第一点收获吧，认识了一群自称为“左派”的青年朋友。这在我原本的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身边的朋友大多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很少有开始思考社会问题的。大多只是看看书，参加些社团，旷旷课，谈谈恋爱而已。而来参加这次实践的朋友无疑给了我很大的惊喜：他们有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也有教师，已毕业参加工作的学长。大家身份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基本属于 YCA 读者，都很关心社会问题（教育问题、贫富差距、国家体制……）。所以尽管大家一开始都不认识，但对相同问题的关注使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讨论滔滔不绝，辩论高声不止。而如果把这些问题拿来和我的同学们讨论，恐怕会得个自讨冷清的结果——当然，这与大家年龄小、经历少、思考少有很大关系。年龄小，虽有基本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但所思考的问题广度与深度仍然不够，于是干脆停留在问题表面，认为政府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讨论也没啥意思；经历少，即社会实践不够，这是由年龄小、一般由家庭庇护解决问题的现实情况决定的。很多同学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殷实，父母往往只愿其安心学习，而不会与小孩详谈家中遇到的困境及社会问题；思考少则由人的天性和生活环境决定。人的天性是包含惰性的，所以遇到麻烦时第一反应都是畏惧、害怕，而我们的生活圈子里多数人都不愿费脑细胞思索问题，甚至包括我们的父母。唯有自我要求较高、勤于思考的奇葩才会愿意让一批批脑细胞的“死去活来”。

而第二点收获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收获就是改变了我的社会观。五天的学习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讨论，更有深层次的分析：什么导致了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国家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文革的历史真相是什么？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什么？五天的学习让我很惭愧，一开始我竟然还抱着来玩的小资心态……在他们的引导下，我和我们社团的队友们提出了很多疑问。YCA 的同志居然也不厌其烦的给我们分析讲解，真的很感谢他们。

先来回忆下第一天的学习。

第一天上午是与云南原机床厂的一位老工人进行交流。老工人约九点就到了一——其实他原本可以比我们还先到的，但老人在外面不知道进哪间屋子，又没有手机，所以耽误了些时间。老人不会说普通话，不过方言也基本能懂。看的出来他对自己年轻时的工厂生活充满美好的回忆——他介绍道，那是个以当工人为豪的年代。工人以厂为家，工作、医疗、生活、教育一体化，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但人们生活很幸福，工作很卖命。给自己家干活，能不卖命么？不像现在，贫富差距那么大，工人早已不是个光荣的职业了。

老人的话使我想起平时生活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家长偷偷指着工人或农民这样教育小孩：“不好好努力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工人、农民成了新一代青年人最看不起职业。这是个阶级严重分化的社会，穷的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富的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真就是杜甫先生写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工人已经不再以厂为家了，怠工情绪严重，能懒则懒。

暑假的时候我就到一个玩具厂进行过社会实践。这还只是个两百号人的小工厂，工人与经理、厂长的工资就有好几倍之差——厂长经理仅是压榨工人的最浅层，上面甚至还有各种股东、银行、放高利贷者。厂里无论正式工、临时工都是慵懒的工作态度，人人心里都惦记着下班时间，一到点了全体工人蜂拥而出，组长、主管也是迫不及待的拉闸关门——有一次我出来慢了还差点被主管关在厂房里头呢。我爸妈在的厂也差不多，听他们说离下班还有二十多分钟就有人坐不住想走了。现在的工人还有几个有敬业乐业的精神啊？

下午是一位参与研发中国第一代重机枪的老工人。他还带了一本记录自己光辉事业的手册，谈起自己的工厂经历来神采飞扬，精神抖擞。我翻开手册一看，前言很短，结语不长，中间的光辉事业也就是参与研发了中国第一代重机枪和担任了一段时间工厂校长嘛，至于这么自夸与骄傲吗？毛主席不始终强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吗？年轻人的自大坦率心态让我对这位老人没什么好感，再对他一百度，显示的内容在册子里边也基本都有，于是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不怎么认真听了。其实现在想想那老人也不算自大，人一辈子难得年轻时有些成就，搁谁身上能没点光荣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呢？这位老工人的荣誉感，不仅是他个人的，更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他们自己的力量，实现了中国的初步的工业化。西方资产阶级办到的事情，东方无产阶级也办到了。

晚上回顾一天的学习，使我陷入了深思：**改革开放属于什么性质？真有利于社会主义进程吗？**

我查了下，改革开放的百科名片是这样描述它的：改革开放（reform and opening-up），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减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这样看来，改革开放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是要发展经济促进民生。

然而具体政策落实后却弊病重重：在国企改革中因为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厂长权力剧增——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任免或聘任中层干部，提出福利奖金分配方案，可制定企业重要规章制度，可奖惩工人等，于是慢慢的厂长这些领导阶层们假公济私，出现了企业大量破产和管理人员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部分国有企业被管理者收购，从而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在教育改革中，20世纪末由于中国处在第二产业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境况下，市场需求大量的工人而不是大学生、技工，故导致大量大学生毕业失业。如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也基本都是供大于求，在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及两极分化的社会关系中，从来不缺少劳动力。过去我国所讲的中国没有失业的情况不复存在了。另外由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弱，导致优秀师资大量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参加活动的兰州大学的同学告诉我自己学校就是如此。我查了一下资料，兰大曾是我国非常优秀的大学，然而由于位处西部，孔雀东南飞。2006年6月28日，中国甘肃网新闻报道，“10年流失人才可再办一大学 兰大何日圆梦”，文章真实反映了兰大1996-2006年十年的人才流失现状。这与改革开放前国家大力支持西部建设形成对比。在住房改革中，90年代中期分房福利取消，中国商品房市场开始高速发展，伴随1993年税制改革，中央将地方70%的税收收取，但义务教育、基建、医疗的支出还在地方，地方只能靠大量拍卖土地填补财政不足。在土地财政、银行资金大举涌入等因素下，房价暴涨；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基尼系数2012年已达到0.474，而2008年是0.49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出现爆发式增长，但是工资占GDP比重不停下降，从1985年56.18%降到2007年的43.12%，连续22年下跌。因为贫富差距导致众多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州织里事件……

贫富差距大、工人怠工情况普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大量大学生毕业失业、城市房价暴涨……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改革开放使得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化，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不是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而是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呢？以前我从来没在意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当然是社会主义了。可是这几天的学习让我更加明白，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关系，资本家通过雇佣关系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没对社会主义下过定义，但他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对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存在阶级区分，也不存在剥削问题。这样看来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中国特色”，看来也不过是一项冠冕堂皇的帽子罢了。叫上“中国特色”，就可以避免相当一部分无产阶级意识到它的实质啊！从自己朴素的观点来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某国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一是如果想建设为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就光明正大的改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要一方面宣扬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却做着资本主义国家做的事情。二是根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分析，在资本社会中，占很大一部分的无产阶级永远是被剥削的对象，资产阶级则对其进行剥削，其最终形态——帝国主义必然会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即两极分化。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初级阶段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生产资料已转化为公有制，没有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剥削，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所以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就保证了人们的相对公平，使社会长期稳定。如此说来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也会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优越的社会制度，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我们再来说说文革的问题，文革真的一无是处吗？我们知道，官方对文革的评价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

治运动。”然而，文革真的是错误的吗？文革，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为整治党内的官僚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的革命。对文革的时间界定有几种说法，在这里我们暂以教科书的为准，1966-1976年。20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刚刚经历土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经济得到复苏，党内有些官员开始懈怠革命信念，滋生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1964年的苏联正处于勃列日涅夫时代，与中国多次发生边境军事冲突，这个已经逐渐“变质”的社会主义老大哥使毛泽东开始思考着如何使中国不“变质”。据史料记载，毛主席在研究苏联问题的时候发现，苏联的领导人始终高高在上，而没有深入群众，于是不了解群众生活，渐渐也不能为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执政也就成了为自己当家做主。所以毛主席在文革中提出“上山下乡”，废除高考，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打成一片。单从这里看就可以发现文革并非一无是处，只是由于党内走资派敌视阻挠文化大革命，才使它失败了。

还有一点收获就是我的小资情怀也得到了一点满足：我见到了一个美丽的鸽的天堂——云南陆军讲武堂对面的翠湖。湖上水鸽成群忽上忽下，忽起忽落，大致数来约有上千只，成为湖上一道独特的景观。惹得不少游客投喂鸽食时倚逗水鸽来手中取食。然而鸽子毕竟是灵性动物，怎会上钩？翩翩羽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从游客指端飞过，却不去取那鸽食。然而往湖里一观，前景却令人堪忧：湖水绿中泛黑，除了鸽粪，还有些许塑料袋和烂瓜果。悠悠湖水，可远观而不可近察焉。我更心生纳闷的是：这成百上千的水鸽从何处而来呢？为何日日在湖上盘旋也不飞去？光尧大哥告诉我，水鸽自滇池而来，不飞离的缘由却不知。我上网一查，才知将人家名字也搞错了，这家伙呀，不叫水鸽，叫红嘴鸥。经专家鉴定是从北方飞来昆明翠湖、滇池、大观楼、盘龙江过冬的。既然是来过冬的自然不到二三月份也就不会飞走了。这鸥是成为昆明靓丽的风景了，可这湖水……湖南、云南、北京，恐怕全国的环保工作都堪忧啊！

昆明启蒙，主要是政治思想的启蒙。从云南回来后我就一次次的思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实问题与理想问题……不过关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我是很认同的。目前学习不够，也许将来我也会是一个 **communist**，一个保尔似的为此而奋斗的 **revolutionary**！

中流擊水

Fighting voices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1.28.-1895.8.5

希望你们的努力将成功地使大学生们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

毛泽东

1893.12.26—1976.9.9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论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黑夜里的牛

中国左翼运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期。社会主义回归的预言落空之后，左翼改良主义在中国最先进的一批青年人中正逐渐丧失影响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经被不少青年所接受。现在，革命左翼讨论的焦点已经从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执政党阶级属性的判定，转移到工人运动发展阶段、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关系、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行动等问题上来了。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左翼开始摆脱改良派的思想束缚，这是十几年来中国左翼运动最可喜的进展；另一方面，认识到改良主义错误的社会主义者，又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没有对社会、工人运动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从而也未能提出系统的长期斗争计划的情况下，仅仅凭着革命的热情，甚至是在完全错误的形势判断的指导下，就匆匆投入了战斗。这样的斗争也许会因为战士的坚强和献身精神取得一些暂时的成绩，博得工人和左翼知识界的同情，吸引一批又一批青年投身进去。但是，像社会主义这种需要彻底改变阶级关系的伟大社会运动，是不可能以这种原始和粗糙的方式取得胜利的。革命导师尤其是列宁已经深入详尽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共运的历史也充分表明了忽略这个问题的危害，那就没有任何借口在行动之前，不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行严肃的思考。

社会主义者必须对工人运动、经济形势、政治思想环境和左翼力量等重大问题形成客观判断。首先，当前的工人运动才刚刚起步，发展非常不充分。罢工事件虽然时有发生，但工人组织的建立却非常困难，而工人如果没有组织，就很难不断积累斗争经验，提高斗争水平。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现实。很多同志在工人运动方面估计过于乐观，存在过度美化工人运动水平的问题。不少人看到了工人运动相对前几年的发展，却没有参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历史，认识到工人运动还只是处于工联斗争的最初阶段。还有一些同志把工人的斗争性跟自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做对比，发现工人虽然没有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却敢于跟资本家做斗争，而自己尽管满脑子革命幻想，却还未“真刀真枪”跟资产阶级干过。于是认为工人觉悟高，工人运动的水平已经比较发达。有这样想法的青年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阅读工人运动史。

关于中国经济形势，无论左派右派，其中都有相当部分人倾向于唱衰。之所以唱衰，是因为他们比较希望出现经济问题，而恶化的经济形势所造成的动荡将有利于社会变革。但是，经济形势是客观的，决不会主动去符合我们的期望。如果一个政治团体将自己的行动计划建构在主观现象的基础上，就一定会遭到现实的惩罚，导致悲剧性的失败。社会主义者尤其应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对于危机前的确不妙，但在全球哀鸿遍野的衰败情景的对比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等等指标都是非常乐观的。而且，随着中国在相当多的行业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产业对印度东南亚国家又仍然保持着优势，因此顺利成为第一工业大国，并且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第一工业强国迈进。许多严谨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将持续多年。

有些同志可能不太同意我们的判断，而他们反对的真实理由往往是高速的经济发展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工业高涨时期工人不害怕丢失工作，反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虽然这种斗争不会直接表现

为对制度的否定，但自发运动的高涨是自觉斗争得以发展的前提。有些同志机械地看待危机和革命的关系，以为只要经济形势一差，马上会有革命运动。实际上，危机可能会导致革命，也可能只会带来骚乱和抗议。如果没有广泛地能够把工人阶级力量团结起来的组织，危机带来的也许只是旁观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还有一些人宣扬“三五年（或七八年）就要天下大乱，革命形势就要到来的”，不知道他们仅仅是为了激发青年们革命幻想，还是其他什么目的。要知道，某改良派大师在零六年的时候就预测了几年之后将发生社会主义回归。他猜中了开始，却猜不中结局。青年们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学会独立思考，要学会拒绝简单的结论，必须要求将结论置于严谨的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之上。

关于政治改革，自由派比左派更着急，甚至有点望眼欲穿的感觉。但中国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仍然只是在纸上，在现实中，政治自由还是一句空话。而没有政治自由，工人运动的发展就受到很大的阻碍，社会主义宣传和组织工作也受到很大阻碍。有些同志认为，现在的政治已经很自由，因为“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少自由”，自由不是白送来的。即便在欧洲，你没有力量就不会有政治自由。但政治自由的实现就意味着，被统治阶级强大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通过具体的力量展示来获得一时的自由，而要求与统治者定义规则，把这种斗争带来的自由固定下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很强大，所以争取到了几十人的罢工与几万人的罢工一样，都不会遭到警察野蛮镇压的自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未达到这种程度，因此也就没有这样的自由。

至于思想方面，“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就代表着一种严重的矛盾和分裂。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造成了“新三座大山”、不断拉大的城乡差别，对工人阶级的高强度的剥削和政治压迫等。这些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其实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宣传的。但当局对社会主义旗帜的霸占，使得人民群众普遍反感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非常流行，加上中国的教育极大地阻碍了学生思想的发展，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这些因素都造成青年中严肃地关心政治的都很少，更不用说认同马克思主义。所以，社会主义者在拥有理论自信的同时，必须充分估计到舆论环境中的各种不利因素。

有的同志会觉得以上的形势判断非常悲观，其实，更悲观的是我们对左翼力量的估计。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还不够高涨，发展程度不够，但这样的自发运动也已经远远超过了自觉的社会主义群体的发展水平。左翼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其中真正愿意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出钱出力，甚至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绝对是少数。以社会主义者当前的规模，尚不足以承担提高一个地区工人运动水平的任务，更不用说推动工人运动在全国层面的发展。这是我们考虑行动计划的起点。只有客观估计社会主义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能够完成的任务，才是负责的和建设性的。而不顾自身力量大小，提出一些非常远大的目标，这样做除了让自己和受自己鼓舞的人感到很快乐很有生活的激情之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运动的不发展带来了列宁所说的“手工业方式”的流行。在泛左翼全国性组织由于感召力下降而失去了对左翼运动的控制之后，各种小团体就流行了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小团体不仅没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为当前的革命指出一条路来，即便说实际工作方面，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成就。同时，小团体间也缺乏有效的联系。在列宁的时代，由于秘密工作和通信技术不发达，小团体间联系很少甚至都不知道对方存在，这就造成的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组织的缺乏。而今天小团体间的交流障碍，往往不是通信技术的不发达或者地理隔离，而是由于缺乏宽广的视野造成的小团体意识，人为地阻隔了当前最缺乏的严肃理论交流。尽管小团体意识的存在也有其客观基础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小团

体意识过于强烈，把小团体的利益放在整个运动之上，那就必然对社会主义者未来的联合造成阻碍。

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但无产阶级是一个又一个无产者个体，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某种身份认同，更标志着整个雇佣劳动者群体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群众组织是联系无产阶级个体与整体的第一个环节。但专制国家的群众组织如果带有较强的政治性，也会像反对派组织一样，受到打压。所以，群众组织要么变成秘密组织以保持政治性，要么维持广泛地联系和影响却失去政治作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把原本需要形式上广泛的群众完成的高度政治性的工作分离出来，由主要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完成。很多人觉得讨论组织是危险的，但运动如果发展，就必然提出组织的问题。而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越是发展，对自觉的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的需要就越是强烈。真正能够避免危险的，就是建立能够适应当前社会环境的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盲目的行动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

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绝不是脱离广泛的群众组织而单独起作用的小团体。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的功能就是组织和协调各个受社会主义者领导的群众组织、潜伏在其他阶层中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同情社会主义的其他个人或组织，汇集他们的作用，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力量。没有这样的组织，群众组织就不能超出自身的狭隘性，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就不能一直向着最终解放的方向发力；没有这样的组织，就不能使得愿意彻底投身而且也适合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能够脱离谋生的劳动，专门地做政治工作，也就不能提高和集中自发运动中的自觉因素；没有这样的组织，分散在各个阶层中的社会主义者和同情社会主义的群众就没法把自己当前的斗争与最终的理想联系起来，就会丧失斗志，甚至放弃理想。

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组织小或者没有组织首先还是因为人少。列宁在《怎么办？》里谈到组织工作时说，当时“没有人，而人有很多”。他指的是愿意反抗现存制度的人很多，但同时“又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而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开始高涨，建立独立工人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运动的自觉方面而言，不仅缺乏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而且缺乏构成这种组织的材料。所以，我们是“没有人，还是没有人”。既缺乏“心怀不满、愿意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斗争的人”，也缺乏能够把这些人的力量组织起来的人。而且，后一部分人相对于前一部分人来说，仍然过少。我们都承认影响广泛的群众组织出现和坚强的核心组织的建立是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但当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直接去建立核心组织。在左翼自身力量非常弱小，亟需壮大队伍的时候，应该着眼于革命家团体的发展，从资产阶级控制最弱的地方入手，发展革命知识分子。之所以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当前工作的首要位置，不仅因为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善于做组织工作，更是由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也往往对劳动人民有同情心，是人民群众中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只有左翼壮大了，其中愿意投身革命事业的人才会多起来，同情并且愿意帮助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才会多起来，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也就有可能建立起来。有的同志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自己应该跑到工人中去当一个普通工人，把自己锻炼为一个普通的鼓动家，甚至只是成为一名“普通工人”。这样的同志也许是真诚的，但事业不仅需要真诚的人，更需要能够想到如何把事情做成的人。

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工作不仅在当前是急迫的，实际上，到革命胜利前，它都一直会是我们的任务之一。因此不能急功近利，要有长远的眼光，长期的计划。群众工作是组

织工作的基础，只有坚持在群众中扎根斗争，才会有机会影响大批有才干的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肯定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同志们在倾吐自己心路历程的时候，往往会提到杂志报纸、书籍、影视作品、或者老师同学在自己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对个人来说，这些作品就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接受它也许是巧合，但它的存在却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运动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些人和物都是前人奋斗的结果，是更早的运动传统的延续。这也就是葛兰西的所谓“阵地战”的精髓。斗争的要点就是占领阵地。大学讲堂、报纸杂志、娱乐界等等都应该是我们占领的地方。除了占领已有的阵地，我们还要创造据点，要到所有劳动群众那里去把群众组织起来。在运动初期应该首先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去建立组织。群众组织决不是小一些政治组织，不能弄成秘密的团体。群众组织必须尽量广泛，要变成接地气的有吸引力的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群众和社会主义政治组织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现在很多左翼社团把自己定义为社会主义政治团体，志向远大，色彩鲜明，而不太顾及群众的一般政治思想状况，忽视了把社会主义和周边（在吸收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多的群众联系起来的任务。错误的定位导致许多左翼学生社团既没有起到群众组织的作用，也更不可能去完成政治团体的目标。

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宣传进步思想。但宣传不是忽悠，社会主义者在群众中活动的时候，也一定要坚持理性客观的精神，以真诚的态度与群众交流，通过对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等方式，逐步在群众中普及社会主义思想。这就要求社会主义者，尤其是知识分子要具备基本的理论素养。许多同志抱怨学了理论没什么用，号称“理论不需要太多，差不多就行了”。这种观点在左翼学生中的流行颇让人担忧。今日的工人已经不是解放前农民，已经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社会主义者如果想要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就必须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科学知识。否则，不仅不能说服群众，遇到新变化新现象的时候，连自己都无法说服。学习科学知识就必须抱着严谨的态度，毛主席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需要提醒一句，有的同志也许不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而是没有动脑筋想过运动要取得成功到底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做些什么？对这部分同志，我们建议好好思考下这类问题。如果自己不属于那种愿意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来的人，就不要勉强自己。立足于当地，业余从事一些群众性的工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组织提供一些支持，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斗争必须讲求策略。选择阵地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要明确应该到哪里去斗争。以工人运动为例，应该是到工作场地去斗争，还是到工人社区去做工作？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工厂里上班的工人和工作之后的工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是又不是。对于工人自己来说，自然是；但对资本家来说，就不是了。所以，社会主义者在社区做工作，招致资本家的反感会少一些，也能够建立与工人的联系；而如果在工厂里斗争，则是跑到资本家的老窝去闹事，自然会遭致最强烈的打压。社会主义运动最终肯定在工作场所全面展开，但在运动初期，弱势的一方应该先进攻敌人的薄弱环节，甚至是缺乏政治意识的地方往往会忽视的地方。把有限的力量投入到攻坚战，往往徒劳无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社会主义分子在工人社区活动会取得相对较好的成绩，而立足工厂内部的工运工作难见成效。学生工作也是如此。如果哪个社团采取了搞罢课等会破坏教学秩序的斗争方式，就往往会受到校方的清算，而通过学生课余生活的类似课外兴趣小组的文化活动来传播进步思想，则不会引起太多注意。这种斗争的辩证法是普遍适用的。

社会主义者自然必须密切组织工人运动的动向，尽可能地介入其中。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社会主义者应该在整个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而不论整个社会主义者的出身是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还是资本家。首先，工人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获得生活条件的改善，能想到的就是团结起来进行经济斗争。作为商品的雇佣劳动者以厂为单位，随后走向整个行业范围内的斗争，这一工联斗争的发展进程是市场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不论这一斗争中有多少血泪，多少歌者诗人参与其中，或者多少学生扔掉学生证或者毕业证跑到工人中进行斗争的鼓动，工联斗争从整体上讲仍然必须被视为自发。而这种自发性恰好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体现——不是群众突然想要在人间建立天国，也不是读了《资本论》发现被剥削了不爽，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走向与资产阶级对抗的组织化的斗争。资产阶级无法阻止这一运动，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拖延、分散和削弱其政治性。所以，社会主义者所要做的就是加速这一过程，并尽力提高运动的自觉水平。无产阶级的数量是远远多于包括本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数量的，这也是唯物主义规律的体现。所以，社会主义者要做的不是直接去组织一般的工人，而是尽量发现、培养和保护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鼓动家和活动家。这些有斗争经验的工人就是运动最先进的部分。而要发现这样的工人，首先就要求社会主义者能够参与到与工人阶级有广泛联系的群众组织，或者是从事诸如劳动维权之类的能够辐射较大人群的工作。卖掉公司卖掉房子跑到一个一般的工厂里去干每天 11 个小时的活，做得好也许能把本厂的工人组织起来斗争。但在你斗争的时候，也许同一个区的另一个厂就有工人活动家组织了比你成功得多的罢工，而这位工人如果没能得到照顾和培养，就往往会丢了工作，整日为生计发愁。如果工人的自发运动高涨，这样的工人决不会是少数。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是自己去完成一个普通的工人活动家就能完成的事情，还是应该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去做普通工人完成不了的事情：帮助他们实现职业化（而不会为了生计每天工作 11 小时），培养其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等等。坦率地说，以目前的左翼分子数量来看，即便都有超强的群众工作能力和忘我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沿海工业区去也是石沉大海，翻不起一点波浪。当年恩格斯考虑到他和马克思都没收入，而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才干要胜过自己，便放弃专门的理论和政治工作，去曼彻斯特谋取了一份枯燥的能挣钱的职位。如果进入工厂的社会主义者发现到自己的鼓动能力可能不如先进工人的时候，也应该考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高工资的工作，然后省吃俭用地把工资剩下来给这些工人鼓动家，让他们可以成为职业活动家。现实的实力对比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地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而不是任由内心的激情压抑理性的判断。当然，在工人鼓动和组织方面有才能的同志，是可以也应该直接投身于工人运动的，而社会主义者的核心组织的大力支持会让这种介入持久并产生可以积累下来的影响。

运动的不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社会主义者时而消极时而亢奋。左翼学生不知道跟同学随便谈谈“国企改革问题”有什么价值，不知道阅读理论有什么价值，也不知道自己毕业之后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并非庸人自扰，很多毕业后的前左翼学生确实是在这种茫然状态中消极，然后慢慢淡出。于是，很多人就自然而然地想做一些跟工人有关的事情。别的事情不靠谱，工人的事情总是有价值的吧。毕竟沾了“工人”两个字，似乎就离运动近了一些，也就离自己所认定的目标近了一些。找到事情做了，于是又亢奋起来。对于这些同志，首先要肯定其立场，他们在没有找到路的情况下，还是一直努力地想要做些事情。但同时又必须指出这种方式的问题，那就是在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情况下，不努力地在研究理论和现实基础上寻求道路，而是简单地给自己一个立场的安慰。但事业要胜利，就一定要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仅仅有拳头不够，还需要大脑。缺乏理性求实的精神是当前左翼的一大通病。要把运动往前推一步，就必须克服这个毛病。离开组织，社会主义者往往会成为运动的尾巴，而不是先锋。所以必须推动核心政治积极分子的形成，在核心团体的组织下，大家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对于整个运动的重要作用，就不会陷入无意义的茫然之中。此外，还必须指出一条能够看到希望的道路，而不是让大家做“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最后还必须再谈谈左翼联合的问题。左翼团体不是企业，他们的联合不是现实的“利益”；但也不像文人圈子，联合常常只是因为聊得来看爽。左翼团体的联合应该而且只应该基于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革命。宽泛地看，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合并在一起肯定是最好的。当下的实际情况是，各个团体的政治水平差别较大，甚至在成员的构成上都有较大区别，而许多团体开始时间不长，还来不及发现自己的问题。没有经过充分的理论争鸣，没有确立普遍认可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左翼即使把左翼联合作为一项急迫的事情提上日程，是草率的、不负责任的。这样的联合一定是空洞的，不稳定的。但这并不是表示不应该向联合的方向发展。联合的努力必须切合实际。应该大力提倡各个团体克服小圈子意识，让大家都充分交流起来，把自己的观点充分展示，让不同的观点在理性务实的氛围之中充分碰撞。切勿乱扣帽子，把观点差异无限拔高为立场差异，把同志间的讨论变成敌对阶级间的相互攻击。刚刚接触左翼的青年人尤其应当注意这一点。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应该明确了群众组织和专业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区别和各自的作用、社会主义者介入工人运动的方式，以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重大作用。社会主义者可以很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任务：发展革命知识分子、向青年学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进入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发展工人革命家，促进全国性的社会主义者联合，以及确立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其中每一项任务都是非常浩大的，需要许多人参与。我们不是没有事情做，而是有太多事情做。问题的关键是，同志们是否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对左翼青年进工厂问题的思考



: 尘沙

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但结合的意愿是一回事，结合的方式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每一代左翼学生都会面对同一个的问题：知识分子应如何与群众相结合？现在许多同志就提出，革命知识分子必须进厂，只有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普通工人，才算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对于这种观点，许多同志都表示持保留态度。下文作者就是其中之一。作者是一名大二学生，在接触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之后，通过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文章的内容不局限于进厂，还涉及到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关系，低潮期社会主义者的任务等重要问题。引发讨论是作者写就此文的主要目的，希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能积极表达观点。

当前，左翼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经过革命左翼与改良左翼的斗争，有很多左翼青年已经摆脱了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束缚。但更重要的问题又被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真正无愧于自己的信仰？

当前的左翼青年，往往是在大学中接受新思想的。他们中的很多出身于无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家庭，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现在做一个假设，如果这些青年没有接触过新思想，他们将会如何生活？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后，一般能掌握一定的技能。但这些技能，一般不足以使他们上升为资产阶级。所以，这些工人子弟，在毕业后一般能成为掌握一定技能的雇佣劳动者。而我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在今天未必会比掌握技能的雇佣劳动者生活得更好。所以，这批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在大学中学到一定技能后，很有可能不会继续从事父辈的小生产行业。故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和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一般不会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上升成为资产阶级，而往往会成为掌握一定技能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属于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而属于无产阶级，也就是所谓的熟练工人。

当前有一种认为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论调。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这种论调从经济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种认为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论调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倾向于当前统治秩序的思想广泛地存在着，即便在工人中也是这样。在这里引用《共产主义 ABC》中的一句话，“工人和农民的情况也类似这样。有的说：‘得啦，我们凑合过吧，我们少管闲事。我们的祖先从前怎样生活，我们也就怎样生活。’这些人什么也不参加，甚至不懂自己的切身利益。”^①这就是我们一些同志通常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经济地位更容易产生这种思想。但这种思想不仅存在于小资产阶级中，而且存在于工人阶级中！

斯大林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前者，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较后者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无论在自己人中间或外人中间，到处都可以碰

到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则刚刚开始走了几步，刚刚给自己开辟道路。”^②可见，这种保守的思想，与其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如说是无产阶级中广泛存在的保守思想。在阶级社会中，主流思想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主流思想不但被统治阶级所信奉，同时也窒息着被统治阶级。

由于很多学生（毕业后）的经济地位与普通工人不同，学生与普通工人“被资产阶级反动教育毒化”的程度不同，学生整体可能比普通工人整体更倾向于保守。我们应当看到学生本身存在着这种保守倾向，但并不是说，普通工人中就不存在这种倾向。学生保守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学生与普通工人的差异，而在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广泛影响。这种影响对普通工人也是存在的。无限地夸大学生与普通工人的差异，不是把工人当做客观存在的力量，而是把工人当成一种偶像去崇拜！

把工人无限理想化，认为工人中没有保守思想，从而把所有的保守思想都当成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把学生当成小资产阶级的根源。

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思想，即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而不是广泛存在于无产者之中的思想！觉悟的学生，掌握新思想的学生，必然比无产阶级整体更加进步。一味地、不加选择地强调学生要向工人群众学习，是形而上学的标签化的阶级分析，是错误的。

那么，作为已经觉悟的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办？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关注工人运动，但是不能神化工人运动！作为学生的我们，应当多与工人打交道，必要时进入工厂接受锻炼。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成为一个工人”？我们中很多人就是出身于无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家庭，在大学中学到的技能不足以让我们上升为统治阶级。在我们面前，其实不存在是否成为无产阶级一员的问题，所以“成为一个工人”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这句话所说的意思大概是成为一个普通工人。我们与所谓普通工人的差别在哪？无非就是多掌握了一些技能，是熟练工人罢了。

这样看，所谓“成为一个工人”，其实等同于“一个熟练工人放弃原来的工作，而从事一个他所不熟悉的工作”。从理论上来说，看不出这和搞工人运动有什么必然联系。从实践上来说，与普通工人同吃同住同上班，是否真正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呢？我认为不一定，以其他有别于普通工人的身份介入工运，效果可能更好。一方面，熟练工人和非工人，如工程师、律师、医生、记者等，比普通工人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资源去促进工运；另一方面，熟练工人和非工人，社会地位（注意不是阶级地位）高于普通工人，这地位虽然是从我们所反对的旧社会中继承的，但我们不该拒绝利用这种旧社会的遗产。普通工人的思想，其实是社会上的主流思想，在这种主流思想的影响下，工人会更欢迎地位高的而又能帮助他们的人（不帮助工人的人自然得不到欢迎）。

我们可以延伸出一个问题：在当前，职业不是工人，是否还可以成为马列主义者？相信现在已经不需要再进行论述了。工运史上，非工人促进工运发展的例子，不在少数：二七大罢工中牺牲的工运领袖施洋，职业是律师；中国最早的女共产党人之一向警予，对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起了重要作用，职业也不是工人。可见，非工人不但可以成为马列主义者，而且可以成为促进工人运动发展的优秀的马列主义者。

上面对于“成为一个工人”的讨论，只是对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左翼青年来说的。对于资产阶级出身的左翼青年，“成为一个工人”固然可以当作与资产阶级家庭的决裂的表现，但这种青年的职业选择还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定。资产阶级出身的左翼青年，选择职业时也应当以运动的利益为标准。例如，恩格斯选择了商人作为自己的职业，但这是符合运动的利益的。

当然，不能否认学生有进工厂的必要。但以现在左翼的实力来看，学生进工厂只能起到锻炼自己和增长经验的作用，而几乎起不到直接促进工人运动的作用。工人运动目前还处于自发斗争阶段。工人运动依自己的规律而发展，无论有多少左青进工厂，都不能使工人运动很快超越这个自发斗争阶段。我们应当将自己进工厂的目的确定为锻炼自己，而不是直接促进工运。这样，进工厂的经历才能使我们能对现实有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而不是陷入空想。

对于工人运动，我们应当做两方面的思考：

一方面，我们应当考虑如何促进和引导仍处于自发斗争阶段的工人运动。工人运动不是谁想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而是以一定规律发生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工人运动，这种引导在最初是以帮助的形式出现的。要促进当前工人的争取直接经济利益的自发斗争，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才能帮助工人。工人当前最需要的，不是多一个普通工人去发动或者参加他们的罢工，而是在他们斗争时能获得特殊的帮助，包括法律上的、舆论上的，甚至是金钱上的。对于当前处于弱势的左翼来说，把工人社区而不是工厂作为我们的突破点，也许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考虑如何给未来的自觉斗争做准备。在把工人自发斗争提升到自觉斗争的过程中，需要的武器正是马列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承载者，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中最进步的一批人。发展进步知识分子队伍，将对未来的先锋队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人不能参加这种队伍，不过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而是以进步知识分子的身份参加的。可以说，这种进步知识分子的产生与其出身和职业没有必然联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说这句话绝不是开玩笑。组织起来的进步知识分子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承载者，其作用也就在于此。

一些同志热衷于说“几年（十年）就会爆发革命”。我们还是暂时放下这种主观臆断为好，我们不应该低估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也不应当高估自己的力量。德国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曾经说过：“当其他流亡者日日夜夜在计划着怎么推翻世界，而又以‘明天就开始’这种麻醉剂来使自己陶醉的时候，我们这些‘暴徒’、‘匪徒’、‘人类渣滓’（敌人就是这样称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和马克思的学生的）却坐在大英博物馆里，努力积累知识，为未来的战斗准备武器。”^③

李卜克内西所指的正是 1848 年革命后的低潮时期，他的话难道不值得处于低潮时期的我们警醒吗？他和马克思等人对“准备未来的战斗武器”的重视，正是为了更好地迎接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将来形势到来时，我们左翼青年做好迎接的准备吗？形势本身并不能带来革命，它可能只是带来抗议和骚乱，甚至有可能被改良主义者所利用。共产主义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不可能成功。我们左翼青年不应沉浸于推翻旧世界的幻想中，而应当努力为未来的战斗准备武器，以及扩大能够使用这种武器的队伍。

让我们直面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真理愈辩愈明，欢迎批评指正。

注：

①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 ABC》，见理论部分引言第一节。

1920 年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给了《共产主义 ABC》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列宁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党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同志在一本篇幅不大但是极有价值的书中作了极好的解释”。

②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见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9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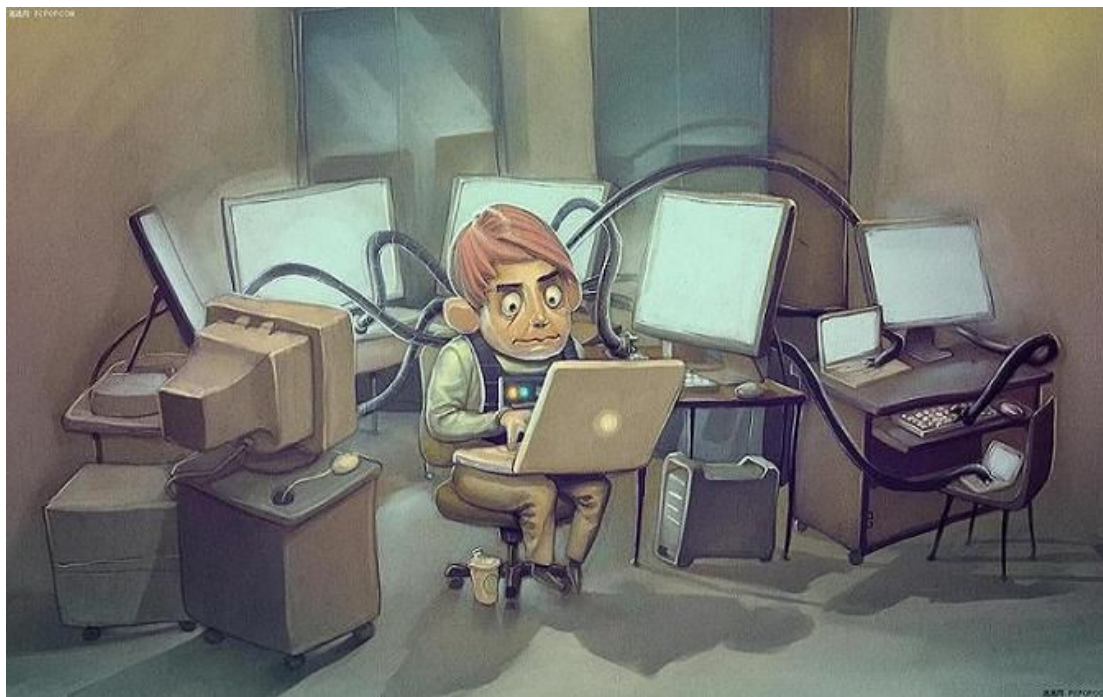
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4 月第 1 版），见第 173 页。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1867 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 年）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 年和 1890—1900 年）；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



是小资，还是脑力劳动无产者

 : 黑夜里的牛



最近经常能看到批评知识分子或“小资”的文章，其中有一些还是直接针对少年中国评论的网友群体。这些文章讲道德，讲理想，有觉醒，还有对工人运动的展望，慷慨激昂，内容丰富，但唯独缺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缺少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策略之基础的阶级分析。这些激进的批判者一直忽略的，正好是 YCA 同志反复强调的：脑力劳动者的兴起是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重要特征，用 YCA 同志的“行话”说，就是“**无产者知识化**”和“**知识分子无产化**”。我们会说明，对脑力劳动者群体的忽视，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产生这一问题的矛盾不仅是认识不清，更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必然结果。

由资本主义竞争所推动资本主义企业，不断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之中，在创造出巨大复杂的机器的同时，还创造出能生产和运用这些机器的技术工人。“劳心者”的无产阶级化和“劳力者”的脑力化将全面改变阶级版图。作为一支庞大的阶级力量，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的自动化，不仅造成机器排挤体力工人，还史无前例地提高了脑力工人在工人阶级总体中的占比。虽然目前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仍然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工人，但可以预见的趋势必然是，从事脑力和体力相结合，或者纯脑力的技术工作的工人将会成为主流。脑力工人的出现使无产阶级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的阶级，无产阶级队伍由以体力工人为主发展为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支基本力量的队伍，进一步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并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方向转化，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体力工人逐渐减少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丧钟已经敲响，恰恰相反，获得了知识和文化的工人不但能更深刻更全面地驾驭自然界，还将表明自己有能力去管理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建立在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相分离基础之上的阶级制度，也必将随着脑体分工的消失而彻底消亡。**意识**

形态家作为一个阶层将越来越显得不必要，从事生产管理和劳动监督的管理者阶层也会在新制度下被有知识的工人阶级所替代，而原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已经显得越来越多余的资产阶级，自然会消失得更加迅速和彻底。

阶级是剥削关系给人划定的一系列位置。剥削关系虽然需要思维的抽象才能认识到，但它的存在却是客观的，所以不能主观地随意地划分阶级。不能仅仅从具体的工作环境、意识、理论水平，甚至是谈吐和外在形象等方面来确定人们的阶级成分，而应该按照他们在剥削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来划分。具体而言，通过剥削获利的是资产阶级，通过帮助别人剥削获利的是管理者阶层，不被剥削就无法生活的是无产阶级等等。

有些人仅仅看到脑力工人和体力工人在收入上存在量的差别的表象，并据此把拥有高于体力工人工资的脑力工人归为中间阶级，而把体力劳动工人归为下层阶级，这种观点混淆了劳动具体形式的差别与阶级的区分，单纯以收入的多少来划分阶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一样，都是劳动阶级的劳动方式，虽然这两种劳动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职业差别，但绝不是阶级划分的依据，脑力工人具有无产阶级的全部经济特征和阶级特性，在生产关系中与资产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通过收入来划分阶级往往是存在问题的，濒临破产的资本家的收入有可能是负数，而工人（不仅是脑力工人）的工资也有可能被供求关系推倒很高的位置。管理者的工资可能超过某些资本家的收入，但这一点不会使得这个管理者就成为资本家，假如他不用自己的收入购买生产资料。

某些动辄以“工人”名号压人，四处批发“知识分子”和“小资”帽子的左派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批判对象，往往只是学习了马列主义的脑力劳动无产者。比如多次被批判的作者，就是IT行业的一名雇佣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也不负任何责任管理，工作上被监督，同样是遭受着剥削的无产阶级。这些批判者眼中的工人形象大概是穿着褂子，手持扳手，黝黑的脸，一笑就露出白牙。倘若某天，一个穿着时髦，还满口科学术语的工人走到他面前，他肯定会说：“别装了，工人哪有你这样的？一个工人的嘴里怎么会冒出‘弗洛伊德’这样词？”他们觉得工人阶级就应该听不懂马列主义的大道理，或者不能独立学懂马克思主义，不应该“附庸风雅”，更不能谈一些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听不懂的理论。言下之意，理论研究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本行，爱谈理论的缺点也只能是知识分子的“职业病”。如果某位工人谈理论甚至谈到超过他的程度，那自然是因为这位工人沾染了知识分子的坏毛病，或者干脆就算不得工人，是小资产阶级。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原因，这样的工人往往都是脑力工人。于是，工人阶级的概念就被圈定在体力工人的范围内，所有在这个范围以外的工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小资”或者“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大概是害怕脑力无产阶级抢了他们的饭碗吧！无产阶级如果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懂得马列主义，通过自己的研究制定斗争策略，哪还有“（狭义的）知识分子”来领导的份呢？而知识分子不愿意把脑力无产者看作是工人，把小资的帽子扣在人家头上，恐怕还是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大脑，最终还是要来领导革命的吧。也许有读者会觉得我们过于尖刻，但是同志啊，判断一种理论的性质，不光是看它说了些什么，更重要地是看它漏掉了些什么，看他忘记说，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

总有些喜欢高喊无产阶级革命口号的“革命家们”有意无意地把脑力劳动阶层放在工人阶级之外，从阶级地图中抹去这一阶层，轻描淡写地将其命名为“小资”。他们哪里知道，这正好符合了资产阶级的期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个生产日益被科学技术渗透的社会，脑力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劳动，是社会生产的核心部分。如果把脑力无产阶级放在一边，不去动员这支庞大的劳动者队伍，革命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不仅革命难以取得成功，即使革命成功了，革命后的建设也无从谈起。要组织或者推动革命运动，必须弄清楚一个基本问题：谁

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也就是说，要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阶级联盟的策略。因为受剥削最深最苦，体力工人当然是工人阶级中最具革命主动性的阶层，但脑力工人同样受着压迫和剥削，在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与体力工人的利益完全一致。如果哪一个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本属于工人阶级的脑力劳动无产者，放到作为革命友军的小资的位置，甚至放到模糊不清的“知识分子”的位置，那就不仅愚蠢，而且反动。

面对这些满脑子“工人”幻想、无限拔高体力劳动的人，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思想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吗？到底是体力劳动多些好，还是脑力劳动多些好呢？我想，大多数工人会选择后者。这个问题跟“到底是当老板好，还是当工人好？”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脑力劳动越来越多，体力劳动越来越少，体力工人阶层想变成脑力劳动者的意愿是现实的；但对无产阶级来说，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变成老板的愿望对整个阶级来说，都是一种空想。既然如此，那些拔高体力劳动，贬低脑力劳动的人到底在搞什么呢？

我们大概能猜想到，高喊“工人”口号的人，大抵自己不是工人。其中喊得最激烈者，往往是那些处于剥削者位置的人：管理阶层、资产阶级豢养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大学教师等）。他们是背叛了本阶级利益，投身到革命中来的。就像历史上那些来自剥削阶级的伟大的革命家那样，一方面对于无产阶级恶劣生活状况的同情和愧疚，另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腐朽生活的痛恨。他们的这一选择中有着强烈的献身精神。所处的社会位置越高，与工人阶级的差距越大，这种献身精神就越是强烈。

但是，正因为这种选择具有感性的特征，所以他们在分析阶级差别时，就容易重视感性的方面，会自觉不自觉地会刻意强调体力和脑力的区别，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活动中运用器官的区别，而不是把剥削放在阶级分析的核心位置。阶级社会中长久以来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象，使得他们对脑力劳动有一种道德上的反感。觉得自己是搞脑力活动的，所以对本阶级的背叛自然是要搞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总带有点“劳心者”的感觉，都算不得“纯正工人”。他们对工人阶级组成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视而不见，更无法理解脑力劳动无产者与体力劳动无产者相互结合之后，能够发挥的改变世界的作用。他们的分析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自己狭隘的经验出发。他们不是去解放体力工人，而是去禁锢他们。

我们走在完全相反的道路上：为脑力工人代替体力工人的现象感到欣喜。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这一转变会导致失业等问题，而这种现象正好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掌握世界的光明未来也就在这里。这一转变甚至会扫除上一次共运失败带来的巨大忧虑。生产劳动全面的脑力化，无产阶级全面的知识化，会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官僚化、资本主义复辟等生死攸关的问题奠定基础。忽视这一前景，共运的前途就依然乌云密布。如果体力劳动工人不大量地变成脑力劳动工人，官僚阶层在消灭了资本家之后，仍将是必要的；如果工人阶级不获得更高的文化水平，变得更有知识，那么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革命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理论争论背后的阶级斗争：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还是站在非工人的管理阶层和资产阶级供养的知识分子一边；是站在唯物主义一边，还是站在唯心主义一边；是站在革命一边，还是站在反动一边。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他们穿着农民服装，深入到伏尔加河、顿河和第聂伯河流域的广大农村，号召农民起来革命。今天中国的民粹派们，好像也正在发动声势浩大的“到工厂去”运动。他们穿着工人的衣服，深入到车间、网吧和台球室，号召工人起来革命。我们知道，俄国的民粹运动最终失败了，因为这些革命家没能认识到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才是最先进的阶级。而正是深刻总结了民粹派

革命家失败经验的列宁，最终带领俄国无产者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新时代的工人阶级和觉悟的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超越有心无脑的“民粹主义”路线**，要全面深刻地认识当代社会，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研究阶级关系中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与当前革命现实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

至于有些人说应该当群众的小学生，向群众学习。这当然是无比正确的。任何党员（群众本就是相对于党的概念）都应该向群众学习，因为只有真正理解了群众，才能带领群众。无论这个党员的出身是体力工人还是脑力工人，也无论这些群众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还是管理者阶层。一个人面对自己不懂的东西，**就应该虚心学习。这难道不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吗？**脑力劳动者缺乏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经历，对车间的工作相对陌生，所以当脑力劳动者出身的革命青年要在体力工人中开展工作时，自然需要一个相当痛苦的学习过程。反过来也一样。体力工人对脑力工作也不了解，陌生程度甚至更高，如果要在脑力劳动者群体中做工作，一开始的学习过程也会是非常痛苦的。不应该只强调脑力劳动者要向体力劳动者学习，而不注重引导体力劳动者向脑力劳动者学习。辩证法讲究的是全面地看待问题，而不是片面化，绝对化。分工造成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这两大相互区别群体，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在政治上缝合这种差异，避免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把所有的力量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当然，切勿认为本文的观点是反对学生进工厂。简单地说，作者只是反对用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鼓动学生进工厂，反对在组织未初步成形之前不加区别地鼓动脑力劳动者放弃当前工作，成为一个纯正的工人，即体力劳动者。对于屡劝不改，固执地宣传这种思想的同志，我只能说：你们继续宣传你们那一套吧，继续扣帽子吧！脑力劳动无产者不会被“小资”的帽子吓倒，他们会坚持不懈地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终将战胜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煽动。无产阶级自主的政治力量，终将“驯服”来自其他阶级的天使们。

漫谈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层



: 右边的基路伯

—— “三千块钱想请个瓦工？你想多了！三千块钱只能请个大学生！”

—— “放屁，三千块至少能请三个（大学生）！”

热门搜索：为撸首付猝死 美女 学霸 XP 刘强东 奶茶 找到181个结果

全部 好友 自己 | 类型:不限

排序: 最新 最热 智能



三千块钱想请个瓦工？你想多了！三千块钱只能请个大学生！

2014-05-08 17:08

分享



放屁，三千块至少能请3个！转自 转自 转自 转自

转自大学生起床协会

大学生起床协会：现在3000块你就想请一个民工。？？别开玩笑。。3000块你只能请一个大学生！！

2014-05-08 16:06

分享



现在三千块钱你就想请一个农民工？别开玩笑了，三千块钱你只能请一个大学生。

2014-05-07 21:11

分享



不到三千。转自我们都是13级

我们都是13级：现在3000块你就想请一个民工。？？别开玩笑。。3000块你只能请一个大学生！！

35

三千块一个月可以请一个大学毕业生，一千块一个月可以请一个大学实习生。毋庸置疑，知识青年已经普遍认识到大学毕业生无产化的现实，不仅如此，即使在无产阶级内部，大学毕业生也不见得就是其上层。“一部分蓝领”收入高于“一部分白领”的现状早已蔓延。

那么，到底是“哪一部分蓝领”和“哪一部分白领”？

一、两纬四分法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例子，瓦工实际上需要特定的职业技能，而且在房地产蓬勃发展的今天有一定的稀缺性。而大学生往往应了“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学习内容严重脱离工作技能，简历上最假的一句话就是“精通 office”，实际上真正配得上这句话的都去拿 20 万年薪了。

同时，国民素质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办公室技能门槛的提高。比如，过去熟练快速地打字是门少数人掌握的技术，在我小学的时候，为打字机的使用专门开设了一个兴趣小组，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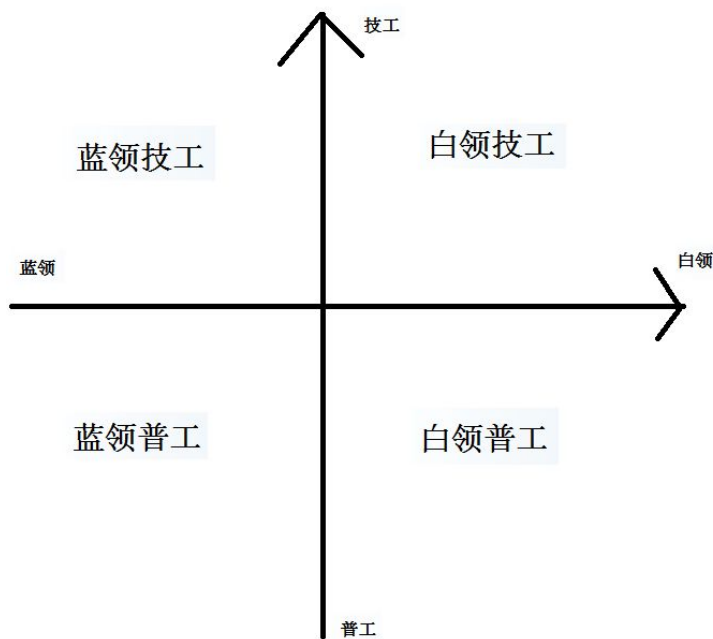
在谁把这个作为一项技能写在简历上就是自取其辱。很多大学生参加工作后，甚至仅仅在办公室实习之后，都会变得很迷茫：“我手上这些工作其实初中生就能做。”其实并不只因为办公室工作变简单了，也因为初中生变聪明了。

缺乏看家本事也就罢了，数量还特别多。最近几年每年新生儿数量在 1600 万左右，2013 年大陆大学应届毕业生 699 万，2013 年为 727 万，假设今后大学不再扩招，也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同时，2013 年新增就业岗位仅仅有 900 万。就算全部新增就业岗位都提供给大学生，也严重缺乏选择余地。

大学生过剩，而技工紧俏，无怪乎《教育部副部长称全国 600 多本科院校将转型职业教育，占总数 85%》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4_05_10_228396.shtml

所以貌似“缺少文化”的瓦工赚得比“知识青年”大学毕业生们多，实在太正常不过了。白领或蓝领只是反映工作场所的不同，但特定工种的稀缺性或可替代性才是决定其阶层不同的关键因素。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蓝领中有普工、技工之分，白领中也有这种分别。今天大学生普遍抱怨自己不如“民工”，并不是说所有的蓝领过得都比他们好，实际是反映“白领普工”不如“蓝领技工”值钱的现状。



二、流动与隔阂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个“产业后备军”理论，意思是说虽然你现在还有工作，但是资本家可以利用失业者、潜在的竞争者迫使你接受低工资，否则你的饭碗就保不住。

其实失业者不一定是你的有效竞争对手（比如待业大学生就干不了瓦工的活儿），你的有效竞争对手也不一定是失业的（比如一波波新毕业的学弟都可以来竞争你的岗位）。

所以，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者的“后备军”都是不同的，有效的“岗位后备军”只能是能干得了他这份活儿的人，而实际的就业压力，就是他个人所能胜任的岗位数量与“岗位后备军”之间的比例关系（你个人在就业市场中的稀缺性）。

显然，这种比例关系涉及到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难度。如果你要让面点师去江南造船厂当焊工，让4S店维修员去工地上当瓦工，大家肯定觉得你疯了。

但是HR初级岗位、前台接待、销售部“学徒工”、麦当劳的实习生、酒店里服务员、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等等都可以互换。既然大学生可以干HR，那为啥不能干服务员和流水线工人呢？因此企业与一些底层高校合谋，以“实习”为名把大学生骗来脱产工作、当低级劳动力的报道，屡见不鲜。

china.com 当前位置：新闻 > 社会新闻 > 正文

西安千名大学生被逼远赴烟台富士康实习(图)

2013-10-10 11:21:22 中国经济网 参与评论0条

打印 A+ A-

对此，王一然早有心理准备。她告诉记者，上一届学生在去年也被安排来实习，而在富士康的实习是该学院学生大学四年的“必修课”，如当年暑假不能完成者，下一年需补上。

但让王一然想不通的是，实习与专业并不对口。她一个同学学的是财会，却被分往流水线“给PS4贴胶纸”，王一然自己的工作则是生产线上的“外观检测”，具体内容是把PS4撕掉保护膜，贴上防开启标识，“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搬机器，撕纸贴纸”。

普工之所以叫做普工，就在于其技能门槛低，可替换性强。而这种特点和工作场所没有必然联系，工业生产固然不断通过自动化来降低对工人的技术要求，办公室工作也不断寻求流水线化来降低应聘者的（相对）门槛，大量创造性工作被拆解为繁琐的操作性事务。整理档案、做报表、汇总数据虽然宏观上来说确实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但作为一个螺丝钉的小白领既没有“管理者”的感觉，也没有“管理者”的收入。

“普工”和“技工”之间实际上横隔着一条鸿沟，叫做职业门槛。各行各业的普工们有效竞争对手很多，而“技工”们的有效竞争对手很少。从眼前利益的角度出发，对技工们来说最理性的做法当然是垄断这一工种。但人才培养的垄断很难实现，实践中往往是阻碍后来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中世纪的工匠结成行会垄断相关工作，学徒工能不能结业出师并不仅仅看水平，而在于“总量控制”。美国的医师协会压制医学生就业资格，让医生永远稀缺，如此才能保证高收入。中国古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样，各行各业的“技工”们就把自己的利益与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割裂开，成为了一个保守的工人上层。当资产阶级以自由主义或技术进步之名碾碎他们的时候，其他的工人往往乐观其成。再次说明，判断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层，“技工—普工”这个维度，远比“白领—蓝领”这个维度重要得多。

三、生产自动化：消灭旧技工、产生新技工

“技工”价高，组织性也强，资本家当然希望利用生产自动化消灭“技工”，用流水线工人替代手工工匠，用麦当劳里面的标准化冷冻食品取代大量高级厨师的岗位。但是用机器排挤复杂劳动、用机器将复杂劳动分解成简单劳动，同时也创造了机器制造业，创造了新的复杂劳动。



振华港机，码头工人背扛肩挑的时代早已过去



学生们在操作数控机床



化工生产控制中心

其中，尤其以化工生产为代表，由于化工行业的特殊性，生产线一般没什么人，全部在生产控制中心，通过电脑和网络进行控制。经过化工本科教育、实习和上岗培训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大家可以搜索下化工生产自动化的公开课视频，虽然已经是远离实操的大而化之的东西，但各位读者们能不能看懂呢？

而我们耳熟能详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有多大的代表性呢？2010年的报道称富士康大陆员工突破100万。假设到现在翻了一番（实际上也不太可能），也不过200万。同期中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为2.7亿人（国家统计局数据）。

来源：《富士康大陆员工数量突破100万》

<http://tech.hexun.com/2010-12-11/126125701.html>

即使退一万步讲，全自动生产线消灭了所有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技工”，但机器又是什么生产的呢？工业母机（生产机器的机器）还是要需要大量人力设计和制造，而这一块的技术要求不低。可以说生产自动化虽然减少了单一生产线的技工需求、劳动力需求，但是拉长了整条产业链，产生了更多的工业门类需求。生产自动化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消灭旧的技工，它也产生了新的技工（制造机器、生产机器）。

“2014年4月2日，在广西南宁市召开的全国装备工业工作会议上，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介绍，去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三分之一，稳居世界首位。”

“苏波说，当前我国多数装备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发电设备产量1.2亿千瓦，约占全球总量的60%；造船完工量4534万载重吨，占全球比重41%；汽车产量2211.7万辆，占全球比重25%；机床产量95.9万台，占全球比重38%。”

来源：《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突破20万亿，占全球比重超1/3》

http://www.guancha.cn/Industry/2014_04_03_219195.shtml



CKX5680 型螺旋桨用重型七轴五联动车铣复合机床



CKX53280 型立式铣车床



武重 XKD2755 型数控双龙门四铣头镗铣床

考虑到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总人口也占世界五分之一，中国的工业结构远比欧美的更能反映全世界整体的生产状况和劳动力结构。

四、生产力与教育赛跑：学做统治阶级的民工

生产自动化水平越高，参与生产的绝对门槛就越高。刀耕火种的社会绝大部分人不需要读书识字，印刷厂工人需要基本的文化教育，计算机在办公室中的普及其实也不过是二三十年的事情。而大城市小白领人人都能在（书面上）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在十年前恐怕也是不能想象。

然而在这个不会用电脑就不能胜任办公室工作的时代，小白领们却抱怨“我的工作初中生也能干！”

其实仔细揣摩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把初中学历当做没文化的表现，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毕业生在中国还是知识青年，还是据说需要上山下乡进行改造才能去掉自己身上脱离群众的臭毛病的群体。这种奇妙的反差，正是教育扩张远远快于生产力进步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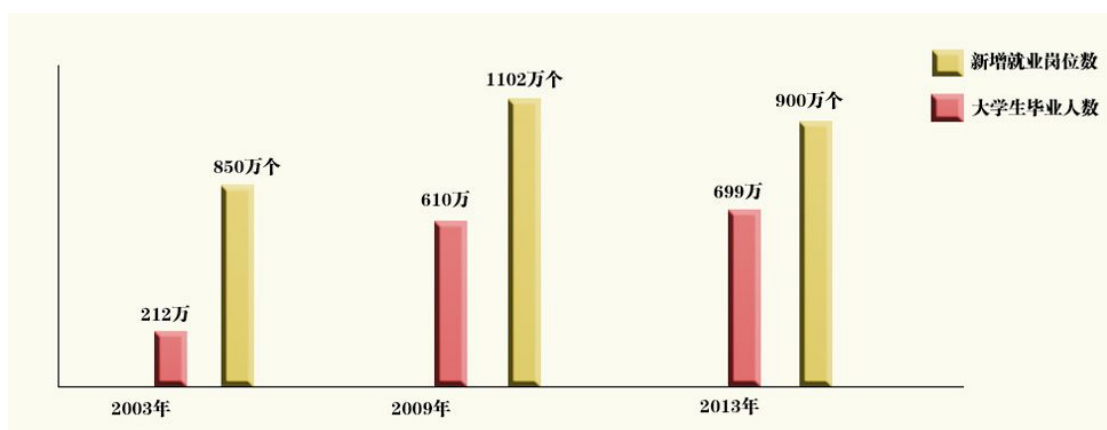
教育扩张远远快于生产力进步，首先是因为生产力达到了一定高度，社会能够较多的脱产教职人员。

第二个原因是，师范生的自我复制可以达到“复利”式的滚雪球速度。新中国在教育普及阶段，直接拿初中毕业生回去教小学，高中毕业生回去教初中，师范生教高中，大学毕业生留校任教。教师教出来的就是下一批教师，十年时间就可以轻松扩张几十倍。这模式就好像计划经济中将生产力向机床生产、重工业生产倾斜一样，会取得飞跃式的赶超效果。教育扩张如此迅速，但生产力、经济水平远远赶不上这种速度。比如下面这个报道

《699 万大学生 900 万个岗位 2013 史上最难就业季来临》

http://www.guancha.cn/Macroeconomy/2013_05_02_142063.shtml

根据里面的数据，2003 年全年新增就业岗位是大学毕业生人数的 4 倍，而 2013 年这个数字只有 1.29 倍，仅仅十年时间大学生就从统治阶级预备队下降为可能要去端盘子的群体。



教育扩张远远快于生产力进步的第三个原因是社会竞争带来的教育投资追加。生产力到了一定水平，普通人也掌握一定剩余货币，有投资增值的欲望。但是生产力越提升，资本也越集中，普通人的投资渠道实际也就越窄。只有追加教育投入是相对门槛较低的。但是越是集中向教育投资，就越是加快教育的贬值，教育越是贬值，大家越是不得不进一步追加投资。

《美国 MBA 泡沫是否离破灭更进一步？》<http://wallstreetcn.com/node/70077>

“这篇报道指出，本世纪经济衰退以来，拥有 MBA 学位的毕业生收入减少 4.6%，可过去三年的学费增长了 24%。” 价格提高意味着供不应求，间接说明读 MBA 的变多了。

经济一旦不景气，大家就幻想用更高的学历让自己脱颖而出，每个人都这么做，便意味着依靠学历“鹤立鸡群”的门槛进一步提高。越读越穷、越穷越读是个死循环，但却是真真实实起作用的死循环，不断加速知识贬值：岗位的绝对要求明明是上升了，但我们觉得能胜任的人却越来越多。

教育扩张比生产力发展更快，便会产生人才过剩，没有足够的高端岗位吸收，就只能排挤到行业内更低一级的岗位工作。当代大学生学的是统治阶级预备队的学问，但是出来往往只能做民工。

五、斗争性来自不满足，而非穷

由于教育扩张快过生产力进步等原因，当代的小知识青年普遍面临理想与现实、所学与所做的巨大落差，但依靠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日子还算能过下去。有人据此认为这些占同龄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小知识青年是保守的，小资左派的。

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下九十年代的国企大下岗。下岗也就罢了，依附在国企上的旧的福利制度也就瓦解了，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迟迟不能建立。朱镕基的确是铁腕血腥改革，创造了数以百万计吃不起饭的社会边缘人群，无论是东北黑社会还是某邪教，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大发展。

在苏东剧变余波未平的九十年代遇到如此动荡的社会情形，就算政权不瓦解也要脱层皮，但中国却反过来快速发展，恢复稳定，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如果我们仅仅将视野局限在国企老工人自然无法理解这一切，但是结合对第一代农民工，特别是其心理状态，的分

析，我们就能明白这一——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国企破产、社会迅速走向资本主义的九十年代获得了进城打工的机会。

九十年代中国农民并非“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进城务工虽然是接受剥削，虽然工作状况和收入水平不能和国企老工人相提并论，但是比起务农已经是天壤之别。

少数国企老工人下岗闹事，但是占人口多数的新工人顶替了他们的位置，而且还感觉生活变得更好了心满意足，如此一来，以国企老工人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也就难免其失败的命运了。

今天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农民工也进入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的生活水平、收入待遇都有了大幅提高，但不满也与日俱增。工厂中的罢工的确越来越多，可是按如果仅仅认为穷便具有斗争性，便不能解释这一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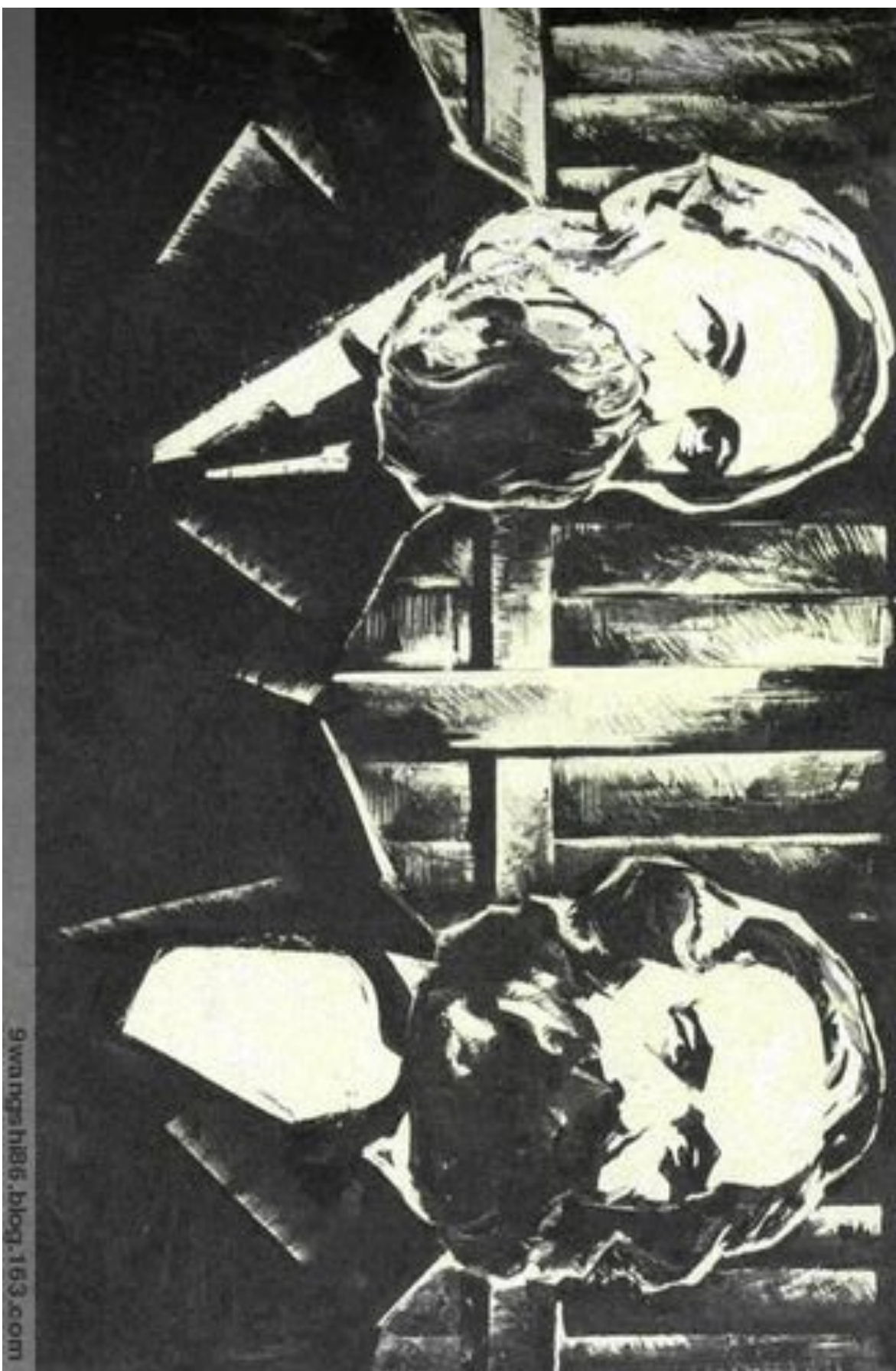
农民进城也就意味着与城市人口有着相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农民工二代多数在城市中成长，“2013年间，87.3%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从遍布城市的民工子弟学校可以窥探着一切。社会灌输给大家的心灵鸡汤农民工二代也在喝，住楼房、用下水道、下了班有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让子女上好学校等等，“像一个人一样生活”的标准在城乡间迅速统一，而大家雇佣农民工的思路依旧是“起码比你们农村好！”

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建筑业比重大降

http://news.ifeng.com/a/20140513/40264701_0.shtml

当阿Q不再搬宁式床去土谷祠，而是憧憬公寓里有实木家具；吴妈还要婚纱照和夫妻精神生活，这才是社会真正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用肥皂剧和励志段子维稳，就得吞下肥皂剧让自己显得越来越反动的代价。

工人阶级整体的知识化，屌丝读了书还是屌丝，学的是“技工”，回头还得当普工这一现状，并不会带来无产阶级的保守化，相反统治阶级出于塑造个人奋斗的幻觉，必然要貌似公平地给予机会，灌输奋斗既能过上好日子的思路。不断钓起无产阶级的胃口而无法满足，反而不断瓦解自己的合法性。



• 马克思和恩格斯

gwangshib6.blog.163.com

所谓精英主义和机会主义



: 知秋

过去数年革命和改良之争后，左翼又迎来了新的斗争，即列宁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在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的，大部分是认识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因此目前不能用对敌批判的方法，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说服的方法，争取犯错误的同志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一. 对 YCA 主张的错误认识

“必须建立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这一列宁主义的提法一经提出，就遭到左翼的围攻。“脱离群众”“书斋（键盘）革命家”之类的帽子纷纷送来。而且由于各个山头缺乏日常交流，也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又有“不愿做工人工作”“鄙弃踏实的基础工作”之类的指责。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不要做工人工作呢？青年学生去工厂掌握一手材料，这确实是很好的学习和锻炼，但并不能称为工人工作。我们只是反对在缺乏核心政治组织提供物质和思想上的支援的情况下，鼓动左翼青年去工厂企图发动或领导斗争，尤其是把青年学生放弃本来的职业方向和熟悉的工作，去“成为一个工人”当做一条自我救赎之路。这不仅完全违背列宁主义，对青年个人和运动的前途也极为不利。

正如《论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所言，当前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需要主动推进，而不会随自发运动水到渠成。更不是所谓书斋空谈，有无数繁重而细致的工作，其中就包括了运用和群众广泛联系的组织，发现、培养、保护群众中的活动家。在今天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者和群众活动家始终是第一位的，推进工人经济斗争等自发运动不能作为目标去追求。

二. 先锋队相对独立于工人运动产生

有的同志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各个斗争协会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我们现在也要努力发展这样的斗争协会。我们完全赞成并正在发展斗争协会性质的组织。但须指出，历史上的斗争协会的主要成员仍是革命知识分子，并且是继承了原先民粹派很多活动家的比较成型的组织。根据现状，应该重点发展斗争协会的材料，即从无产者后备军学生和脑力无产者青年中（普遍教育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必要）发现和培养社会主义者。

“先锋队在工人运动中产生”这是一个模糊而可能包含错误观点的说法，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先锋队在工人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社会民主工党还不是先锋队，众所周知，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布尔什维克来自海外流亡革命者创办的《火星报》及其发行机构。列宁在《从何着手》中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火星报》的代办员网络通过传递报纸、收集稿件和信件、募集活动经费等等工作，不仅传播革命理论，更把分散的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由此形成了布尔什维克。这些工作当然在工人运动的背景下进行，但其本身相对独立于工人运动（请注意是相对独立，请不要诡辩“党的成立与工人运动密不可分”。谁能否定事物普遍相联系的规律呢？）。

并且需要注意到：布尔什维克是在先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下，在《火星报》之后又经历了十几年的艰苦奋斗，才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是列宁主义在形成过程中的必然的曲折。而 20 世纪继发的革命，有了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就不必要经过这样的曲折，比如中共的成立就更加相对独立于中国工人运动。

今天我们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不得不重复布尔什维克经历的曲折。一方面我们要清楚认识这一点；另一方面，应该吸取历史经验，尽力减少这样的曲折。而不是非要搞“摸着石头过河”，甚至把“先锋队建立相对独立于工人运动”称为精英主义（如果批评者非要这样说的话，我们只好回答：列宁主义正是这样的精英主义！）。

三. 必须克服自发性才有革命性

有的同志意见不屑于谈论列宁，甚至迫不及待要“反思列宁”，转而推崇卢森堡等曾与列宁论战的领袖。有的则出于惯性还在重复列宁的词句“不能崇拜自发性”等等，但这些同志也总是忍不住要明示或者暗示，工人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最少、最纯洁，因此自发性还是不错的，只要加以引导就可以变成革命性。

我们不禁要大声疾呼：看看现实吧！活生生的工人并不具有这样神奇的“纯洁性”，而首先是计较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一般是个人和家庭，也可能稍大）的普通人。工人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时也会反抗，但离寻求整个阶级的解放（意味着奉献牺牲）还有很大距离。整体利益、根本利益经常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冲突，因此前者总是（除了短暂的运动高潮）少数人考虑的事情（请注意这个少数不是几个人、几十人的小团体，而是相对少数。一百万人不可谓不多，但相对全国十几亿人，千分之一都不到）。自发性说的就是追求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而不能认识或不能为整体利益、根本利益斗争，从而只能在现有制度下寻求改良。

列宁同志指出：“必须与工人自发性进行殊死搏斗”（《怎么办》）。我想，再糊涂的同志也该明白，什么叫“殊死搏斗”，明白它和那种号称不崇拜自发性，其实对自发性含情脉脉的观点有什么区别。

四. “灌输”是先锋队把自己的意志加给运动

一些同志认为自己已经在和工人交朋友、在工人中宣传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了，已经是在进行列宁所谓“灌输”了（也有同志觉得“灌输”这个词太对工人不客气了，太精英主义，接受不了，而要改为“带入”，并说是翻译问题，暂且不论）。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但必须明确目的：为了发现和培养工人积极分子乃至先锋队的材料。这还远远不是“灌输”的全部内容。

所谓灌输是某种代表长远、根本利益的思想或抽象的政治价值观克服自发性，使个人和组织的思想或行为接受、服从或符合这些思想。灌输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思想灌输和组织灌输。思想灌输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使个人接受这种思想，这又可分为：通过理论宣传，以理论的说服力使对方接受；通过灌输者的个人魅力、威信、使对方接受灌输者的思想；通过宣传攻势，制造一种社会氛围，使个体接受。组织灌输主要通过获得某一组织的领导权、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来使某个思想成为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使这个组织的行为服从或者符合这个思想的要求。这些方式也就是取得领导权、影响力并运用它们的方式。比如：通过在一个

组织内的积极活动扩大对这个组织的影响力；通过掌握一个组织重要环节（如经费来源）实际掌握它的领导权；通过打击其他思想对一个组织的影响来扩大自己的影响；直至夺取政权以法律、制度影响和掌握一个国家的行动倾向。

要推进工人运动并达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水平上来，直接的、主要的方式是组织灌输，思想灌输通常只能起间接的作用，或在运动高潮时起辅助的作用（但绝不是说思想灌输不重要，思想灌输赢得的先锋队员和积极分子是组织灌输的人力来源）。显然，要进行组织灌输，必须有集中统一、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以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使之成为整个斗争的一部分。核心组织必须区别于广泛的群众组织进行秘密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工人自发性，才能战胜敌人。

五. “机会主义”是没有内容的批判

有的同志把我们称为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这个词早已成为对路线斗争失败者的惯用帽子，意义早已模糊不清。他们大概是在“侥幸心理”“投机取巧”这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如果这样，什么叫“不机会主义”呢？大概是“做好扎实工作，革命必定成功”。可是，我们说的必定成功，是在大尺度上说“如果一件事情可能发生，那么最终必然发生”，而对于具体的一次革命，没有必然胜利这一说法，恰恰相反，革命是九死一生的。如果希望在自己这代人中取得成功或相当的成绩（相信不少同志是这么想的），本身就是侥幸。任何策略（路线是一个时期的总策略）没有不冒风险的，如果非要区分智慧和投机，恐怕只能以成败论英雄了：成功了就是“正确的策略”，失败了就是“机会主义”。这样看来，所谓“机会主义”不过是在说“我正确，你错误”，而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

六. 结语


集中统一的先锋队是胜利的基础，认识到这一点离实现集中统一还有遥远的距离，但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十分可贵了。比如本文提出的列宁主义的道理就可能引起疑问或争议。缺少日常交流的同志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有很大差异，更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坦诚交流、严肃讨论。而不是互相怀疑，动辄上纲上线，把策略和路线问题当成是立场问题或投机来批判，不把搞清楚问题作为目的，为搞臭对方搜罗材料，甚至出于本位主义搞封闭和对抗。

团结在列宁的旗帜下前进！



• 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当前运动中若干问题的看法

 : 尘沙

一、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能有兴趣来讨论运动的问题的，大概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就是说，姑且默认为“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个什么玩意？

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来说，“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这里姑且把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划等号。即便不是等号，至少我们相信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是希望能成为“共产党人”的。

就是说，我们是这样一种人，想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并且懂得如何去做的人（这里不是说我们能精确地预测未来，而是说我们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懂得了做这件事情的“一般过程”）。

我们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且自认为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期。在资本主义社会稳定运行的时期，社会的主流思想是认同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而我们，是不认同这种秩序、想要消灭这种秩序的人。我们认识到消灭这种秩序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们在自觉地做着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种必然性的话，我们就是实现这一必然性的自觉因素。

在实现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这种自觉因素，自觉地去消灭旧秩序的因素，并不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任何已经消亡的社会形态来讲，大概都是如此。比如说，在推翻帝制的过程中，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难道不算是自觉力量吗？（也许有同志认为同盟会很挫。但即便很挫，在当时也可以算是自觉因素。）

不管在哪个时代，自觉因素的任务都是在于：积蓄力量，实行变革。如果说自觉因素存在某些缺点，那么这种缺点只能是在于：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形势、策略和能力等等，而没能完成（或者尚不能完成）属于他们的任务。

自觉因素想要取得胜利，必须要掌握一定的力量。而我们认为，这种力量主要就是群众。所以，对于尚未能掌握群众的自觉力量（今天又有谁敢说已经掌握了群众呢？），他们的错误（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在于没能领导群众，而不是在于“妄图领导群众”。

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的问题应该是去领导群众。无法领导群众（或者尚未能领导群众）是形势、策略和能力的问题；不想着去领导群众则是立场问题，是推卸责任的问题。当群众受

到黑暗社会的压迫时，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自觉因素难道不该领导他们走出黑暗吗？所以，我们应该以“妄图领导群众”为荣，而不应该把这称为精英主义。

一些同志存在对自己的出身不自信的问题。姑且不谈屁股是否一定决定脑袋，就单纯说“屁股”，多数同志也不是资本家或者资本家出身。最近争论的比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是什么阶级。有些同志认为学生是小资产阶级，或者认为学生是小资产阶级后备军。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学生不属于生产过程，自然不能算作某一阶级。而学生参加生产过程之后会分化成各种阶级：富二代学生可能会成为资产阶级，一些学生可能自己搞所谓的“创业”成为小资产阶级（因为很难创出什么“大”业），而更多的学生是要成为雇佣劳动者。根据科学定义，界定一个阶级，不是以其收入，不是以其工作环境，而是以其对生产资料的关系。雇佣劳动者阶级，就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学生中很多将会成为无产阶级，多数学生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一些同志否认我们学生多数是无产阶级后备军，否认我们将来要成为无产者。原因在于，他们看到我们身上的各种毛病，然后想“你们这么多毛病，也算是无产阶级？”而这种想法隐含的意思是，无产阶级没这么多“毛病”。在这里，我们要指出，这种想法实质上就是在崇拜自发性。一些同志喜欢讲阶级本能，他们讲的阶级本能的意思大概是，无产阶级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本能就是“战斗”。

这里涉及到一个应然和实然的问题。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无产阶级应该是战斗的。这是“应然”；实际上，无产阶级还没有战斗，这是“实然”。但多考虑一步，“战斗”的前提是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本阶级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所在。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广泛影响，无产阶级还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目前还是认同资本主义秩序的。

可能有同志会说，无产阶级哪里认同资本主义秩序了，无产阶级不是每天都在斗争吗？我们要指出，不能自觉地针对资本主义制度开展斗争，归根结底还是认同资本主义秩序的表现。工人罢工（经济罢工）的目的难道不是和资本家重新签订契约吗？而我们想要的，不是重新签订契约，而是消灭这种契约制度。这种观点才是否定资本主义秩序的观点。只图在现有体制内谋求短期局部利益的观点，只能说仍然是认同资本主义秩序的观点。谋求短期局部利益的行为，可能为谋求整体根本利益做积累和准备，也可能没有或相反。

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战斗的无产阶级，没有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那个“无产阶级”。但不能因为无产阶级有缺点就把他们归为小资产阶级。比如说，脑力无产者的自发斗争不多，这并不影响我们科学地去分析他们阶级地位。这里，我们姑且不讨论脑力无产者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更“小资”一点。把作为“我方”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说成是作为“友军”的小资产阶级，这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

而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当前无论哪种无产者群众，其斗争性只能算作自发性。脑力无产者的斗争性可能弱一些，或者体力无产者的斗争性可能强一些，但这些“斗争性”都是在同一“数量级”上的，都只是自发性。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性和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性是不在同一“数量级”上的，“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宣言》）。这就是所谓的自觉性。

总结一下，我们学生中的多数作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从自己该来的地方来，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去，是不应该有丝毫的赎罪心理的。我们出身于底层，对人民没有什么债务；将来还要在底层混，也不会产生什么新的债务。我们结合群众的目的，不是赎清自己所谓知识分子的罪过，而是推动现实的运动。

二、关于结合群众的问题

我们“妄图领导群众”。要领导群众，必然是要结合群众。我们结合群众的过程，也就是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我们开展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就是有可以抗衡直至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实力。“十月革命是工农群众的巨大革命高潮和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一运动的正确领导相结合的产物。”（克鲁普斯卡娅）巨大的革命高潮，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客观的社会形势，也就是列宁同志所说的“‘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社会形势的到来是不以社会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实行十月革命的实力，就是对群众运动的正确领导。

【活动概况】

本次实践中，同学们与工友相约为伴，共同进工厂到流水线上亲身体验大工业生产方式，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

有同志提出了“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这种说法（见上图）。我们认为这是把关系搞反了，不是无产者群众改造社会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改造无产者群众。可能这些同志又会说，难道群众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吗？当然有。但是我们学习物理学，能和“物理学改造我们”划等号吗？在学习物理学的过程中，我们也受到了改造。但应当明确，实行这种改造的主体是“我们”，而不是物理学。向群众学习也是一样。群众的经验比我们丰富，我们对群众的生活及其所思所想还不完全了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在结合群众的过程中，我们也受到了改造，但改造自己的主体还是自己。而不是什么“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

再谈一点，有同志可能会说，毛主席不是提倡学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吗？要注意，在无产专政的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人的贫下中农可以较为清醒地（相比旧社会而言）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个时候学生上山下乡，还真是可以接受一些社会主义的观点。而今天资本主义条件下，认为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的无产者群众可以改造自己，只能说是救世主情怀的一种变种——把群众当成自己的救世主。

总之，所谓改造群众，是按照我们的观点去改造，所以实行对群众的改造的主体是我们自己；实行对自己的改造，也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进行，所以实行这种改造的主体也是自己。实行两种改造的主体都是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将来，实行这些改造的主体，甚至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态，党。

接下来我们再引出一个问题，评价结合群众形式高低的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只能是做群众工作的成绩。而有同志提出，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是结合群众的最高形式。（见下图。《<怎么办>的启示——也谈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这种评价方式显然太过武断。

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既可以利用ngo等各种改良组织，也可以利用工作的关系尽量能与工人群众多接触（这就要求在求职时尽量选择能与工人群众密切接触的，但又不与工人群众相对立的工作），也可以直接到工人聚居区去搞调研、交朋友。最高的形式，就是摆脱原有社会身份，直接到工厂中去成为普通工人。对于愿意做出这样选择的同志，要积极鼓励，同时也要充分指出可能面临的困难，使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能够长期坚持。

三、核心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

所谓核心政治组织，就是社会主义者做政治工作的秘密组织。这种组织为什么是必要的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列宁同志在《怎么办》一书中的说法。

“（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证持续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

（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的群众越加广泛，这种组织也就越加迫切需要，也就应当越加巩固（因为各种蛊惑人心的人诱惑群众中的落后阶层也越加容易）；

（3）参加这种组织的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

（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内，我们越缩小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缩小到只吸收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与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参加，这种组织也就会越难‘捕捉’；

（5）而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与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越多。”

可以知道，核心政治组织是运动发展所必需的。我们今天既然懂得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东西，就完全有可能主动地去创造一些促进历史发展的条件（注意不是全部条件）。核心政治组织，正是这些可以创造的条件之一。集中起来的社会主义力量更有可能获得胜利，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而所谓群众组织，顾名思义，就是政治性（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较弱的群众组成的组织。像学校中的社团、工厂中的工会，都属于这种组织。而群众组织，相对于核心政治组织而言，就是去政治化的。在专制国家内尤其如此。一个组织，或者成为核心政治组织而失去其公开性，或者成为群众组织而失去革命性。

我们需要核心政治组织，并不是说群众组织没有用。恰恰相反，核心政治组织的构成材料就是从群众中产生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在群众组织中做工作，发掘出群众活动家的材料。这些材料就有可能组成核心政治组织。核心政治组织对群众组织的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很可观的。

YCA 同志提出了一个说法，没有核心政治组织根本谈不上任何推进工人运动和灌输。在一些同志看来，这句话也许过于绝对。但应当注意，这里说的推进工人运动不是简单地和工人打交道，灌输也不是说服一两个工人。灌输是指某种代表长远、根本利益的思想或抽象的政治价值观克服自发性，使个人和组织的思想或行为接受、服从或符合这些思想。把社会

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是需要核心政治组织统一领导的。质疑“没有核心组织根本谈不上任何推进工人运动和灌输”这句话的同志，是不是把“推进工人运动”的标准降得太低了？

有同志说，“工人的力量在于工人的组织，社会主义者进入工厂的首要目的，就是推动工人形成自己的组织。这种组织不是单纯进行工联运动的组织，而是把工人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小组。”（《列宁主义还是反列宁主义——五评少年中国评论》）。我们想要质疑的是，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工人小组”，是核心政治组织呢，还是群众组织呢？如果是核心政治组织，那么就等于承认 YCA 同志提出的“要核心政治组织”是正确的。排除这种可能性之后，这位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工人小组”就是群众组织。

而建立核心政治组织，是一项繁杂的工程，在其过程中不但不排除群众组织，反而要运用群众组织，包括所谓“工人小组”。

需要注意的是，核心政治组织在建立之初还不是先锋队。先锋队是统一集中的核心政治组织。所谓“统一集中”，意味着先锋队掌握了本国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同时也意味着有相当的群众动员能力。

YCA 同志指出，“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布尔什维克来自海外流亡革命者创办的《火星报》及其发行机构。”“《火星报》的代办员网络通过传递报纸、收集稿件和信件、募集活动经费等工作，不仅传播革命理论，更把分散的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由此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所谓精英主义和机会主义》）。第一句话说，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自《火星报》及其发行机构。也就是说，《火星报》及其发行机构最初还不算是先锋队，只能算是核心政治组织。

而要形成《火星报》及其发行机构这种核心政治组织，必然不是一项书斋空谈，是需要运用和群众广泛联系的群众组织的，包括学校里的社团、工人小组直至工会。

四、当前推进经济斗争是工作重点吗？

看到丁先生这样一段话：

“少中评在某一篇文章中说‘要促进当前工人的争取直接经济利益的自发斗争，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才能帮助工人’，在另一篇文章中却说：‘推进工人经济斗争等自发运动不能作为目标去追求。’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少中评在经济斗争上完全自相矛盾、混乱无知的态度。”（《列宁主义还是反列宁主义——五评少年中国评论》）。

我们认为丁先生在这里运用了非常高明的论战手法。

丁先生引用的第一句，“要促进当前工人的争取直接经济利益的自发斗争，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才能帮助工人”，原文是：

“对于工人运动，我们应当做两方面的思考：

一方面，我们应当考虑如何促进和引导仍处于自发斗争阶段的工人运动。工人运动不是谁想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而是以一定规律发生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工人运动，这种引

导在最初是以帮助的形式出现的。要促进当前工人的争取直接经济利益的自发斗争，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才能帮助工人。工人当前最需要的，不是多一个普通工人去发动或者参加他们的罢工，而是在他们斗争时能获得特殊的帮助，包括法律上的、舆论上的，甚至是金钱上的。对于当前处于弱势的左翼来说，把工人社区而不是工厂作为我们的突破点，也许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考虑如何给未来的自觉斗争做准备。在把工人自发斗争提升到自觉斗争的过程中，需要的武器正是马列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承载者，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中最进步的一批人。发展进步知识分子队伍，将对未来的先锋队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人不能参加这种队伍，不过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而是以进步知识分子的身份参加的。可以说，这种进步知识分子的产生与其出身和职业没有必然联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说这句话绝不是开玩笑。组织起来的进步知识分子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承载者，其作用也就在于此。”（《对左翼青年进工厂问题的思考》）。

可以看出，原作者仅仅是在提供一些思路，并不是说“促进当前工人的争取直接经济利益的自发斗争”是工作重点。而且，原作者说的“要促进当前工人的争取直接经济利益的自发斗争，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才能帮助工人。”其中第一个字“要”指的是“如果想要”的意思。原作者后面又提到“工人当前最需要的，不是多一个普通工人去发动或者参加他们的罢工，而是在他们斗争时能获得特殊的帮助，包括法律上的、舆论上的，甚至是金钱上的。”如果我们有一点分析能力的话，就应该知道，原作者是在质疑做工人工作是否只有进工厂这一条路。这一点质疑想必丁先生也是认可的（见划线部分）。“任何一个有志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不是打嘴炮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应该走进工业区，走进产业工人中间（笔者一再强调不一定非要采取进厂的方式）。”（《所谓社会主义核心组织——三批少年中国评论》）。

至于丁先生引用的第二句，“推进工人经济斗争等自发运动不能作为目标去追求”，则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原文是：

“当前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需要主动推进，而不会随自发运动水到渠成。更不是所谓书斋空谈，有无数繁重而细致的工作，其中就包括了运用和群众广泛联系的组织，发现、培养、保护群众中的活动家。在今天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者和群众活动家始终是第一位的，推进工人经济斗争等自发运动不能作为目标去追求。”（《所谓精英主义和机会主义》）。

原作者提到“在今天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者和群众活动家始终是第一位的，推进工人经济斗争等自发运动不能作为目标去追求。”原作者强调的是，“在今天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以今天左翼的实力，尚不足以承担提高一个地区工人运动水平的任务。我们没有办法变戏法变出许多社会主义者来，所以只能踏踏实实地把发展社会主义者和群众活动家作为首要工作。

我们在实力尚不足以提高一个地区工人运动的水平的时候，不把针对工人群众做的工作标榜为开展工人运动，而是把此项工作的首要目的明确定位为发现、培养、保护群众中的活动家。

让我们以列宁同志的一段话结束本节。“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制定策略时，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

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仅仅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标榜自己的“革命性”，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正因为这太容易了，所以不是解决困难的、极困难的的任务的方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五、关于学生工作

前几节说到，我们认为需要建立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而当前，我们还不是要直接去建立核心政治组织。在建立核心政治组织之前，首先要发展社会主义者和群众活动家。

到哪儿去发展社会主义者和群众活动家呢？如果笼统地回答，就是各阶层。当然，这种说法等于废话。有同志认为，工人能切身体验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到工人中去发展社会主义者和群众活动家是最容易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花同样的力气去对每个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对每个人都进行 100 小时的社会主义灌输”），那我们得出的结果大概是工人最容易成为社会主义者。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条件去花同样的力气对每个人进行宣传。比如说，工人群众就没这么多时间听我们的宣传，这是客观情况。这造成了一个结果，目前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往往是有闲阶层，如学生之类。

我们认为向学生宣传有这些有利条件：

第一，学生的三观尚未完全定型，其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认同尚未完全形成，此时可能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宣传。

第二，学生是属于有闲阶层的，至少可以说，他们有时间接受社会主义者的宣传。这是我们做宣传工作的有利之处。

第三，通过社团的方式，宣传对象的范围更广。如果学生中的社会主义者只是把宣传重点放在自己身边的人身上，也很难有成效。据一些做过工人工作的同志说，在一些工厂，物料员相比其他岗位更有利于开展宣传，也正是因为可以接触更多的工人。这样看，虽然简单的“去流水线”这种思路可以用，但如果只认定这一种思路是不是也过于狭隘了？

我们的经验也证明了对学生的宣传工作是有成效的。

至于有一些同志认为学生“小资”，工作难做之类的。像下面这一例。“事实无情地粉碎了 YCA 的左翼青年革命性的唯心论，在 YCA 看来，左翼青年有知识有文化，思想境界阔大深远，是最易于接受革命思想的，最富有政治意识与斗争革命性的，一旦组织起来，就如何如何。这与我们各地的社团建设实际完全相反，不是唯心论难道还是马克思主义？”（《大学生小资左派分析兼评 YCA》。）

我们不得不提醒这些同志，是否需要改进工作思路。我们认为当前一些学生社团工作不好做的原因在于无法正确地对社团进行定位。举个例子，某个社团出现了所谓自由散漫的现象，然后就去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社团是群众组织，根据学校给的定义，就是学生依靠兴趣组成的组织。这一点，左翼社团也不可能避免。所谓的“自由散漫”极有可能是社团对同学们的吸引力不足。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多开展能吸引群众的活动，而不是在于学习毛选。社团是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多地联系群众。一些左翼社团把自己定义为社会主义政治团体，志向远大，色彩鲜明，而不太顾及群众的一般政治思想状况，忽视了把社会主义和周边（在吸收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多的群众联系起来的任务。列宁同志指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

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同他们隔离开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错误的定位导致一些左翼学生社团既没有起到群众组织的作用，也更不可能去完成政治团体的目标。

顺便我们还要提一点，如果感觉和学生打交道都有困难，那大概也不要指望和工人打交道会容易多少。毕竟和人交流的技巧在一定意义上是超阶级的。

六，关于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

社会主义者能否摆脱“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边缘地位”？

看到丁先生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者永远不可能占领大学讲堂、报纸杂志以及更扯淡的娱乐界，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永远会处于边缘的地位。但是这对工人来说无所谓，工人进不了资产阶级的大学讲堂，也很少看资产阶级的报刊杂志，工人是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shzy 运动中的精英主义——评 YCA<shzy 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者永远不可能占领大学讲堂、报纸杂志以及更扯淡的娱乐界，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永远会处于边缘的地位。”这句话的来源无非是“任何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先明确一点，何为主流？主流就是大多数人的意识。（难道丁先生对“主流”有相反的定义？）在资本主义稳定运行的时期，自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主流。但我们恰恰是要破坏这种稳定。“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永远会处于边缘的地位”意味着我们无法取得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支持。我们要想取得革命胜利，难道不需要取得相当一部分群众甚至是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吗？

毛泽东同志说过，“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当举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这句话表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倾向于革命的意识是有可能占据主流的。甚至可以说，毛主席认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夺取政权的必要条件。中国革命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难道解放战争时期人心不是向着共产党吗？难道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处于边缘地位”吗？

列宁同志也说过，“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的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犯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丁先生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永远会处于边缘的地位”，就是说，广大群众永远不可能采取支持社会主义者的立场，那么我们的胜利如何能保证呢？按丁先生的说法，我们大概永远不会有和资产阶级决战的一天。

列宁同志又说，“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就是说，列宁同志认为，革命者应当努力在夺取政权之前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请问，掌握“一切形式或方面”，难道不包括摆脱“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边缘地位”吗？

引用了这么多前人的话，只不过说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丁先生又说了第二句，“工人进不了资产阶级的大学讲堂，也很少看资产阶级的报刊杂志，工人是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

关于所谓“大学讲堂”，如果是重点大学的讲堂，确实是一般工人进不了的。但同时有两个事实：第一，即便是重点大学的讲堂里，也极有可能坐着很多工人阶级的后备军；第二，工人阶级知识化乃是当今趋势。工人阶级的相当一部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以后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比重还会越来越高。

“工人很少看资产阶级的报刊杂志”。难道丁先生把我们的工人阶级都当傻子吗？全球网民都快要达到 30 亿了（《联合国：今年全球网民将达到 30 亿》）。难道我们的工人阶级网民只知道聊 qq 玩游戏而不知道看新闻吗？难道我们看的新闻不是资产阶级媒体发布的吗？不过我们更愿意善意地理解一下丁先生的意思：他大概是说，现在纸质媒体越来越少，我们的工人阶级读到的确实不是资产阶级的报刊杂志，而是资产阶级的电子媒体。

“工人是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至于这一句，如果工人阶级不属于主流社会，那主流社会是个什么玩意？

总之，社会主义者要摆脱“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边缘地位”，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才有在和资产阶级的决战中取胜的把握。

七、结语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上文所述。

第一，社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自觉因素，将要领导无产阶级和各阶级群众。

第二，社会主义者结合群众，不应该是一条赎罪之路，而是从了解群众到领导群众的必由之路。

第三，要想推进工人运动，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当前，是否有利于核心政治组织的形成，是衡量一切行为利弊得失的标准。

第四，鉴于当前实力，发展社会主义者和群众活动家必须摆在第一位，这些人将是未来核心政治组织的组成者。推进经济斗争不能作为当前社会主义者的中心任务。

第五，发展社会主义者和群众活动家不是书斋空谈，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自觉地去，其中就包括运用各种与群众广泛联系的组织。

第六，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通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完全有可能在一些领域和地域的意识形态战线上形成对资产阶级的优势，摆脱“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边缘地位”，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为在和资产阶级的决战中的胜利创造条件。



• 查韦斯

查韦斯的资本主义大锅饭还能吃多久



：马前卒

编者按：不可否认，查韦斯治下委内瑞拉民生有很大发展。但这种民生的发展主要依靠石油利润的再分配，而查韦斯又无力将石油收益转化为投资、转化为生产力的进步，只能发福利分光。因此当大量贫民通过查韦斯的医疗教育事业逐渐走向上层贫民后，他们突然发现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没有了。

前言 大洋彼岸的社会主义试验

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委内瑞拉在中国颇有“超常”知名度。因为从1998年到2013年，查韦斯在这个拉美国家展开了宏大的“社会主义实验”。15年间，查韦斯经历过数次大选、军事政变、大国施压，却始终牢牢控制着政权，为整个拉美树立反美左翼政权的榜样。2007年，查韦斯在就职仪式上公开宣称：“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灭亡”。2013年，查韦斯去世，接班人兼继任者马杜罗访华，到中央党校宣讲“21世纪社会主义”，敢于高调提议“共享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中国是个经历过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普通人隔着太平洋看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实验”，难免会用毛泽东、列宁的事迹去摹想查韦斯，或是随着西方媒体，把查韦斯描述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客军阀。委内瑞拉的新闻因此在中国有了别样意义。上周，碰到一个长辈亲戚，他近年常驻委内瑞拉钻井采油，聊天间谈到该国现状，谈到了许多日常生活细节，都是很具体的的一手信息。当然，个人观察难免局限于视角，故笔者又查询了一些网络信息作为对照，加上此前对委内瑞拉的一些分析，连缀成文，供读者参考。

一、在警察面前酒驾

第一个细节相当惊人：“喝酒开车没人管，全世界只有委内瑞拉可以”。这位长辈在海外探油，走过好几个大洲，包括一些秩序混乱的非洲国家。但只有在委内瑞拉能看到这样的场面：“年轻人开车，单手扶方向盘，另一只手抓着酒瓶。喝光了就把酒瓶向窗外一丢，警察看见也不管”。

这个见闻过于惊人，我查了一下以往的新闻，发现在整个拉美地区，人均酒类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正是委内瑞拉。从维基百科看，委内瑞拉的人均酒精消费量排名世界第41，的确没有哪个拉美国家比它更高。查韦斯甚至要把军队派到街头，解决酗酒问题。这果然是个喝酒成风的国家，但喝酒厉害的国家还有很多，警察不管酒驾却是头一次听说。听了这个段子，我主观判断委内瑞拉交通事故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酒精。

但是长辈否决了这个猜想：“很少有人因为酒驾出事儿，他们那边的司机技术惊人，两辆车隔着几厘米交错而过，根本都不减速，中国人心惊胆战，当地人若无其事。”这么强的技术是怎么来的呢？“旧车多，新车少。反正警察不年检，什么年代的车都在路上跑。”有了这么多旧车、破车打底，委内瑞拉人的驾车技术没法不好，酒驾那点小事儿相对车辆故障

来说也就不算什么了。

在网上，我查到了一个类似的见闻录，看来长辈所言非虚。

“车破得无法想象，没有交通管理，全靠个人遵守。走在路上，到处都是破得让我们难以置信的车，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车身上全都布满严重的擦痕，根本没有任何标志；一个车车身严重凹进去，不知道车门能正常打开不；一个车车顶不知道被谁撕了，估计是钢铁侠吧；一个车没有任何玻璃，就用塑料布挂上，还漏洞；一个车车身连接处裂开，用了点普通的胶带往上粘，不知道需不需要一天换次胶布……虽然车很破，也没有交警，红绿灯也很少，但是在加拉加斯我却觉得交通无比安全。几乎所有的车都会让行人先走，在国内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停在那里等车先过，没车再走，可是在这里每次都是车里的人冲你摆摆手让你先过。虽然大量飞速摩的穿梭在汽车间让人心惊胆战，可是他们也很小心，基本也让着行人。我真的是非常感叹，这和国内的交通秩序混乱，交通管理又严格的局面真是天壤之别。”

http://vigiwan.kuxun.cn/gonglue/156901_12798_new.html)

二、腐败与治安

警察不管事的原因很简单：“警察收入太低”，所以没有积极性。其实法律还是规定过禁止喝酒开车的，但似乎喝酒开车已是法不责众，警察都不好意思以此为借口要钱。碰上可敲诈的对象，警察的索贿近乎明抢：“敲敲车窗，用手比出数钞票的姿势：‘不给点喝咖啡钱吗？’”。在国内 20 世纪 90 年代基层警务最失控的时候，乱罚款的交警也是要讲面子的，绝对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地授人以柄。如此索贿，只能说明委内瑞拉完全不存在基层反腐机制，看来透明国际把委内瑞拉列为最腐败国家之一并非空穴来风。

甚至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也引述了透明国际的说法来警告国内投资商：

委内瑞拉成为本地区腐败最严重的国家

(<http://ve.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1011/20101107220739.html>)

委内瑞拉“蝉联”拉美最腐败国家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vj1/1/201212/20121208494183.html>)

从国内媒体的报导来看。委内瑞拉华侨也对基层军警的腐败怨声载道。

遭无良警察勒索 委内瑞拉一社区华人罢市维权——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hr/hr-hszx/news/2009/09-25/1886231.shtml>)

如此腐败的警方，显然没有能力维护社会安全。我亲戚谈起治安也是摇头：“治安极差，一年要有一万谋杀案”——这可是个 2 000 多万人的小国，人口只和上海市相当。要是上海市每年有一万起谋杀案，恐怕《新民晚报》上就没有别的新闻了。但我随手一搜，发现事实还要更可怕——**2013 年，委内瑞拉全年发生 24763 起谋杀案。**

(<http://money.163.com/14/0108/18/9I39RMAQ00254TI5.html>)

而根据商务部提供的官方数据：**2012 年委内瑞拉共有 16000 人死于谋杀，其中 92% 死于持枪案。**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vj1/1/201303/20130300053385.shtml>)

考虑到许多谋杀案未必得手，这基本证实了每年 2 万多起谋杀案的数字。另据报道，每年还有 2 万委内瑞拉人被绑架。这意味着每 20 多分钟，就有一个委内瑞拉人被枪杀，还有

一个委内瑞拉人被绑走。根据公开数据，2013 年上海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25 562 人，其中包括大量街头抢包、溜门撬锁的小贼，或是酒后斗殴、出手过重的闲汉。如果这 25 562 人全部变成持枪谋杀犯，再来几万个绑架犯，上海人差不多就体会到委内瑞拉的治安水平了。

打开当地华人的新闻网站 (<http://www.venchina.net/noticia/venezuela/>)，满眼看去不是经济风波，就是治安问题，再就是抱怨军警敲诈。在外交部发出的《中国公民赴委内瑞拉须知》中，委内瑞拉的治安和军警腐败问题完全是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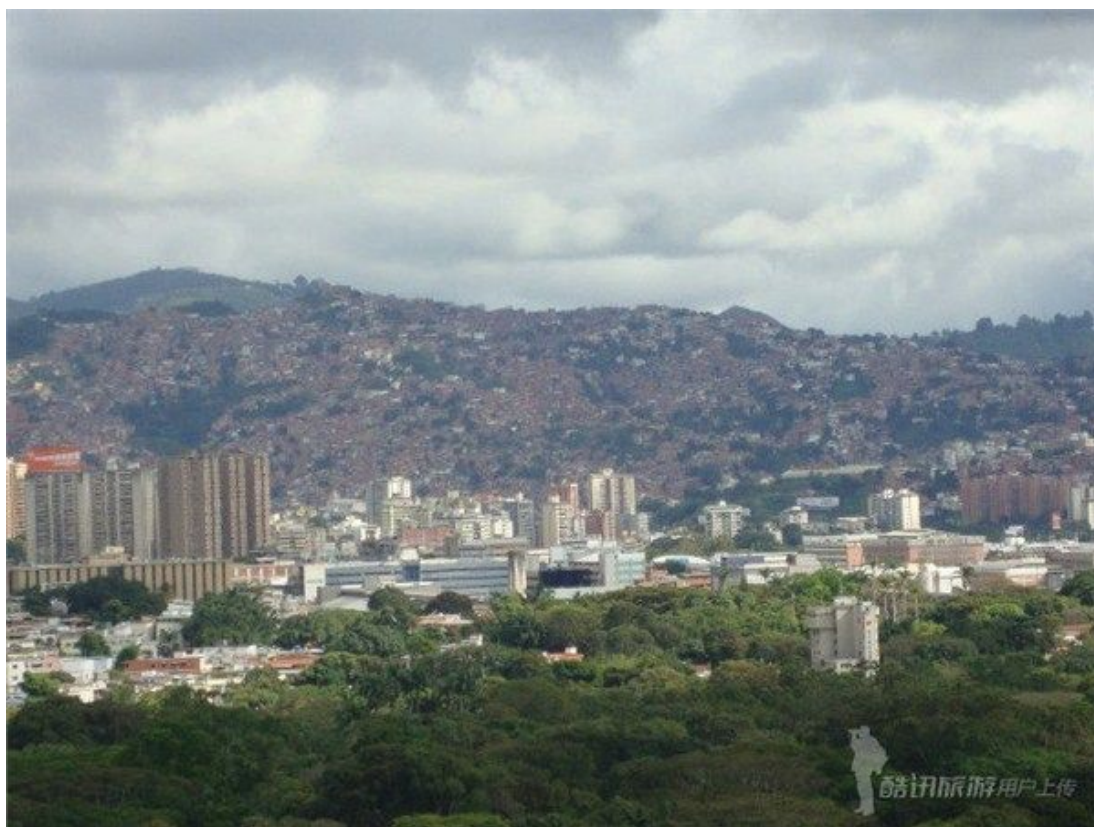
“近年来委内瑞拉政局不稳，经济状况不佳，社会治安有所恶化。以谋取钱财的持枪械抢劫、偷盗、绑架等犯罪活动呈上升趋势。据泛美开发银行 2003 年 10 月的一次调查，委在拉美各国中因暴力死亡人数占第六位。自 1999 年到 2003 年，委因暴力而死亡的人数达 4.3 万人，而加拉加斯每十万人中死亡人数达 133 人，居拉美各国主要城市第三位。因此，一些不法分子（包括现役和便衣警察）以审查证件为名，对我旅委侨民实施敲诈勒索和非法拘留。遇有此类事件，只要本人持有合法居留证和身份证，应与之交涉，切忌满足其不合理要求。交涉时，可向对方索要姓名、警号、电话等个人资料，如问题难以解决，可求助我驻委使馆。” (<http://ve.chineseembassy.org/chn/lsfw/1009A/t202095.htm>)

治安恶化到一定程度，警察就算混日子也不好混了。在中新网的这则报导中，警方的行为让人哭笑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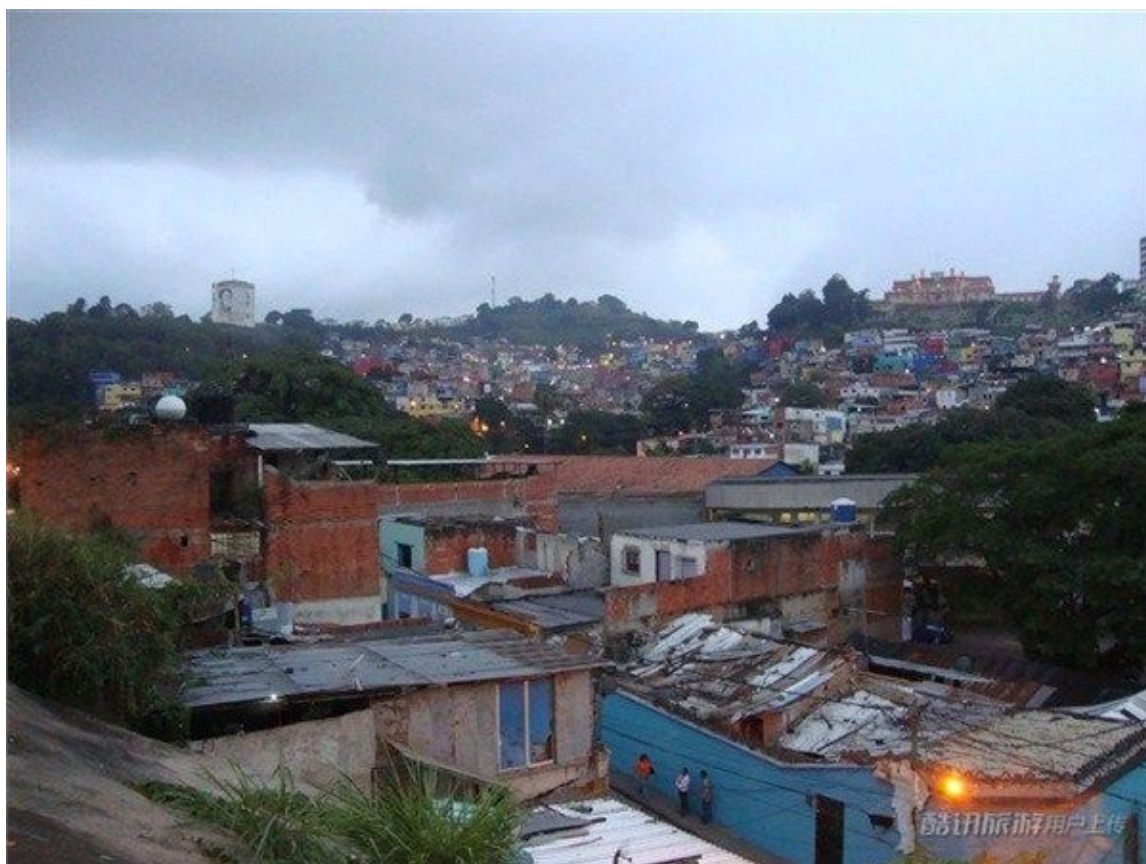
“警察整天提心吊胆，外出执勤时不敢单独行动，赶赴出事地点或处理犯罪现场时至少要出动 8 名警方人员，人去少了容易吃亏。警察不仅每天与死神擦肩而过，而且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形象糟糕。委内瑞拉司法部长承认，在委内瑞拉的凶杀案中，有 1/5 的案子是警察干的。”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9-05/4161077.shtml>)

三、贫民窟

军警腐败是治安崩盘的重要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贫富差距巨大、失业率高才是问题的根本。2004 年的时候，委内瑞拉高等法院曾经提议：“对于那些长期被极端贫穷所折磨的人们，如果他们在没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偷盗食品、药物和不值钱的生活必需品，法院不会对他们进行惩罚。”这等于从官方角度承认了治安问题和贫穷的关联。从直接观感来看，首都也是：“大片的贫民窟，房子是铁皮顶，下面四根柱子撑着。里面啥都没有，家徒四壁”。这个“四壁”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是“只有一拃（即手掌）厚的墙”。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已经很流行的东西，他们基本都没见过”。与之对比，“高级酒店比中国的好多了，设施好，服务也好……富人什么都有，有美元什么都能买到”。



城市和山上的贫民窟



贫民窟近景

从公开新闻来看，委内瑞拉最出名的不是石油，甚至不是查韦斯，而是层出不穷的世界

小姐。用百度搜索委内瑞拉，查看自动弹出的推荐序列，排在最前的关键词是“委内瑞拉美女”。



用百度搜索委内瑞拉，排在最前的关键词是“委内瑞拉美女”

在几十届世界性选美比赛中，委内瑞拉的冠军数量和美国、印度相当。考虑到美国引领世界审美文化、印度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青年人口，这个成绩相当惊人。原因肯定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委内瑞拉的混血民族。对于这个问题，早有人做出了理性的分析：“委内瑞拉美女常胜的秘诀在于有组织的长期准备以及少女们为摆脱贫困而付出的努力，这和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垄断世界长跑冠军位置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委内瑞拉出了这么多世界小姐》）

即巨大的贫富差距才是委内瑞拉“出美女”的根本原因。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阶层流动性很小的社会，美貌是许多家庭获得希望的唯一机会。

四、不该这么穷

不过，从经济指标来看，委内瑞拉应该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2013 年人均 GDP 超过一万美元。在中国，除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外，也只有江苏、浙江、内蒙古三个省区达到了这个水平。但中国从未有哪个省市的犯罪率接近委内瑞拉，城市里也很难看到连片的贫民窟。为何委内瑞拉会过这样的日子？

从资源来说，委内瑞拉也不该过这样的日子。该国探明石油储量 3 000 亿桶，高于沙特和俄罗斯，已经是石油储量的世界冠军，现在每年出产 1.6 亿吨石油（中国年产量约为 2 亿吨，沙特约为 4.5 亿吨）。按照世界市场油价，仅此一项就意味着 1 300 多亿美元的收入，超过重庆市的 GDP 总量。更何况委内瑞拉还有世界级的大金矿、钻石矿，以及拉美地区仅次

于巴西（巴西的国土面积和中国相当）的铁矿。在中国工业疯狂扩张，抬高资源价格，打造“金砖国家”的 21 世纪，委内瑞拉这笔资源遗产可谓丰厚——务必记住委内瑞拉只有 2 000 多万人，和重庆市人口基本相当。



产自委内瑞拉，重 217.78 克、约高尔夫球大小的金块，
是全球迄今发现过的最大单结晶金块。

对于委内瑞拉资源丰富却没有好日子过的事实，那位长辈从专业角度做了如下评价：“首先他的油不是那么好，粘度大、含硫多，不好采也不好炼，比起其他几个石油大国的原油要便宜七、八美元”。不过，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在石油价格超过 100 美元的今天，价格跌个七、八美元，不能改变委内瑞拉坐在金山上的事实。

第二个原因是一部分原油并非按照市场价格出口。委内瑞拉缺乏资金和技术来开发全部油田，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国家进行开发，每年有一部分石油要低价出口去换技术、抵利息。但这依然只是一小部分成本。和中国大庆油田那些近 90% 的含水率、日产数吨的油井相比，委内瑞拉日产上百吨的油井成本实在不算高，更何况许多依赖外国资金技术采油的国家过得也不算差。

在这位长辈看来，委内瑞拉真正的问题在于两个：“乱花钱”和“劳动力成本太高”。

五、油比水便宜，不是传说

所谓“乱花钱”就是超出能力地发放福利和补贴。按照那位长辈的说法：“到这里真见识到油比水便宜了”。到底有多便宜，长辈并没有给一个确切的答案。上网查了一下：

“每升汽油售价仅为 0.095 玻利瓦尔（1 美元约合 6.30 玻利瓦尔），给一辆汽车加 40 升汽油，花费仅相当于在当地购买一个鸡蛋的价钱，甚至比一瓶 355 毫升的矿泉水还要便宜……5 美分一加仑（3.79 升）的汽油价格维持了近 20 年……政府不仅没有从汽油销售中得到一分钱的利润，还要每年补贴近 200 亿美元”

(<http://jingji.cntv.cn/2013/07/22/ARTI1374449679429357.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12-19/5639240.shtml>)

以中国，或者以任何国家的标准，这种油价都等于白送。再加上近乎无政府状态的车辆管理，难怪这个国家遍地都是旧汽车，到处都有“神级”的司机。这是用每年 200 多亿美元的石油补贴培养的赛车场啊。为了赢取大选中的“民心”，政府不敢对离谱的汽油价格进行任何触动：“哪怕把一箱油价格从一个鸡蛋提到两个鸡蛋，也是想都不敢想。”

除此之外，高速公路也是“要么不收费，要么象征性收费。跑上百公里，换算成人民币的过路费只要几毛钱”。为验证这一说法，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个人游记：

“因查韦斯的新政，委内瑞拉的汽油价格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每升 95#汽油仅需要 9 分钱 BS（玻利瓦尔），加上一元人民币换 2 元 BS，不到中国的 100 分之一。加上委内瑞拉小车不收过桥过路费、极低的停车费，在委内瑞拉开车是所有汽车一族的梦想”。这样的“梦想国度”还没有被汽车挤爆，恐怕也能说明委内瑞拉平民的购买力了。

(<http://www.mafengwo.cn/i/1082599.html>)

不过，就算买得起车，也别着急向往这个驾车天堂。“高速公路没有路肩，只有纯粹的两条车道。好多路段连护栏都没有，下面就是陡坎和悬崖……好在出事后的援救也是政府买单”。免费和安全看来很难兼顾。就在搜索相关信息的时候，我恰好看到了另一条新闻：

“前委内瑞拉小姐莫妮卡·斯皮尔 6 日晚在卡拉沃沃州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被劫匪枪杀……事发时斯皮尔正与其前夫和 5 岁的女儿驱车行驶在瓦伦西亚—卡韦略港高速公路上，劫匪拦截了他们的车辆并对他们开枪，斯皮尔与前夫中枪身亡，女儿受重伤……据当地运输工会介绍，在这条仅 50 公里的高速上盘踞着 8 个专门持械抢劫过往车辆的犯罪团伙，治安状况堪忧”——看来虽然政府补贴丰厚，但即便是委内瑞拉小姐，也没法安心地享受这“免费”的福利。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1/08/c_118879700.htm)

六、限价与排队

除了近乎白送的油价和过路费外，“每到大选，就要发东西，小到日用品，大到房子，拿出来换支持率。大多数白送，少数象征性收点费用”。查了一下，按照商务部的信息，仅住房计划就是一个每年耗资百亿美元的工程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1/201211/20121108442471.html>)。即便委内瑞拉每年有千把亿的石油收入，这个投入对财政的压力也不可忽视。另外，大多数贫民窟的水电也是免费的。

即便如此，以左翼立场上台的政府依然认为补贴不够。在巨大的通胀压力下（高补贴造成的浪费正是通胀原因之一），政府对绝大多数商品实行了限价销售政策。“警察上门检查，要是超出限价就当众拍卖你的货”，结果呢？“货架几乎空了，亏本生意没人做，商店宁可关门也不进货，连卫生纸都缺了很久”。这倒不难理解，货币贬值了，价格不变，这个便宜人人会占，更何况政府鼓励你去占这个便宜。至于这个便宜是不是一锤子买卖，那不是普通消费者应该关心的事情。顺手一搜，可以看到政府的限价决心，以及限价带来的后果。

[MERIDA 的人为了购买电池排队达 4 天-委内瑞拉新闻网](#)

(<http://www.venchina.net/noticia/venezuela/2014-06-05/142753.html>)

[MARACAIBO 润滑剂商店被检查出超价-委内瑞拉新闻网](#)

(<http://www.venchina.net/noticia/venezuela/2014-06-05/142752.html>)

[医药行业要付清 50%的债务才能正常运作-委内瑞拉新闻网](#)

(<http://www.venchina.net/noticia/venezuela/2014-05-29/142739.html>)

[委内瑞拉卫生纸稀缺 民众疯狂抢购 新闻中心 中国网](#)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3-05/18/content_20030919.htm)

限价带来的缺货、个人囤积和排队问题暂且不论，仅从执行来看，查韦斯和马杜罗不得不频繁出动军队，来干预具体的经济问题。

[委内瑞拉通胀严重 军队接管米制品加工企业 网易新闻中心](#)

(<http://news.163.com/09/0302/05/53C1FBPI0001121M.html>)

[委内瑞拉军队“占领”最大家电卖场 限价出售商品\(图\)-国际频道-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11/c_125679913.htm)

2009 年要占领粮食加工厂，现在连家电卖场也要占领。再往下发展，不知道委内瑞拉军队会不会把整个国家重新占领一遍。

七、美元为王

在一个通胀严重的国家，汇率显然应该急剧变化，但实际上，委内瑞拉政府试图在汇率上否认最近几年的货币贬值。按照贬值后的官方汇率，委内瑞拉本国货币玻利瓦尔对美元的汇率是 11:1，但与购买力相符的黑市价格是 80:1。只有政府特许的少数贸易可以获得官方汇率，其他人获得美元只能通过走私和黑市。在如此之大的套利空间下，甚至妓女都开始转职：

“对于来自乌克兰、阿拉伯和菲律宾的海员们来说，Elena 这样的妓女就是活生生的外汇交易柜台。因为在委内瑞拉，当街买卖美元是违法的，但卖淫却不违法……在这种由妓女等人组成的黑市中，美元的汇率要超出官方汇率的 11 倍还多，因为官方合法渠道的美元实在稀缺。利润如此高昂的生财之道吸引了很多人投身其中。”

(<http://forex.jrj.com.cn/2014/06/10071317371860.shtml>)

对汇率问题，我从长辈口中听到了另一个近乎离奇的故事：“那边的年轻人为啥喜欢出国？……他们没钱的，但越是没钱越要申请出国……因为出国可以按照牌价换 2 000 美元的外汇，这笔钱扣除机票，剩下的到黑市换回当地的钱，最起码也能白玩一趟，一般还有得赚……”故事荒谬到听起来不像 21 世纪的事情。但上网一搜，这居然已经是委内瑞拉的普遍事实，甚至还导致了机票荒。

[民众出国买美元兑价差 委内瑞拉爆机票荒 民航新闻 民航资源网](#)

(<http://news.carnoc.com/list/270/270106.html>)

当然机票荒不止这一个成因。政府强迫外国航空公司按照外汇牌价来出售机票，但不允许他们按照牌价兑换美元。以美元计算成本的外国航空公司当然纷纷撤离委内瑞拉。

[多家航空公司停飞委内瑞拉 其欠 40 亿美元](#)

(<http://biz.xinmin.cn/2014/05/22/24369463.html>)

[委内瑞拉欠债 40 亿美元 国际机票价格将翻 4 倍](#)

(<http://www.venchina.net/noticia/venezuela/2014-05-30/142741.html>)

对此，马杜罗做出了一个似乎颇有说服力的解释：“各家国际航空公司在世界杯结束后会重新调整航班，现在停飞委内瑞拉是为了满足世界各地前去观看世界杯的球迷。”

(<http://www.venchina.net/noticia/venezuela/2014-05-22/142701.html>)

至于国民信与不信，恐怕要看巴西世界杯到底有多么精彩了。但在那边的中国企业员工不能因此不坐飞机。所以“我们去委内瑞拉，都在中国买好往返机票，免得到时候出问题”。

基于好奇，我又多问了一句：“从新闻画面看，委内瑞拉的中国商品可不少，他们自己的钱贬值，缺美元；那他们认不认人民币当硬通货呢？”

回答是否定的：“人民币？你得去找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才行。本地人只认美元。”

八、劳工的“好日子”

正如长辈指出，“劳动力成本太高”是另一个致命问题。高补贴、高福利并不是查韦斯“21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左翼劳工政策才是他的政策基石。前面谈到的“家徒四壁”的贫民窟居民，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政府会促使“女人养男人”，即“社区让女人去上班，其实也不干什么，就是找个名义发工资，回去够一家度日”。不考虑被浪费掉的劳动的话，这倒是个不错的政策，既发放了低保，也提高了妇女地位，比纯粹的发钱要好得多。

不过，以工作的方式发福利是好事儿，以发福利的方式去工作，那就是灾难了。“中国企业到当地采油设厂，雇多少当地人不能自己说了算，政府和社区都要管，层层加码……”。规定外企雇佣本地工人的比例，这是许多国家的通例。但基层社区也有权利提出要求，这就有几分混乱了。而且：“雇来的工人不勤快，几个人也赶不上一个中国人。说走就走，留也留不住”。但福利要求却远远超过中国人：“每周打三天零工，就必须发一周的工资，社区的理由是其他两天没法找别的工作了，社区权力大得很，什么都管……100 多年不打仗了，什么福利都有，欧洲美国有的这里有，欧洲美国没有的，这里也有”。

打零工的不好用，长期雇佣如何呢？那负担更重了：“雇上一个月，就没法随便解聘了，社区会干预的”。工人一旦有了固定职务：“全家的医疗费用都要公司报销，不封顶”。这样的要求，即便是石油公司也觉得压力巨大，其他企业就更难接受了：“山东寿光有个企业到委内瑞拉投资，开了几万亩地，雇当地人种菜，没几年就亏得一塌糊涂，关门走人”。

看 2009 年的委内瑞拉投资与经贸风险分析报告里面也提到了工资成本问题：“……失业人员较多，委内瑞拉工人技术熟练程度低，工资成本相对较高……”乍一看，逻辑似乎不通，“失业人员多”完全不应该是“工资成本相对较高”的原因。但细想一下，因果关系反过来就对了——“工人技术熟练程度低，工资成本相对较高”正是“失业人员多”的原因。近年委内瑞拉每次游行示威，第一诱因都是失业率高。但考虑到已有票仓的支持率，查韦斯很难收回已经承诺过的劳工福利。这恐怕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看最近的委内瑞拉新闻，该国已经有 20% 的企业停产。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508/c1002-24992275.html>)

在这种“超常”的劳工政策下，本土企业如何生存呢？据比较泛泛的观察：“主要靠偷税……富人都有自己的办法……军队都在经济界有自己的利益，否则怎么在查韦斯死后保证他们忠于政权？（马杜罗并非军队出身）”关于这一点，能找到的可靠数据不多，只发现之前的几则新闻：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授予总统一年特殊权力应对腐败-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11-20/5525978.shtml>)

委内瑞拉黑帮老大“隐形”逃狱 三个月内第二次-搜狐新闻

(<http://news.sohu.com/20100901/n274615063.shtml>)

委内瑞拉的传奇监狱（图） 旅游情报 南方网

(http://travel.southcn.com/l/2011-06/07/content_25107769.htm)

委内瑞拉总统大幅调整军方高层-新华国际-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7/10/c_116472217.htm)

委内瑞拉逮捕利用法航客机走私 1.3 吨可卡因军官-国际频道-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24/c_125432835.htm)

九、中国人来了，中国人要走了

委内瑞拉人工作效率低，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在这里有很高的竞争力：“来这里开个小店，做技工，很容易赚钱”。所以，尽管这里的名义 GDP 只有一万美元，和江苏浙江相当，还是有“许多中国人偷渡过来打工，来了就到贫民窟做生意去。现在已经有几十万人在这边……不，大多数不打算再去别的国家，就在这里干，很赚钱”。拿旅游签证过来打工的太多，以至于“这边的海关警察见到广东人就先赶到一边，专门查”。

上网查了一下，仅广东恩平市（县级）就有 20 多万人在委内瑞拉。

“恩平市共有海外华侨 50 多万，其中最多的为旅居南美洲的委内瑞拉，达 20 多万人。……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第 5 大产油国，经济发展迅猛，需要大量的人力，因此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委国“移民潮”……恩平人凭着一份勤劳，从种地、洗衣等苦差事做起，逐步涉足餐馆、杂货店、进口贸易以至厂矿企业等领域，成了当地经济发展一支生力军。”（<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1/09-21/3343319.shtml>）

只是最近委内瑞拉经济不稳，实际汇率暴跌，一部分人开始返回中国。

委内瑞拉华侨掀回乡潮 半年 3 000 余人返广东恩平

(<http://money.163.com/14/0308/10/9MQBG03H00254TI5.html>)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普通华人能在委内瑞拉站住脚，不是靠资本或血统，而是靠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现在他们都被逼离开，想必失业和通胀相当可怕，想必委内瑞拉平民更无法忍受。只是华侨有国可回，当地人却无处可去，委内瑞拉恐怕要进入一个动荡时期了。

十、后查韦斯时代

自从 2014 年新年，也是查韦斯去世后的第一个新年开始，委内瑞拉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街头冲突。先是学生，然后是普通市民，还有一向站在查韦斯政权对立面的中产阶级表明了反政府的态度。在最危急的三四月份，抗议者曾像乌克兰同行那样占据首都广场，用自制武器和军警在街头混战。占据广场的行为最终以军队武装清场告终，40 人死亡。这已经赶上了 2 月份基辅街头的伤亡规模。乌克兰人的抗议人群中有拳王，委内瑞拉街头则战死了选美冠军。

若非乌克兰最后打到东西内战、国家分裂，委内瑞拉本应是这个春天的新闻主角。马杜罗妻子曾当众为支持者打气：“委内瑞拉不是下一个乌克兰”。



2014 年街头对抗

但军队开枪控制首都之后，抗议并未因此平息。4 月 24 日，政府宣布一切游行都必须预先审批，随即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数百人受伤。5 月份起，学生再次上街抗议。虽然政府在五一劳动节上调了工资，但反对派不依不饶，市民苦于排队和涨价并存，年轻人则抱怨失业。街头再次出现了死亡。6 月 13 日，委内瑞拉终于公布了官方数据，宣称过去一年通胀率为 60%，并归咎于反对派的破坏和美国的干预。从经济趋势和这个表态看，委内瑞拉的动荡远没有到头。

从发展机遇来说。21 世纪初的委内瑞拉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论天时，中国和东亚的工业发展拉高了资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让所有资源产出国大发其财，而且在可预见的一代人时间内不会再有油价跌到个位数的危险。

论地利，前面已经说过了委内瑞拉世界第一的石油储量和金矿铁矿，这里不再重复。

论人和，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油价低谷让委内瑞拉人期待转变，查韦斯的左翼底层立场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15 年间，他的政策和个人魅力让他对抗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包括大选、弹劾公投和军事政变。他和他的政党有足够的时间去改变国家。

但是，15 年后，查韦斯并未留下一个繁荣稳定的国家，甚至他的政权也越来越难以延续。2013 年 4 月，查韦斯死后第一次大选，尽管整个国家挂着查韦斯的遗像，尽管代总统马杜罗反复强调自己是查韦斯的继承人，以哀兵必胜的气势带着全党参与竞选。但结果依然只是险胜——支持率 50.66%，仅比对手卡普里莱斯高 1.59%。这是去年的事情。接下来的一年，马杜罗政权经历了 60% 的通胀，经历了大规模的街头流血冲突，对治安和物资供应不足束手无策。从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未来发展也不容乐观：

1—4 月委内瑞拉化工业生产下降约 50%_石化市场现货价格专栏_新浪财经_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20140613/082119402153.shtml>)

委内瑞拉汽车产量和销量大幅下降_网易财经

(<http://money.163.com/14/0606/09/9U21GIDL00254TI5.html>)

在一个石油储量世界第一的国家，化工行业出现腰斩；在一个汽油近乎免费供应的国家，汽车产销量跌了8成。这经济发展趋势已不言而喻。接下来几年，不用说再出现2002年那种种军方和反对派的联手政变，就算是再来一次换届选举，恐怕“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就要断送在马杜罗这个查韦斯的好学生手里。

十一、石油，石油，还是石油

从个人生命来说，查韦斯时代已经在去年结束了；从政策延续性来说，我也不看好查韦斯时代还能延续很久。但我无意评价查韦斯个人的思想或品行——也许他的确表里如一，一生为他挚爱的委内瑞拉底层群众而奋斗，但感情从来不能代替政策的实效；也许他只是个惺惺作态、沽名钓誉的政客，但世界上有几样东西可以不问真假，装一辈子就是真的，比如爱情，比如真诚。查韦斯已经是个历史人物，真正有意义的是委内瑞拉人民未来的命运。

不可否认，查韦斯执政期间，委内瑞拉的民生有很大发展，尤其是最穷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得到了明显提升。1999年，查韦斯执政的第一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高达55.4%，现在只有25%，1999年委内瑞拉有4000个基层卫生机构，现在已经有一万多处。这在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算得上了不起的进步。委内瑞拉妇女流着泪赞颂查韦斯的政策是“上帝送来的礼物”，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类似的社会进步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我们必须同时看到石油价格的暴涨。1999年初的石油价格是每桶11美元，2001年的石油均价已经是25美元，2006年70美元，2008年更是冲击了150美元的高位。之后石油经过2008年前后的短暂波动，又迅速回到100美元的高位，并基本保持稳定。

对于石油储量世界第一、95%的外汇收入和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都依赖于石油的国家来说，这和天上掉馅饼、地上长摇钱树也没什么大区别，更何况委内瑞拉储量丰富的其他资源，如铁矿、黄金、煤炭等资源价格也在同期经历了明显上涨。委内瑞拉每年因此净增收入上千亿美元。

就像同期俄罗斯的“复兴”不能解释为普京的肌肉块一样，委内瑞拉民生改善的最主要因素应该是油价，而不是查韦斯的爱心。反过来说，2008—2009年委内瑞拉经济出现萎缩，大量民生工程烂尾，查韦斯的党派在许多选区失利，甚至连首都加拉加斯都丢给了反对派。这也不能归结为查韦斯的能力下降，而是因为这两年正逢世界金融危机，油价短暂地下探到40美元——之后油价快速反弹，查韦斯又夺回了政治优势地位。



虽然石油是查韦斯安身立命的本钱，但查韦斯似乎更擅长花掉石油收入，而不是提高石油生产效率。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委内瑞拉就达到了 300 万桶/日的开采能力，查韦斯上任前曾一度达到 350 万桶/日的高位。但之后的十几年，委内瑞拉原油开采始终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一度只有 250 万桶/日的水平，目前的产量也只在 300 万桶上下打转。很多时候，委内瑞拉根本用不完在欧佩克（石油生产输出国组织）争来的生产配额，近乎于捡到钱再亲手撕掉。价格暴涨似乎完全没有刺激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虽然这是全世界最不需要担心石油储量枯竭的国家。

同期委内瑞拉的其他产业也没有明显的发展，钢的年产量始终在 200 多万吨打转，铝产量甚至回落到 20 世纪水平。查韦斯搞了十几年，委内瑞拉依然有 90% 以上的商品依赖进口（这是一般估计，反对派则声称为 95% 以上）。可以说，委内瑞拉近年的社会进步，几乎完全依赖于外部的油价推动，而不是本国的生产力进步。而查韦斯执政后期直至今天的动荡，根本原因在于油价停在 100 美元的均值附近小幅波动，不再持续过去十几年的总体迅猛涨势。美国页岩气技术突破，俄国和中国签订长期能源合同，这对马杜罗来说恐怕都不是好消息。

十二、未来 vs 现在

查韦斯自称马克思主义者，2007 年查韦斯甚至向全体企业员工提出要求，每周安排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http://gb.cri.cn/14558/2007/04/26/2225@1565166.htm>）去年马杜罗访华，在中央党校公开宣称：“查韦斯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反思未来的道路，并最终确定用社会主义进行自己的革命”。这样说来，用马克思主义标准去分析查韦斯的“21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算是恰如其分。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9/23/c_117473905.htm

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什么？是人类的自由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要搞革命，用社会革

命推翻旧制度，破除制度对人类自由的限制。但人类自由发展的障碍不止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还包括物质条件限制，手工业肯定没法支撑社会主义。所以，革命还意味着用新的生产关系去激发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再用新增的生产力巩固新制度，给人类更大的自由空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一场革命不意味着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那么，这场革命既不完整，也不会稳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说，中国革命如果止步于占领南京、全国土改；俄国革命如果止步于枪毙沙皇，带来“和平、面包、土地”，那都不能算是完整的革命，更不能算是成功的革命。所以，中苏两国在战争胜利后实施的快速工业化不仅仅是革命的成果，更是革命本身。

要搞工业化，投资是绕不过去的问题。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进步的可能性。只要持续地投资，升级生产工具（机器），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工业经济就会以指数函数增长，涌出源源不断、越来越多的财富。从长远来看，初始投资和这些财富相比不值一提。但是，但是……问题就在于“从长远来看”。

长期来看，投资（实物和劳动力投入）意味着福利和轻松的工作，但从短期来看，投资和发福利、提高劳动技能和轻松上班不共戴天——家底就那么多，买了机器就不能买消费品；时间有限，看了世界杯、喝够了啤酒，劳动纪律肯定不会同步增长。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眼前不肯辛苦，不肯勒紧腰带节俭，代价自然就是生产力停滞、坐吃山空。

而这正是委内瑞拉发生的事实。随手一查，我看到这样两则查韦斯执政期间的新闻：

委内瑞拉铝业公司称调降今年铝产量目标_中铝网

“公司预计今年将生产 170 000 吨原铝，低于最初目标的 191 000 吨，并表示将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除非短期内有资金投入……去年产量达到 178 124 吨，较上年减少 5%。产量下降大体受技术因素影响，因为政府提供的 3.42 亿美元用于技术升级的资金投入步伐慢于预期。大约价值 3 000 万美元的生产线同样需要立即修缮……目前形势是废旧的机器太多了，而维持这样一个缺乏投资的工厂生产困难重重。正因为如此公司逐渐失去竞争力。”

(<http://news.cnal.com/enterprise/2009/07-01/124639030728241.shtml>)

国际能源机构称委内瑞拉石油产量持续下滑_国际_能源 - 中国铝业网

委内瑞拉 7 月份的石油日产量为 247 万桶，与 6 月份的日产 259 万桶相比下降了 12 万桶，与 4 月份相比则下降了 16 万桶……该机构估计，7 月份委内瑞拉的剩余生产能力为每天 23 万桶，因此委内瑞拉目前的日原油生产能力约为 270 万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规定的委内瑞拉的日产限额为 322 万桶，委内瑞拉的实际石油产量比这一数字低 75 万桶。

(http://www.alu.cn/aluNews/NewsDisplay_476061.html)

该机构认为，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和精炼能力下滑的直接原因都是设备进行维护，深层原因是委内瑞拉石油工业投资不足，转而把大笔的石油美元用于社会项目。1998 年 3 月，委内瑞拉的日产量曾经达到过 337 万桶，日产能约为 400 万桶。

石油和铝土矿是委内瑞拉最有竞争力的资源，给委内瑞拉赚来了数不清的外汇。但政府掌握的石油美元优先用于社会福利，石油业和铝业都未能得到足够的投资，产量停滞不前。这倒是解释了为什么查韦斯能不停地发福利、提高劳动待遇。按照马杜罗的副手拉米雷斯的说法：“2002 年至 2013 年，委内瑞拉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总投资是 6 00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石油出口收入。从 2002 年至 2013 年，委内瑞拉出口石油创汇总收入达到 4 870 亿美元”。(<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124/c1002-24212208.html>)

这两个数字的准确性有待考证，但足以说明大多数石油收入被福利和补贴消耗掉了。就在委内瑞拉各主要工业部门停滞乃至衰退的同时，委内瑞拉医疗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增加到8%。我不是反对在医疗上花钱，不是反对让平民活得更好。问题是，既然查韦斯积极地延长平民寿命，总该考虑他们老了之后怎么养老、怎么筹措医疗费吧。今天的好日子（何况也没多好）不能以未来为代价。

十三、革命为什么？

回到革命的定义问题。革命为了什么？从物质上直观地讲，就是让穷人过好日子，让劳动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工作，这没错。但任何政策都必须有时间定语。人民不是过了今年没明年的濒死患者，不是没有后代的出家人，为了将来的好日子，为了保证子子孙孙都能有尊严地工作，眼下必须进行持续的投资，必须建设一个繁荣的工业经济。

从政策上说，这需要中央集权，而不是把大量的经济资源交给基层社区分配；需要积累国家资本，而不能滥发福利，提出不切实际的劳工待遇。查韦斯为了眼下的口碑和支持率而推行的福利政策，实际上送掉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这种政策无论如何说不上是革命政府所为。更何况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提出高待遇，实际上是让企业不敢投资、不敢雇人。人为制造了高失业率，连眼前的劳动者利益都无从保护。在无力增加供给的情况下，用军队监督限价销售，只能是制造缺货和排队，反而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按效果来定性，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伪善政策。

退一步说，委内瑞拉是一个小国，人口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小省，美国近在咫尺。指望这样的国家学习中苏，发展门类齐全、军民并重的工业经济也的确不现实。但无论如何，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委内瑞拉的立国之本，临海的地形则保证了出口便利。【投资石油工业——→提高将来的收入】这个简单的逻辑人人都能懂。只要愿意投资，愿意为长远打算，查韦斯的委内瑞拉其实比当年的中苏更有优势搞社会主义工业。高油价之下，委内瑞拉甚至不需要勒紧腰带，只需要不把石油美元吃光分净，就能持续投资。有如此优越的发展条件，查韦斯连石油增产、钢产量增加都做不到，只是坐等石油涨价过好日子，这“革命”也未免太轻松、太没心没肺了。人无近虑必有远忧。查韦斯当年不想操心，自然有马杜罗替他还账。

十四、石家庄无产阶级比查韦斯更聪明？

查韦斯遇到的问题，走过的弯路，中国共产党当年也遇到过。举个例子，石家庄是当年共产党在关内拿到的第一个大城市。来自农村的接管人员一度迷茫地采取了民粹路线，涸泽而渔地从工商业获得物资，用来迎合贫民的自发行动。共产党高层很快发现了这个错误，并从中吸取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关于这一问题，有很多相关记录，比如：

参加贫民会的人不能正常劳动……“可误不起这空儿哪！”已经成为群众的普遍呼声。市委市政府领导根据这种情况，提出了“借粮”的口号，由贫民会干部开会讨论，然后去“借粮”……十三街的万聚永电磨房被借小米185斤、谷子1671斤、麦子1872斤……这很快形成了一种风潮，贫民们不生产、不劳动，靠借粮来生活，形成懒惰的风气……当时由于群众的觉悟还没有提高……多数人抱着“谁有钱就斗谁”、“穷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一区三街的纠察队抢了十六街商号里顺成的买卖；南大街四条胡同箩圈业工会纠察队封了三家箩圈店，结果全胡同都黑了街。店员也开始向东家清算，太和药店店员要求增加工资，东

家给店员分货、分股，店员在店里大吃大喝……不仅工商户恐慌，广大贫苦市民对这种做法也极度不满。有的市民说：“不能再让贫民会斗了。要是把买卖斗得都关了门，石家庄成了小乡村，穷人更难过。说是城市吧，没有商业，说是乡村吧，没有地种”
(<http://www.doc88.com/p-770863433105.html>)

“1948年初，在和平剧场里开大会，市长(柯庆施)告诉大家，走错路了，中央批评了，说工作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不应将农村里土改的那一套搬到城市里来，城市贫民代表不了这个城市。城市里没有工商业，就不算城市……”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9/02/11/003890793.shtml>)

如此看来。查韦斯有必要向1947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先进无产阶级学习一下经济思路。最起码当年的城市贫民知道要先有劳动，然后才能讨论分配劳动价值。

十五、能力与手段

中国共产党自信地纠正错误，发展城市私营工商业，但这并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实际上，共产党不打算对所谓的市场规律奉若圭臬，对私有产权也毫不感冒。很快，控制全国的共产党人开始推行公私合营，以重工业为中心进行经济建设，完全废除了粮食、钢材等物资的市场流通，金融改为国家专营，全面计划经济。以“违反市场规律”、“藐视私有产权”为标准来衡量，当年的共产党要比查韦斯“过分”得多。

所以，是否尊重“市场规律”，是否以行政手段干预价格、插手经济都不是真正的问题。分析细节，当年的共产党接管干部和21世纪委内瑞拉的军管人员有两处不同：干预目标、干预深度（力度）。

从目标来说，共产党并不打算把控制的物资用来提高贫民的生活水平。除了救灾之外，绝大多数物资都变成了社会积累，用来发展新中国的工业经济，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开始明显影响中国的消费品供应。这和查韦斯用枪顶着商店老板，搞军管大拍卖的模式完全不同。

但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是干预力度。

就在占领石家庄和其他大城市的同时，共产党正在努力吸收学生和年轻工人加入队伍，并迅速把他们培养成接管干部。每打下一座城市，共产党不仅仅会占领军事要地、政府机关，还会向几乎全部经济部门派出干部，从高层到基层接管整个经济体系。这些干部不是具有政治觉悟和军事经验的军官，更是共产党竭力挑选的技术人才。共产党的目的不只是代表工农占有经济部门的资源，而是试图具体干预整个社会的经济事务，以总动员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乃至工业革命。如果说共产党的接管干部是一个技术精湛、努力学习的工程师，查韦斯派出去占领商店的军官只能算是一个装卸工，企图用锤子敲机箱的方式来修理电器。中国共产党【控制】了每一个它占领的城市，查韦斯则只是【占领】了商店和工厂。

搞生产、搞技术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各工序精密配合，从头到尾丝毫不能懈怠，否则就前功尽弃。但消费和发福利就容易多了，人人都会。虽然分配公平也是个难题，但既然有东西可分，就算不那么公平，一时半会的也没人抱怨。委内瑞拉每年花200亿美元补贴国内的汽油，也没见开不起汽车的贫民有什么不满。和做蛋糕比起来，切蛋糕总是让人开心的。

所以，掌握社会的力度决定了革命后能做的事情。查韦斯的社会主义统一党能够向社区分配福利，能够组织街头斗争，能组织竞选，能和红色军阀结合维持中央政权，但没有能力对经济进行具体的控制。面对复杂的经济问题，他们本能地选择了熟悉的民粹路线，以街头运动的模式去管经济，以“政治正确性”为出发点去分配消费品，而对投资和精细管理漠不关心。

十六、资本主义大锅饭

情感上说，我非常理解查韦斯发动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初衷。拉美地区“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被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折腾了一轮又一轮。美国本宁堡军事基地有个“美洲军校”（原驻巴拿马），为拉丁美洲培养了十几位军事独裁者和数以万计的右翼军官。历次拉美的政变、屠杀都少不了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著名的毕业生有阿根廷独裁者加尔铁里、玻利维亚军阀路易斯·阿尔塞·戈麦斯、智利情报主管劳尔·伊图里亚加、危地马拉独裁者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巴拿马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秘鲁军阀弗拉迪米罗·蒙特西诺斯——2002年发动政变，试图致查韦斯于死地的陆军总司令弗拉因·巴斯克斯·巴拉斯克，也是这里的好校友。

但是，世界并不是一根只有两头的棍子。反对资本主义，不等于能搞好社会主义。相反，只凭着一腔热情和街头运动的能力就去搞社会主义运动，最后必然要把社会还给资本主义规律。查韦斯派军队占领商场，实际上说明他缺乏既忠诚又懂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没资格谈管理社会，更没能力改造社会。所有的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都只能按照既有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运行。查韦斯把绝大多数机动资金拿来发福利，客观上把投资、积累的任务让给了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国家会越来越依赖于资产阶级提供的经济增量。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发起的时候多么慷慨激昂，都只能退化成资本主义规律上的改良主义。查韦斯的社会主义福利大餐，实质上是一份资本主义提供食材的大锅饭。

改良这种事情，就是在一片欢呼中修正社会的局部制度，最好别得罪人，而任何全面改革都免不了有社会群体不满。这意味着任何改良都只能有局部效果，以选举制造合法性的分权制国家尤其如此。查韦斯的社会主义运动因此客观上被“拆分”为无数个地方性、行业性运动。每个社区和工会都企图在切蛋糕运动中发出更大的声音，向够得着的企业讨要更多的利益。

这种“自发性”显然会带来不公平，但只要蛋糕（石油、美元）还没有完全切光，就没人会为整体利益担忧。比如前面提到过每年200亿美元的燃油补贴，实际上委内瑞拉只有20%的家庭有汽车，但很少听到剩下80%的人对此表示不满。查韦斯就这样用貌似公平的补贴换来了暂时的政权稳定性。

十七、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越来越难

不过，从长期来看，不同的利益集团够切分的企业利润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能真正控制社会、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坚强统治集团，各利益集团会迅速地发生冲突。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有固定职业的人和失业者、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早晚会因为蛋糕不够大而对立起来。每年几万起谋杀案足以说明冲突的尖锐性。

在各个利益集团中，石油行业的管理层和熟练工人掌握整个国家的财源，博弈能力最强，不依靠查韦斯也能获得足够的利益切分，所以他们是查韦斯的坚定反对者，屡屡和政府发生冲突。2002 年政变中，最先站出来反对查韦斯，最先欢迎反对派上台的组织就是石油工会。

(
http://www.chinamil.com.cn/gb/defence/2002/04/16/20020416017040_zhxxw.html)

石油工会也屡屡对政府的决策进行阻挠：一位反政府的工会领导人表示，他的工会代表着 53 000 名石油工人。“我们普通石油工人没有义务为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糟糕的管理买单。”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090504/15316178939.shtml>

每年的五一节，站在政府一面的工会和反政府的工会组织都会举行独立的游行示威，两派声势不相上下。反政府一派的工会甚至屡屡发动总罢工向政府施压。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保护劳动者权益著称的国家来说，这种现象可谓荒诞。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2/86/20020502/721952.html>)

不过，虽然利益集团纷争不断，虽然示威、政变是家常便饭，但查韦斯政权还是维持了 15 年的基本稳定。这期间，国家拿到了税收，贫民生活明显改善，有工作的人拿到了加薪和名义上的高福利，资本家借腐败和逃税拿到了利润，军队则得到了足够的军费。和大多数拉美国家相比，这似乎还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正如前面提到的，委内瑞拉的人均酒精消费量还保持在拉美国家的冠军位置上。

常识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委内瑞拉的每个利益集团都基本满意，谁的利益受损了？

答案是所有委内瑞拉人，尤其是未来的委内瑞拉人。在查韦斯管理下，他们低效地分掉了高油价带来的石油美元，甚至还打压了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份看上去很美的资本主义大锅饭，归根结底还是要委内瑞拉人自己买单。在这个科技迅速进步的时代，如果有朝一日新的能源科技开始打压油价，一定会有委内瑞拉人为查韦斯时代而后悔。考虑到现在委内瑞拉 90% 的商品靠进口，将来未必不会有人说：“真希望我们当年没有那么多石油”。

从眼下的趋势看，即便油价不跌，马杜罗的政权也危机重重。一方面马杜罗政权在继续向贫民窟发放福利，试图减少贫民的数量，另一方面走出贫民窟、受到教育的年轻人的诉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分发少许廉价消费品完全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年轻人在经济上或许还是贫民阶层，在精神生活上却更接近反政府的中产阶级。马杜罗政权在消除贫民、推广教育方面的成就越大，自己的执政基础损失就越快。但如果他们停下这一进程，就会立刻丧失来自现有贫民窟的支持。这真是个左右为难的选择。

结语：马克思的龙种，查韦斯的跳蚤

在前面的一万多字中，我把查韦斯-马杜罗政权从头到脚“黑”了一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否认查韦斯时代的明显社会进步。我只是提醒读者，这一进步的基础并非生产力的突破，而是油价的高涨，而即便油价继续保持高位，查韦斯的继任者看起来也很难延续他的事业。

眼下委内瑞拉 60% 的年物价涨幅或许比 1996 年的 103.2% 低一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当年查韦斯上台，社会背景正是 90 年代的超高通胀。用“比烂”来为自己找借口的政权，需要经常想一想自己前任的下场。

在文章的最后，考虑到查韦斯和马杜罗自认的社会主义者身份，我用这段马恩合著的发言来给全文收尾：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 10 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恩格斯书信 1890 年

诚然，委内瑞拉领导人如果放下“独立自主”的脸面，及时、彻底地投靠世界级大国（显然只有中美两个选项），借外国力量开发丰富的资源，只要油价保持高位，未必不能再把“查韦斯路线”再维持十几年。面对反对者的指责，查韦斯的辩护者也可以说查韦斯和马杜罗缺乏彻底改造社会的条件，只能“因陋就简”地搞改良，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这我也不否认。但无论如何，被石油兴奋剂催得再肥大，跳蚤也不是小龙；拉美气候再促进变异，虫子也没有龙的基因。如果有社会主义者试图到 21 世纪的委内瑞拉寻找未来，我只能建议他多吸取教训，谨慎地辨认“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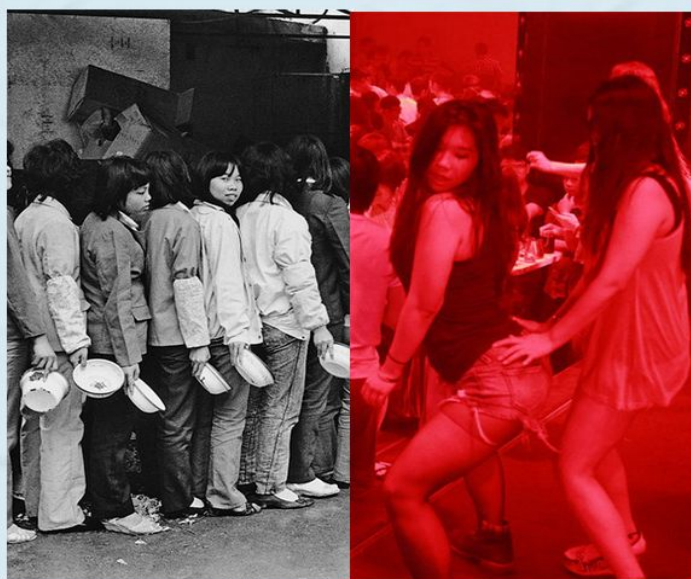


语录



少年中国评论

<http://review.youngchina.org>



在这里象在任何地方一样，居民中的正派妇女，-----那些希望靠劳动而不是靠出卖肉体生活的人-----甚至在商业繁荣时期也只能得到勉强糊口的一点工资。

当她们因没有工作而被抛到街头的时候-----这些不幸的妇女常常有这种遭遇--她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卖淫、乞讨。或者进比监狱还不如的习艺所。

恩格斯《英国妇女状况》

背负婊子的骂名也要走这条路，因为 贫穷是更为深刻的耻辱



：吴名峰

几天前，在 CCTV 记者的暗访之后，警方关闭了东莞十几家涉黄会所。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十几家会所在东莞不算什么，突击检查在这一行业也是时有发生，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网上对此事讨论热情很高。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也很值得讨论的事情，激发了我的表达欲。虽然一位长者曾经用他的人参经验告诉我要闷声发大财，但我不说话会憋死。说话之前我先声明，我从来没有去过东莞。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性交易是否能合法化。目前官方对于性交易的处理，还是比较恰当的，也符合了社会对于性交易欲拒还迎的看法。

事实上，我国法律对性交易打击并不能称得上是严厉，只要不强迫、不组织、不控萝莉，一般不涉及刑法。抓到买卖双方，无非是罚个几千块，通知家里来领人，有单位的可能会被开除。

这是很有意思的，执法部门对于失足妇女之宽大，可以说除了通知家里一条外，对失足妇女基本没有威慑力，而仅有的，来于家庭或社区的阻碍，实质上是来自道德而非法律的束缚。

如果再对比一下失足妇女的收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风华正茂的少女投身这一行业。

按东莞会所六七百元一次 ISO 的行情，失足妇女每接客一次一般收入三四百元，一天一般可以接客三次，一个月可以接客二十天左右，月收入可以轻松达到二三万元。当然失足妇女也是分等级的，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的“模特组”收入可以翻几翻，刚入行的“实习生”一次只能拿一百元。发廊里集体经营或自家个体经营的失足妇女们收入更是千差万别。

但基本没有疑问的一点是，大多数投身此行业的失足妇女容貌只有三四分，也没有家庭背景和其他杰出的技能，如果不干这一行，她们大多只能领两三千块的月薪，在年老色衰时嫁个和自己一样出身的屌丝，在城乡结合部忍受丈夫吹嫖赌饮。

所以，她们投身这一行业，多数不是被迫的。只要想想她们要在床上帮老丑肥臭的男人舔遍全身，确实是非常悲惨。但更悲惨的是，这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

她们宁可背负婊子的骂名也要走这条路，也许是因为她们意识到贫穷是更为深刻的耻辱。

有人会说，自己两三千块月薪也能过得很好，其实刚毕业就在家人帮助下买房买车。说喜欢吃粗茶淡饭的人，基本是吃腻了大鱼大肉。说只重感情的女人，最后基本嫁了小康人家。你在学校里，也许一千块就很足够，但如果你一辈子月薪两三千块，你会过得很痛苦，眼看别人一个手机顶你全家一月温饱，灌多少心灵鸡汤也无法安慰你受伤的灵魂。

那些说贫穷不是借口的人，其实多数没有真正穷过。或者是为了秀优越。

是，也有许多工妹，甘于一辈子领两三千块的月薪。可是她们的地位，真的比失足妇女高吗？婊子遭白眼，穷人也一样遭白眼。

而失足妇女们出卖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十年，实际上还是达不到中产的水平。为此她们很可能一生都不能正常结婚生子过性生活。一些人与生俱来的物质条件，另一些人出卖了一切也无法获取，这就是阶级。

我认为，了解了这样的背景以后，再继续讨论卖淫能否合法化，是虚伪的。单纯靠法律并不能解决她们的问题。即使卖淫合法化，受到高税收和各种规章束缚的官妓也难以和收费合理服务多样的暗娼竞争。

卖淫并不是女性物化的原因，而是人类物化的结果。谈论人买卖身体的自由听起来有点新鲜，但这种事一直在发生。人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神圣，在商品化的社会，人就是可以交易的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码。

像一个笑话里说的，男人对女人说，即使有人出两千万，我也不会把你让给他。女人说，如果有人为我出两千万，我愿意跟他走。

我们总是为自己追逐物欲打出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感动得自己都信以为真。

你背景离乡抛开父母不就是为了多挣两个钱活得滋润些吗？但你得说是为了理想。

你抛开女友远渡重洋不也是为了多挣两个钱体验一下假洋鬼子的滋味吗？但你还是得说为了理想，为了呼吸民主空气。

你老母卧病医院无人给她换尿布擦屁股，你说是工作繁忙，其实还是放不下几个钱，又穷得请不起护工。

你老父意识模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你决定放弃治疗，说是不愿看他继续痛苦，其实是无力负担 ICU 的住院费用。

你四分不能更多却对一切月薪一万以下的没车没房男士没有感觉，说是对爱情不能随便，其实除了财产什么都可以商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码，总的来说，钱越多，抗打击的能力就越强，价码就高些，还能管穷人叫 low 逼。

一个人再丑陋，粗俗，邪恶，都不是问题。丑陋，可以找个漂亮的女人改良基因；粗俗，可以大把撒钱学习装逼，让后代接受好的教育；邪恶，你都学会装逼和做慈善、赞助媒体了，谁还会再乎？真正的致命伤只有穷！

当然，现实生活中你不能说“真正的致命伤只有穷”这句话，因为如果你不幸是个穷人，会被人说你 low 逼，没有灵魂，连工妹都会绕着你走，生怕沾上你愤世嫉俗的穷酸气。如果你是个有钱人，说这话更会被一干屌丝攻击人肉跟踪。

你要说，不管你挣得多还是少，只要有梦想和爱，就会获得幸福。

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

一九三九年



纪念毛泽东



: 鲁智力深

我生于九零后，未见天明，天已经黑——已经不习惯叫他主席了。当下各种作协、摄影协会、文联的主席出来走穴，梳着难看的大分头，油光满面，面目可憎。就连学生会的主席也是昂着鼻子走路，惯于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商会和慈善基金的主席们周旋在官僚和会员之间，左右逢源，倒显得平易近人一些。高中时，从学校出发，穿过一条长街，再走一两公里过一座桥，就到了书店。用现在的话说，书架上大多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可敌人反对的，必然是我们都拥护的——陪我逛书店的女朋友固然不爱看书，我也拉她去人迹罕至的书架，在其中就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和毛选。

眼看毕业了，想起之前找工作的经历，忍不住学《大话西游》里的夕阳武士，对自己说一句：“他好像一条狗啊！”千千万万学生小资，找工作时好像历经沧桑，心窝爬上了裂纹，身价在一遍遍拒绝中落到温饱线，变成温顺小狗，终于尘埃落定了。大狗深藏功与名，事先画了一张饼，其实是吃完了的，可是还在啰嗦：“中国梦。”群众满头大汗，对之曰：“三个代表。”

教材上写，“中特”理论生于毛，成于邓，发展于三个代表。当初为了应付考试，背得头皮发麻，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三个代表”是什么，总不会是三个戴表的人；一面又说毛泽东“老来昏聩”。毛泽东又不是皇帝，即便昏聩，也不至于生灵涂炭。为了划清界限，后继者把他当开国君主那样供在神坛上，又默许媒体对各种“宫闱秘辛”的揭秘来抹黑他。不久前，深圳亮相了一尊毛泽东的塑像，金光闪闪，汉白玉的底座，不食人间烟火。

十九世纪末，西方的旅行者来到中国，写下这样的话：“中国的过去比西方悠久的多，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不过，过去并不等于历史。中国过去没有真正的叙事，有的只是一个不知真假的故事罢了。”在历史悠久的中华帝国，来自发达世界的旅客看到了一片凋敝的现实。过去某个时间点的辉煌，短到数十年，长不过两三百年来，统统习惯性地变成废墟。黄炎培曾问毛泽东，共产党靠什么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给出了他的解答，就是实行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这样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提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实行民主的。传统的政治叙事里没有人民的作为，多的是所谓“家天下”和“牧民”。孔尚任写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几千年来，王朝就这么崩坏循环。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开门一看，真的只剩下一堆断壁残垣，一触即碎。

临近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离他去世也已经快 40 年了。这一百多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由竞争的经济被跨国的垄断资本替代，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高潮到低潮。私以为，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和政治领导的技艺不是最值得纪念的。对这些才能表示惊叹不过分，长期为之赞颂并大书特书就过分了，因为堕入架空小说的窠臼了。恰恰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救星式的图腾形象也应该被放到注意力之外。而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在敌国环伺的情形下的思考，才是最值得后来者反复取用的财富。毛泽东给了我什么启发？

上个世纪 70 年代经济滞胀的背景下，资本大量跨国兼并，直接导致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如今的资本主义世界，担当主力角色的是大型跨国公司，全球化实际是垄断资本的跨国化。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指出，世界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的体系，而非相互分离的国家利益体系，资本的收益取决于在这个跨国体系里的地位。跨国资本并不渴求国家的主权，民族资本实为跨国资本的附庸。这种情形下，第一、第二世界的国家仅仅是作为各种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而由寡头们不遗余力推广的地区主义改写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使之抛弃了多民族的平等联合，变成了纯粹的单民族霸权的分离主义；第三世界各色民族冲突、历史矛盾的间隙，资本进入，控制住他们的经济，将利润源源不断地送往金字塔顶端——正因为如此，作为大本营的第一世界美国，才愈加吸引各种跨国资本前去落户，只因美元的霸权。追求地区霸权的民族主义不足以抵抗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是不可抵抗的，各种民族主义力量强大的国家，其自身经济实际上是在跨国资本的掌握中。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长久地预计，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那样联合起来，阶级对抗和地区对抗联合起来，运用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观，建立国际组织，才是对抗统治阶级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对于毛泽东晚年的作为，官方认为他犯了巨大的错误。既不能全然否定，而用“老来昏聩”这种春秋笔法间接否定，因为情感复杂，为政权的合法性蒙上了羞羞答答的面纱。毛泽东去世后，社会主义中国彻底沦为资本主义再次复兴的契机，为跨国资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无数廉价劳动力，也使各种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先富裕了起来。今天重新提起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是为了说明这样的道理：

第一，阶级的区别要人牢记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人类历史构图的底色；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革命成功的前后都有可能内部产生修正主义派别，这绝不是个别的情况，外部的资本主义环境为修正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广袤而坚实的土壤；

第三，从先锋队内部产生新统治阶级的隐忧不禁使人疑问：经历过这样好似欺骗行径的失望群众，凭什么相信共产党能够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如今高度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体现了比以往帝国主义时期更高程度的霸权，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拥有空前的手段，而全球化的阶级压迫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怎样的土壤？

第四，“文化大革命”对后继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仅仅就“民主”来说，它就提示了形式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区别。有人认为大众民主是暴民政治，相信共产主义者则会毫不吝惜地认为它是最终超越阶级压迫的现实运动。在更现实的意义里，不得不澄清这样一个问题：在过渡时期里，由于政治组织的高度垄断，尽管有“鞍钢宪法”这样在局部生产领域的民主制度，但限于物质的丰裕程度和劳动时间偏长，群众在经济上缺乏自主权，未能建立与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政治意识，因此不具有主动探究和影响政治进程的能力；而作为政治运动自上而下的参与者，才刚刚实现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实际上是落后的，也是进步的。既然是自上而下的，也就脱不了“人亡政息”这样的周期律。未来如何避免它？如何实行它？

毛泽东留下的遗产还有很多，我只选了两点。在纯粹个人的情绪里，我从来不愿意去纪念某一个人或事——无论哪种纪念方式，本身都是作为仪式，意识形态的氛围太浓厚了。然而世上没有能够抛弃意识形态的人，只不过说，从一种意识形态转而投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之中。这么说来，我们又不得不纪念了。人人都指望天亮的那一天，而人人都要为之付出代价——这是你我的梦想，继承自前人未竟的事业。

阶级和富士康工人



: 鲁智力深

编者按：中国经济腾飞离不开规模庞大的沿海代工业，而富士康几乎就是这类血汗工厂的代名词。富士康工人曾经以“十三连跳”震惊世界，年青一代农民工的生活境遇也由此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最近，富士康因为《财经天下周刊》的一篇报道，又一次成为新闻焦点。下文是一位大四学生对富士康工人境遇和出路的思考。作者从《财经天下》伪善的报道、全球化背景下的阶级图景，一直谈到自主工会和工人政党的作用。大学生开始认真思考同龄的农民工的命运，让编者不由得感慨，如果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和体力劳动无产阶级能团结起来斗争，将是一支多么伟大的力量！推荐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同志阅读此文。

从最近的一篇报道（《富士康的夜生活》一文，《财经天下周刊》）里，我们得知，同以往所有自由派的媒体一样，报道依旧充斥着肤浅和伪善，以及为了说服读者而刻意透露的那点狭隘的“真实”。仅仅这一些表面的事实，不足以让我们勾勒出跨国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工人现状。

1，阶级的现状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年代，“阶级”的概念比任何时候都要深入人们的认识，如今却再难从日常生活中意识到自己是哪个阶级的成员。民族成为更有共识的归属，而“屌丝”逐渐代表了大多数人失意的自嘲。

除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灌输，在发达国家，阶级意识赖以生长的物质环境也有了变化。例如美国、日本和欧洲，60年始，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者的比例大幅度下降，从事金融与第三产业的人数逐年增加。温特制（Wintelism）的模块外包模式取代了福特制（Fordism）的“中心——卫星”集群模式，上游公司依靠专利垄断了全球产业链绝对的利润。大工业时代催生了工人阶级，那时他们处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中心，阶级利益使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运动。不过，在所谓后工业的国家里，日渐熄火的政治斗争以及雨露均沾的福利政策，又使得他们服从于资本的逻辑。

无产阶级的非革命化、有产化，令传统的无产阶级定义处境尴尬。无产者是小生产者丧失生产资料后成为的，这是最初的共识。“商人购买他们的劳动，并且先是剥夺他们对产品的所有权，很快又剥夺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或者是为了节省商人自己的生产费用而把劳动工具留给他们作为徒有其名的财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实际上，无产者“可以拥有生产资料，但他不能用它们来养活自己，除非他与资本家签约”。（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徒有其名的生产资料不能使他摆脱雇佣关系。需要强调的不仅是剥削关系，也要强调控制（从属）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承认传统的无产阶级定义的主观性。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阶级”也是主观的，用以消解人复杂的主体性（民族、职业、性别），对社会关系进行了简单的化归。如果排除人类用一个叫做“阶级”的词语来定义这种关系的主观，“阶级”则纯粹的是表示一种经济上的集团关系——没有这种经济上的集团关系，资本根本无法进行积累，也无法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的

竞争导致所有权的垄断，生产中心向消费中心转变，并没有改变阶级对立的情况；有人声称“告别工人阶级”，我们仍可以这样说，阶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因此，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边缘地带与中心资本的对抗，一个是遍布世界的阶级的对抗。

2，富士康

“来到了富士康后，让小辉这个‘小时候兜里零花钱从来没超过 20 块’的农村孩子迅速有了‘城里人的感觉’。但很快，富士康机械、枯燥的工作和离家后的孤独感吞噬了小辉挣到工资的喜悦”，“在 2010 年的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后，很多媒体将矛头对准了富士康的加班制度，但富士康的工人并不这样想。一位曾经的富士康员工说出了很多工人的想法：‘他们如果不来这里，一大部分人过得肯定没现在好，另一部分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些人该怎么活，从来不是他们自己定的。前两年跳楼，媒体喊打喊杀，富士康改了制度，加班少了，于是工资就少了，有人问过这些员工愿不愿意么？’”

“工人没有祖国”。然而，同发达地区的产业工人相比，经济状况的不同并没有表明阶级敌人的不同。在中国，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最像传统工人阶级的工人。资本的全球扩张，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制造业林立；靠外资和出口，经济快速增长。这个过程中，政府除了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政策，还提供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地方政府不仅鼓励职业学校的学生去富士康工作，往往也不会严格地规范用工规则。

每日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工人对于自己受到剥削的情况再清楚不过了，这是雇佣关系里最直白的道理。报道倒是描绘出一种认命了的犬儒理性：他们意识到了剥削，依旧忍受下去，只想维持原有的那些工资。这种描述的反动在于，它有意地无视了工人反抗不合理制度的自发性。以后的事实将证明，这是自由派最短视的地方。

“在做工期间，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向线长申请，这样会被准许 10 分钟的解决时间，如果超过时间没回来，生产线的线长便会加以管教和批评。‘有的线长素质低，总是骂人，’马帅说他曾亲眼见到一个线长对新来的普工爆粗口：‘你××会做不会做，不会做给我滚蛋！’‘如果你太老实，在里面还会挨打。’他说。”

针对上面的情况，报道给出的结论是：“这无可避免地造成了疏离感的企业文化”。

管理者除了精于制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规则，也乐意玩弄一些组织的“文化”。如果组织文化仅仅是“完成既定任务的某种非技术性的方式”，那么，可以承认它是中性的，甚至符合员工的心理需求。但是，管理者不会设计“天天涨工资”的标语，员工也不会为组织的文化而有多少感动。好比节约是普罗的文化，浪费是富人的美德，文化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分为阶级的和非阶级的。组织文化简洁地传达了管理者的愿望，员工则埋头做工，完成任务，大多不会认为自己在从事同资本有关的劳动。

“相当一部分的富士康工人像马帅一样，没有女朋友。马帅说他不愿意找女朋友，他觉得有女朋友反而麻烦，而蹦迪则成了像他一样的男工们寻找“爱情快餐”的方式。由于这里工人的超高流动性，大多数人都是过客的心态，男女关系在这里似乎更为随便。”“‘有些女工嫌加班太累，自己就出来兼职，这些都很平常。’在深圳和郑州两个基地，这个说法被多个采访对象所验证，而且大多数的员工对此表现得习以为常，‘这些女孩子都很好找，随便加一个富士康的 QQ 群，里面就会有很多，QQ 上有她们的联系方式和见面地点，你们还

可以去旅馆开房，地点你来定，这比去村里那些按摩店安全多了，她们都是厂里面做工的，做这个事儿只是兼职。我身边很多人都试过，没出现啥意外。’ ”

军事化的管理，极长的工作时间和高强度劳动，人员的高流动性，决定了爱情的稀缺。区别于起初的社交网站，婚恋网站的流行只证明了一个道理：现在，爱情需要担保，安全第一。做担保的，是清晰罗列的照片、生辰八字、职业和收入，用物代替缺乏时间又身心俱疲的人。“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产者那里，婚姻总是爱情的坟墓。不上婚恋网站，他们拥有现实，邂逅不同的爱情。“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无产者大可以和妓女相爱，爱没有政治，爱的共同体则最政治。

“这次唱诗班聚会有将近 100 多人，大都穿着印有十字图案的红色服装，这是富士康内部一个颇具规模的基督教团体，组成者都是场内员工，唱诗只是他们每星期举行的集会活动之一，而他们也只是整个团体的一个分组，在郑州有两个工业园区，一共有 4 个分组，每组有近 4000 多人，整个基督教团体有固定成员上千人，这在流动性很大的富士康是难能可贵的。” “ ‘有些人，他在迪厅蹦迪，一蹦蹦一晚上，有些人上网，一上上一通宵，他哪里知道主的仁慈和生命的美好！我们都是被主拯救的，我们要感谢主，赞美主，来，我们一起来唱……’ 在领唱的带领下，广场响起了不算很整齐的赞诗的歌声。”

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殖民有两样法宝，一是炮舰，二是牧师。当代，资本扩张仍免不了用这两样。在形式上，宗教看起来不似厂区外面廉价的迪厅，但去迪厅里面蹦跶一会，合着巨响，一样令人麻木。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根植于颠倒了的世界；迪厅是异化了的休闲处，根植于异化了的工人。

3，工会情况

我们知道，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时，富士康和其他工会没有区别，一样的形同虚设。一旦管理者要求工会监督和镇压工人时，它会完整地履行职责。资产阶级国家里，工会难免沦为资本的附庸，独立不起来。

工人同工厂所有者的对抗一直没有停息过，有骚乱的形式，有罢工的形式，也有其他什么形式，但这些对抗很难说是政治斗争。自发对抗是自觉对抗的萌芽，“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个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还不能说是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地抛弃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列宁，《怎么办？》）要使无产阶级进行政治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斗争，工会扮演着桥梁的职能——自发的工会斗争，导致工联主义；而一旦工会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将起连接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运动不是通过工会实现，而是要通过政党实现。工会从事改良的经济斗争，而“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工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做的。在专制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在法律上首先就被禁止公开活动，怎样才能从经济斗争范围的外面向工人宣传和灌输革命实践和政治谋划？既然工会的存在至少是合法的，一些属于工会的宣传和组织机构也会是合法的。在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情况下，工会是进行宣传鼓动的最好的实际机构，领导宣传组织

的则是最坚定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的任务有两个，第一是在工人和其他人群（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宣传革命斗争的思想，而最急迫和实际的是，同那些民主主义者一样，先“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任务”。



理論視野

Theoretical Horizon



89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

1918.10.16-1990.10.23

马列主义的哲学是无产阶级斗争不可缺少的两种理论武器之一。共产主义战士必须消化和使用这个理论的原理：科学与哲学。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同时是科学家（历史唯物论者）和哲学家（辩证唯物论者）的战士去协助捍卫和发展这个理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1.28.-1895.8.5

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列宁

哲学的党性——列宁哲学的一种辩护



:王小晦

摘要：列宁关于哲学的基本论点，全部哲学都是有党性的，或者唯心主义立场，或者唯物主义立场。以往，学界对于列宁哲学论点的批判，多是简单粗暴地论断其为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破坏，或者是从神圣“人性论”的角度进行嘲讽。通过梳理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传统，得出列宁的哲学论点是对哲学传统最好的扬弃；而当代哲学，从拉康的自我形成机制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传唤，则反击了“人性论”对“党性”的纠缠。列宁关于哲学党性的论点不仅没有泯灭哲学的意义，反而是一种新的自觉的哲学实践的开始。

全部哲学史就这样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尸骨；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肉体死亡的个人，而且也充满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体系，在这里，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哲学史的事实并不是一项冒险的行为，一如世界的历史并不只是一些浪漫的活动，换言之，它们并不只是一件偶然的事实，迷途骑士漫游事迹之聚集：这些骑士各自为战，无目的的挣扎，他们的所有努力，都没有效果。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一（贺麟、王太庆译文）

在任何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下谈列宁的哲学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列宁写道：“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在公共场合，任何哲学家或者哲学工作者若是不以“战斗”的姿态、用恶毒的人身攻击的方式来诋毁列宁的哲学论点，似乎就不足彰显自己哲学的普世性。他们组成反动堡垒狙击列宁的哲学论点，目的只有一个：“凌驾”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但事实上，哲学家们“每时每刻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所有努力的客观作用，就是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即哲学意识形态。

列宁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传统西方本体论哲学一个真正的超越，亦即哲学的党性。关于马克思对于哲学的发现，阿尔都塞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一种基于无产阶级党性立场的哲学实践。哲学只是作为一门没有对象的学科，以往，意识形态工作者们依据他们服务的阶级（很多人并不知晓他们在为其服务）的教诲，把哲学圣神化，他们的工作是在意识形态内部用意识形态话语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神圣化、普世化，狙击科学工作的前进。而列宁公然指出了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他们恼羞成怒地妄图用他们从陈旧的启蒙哲学中掏出的一些闪闪发亮的黑色粪球来螳臂挡车，可稍稍具有常识的人们只会认为他们的大粪球的抛物线轨迹是优美的。

列宁的论点，所有的哲学都是有党性的，它或者直接表述自己的立场，或者通过反击相反的立场来彰显自己的立场。绝大多数的哲学家或者哲学意识形态工作者们都要千方百计要宣称或者证明自己的无党性，而他们的无党性不过是党性的一种。依据列宁的教诲，作为一

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战士，有必要向所谓“无党性”宣战，这算作哲学实践的一种。

1、本体论与哲学

长久以来由于国朝马哲学界对本体论的错误解读而形成一个激烈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本体论？在这场争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指认为各种本体论，其主流为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争论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被指认成一种本体论哲学，被误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被湮灭在西方哲学传统中。通过梳理西方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方能传唤出本体论在国朝马哲学界里迷失的所指。

回顾西哲学史，哲人们总是在以体系对抗体系的方式展开各种战斗，而这些所谓的体系就是本体论。本体论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特点在于，认为存在一个超越经验世界的秩序，它是绝对精神，是逻各斯，是存在，它是传统西方哲学体系的一切。由于西方哲学发展路径的特殊而产生的本体论，是哲学的一种特有形态。从本体论的完整发展形态看，它是把系词“是”以及分有“是”的种种“所是”（或“是者”）作为范畴，通过逻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先验原理体系。国朝学界大有对本体论忘文生义而把它当作关于世界本体或者本原的学问，这样一种理解直接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阐述。

对于西方传统哲学，阿尔都塞在《哲学和科学家自发哲学》中把哲学家称作远离一切实践的知识分子：“他们想要隔着这段间距，用自己的词语掌握实在，把实在嵌入系统。词语复词语，体系复体系，而世界一如既往继续它的进程。这种理论话语对其他方面的实际工作（科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实践）无能为力。哲学：它的企图弥补了名号上的缺陷。这种企图生产了漂亮的话语。”通过对照俞宣孟先生给出的本体论定义，显然可以看出上面关于哲学是“词语复词语，体系复体系”的说法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那么，“哲学的党性”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任务理解为自觉抵制建立本体论体系解释世界的诱惑，并主动打击理论危机下不可知论的一时泛滥；马克思主义哲学拒斥本体论，对唯心主义体系国王的僭越，使得现代君主有了革命的武器。

黑格尔哲学作为传统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体系不仅超越之前的体系，而且据称可以包涵一切，它覆盖自然和宇宙，又覆盖人类个体和人类文明。这样无所不能的“客观逻辑”是从“有”的概念推演而来。这样的体系不是从现实出发解释世界，而是从概念出发解释世界。很显然，这个宏伟的逻辑体系本身就是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在“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哲学体系”这样的词语下进行的，很少使用“本体论”这个概念。但黑格尔的逻辑体系显然是一种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拒绝开创一种新的哲学（本体论哲学）来抵抗黑格尔哲学，哲学的党性使得哲学实践从这里开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中是一个坐标事件。这一变革是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弃扬实现，放弃以形而上的逻辑体系解释世界的企图，由此传呼的革命弥赛亚亦即唯物主义得以占据唯心主义消失之后出现的空场，使得用科学解释社会得以成为现代君主的武器。而科学的方法论也得以从意识形态的牢笼挣脱出来，从而使得从抽象逻辑概括世界的黑格尔式一元矛盾跃变成真实世界多元矛盾的过度决定。只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唯

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主要是批判本体论哲学，才可能进一步理解恩格斯所说的今后“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等论断。

据此，我们知道列宁关于哲学党性的论点不仅没有抹杀哲学的意义，却使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的“战场”有了明确指向，即消灭哲学意识形态。

2、无意识主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党性

陷入到“党性”中而做困兽犹斗的哲学工作者们，总是用党性毁灭“光辉的人性”来对我们共产党人加以嘲讽。然而，从1965年到1967年出现的当代知识史上的大爆发，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拉康《文集》和德里达的三部著作等等的出版，形成的结构主义的视野把自启蒙时代而来由迪卡尔塑造的统治我们头脑的人的主体被彻底解构，彻底变革了人们对于自我意识的认识。这场运动被阿兰·巴迪欧称为哲学史上的最伟大变革之一。在“主体”已经被解构以后，继续谈论“人性”无疑和在量子力学时代按照经典力学讨论原子中的电子运动一样可笑。从拉康的无意识主体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疑毁灭性打击并热烈的嘲讽了以“人性论”攻击党性的论点。

2.1 无意识主体：虚假的“自我”

弗洛伊德开创了精神分析学说。阿尔都塞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一文中评价说，就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拒绝了“经济人”一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拒绝了“心理人”（不再提倡虚假的“自我”）。弗洛伊德之后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哲学家雅克·拉康，不仅以现代结构主义和语言学重塑了精神分析，更使得人们对于“自我”的认识不再沉湎在泰西哲学的神话叙述中，并对“自我”及其形成机制开始有了科学的研究。

在当代，拉康是第一个宣布个体主体的“自我”死亡之人，他杀死了施蒂纳的“惟一者”，从主体性构建的虚假性的角度解构了“人性”，从而使发端自启蒙时代的整个人本主义的根基陷入根本性窘境。依据拉康的学说，个人之自我的形成，发生于一种虚假的强制性自我认同。在镜像中的虚假认同，是一种自恋式的虚假认同。当婴孩在镜子中看到相对稳固的自我影像，即误将其认同为“自我”。自我对于镜中想的误认是开始，紧接着是命名，即个人奴隶般地被迫对一个符号（家庭意识形态的传唤）的认同。你一生下来，家人就叫你王小嗨，你就成为了王小嗨。人们对王小嗨有太多的期望，王小嗨应该成为听话懂事的孩子，他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王小嗨应该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画家。你被传唤为一个家庭意识形态需要的“王小嗨”。这就是大他者传唤的结果。这就是说，人在开始学习语言时就已经处于一种暴力规训之中，从没有什么所谓符合“人性”的个人，只有他者传呼特定符号时形成的被误认的“自我”。主体在接受名字时候，就已经按照大他者的规训来塑造“自我”。进入语言维度的主体，本质上被结构成一个无意识主体。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无意识主体，意味着无意识主体不再是特殊的个体经验的层积，而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存在。被无意识的语言结构支配的主体不再真正存在，而“自我”也不过是无意识的表征。更进一步，无意识主体对应着语言结构的大他者。至此，作为主体的人回归到“社会关系的总和”。

2.2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唤的党性



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阿尔都塞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角度，首先来阐述“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作用——就它是一个镇压机器来说，本质在于用（肉体的或其它形式的）武力来保证生产关系（说到底是剥削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条件。国家机器不仅为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王朝、军事王朝等等）不遗余力，而且首先要运用镇压（从最野蛮的肉体施暴、到纯粹的行政命令和禁令，直到公开和隐蔽的审查制度）来保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行的政治条件。”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镇压机器，阿尔都塞开创性地阐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只有一个的镇压机器相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多个，它们或者属于“公共”的，或者属于“私人”的机构（学校、家庭、教会、公会、电视报纸等等）。镇压机器通过暴力、物质力量发挥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作用。最后，作为整体的国家机器完成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因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运用意识形态来发挥作用，所以如果统治阶级不能确立自己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领导地位，以维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则不能确保统治地位的稳固性。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在改造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工具——学校，通过打碎旧有的教育工具，创制新的教育工具，革命政权得以维系革命正当性并培养革命接班人。革命不在于推翻了反动政府，而在于创造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在于要把国家政权从封建贵族的手中转移到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家手中，打碎了一部分暴力性国家机器再建立一部分新的暴力性国家机器，而在于粉碎了作为封建社会头号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教会。此后出现的民间教会，即是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创制，而作为君主则有意或无意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做出了裁决。

拉康的“虚假”自我形成正是由于大他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种）的传唤。按照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解读，意识形态一般是一种无历史的、共时性的、对“现实的真实关系”的想象。主体对于意识形态才有意义（误认和想象），具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按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需要，使具体的个人（我们所有个人）误认成具体的虚假“自我”方能完成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如果我们同意先不谈论“人性”，即对未出生的孩子寄予期望的家庭意识形态，所以，甚至在出生前，孩子从来都是一个主体。“王小嗨”要继承父姓，要成为一个画家，在这样特定的家庭意识形态的模子里被认定为这样的主体，从还未被孕育，就有人按照这个符号来塑造“王小嗨”。“王小嗨”并由此获得一个身份，成为被传唤出来契合再生产的不可替代的人。

如果我们只能按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传唤、规训而形成主体，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照常运转，世界就不会有变革。事实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不是铁板一块。依据马克思的教诲，意识形态归根结底产生于与之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可以得出这样的论点，即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就是对传唤具体个人为具体的某阶级而服务的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于占据具体个人的抢夺战。事实上，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已经传唤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先锋队即现代君主。哲学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战场，接受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唤的哲学家个人，必然要捍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哲学意识形态）的普世性，以此彰显所谓的“无党性”。“无党性”其实是党性的一种（因为或者彰显党性无非就是资产阶级党性还是无产阶级党性，或者泯灭党性存在）。那么假如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坚持“无党性”立场，无疑不知不觉中就会成为替资本主义统治稳固添砖添瓦的一份子。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让人们沉浸在想象的关系中而不自知。与党偶然相遇的知识分子，被党的意识形态传唤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摆脱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有机知识分子意味着必然要摆脱自己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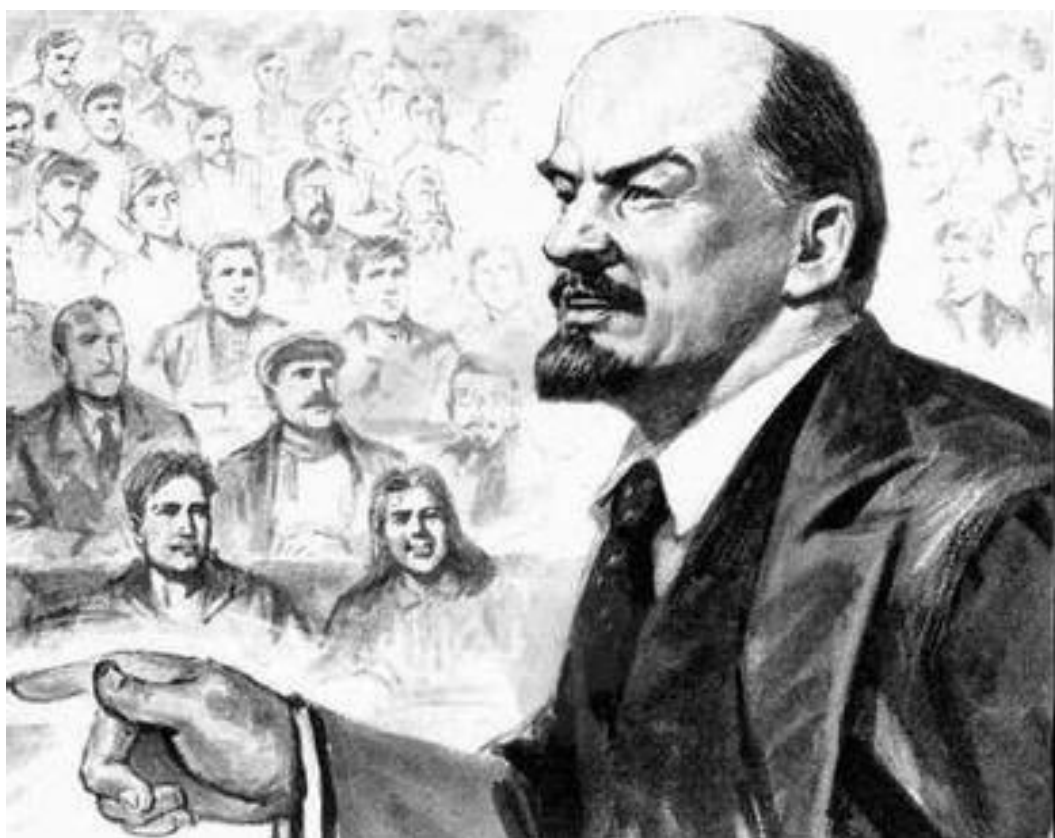
所带来的一切，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教诲我们说，在哲学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困难的。而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天然有一套与之相伴的物质关系，这种物质基础必然孕育着唯物主义，他们天然比较容易接受符合无产阶级党性的哲学。

参考文献：

[1] 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3] 吴琼，雅克·拉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列宁

MAY
DAY

WORKERS
PARTY
U.S.

30 HOUR WEEK

MAYMARKET



96

自发性与自觉性



：黑夜里的牛

作者不久前发表的《论社会主义者当前的的问题与任务》一文引起了一些同志的讨论。有赞同，也有反对。赞同的暂且不提。就反对意见来说，大都聚焦于社会主义群体和工人群众的结合方式上。他们认为独立于工人运动之外的左翼知识分子（更常见的说法是小资）团体没有意义，或者担忧非体力工人的社会主义者群体过度强调自己的“领导”地位会导致脱离无产阶级的倾向。更激烈的批评则认为，把自己当做革命家，把工人当做任你摆布的棋子的态度是不对的。主观上自以为是，实践中幼稚可笑：不深入到群众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谁愿意被你领导？还有同志甚至直接否定革命知识分子的先进性，认为这些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左翼青年算不上进步力量。这些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道理不多。要么过于片面，要么相对简单。任何实践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理论问题。而要讨论革命家组织的必要性，革命家组织和群众的结合方式等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之间的关系。

根据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文献，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有时候还会对工人的觉悟抱以较高的评价，比如认为狄慈根独立发现了唯物辩证法。所以，有人就此认为列宁和考茨基他们所讲的“灌输论”“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其实，虽然马恩没有明确阐明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但他们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在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两位导师明确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注：“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编者注）；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这段叙述是把共产党当做工人运动的先锋，即自觉的力量看待。共产党的这种自觉性依赖于理论的高度和彻底性。这一彻底性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最著名的宣告之中：“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②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在消灭资本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但工人生存条件的改善或者对恶化趋势的抵抗，却可以在资本主义的既有条件下完成。面临着恶劣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无产阶级，自产业革命开始后就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这些斗争的目标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不反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安全的工作条件、更短的工作日等等。这些改良斗争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却会影响资本家的利润率，因此绝不会轻而易举地达到，必须经过通过漫长的有组织的斗争。市场经济的规律促使工人阶级走向行业的联合，因为不这样做，作为卖方的工人将失去或极大削弱与作为买方的资本家的谈判筹码。就像资本家废除封建特权，农奴逃出封建主的领地一样，处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通过罢工等手段发展既有的生存条件。这一斗争是自发的。

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使得工人阶级逐渐联合成一个整体，而在经济斗争中得到壮大的工人阶级不可避免的会提出政治诉求。如果工人阶级被最终能导致其解放的思想所影响，那

么这种政治运动就必然会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消灭。所以，资产阶级一旦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是不可阻止的，就会想尽办法将这种斗争局限在经济斗争的领域。比如，工人阶级最早组织起来的英国，同时也是最早产生了工联主义思想。工联主义的主要主张，就是主张阶级调和，宣传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协调一致的，主张进行纯经济的斗争。③

所以，我们说的自发性，不是指工人在斗争中纯粹是“自发”的，没有眼光没有理论没有战略，而是说这种斗争是在工人阶级**没有认识到——也不需要认识到——**自己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的情况下，由现实的经济利益所推动。斗争的目标也能为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自发运动存在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发展过程，斗争中的群众也在不断学习，变得越来越善于进行这种斗争。而自觉性则是指旨在推翻资本的政治统治并全面变革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列宁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的斗争。与自发斗争一样，自觉斗争也会经历一个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是，自发斗争不需要任何自觉性即社会主义的意识也能开展，但自觉斗争却既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不能脱离自发斗争，它只有通过掌握二者才能获得成功。自发斗争和自觉斗争是工人运动的两个方面。如果自发斗争不发展为自觉的斗争，工人阶级便不能获得解放。但认为自发斗争天然高于自觉斗争，或者自觉斗争天然高于自发斗争，都是不正确的。不过，客观情况是，由于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自觉斗争的恐惧，国家机器会更加防范自觉斗争，往往就造成运动的自觉方面远远地落后于自发方面。

那么，工人阶级能否通过自发斗争自行达到自觉，即运动自身创造出一套“马克思主义”呢？列宁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导师在《怎么办？》中讲道：“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④各国的历史都表明：工人阶级单是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作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90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⑤

列宁写作此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里，无论工人阶级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资本主义而言，它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把工联主义包括在自身之中。而工人阶级方面，也由于教育的普及，文化程度取得显著提高，至少主要工业国的工人阶级都已经基本具备了诸如阅读、计算等基本文化素质。而且，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在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了胜利，留下了极其巨大的遗产。这些遗产不光是各种社会主义的文字资料，还有人民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在这样的特殊社会条件下，列宁的论断是否已经失效了呢？根据客观情况来看，列宁的论断仍然成立。以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为例，社会主义运动在党变质之后，就迅速地衰落，并没有受到来自工人阶级的大的自觉（即从社会主义意识出发的）抵抗。而新生的工人阶级，虽然长年在血汗工厂里受到中外资本家剥削，其中独立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革命工人的，极其罕见。绝大多数工人的思想仍然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掌握。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靠共产党里的左派，文革造反派“余孽”，学院里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左翼学生传承和发扬。这与列宁讲的当时俄国的情况是类似的：“当时一方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

自觉斗争的觉醒；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⑥

“工人阶级的本能”是一个时常被提及的概念。出于对非无产阶级的出身不自信，又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自己能够给运动带来什么价值，有些同志就机械地把阶级和阶级意识混为一谈，认为工人依照自己的本能就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列宁的时代也有这样的一些人。列宁认为他们“忘记了本能性也就是社会主义者所应当予以帮助的那种不觉悟性（自发性），忘记了在现代社会里‘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⑦无产者像其他任何阶级的群众一样，也是现存社会的产物。群众依照“本能”，不断总结经验，完全可以进行经济斗争。但群众如果不学习思考马克思主义，依照什么本能，根本无法自动达到对自身与现存秩序的关系的正确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任何退却和犹豫都是为资产阶级思想束缚群众的大脑提供便利。

某些同志一听说有人说“社会主义者是自觉的而工人是自发的”这类观点，就十分不满。他们认为这样提是看不起工人，自以为是。其实，只要承认“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使得“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工人中大多数不能自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就不得不承认工人中存在着自觉的少数和自发的多数之间的矛盾。无论这些自觉因素产生于普通工人还是产生于本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强调知识分子是作为运动的自觉因素加入进来，并不是否认工人阶级中能够出现掌握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工人。实际上，由于工人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文字资料的广泛存在，以及网络的普及，善于思考问题的工人是完全有可能通过学习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但是，这样的工人一旦成为了社会主义者，就主要的变成了运动中自觉的方面。觉悟的工人同样存在着如何去领导其他尚未达到自觉阶段的工人的问题。

觉悟工人和觉悟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体现为不同的革命分工，不能武断地说谁高谁低。无产阶级的坚定性，是指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被收买，必然不断革命直到解放全人类。并不是说他们中的先进分子相对革命知识分子就一定更坚定。中国“六大”就是按照“工人高于小资知识分子”的原则，把向忠发扶上总书记的位置，还选举大批工人为中央委员。这些革命工人并没有像共产国际期待的那样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要，恰恰相反，大批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变节，尤其是向忠发顾顺章等，他们的叛变使党组织遭受巨大的损失。客观地说，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党员不仅坚定，而且善于做群众组织工作；而有些工人革命家，反而经不起威逼利诱，做出背叛党背叛无产阶级的事情。

工人参加工人运动大多是所处的经济地位所要求的，而其他阶层（包括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之所以投身工人运动，很少直接被经济利益推动。一些人由于某种道德感或者说同情心，想要做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慈善工作，这样的人是自发地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觉因素进入工人运动，把工人运动限制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还有一些人先是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认识到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才能实现人类大同，然后积极地参与到工人运动中来。后一类人就是运动的自觉因素。需要注意的是，说他们是自觉因素，并不是盲目认为他们天然能领导工人。实际上，由于运动的自觉方面往往落后于自发方面，这些没有斗争经验的革命知识分子一般都是缺乏经验的，不经过痛苦的学习，没有办法完成其使命。而学习的主要途径，就是深入群众，掌握群众的语言和思想状态，使得自己善于把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与工人最切近的需要结合起来。

虽然列宁否认工人自发运动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但从逻辑上讲，独立于自发运动之外的知识分子即便不出现，工人也能够逐渐掌握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这一进程会慢很多和曲折很多（到底慢多少曲折多少我们无法估计，就像一位工人同志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的，也许要一千年！）。不过，既然通过理论学习认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阶级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已经产生出来了，就不可能把知识分子放在一边，任由工人自己去寻找从自发到自觉的道路。各国的革命史也表明了，革命知识分子一旦与群众相结合，将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许多同志十分排斥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小资”，落后，不仅不能领导群众运动，自己还需要群众运动的刺激才能保持其进步性。但这些同志的说法不仅贬低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还对工人运动做了过度的美化。同时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现在中国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青年有相当多是理工科背景的，毕业后就成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的工作环境与典型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第二，在这里狠批知识分子的，往往本人就是知识分子，而我们认识的一些工人出身的同志，对知识分子的软弱性等毛病，相反还报以更大的宽容。

自发性和自觉性之间是有差别的，而差别就会造成矛盾。它们可能会相互结合，也可能相互脱离甚至对立。既有自觉性脱离对自发性掌握而演变为政治密谋，也存在自发性摆脱自觉性的领导，蜕化为改良主义的情况。**不能仅仅强调自觉因素脱离自发因素的问题。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人中出过修正主义叛徒，工人的经济斗争组织中也出过改良主义工贼。**自觉和自发的辩证关系不仅存在于运动的两个方面和群体之间，甚至还会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现代的工人运动必然会造成一批工会和党的官僚，这些官僚最初参与运动的原因是为了追求社会主义，但随着生活的稳定和资产阶级国家对革命的压制，自发性压倒了自觉性，就很可能满足于改良斗争，抛弃对最终目标的追求。而工人也可能会通过自己的学习，把自发性提高为自觉性，逐步认识到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获得本阶级的解放。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发性和自觉性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方面。前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改良斗争，后者是试图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自发性不代表低端，自发斗争的充分发展，会使得无产阶级团结成一个整体，无论这个整体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都意味着力量的发展；自觉性也并不代表高端，如果运动的自觉方面不善于掌握自发方面，那这种自觉性就是低水平的。**在最初阶段，自发性力量和自觉性力量的发展往往是分开的；而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把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无论自觉性来自于知识分子还是工人自己，都是运动取得胜利的必要因素。自发性和自觉性并不是直接对应到知识分子和工人两个群体。只不过是说，在运动初期，自觉力量一定是弱小的，知识分子革命者肯定甚少出于自发斗争的原因加入运动，所以自觉性因素就较多地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工人如果觉悟，完全可以承担知识分子革命者所完成的职能，而历史表明，这样的工人随着运动的发展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不会去幻想每一个无产者都能通过理论学习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并投身革命。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脑力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使得工人阶级能够自主掌握理论并从而发展自觉性的机会大大增加。目前，这个群体中产生的社会主义者还更多地自认为是知识分子或小资，但这仅仅是就他们获得社会主义观念的途径来说。客观地看，他们的阶级归属已经与以往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有了很大的差别。

下面再谈一谈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具体组织形式的问题。

各国历史表明，自发性所要求的组织是工会，而自觉性所要求的组织是政党。关于前者我们不用多说。关于后者，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说到，“（1）革命家组织；（2）

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也认为其他阶级中某些分子在一定条件下会参加这些工人组织的）。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⑧关于工人组织和革命家组织，列宁在《怎么办？》里有如下的描述：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们对于厂主和政府进行的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并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与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同。第一，工人组织应该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相反，革命家的组织所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然这种组织的参加者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职业之间的区别了。”^⑨

关于革命家组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列宁认为要在专制环境下斗争，就必须把群众组织政治任务减少，而把善于跟政治警察做斗争的人结合起来组成秘密的革命家组织，去完成这些政治任务。虽然列宁的时代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专制国家，但社会条件还是有着极大的不同。最大的差别是科技的发展导致了现实世界的全面数字化。具体说来，就是通信的普及，全面的社会监控，以及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不仅人的各种特征被数字化，物理世界也映射到虚拟数字空间中了。个人是否还具有与政治警察斗争的能力，斗争的方式是在物理层面的“隐藏”，还是在数据层面的“遮蔽”，这是需要通过实践去回答的问题。但是，现在的政治斗争仍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相比于列宁的时代，甚至更加浩大。所以，就组建一个专门化地完成政治任务的群体这一点来说，列宁的观点仍然适用于当下。不能看到一些新变化就否定列宁的观点，更不能因为自己素质差，就认为此路不通。我们要提醒自己，此路不通，未必有别的活路。

那么，党所做的工作，相对于自发的工人组织所做的，有什么差别呢？有很多差别，而且差别很大。我们现在还没有党，还谈不上党的斗争。回答这个问题还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就引用列宁的一段文字作答，并结束本文：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⑩“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⑪“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所有一切（不管涉及哪一个阶级的）专横和压迫、暴力和黑暗现象有所反应（并且用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用其他什么观点来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应该不遗余力地进行政治揭露工作，因为“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⑫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

③ 1851年成立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和1860年成立的混合木工协会为代表的新模范工会最完整、最系统地体现了工联主义思想。后者拥有坚强的领导和雄厚的基金,很快取得对全国工会运动的领导权。工联领袖把雇佣劳动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口号。而争取“公平的工资”的主要手段,就是由资本家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仲裁法庭调解劳资纠纷,以达成劳资两利的协议。(来自百度百科)

④ 有同志认为翻译成灌输进去是误译,据英文版,应该是带进去的意思。但灌输和带进去都表示往工人里增加了它本来没有的东西。至于灌输把工人说得太被动了,把社会主义者描绘得太高等等,对于这里的讨论并不重要。

⑤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

⑥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8页

⑦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页

⑧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

⑨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⑩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7页

(11)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12)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285页

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创制学



: 走向现代之路
巡夜人-马宁

编者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之一。左翼中关于历史理论的讨论格外引人注目。@走向现代之路和@巡夜人-马宁两位同志此前撰写的一篇文章细致地讨论了“历史创制学”的问题。虽然言辞犀利，内容却发人深省。小编征得作者同意后，特将其转载于本站，希望能促进理论思考和争鸣。

不久前“女神读书会”刊发了傅小正的《“共产主义”：末世论还是创世论》。这篇文章由刘小枫关于毛泽东国父论引发的争论而起。不同的是，傅小正用了所谓历史创制学的方法来论证和辩护毛泽东的国父地位。毛泽东是否国父这种问题我们并不感兴趣，我们在这里想谈一谈历史创制学，看看这个能创造奇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货色。

傅小正在文中为其历史创制学的出场做足了铺垫。他先是把关于毛泽东的国父的争论规范为“逻各斯”的冲突，使问题一开始就具有了浓重的唯心主义气味：“总是陷于自己的族群而不可自拔，并仇视着其它不同的习俗”。于是争论的各种表现都是“假象”，真相只有一个：“两种普世价值、两种逻各斯之间的冲突”。是哪两种普世价值以及逻各斯呢？作者并未做太多说明（因为他的主旨也不在此），只是给出了结论：一是毛泽东与新自由主义、基督保守主义之间的统一，二是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之间的统一。因为作者的这种处理方法是历史创制学应用的具体表现，所以值得谈一谈。

作者在这里绕了很多圈子，谈了阿伦特等“共和主义”派推崇的城邦的对立用来类比两种“逻各斯”之间的冲突，这个类比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一个城邦并不是一个原子，甚至谈不上统一，城邦本身就是分裂的，城邦是奴隶主的城邦，对立的是一个城邦的奴隶主与另一个城邦的奴隶主，对于不同城邦的奴隶来说，这其中并无有意义的差别。我们在该文的最后甚至看到作者把“城邦”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说“城邦是真正的公共空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公共空间”是奴隶主和氏族贵族共同占据的，而奴隶和非公民的自由民则被排除在外。而他所谓的两种“逻各斯”的对立则与之完全不同。他还谈到了法国哲学家科耶夫钟情的“游击队”，浪漫地说，“游击队的生存空间是大地，……大地之为大地，正在于它屏退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生存方式，它是真正的政治空间，而不是经济计算。”且不说所谓大地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对立是一种荒诞的哲学，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生存在海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而且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也远远晚于大航海时代，与海洋毫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摆脱对海洋的依赖；事实是，任何一种生存方式都是经济计算，没有经济计算任何一个人、家庭、政党、社会或者国家都无法生存，不论是在大地上还是海洋中，游击队还是正规军。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作者的这些论述，没有丝毫历史唯物主义的味道。**作者绕的那么多漏洞百出的圈子，如果不是为了炫耀名词实质上也没有必要的，他只需说出两种“逻各斯”的对立就可以了。

但是，两种“逻各斯”是对立的吗？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总是在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对立的。这两种所谓对立的“逻各斯”，它们有着共同的更高一层的“逻各斯”，它们只是这

更高的“逻各斯”的演变。**这种更高的“逻各斯”就是合法性。**把毛泽东与新自由主义、基督保守主义统一在一起，是为了给这种“逻各斯”以合法性，因为这种“逻各斯”为了把自己的利益说成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更好、更直接的招牌。把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统一在一起，同样也是为了给这种“逻各斯”以合法性，宣扬自己是毛泽东事业的继承者。有趣的是，作者根本没有提到否定毛的“逻各斯”。

这两种“逻各斯”都把合法性的根源追溯到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它们统一在了一起。但是比宇宙大爆炸的速度还要快，这两种“逻各斯”瞬间从统一的混沌状态中分裂而出，呈现出你死我活的对立。为什么同一个毛泽东，却像板蓝根一样功效神奇、包治百病呢？傅小正说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做人的余地。不是人，难道他是神吗？不，正相反，出现这种情形，恰恰说明毛泽东不是神。一个神是绝对同一的，它的自身不包含任何矛盾。神本身不会即是善的也是恶的。神是绝对的善，而魔鬼是绝对的恶。而毛泽东不一样。即使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但是他仍然不是一个神，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诠释。神的绝对性是靠着神的信徒的屠杀和恐怖确立的，而毛泽东的绝对性，还远没有能够这样确立起来。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旦毛泽东具有了这样的“绝对性”，他也就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解放者，而走向了反面。

事实是，不论哪一种“逻各斯”，当它企图把毛泽东和自己捆绑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抓住了毛泽东的真实一角，而后夸大为全部。因此，有时候我们甚至很难判断，究竟是哪一个版本的毛泽东更真实，还是哪一个版本的毛泽东更不真实。毛泽东既是善的，也是恶的。他解放过人民，也戕害过人民。毛泽东的不同信徒们都想把自己抓住的那一片确立为神，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确立为神，以神的名义行使神的权力，实质上也就是把人的权力从其他手中剥夺掉，并把它集中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在我们看来，如何对待毛泽东并不是毛泽东的问题，不论摸到腿的说他像柱子还是摸到耳朵的说他像扇子，都不再与他有关。在我们看来，这些分歧远不只是“逻各斯”或者方法论那么简单。向他追溯合法性的行为，决不是为了意识形态上的目的。

傅小正为历史创制学出场准备的第二重铺垫是对公羊学的阐释。这重铺垫不但是历史创制学的应用，而且是历史创制学的合法性来源，如同两种“逻各斯”在毛泽东那里寻找合法性一样。作者这些写道：“《左传》长于记事，《穀梁》长于大义，《公羊》则兼具微言大义。”既然《公羊》是前二者的“合题”，那显然就是历史创制学的先驱了。此外，我们马上就看到，在讲了一通“素王”与“革命”的道理之后，作者写道，“素王的创制、墨家和释道的平等、心学的成圣论和法家的世俗关切对于律法（礼法）的反抗在毛泽东那里汇成了一股力量。”于是，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是纯粹中国古代史的产物，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关。那么很自然的，毛泽东思想也纯粹是中国古代史的产物，也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关。历史创制学在《公羊》那里找合法性还嫌分量不够，又把毛泽东也挂了起来。于是除了扇子和柱子，我们又有了一个像绳子的毛泽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中国古代史并不是中国古代农民等被压迫者的抗争史，而是中国古代封建的，或者其它任何一种统治阶级的（超经济）剥削史、压迫史以及为这些超经济剥削压迫寻找遮羞布的历史。换言之，这已经倒退到1840年以前，或者说清末新思想传入之前的历史“思维”水平。这种“思维”，恰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从进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直接鞭挞的对象。几个“革命”的辞藻，掩盖不了这种史观的倒退和反动本质。

因为毛时代后期对法家的极端赞扬，使很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法家有什么样的思想渊源。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比亚里士多德和孔夫子更近。

法家的严刑酷法和重农轻商，厚今薄古，时刻围绕着君主。法家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的地位和权力、以君主的剥削压迫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傅小正谈到了毛泽东的“弑父”，而实际上，法家正是父亲顺从的儿子，即使车裂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毛泽东时代赞扬法家，说法家代表了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显然是种歪曲。从这一点上来看，历史创制学在毛泽东这里寻找合法性，也是一种非常合乎逻辑的做法。

因为毛泽东不是神，所以即使在他这里找寻合法性，也需要相应的论证。这是颇为麻烦的一件事。傅小正围绕着《公羊》和毛泽东写了很多东西。他说，“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曾敏锐地指出，古代人的智慧是关于永恒价值的追求……毛泽东的逻各斯，并不是启蒙主义自由主义那套工具理性……毛不会是如公知、历史真相党那样庸俗下流的智术家。毛的理性与自由观念毋宁更近乎于古代，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也可能是他的可怕之处。”作者在这里依旧没有丝毫历史唯物主义的味道。在一个对世界的细节缺少认识的时代，人们很自然地用头脑中的想象来填补对世界认识的空白，这必然引导人们走向对宇宙和人类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猜测，而不是执著于细节和真相。这些猜测都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古代人眼中的许多“永恒价值”在今天可能已经一文不值。而毛泽东如果“更接近于古代”，那么显然等同于说他更接近于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想象，并为自己的想象为人类的“永恒价值”，能够拯救人类，并为之奋斗。现在，毛泽东不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非常现代的思想无关，而且不但是中国古代史的产物，而且是世界古代史的产物了。与傅小正的中国古代史只是统治者的历史一样，这里所说的世界古代史同样如此。作为一个基本常识，在古代，古代希腊罗马，这样的“自由”亦即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只是一小撮统治阶级成员的特权，“古代人”这样的词句不会使得这样的自由变成多数人的自由。换言之，傅小正的这篇东西连篇累牍地谈论“解放”，指向的却全部都是奴役和压迫。

作者继续追问：“公羊学真的如流俗所认为的那样，是非历史，甚至是反历史的吗？……尽管后世‘正史’神迹的色彩越来越淡，但它们始终都树立了一条普适的道德标准，并以其来绳墨一切历史人物与事件——对兴衰治乱原因的讨论无一例外地回归到了单纯的得到评判。……传统史学追求的是一种超时间、超现象的普遍本质，它不会去贯彻历史的相对性，更不会去承认历史的不断被创造，……章太炎、周予同诸公对于‘今文非史’论断，恰恰不自觉地还原了公羊学那真正的、具有时间性的历史思考，尽管这些思考在我们看来，仍然是残缺和片面的。”

若如作者所言，公羊学对待历史具有时间性，那么显然，历史的时间性应当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因此也有着不同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一个历史时代（或者一个朝代）的兴衰，不能从它如何看待自己、从它的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真正的原因，而应该从它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去寻找；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原因，都要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用教条来套。如果所谓公羊学的历史时间性是这样的含义，那么我们将会很高兴地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基本原理，原来中国人早已经发现了。

可是，傅小正马上告诉我们，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所谓历史的时间性，并不是客观的，而纯粹是主观的。“不仅仅孔子托古改制，诸子也托古改制，诸子百家所有人的言论并不是因他们出于王宫而各自对周代政制的某一方面做简单的复述，而毋宁是处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救世之弊’，是借用古人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承认你对舜、禹、伊尹的描述或许正是历史实相，但这并不妨碍我为了追求

‘世界历史新的一幕’而对他们做出不同的解释。……我们则可以在荀子、韩非子的‘圣无常法’、公羊家的‘孔子创制’那里，看到历史新的可能性的一丝曙光，尽管他们也会‘很保守地’与统治者形成暂时的和解。……蒙文通先生等于提出了‘人民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以及新的历史叙事’的伟大命题。”

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似乎解释历史也就创造了历史，或者我这么解释历史就可以这么创造历史。所谓的时间性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对历史重新做一次解释，而且在傅小正他们看来这也是重新“创造”历史。这是什么样的时间性！事实上，这样的“创造”，注定只能停留在主观的幻想领域。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傅小正援引的这些“托古改制”（除了康有为的最后一次），对各个封建王朝不仅没有分毫触动，而且恰恰强化了其统治。这不禁让人想起那样一句话：谁都不能创造历史，除了历史学家！这种历史观追求的不是历史真相（管它呢！），而是对历史做新的解释。这种对历史做出五花八门的新解释的做法，与该文引用的马克思的话根本就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指出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借用旧的语言，但是马克思随即强调，这就如同总是把一门刚学会外语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是还没有领会和熟练掌握新的语言。而且这种做法是在革命形势形成之后，在革命进行中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革命成功，那些旧的语言就会被扔到一边去。“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就都消失不见了。”这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规律**。一会儿把现象当成规律顶礼膜拜，一会儿又奢谈“断裂”，这种思维之混乱、错乱显而易见。而历史创制学与革命者相反，对那些古董情有独钟，大概还希望借此造成革命形势；甚至它的古董还是假古董，因为每过一段时间，它就得把那些古董翻新一遍。

而且在这里，傅小正实际上讲到了两件事。一件事是重新解释历史，或者更恰当的说是“托古改制”，另一件事是“圣无常法”，也就是推倒重来。前者是法先王，后者是法后王，似乎目的都一样，方法论却完全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莫非仅仅是孔夫子是历史学家所以喜欢说往事，而韩非子历史知识不足所以只能讲现在？显然不是。同样是为了改变现状，但是内容却是不同的。孔夫子的政治理想是周制，本质上是希望社会能回到周礼的轨道上去。而韩非子的政治理想是霸道，根本不稀罕用古人的语言和衣服。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根本区别不能因为他们都想改变现状就混同一气，就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民国时期遗老遗少的活动不能因为都“反对民国”就一锅煮一样。就是都托古改制，目的也可能完全不同。在今天，傅小正的历史创制学能找到颇多回音，有托民国改制的，有托苏联改制的，有托文革改制的，还有托美国改制的，——显然他们远不是一回事。所以，所谓历史创制学，正名为历史伪造学可能更加准确一些。既然傅小正们试图用它革命，当然也会有傅小歪们试图用它反革命，他们完全可以把毛泽东解释成为大灾星、大反派、大祸害，事实上已经有了这样做的、网上一抓一大把的民国粉丝们。因此，这种历史创制学事实上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种所谓的“创制学”事实上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规定“创制”的方向。**

唯物史观与之完全不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历史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不同的立场上去解释历史，当然改变不了历史的真相，因为历史是客观发生过的。用不同的方法去伪造历史，更是绝对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决不可能因为有些人从这样或者那样的立场上去解释历史，就能改变历史的走向。

由此可见，历史创制学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根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谬论，大致是1990年代以来国内流行的各种新儒家和西方理论的大杂烩。但是傅小正并没有满足于此，

而是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他文章的最后一段，叫作《我们为什么要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创制学”？》

历史创制学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两大贡献，**第一个就是唯物史观**，而历史创制学否定唯物史观，怎么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傅小正为什么一定要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创制学呢？难道唯物史观与反唯物史观能调和在一起？

傅小正写道，“放眼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似乎只是在继承黑格尔的哲学思维，往远了说是在继承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古典目的论。……所有这些评说都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免除对马克思的个人崇拜，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一部不断批判发展的历史，一部不断寻求对自身断裂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回应，就是在不断地抽去‘绝对精神’这个最保守最反动的东西，因为‘绝对精神’，本身是一个严密完整无所不包的固定体系。马克思主义是要拆除黑格尔体系的大厦，并在它的废墟上去寻找批判的砖头！我们需知，马克思是这个理论的开创者，却不是最终完成者，甚至需要如沃勒斯坦那样，‘把他当作战友’。毕竟，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个人的事业。”

这段话是如此重要，因为它揭露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创制学”的秘密。之所以要把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创制学拼贴在一起，是有着极其现实和功利的目的的。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要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以便借马克思主义这件“旧服装”，“借来的语言”，这种“久受崇敬”的东西来实现他们的意图。这是历史创制学的“时间性”和“不同的解释”的实例。

首先，他们极力夸大马克思主义的“断裂”，不仅仅与黑格尔断裂，而且与自身断裂。这样，“断裂”成了马克思主义本质性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了一种类似自变体病毒的东西，不断否定自己。而且，这种否定在他们看来是随心所欲的，没有任何对象目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规范可言的。这事实上已经消除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所应该具有的东西，事实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只有名称没有具体内容的空壳——不难看出，这个和……有异曲同工之妙。前面对毛泽东是绝对的同一性，这里又马上跳跃到绝对的非同一性，其目的昭然若揭。而且，这样一来，他们的“毛泽东”，和刘小枫眼里的毛泽东毫无二致，是一个“去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因而去革命化了的毛泽东。

其次，他们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定义为彻底的毁灭，只是接受几块批判的砖头。如果这样，那马克思谈不上主动自认是黑格尔的学生。傅小正们显然不解马克思为何突然在《资本论》跋中做如此声明。那是因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重新读了黑格尔，并受到启发。列宁强调，“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这种“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路数，显然和第二国际，以及斯大林——日丹诺夫更加心有灵犀。

第三，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未完成”。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个人的事业，与马克思主义是否完成根本是两回事。事实上，他们真实的想法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点在下边很快就会显露出来。

他们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以上三点规定呢？**因为这样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才适合应用于他们的目的。**他们强调“未完成”，是为了论证因此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人不断去“完

成”。他们强调“断裂”，就可以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硬塞进马克思主义中去。而他们夸大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决裂，无非是为了以屏弃历史目的论为借口无限夸大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他们误以为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就可以把唯心主义的历史创制学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然后把毛泽东安置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史的最高峰，并通过神化毛泽东来为自己夺取在人间的市场。

傅小正进一步阐述道，“马克思不是多愁善感的抒情诗人，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不只是要说明工人阶级有多么可怜，而毋宁是要解释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展的奥秘，只要有剩余价值存在，生产部类与消费部类就不会平衡，资本主义就会不断地需求外部市场以满足内部无法消费掉的商品，并把外部市场纳入到其自身内部，直到它扩无可扩。……资本却是运动的实体，是不可分割的。并且，资本主义的扩张是有其自身意图的，只有把全世界纳入到它的内部后，它才会走向灭亡。在这之前，资本主义不管有多么地肮脏，但它始终都是作为进步的力量存在的。这里仍然保留了黑格尔体系的残留，而这种残留恰恰是考茨基主义的思想根源——我们所有的……都是为了在等待那个绝对的时刻，它一旦到来，一切不公就会消失，我们自然而然地获得解放，在它到来之前，我们只有默默地忍耐和承受。这种犹太教式的祈祷和默念，是与作为解放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冰炭不相容的。”

作者在这里表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系列问题的不了解。剩余价值规律根本得不出生产部类与消费部类不平衡的结论，而资本主义积累需要不断向外扩张市场的思想来自于卢森堡，她的这个错误理论早已为布哈林和列宁这样的革命派以及考茨基这样的改良派所批判。在现代仍然高举卢森堡的这个错误理论是很奇怪的事情，似乎是用来为自己更加错误的主张辩护。此外，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资本主义是自行灭亡的，他更加没有认为这要等到“把全世界纳入到它的内部后”。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在当时仅仅存在于地球四分之一面积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在高声宣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傅小正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故意对马克思时代的国际工人运动视而不见，这样的歪曲需要怎样的勇气！

因此，所谓黑格尔体系的残留仅仅存在于作者的想象之中，而作者的这种错觉，无疑来自于各种时髦的小册子。作者在赞扬“断裂”的时候，却从那么多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理论大杂烩中继承了那么多错误的、反动的东西！

而且，即使是考茨基主义也远没有他所谴责的那么庸俗。而他的思想，却与伯恩斯坦“目的并不重要，运动就是一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傅小正这么抨击马克思主义，把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也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证明随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断裂”。他写道，“当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时，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就已经死亡了。然而，死亡毋宁是重生。‘在马克思和列宁之间，断裂和创造超过了延续和发展。同样，在斯大林与列宁，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也存在断裂’（巴迪乌：《阿尔都塞：无主体的主体性》）。这种断裂真正宣告了一以贯之、圆通无碍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断裂恰恰是旧的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和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首先，第二国际尤其是第二国际的“中派”和右翼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早在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之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恩格斯的友人指出，如果恩格斯活着，是不会赞同第二国际的很多政策的。列宁与第二国际的决裂，根本不是旧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决裂。傅小正

们想证明列宁与旧马克思主义“断裂”，却只能举出一个例子来，就是所谓“列宁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打开了缺口的政治实践，也同样是一次理论创造，……第一次真正冲击了它固有的教条”。而实际上，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例子。即使列宁主张能够在最薄弱的环节打开缺口，他也仍然相信，俄国革命的胜利需要靠欧洲革命的胜利，这依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固有思想。列宁和苏联对德国、匈牙利等革命的支援等具体措施则进一步说明了傅小正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并不是傅小正的发明，而是继承斯大林的歪曲。而且，这充其量只是策略上的不同，而策略必然依照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改变。在原则上、在基本立场上，列宁与马克思毫无差别。**傅小正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斯大林式的无限拔高策略的作用和意义，从而为违反原则打掩护。**

但是如果你认为作者称赞列宁是为了表彰列宁，那就错了。当作者写下列宁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毛泽东。他写道，“齐泽克曾指出：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列宁到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次伟大传承，这两次传承毋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背叛，而正是这两次背叛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了两次伟大的重生。”正如同心虚的历史创制论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要拉出公羊学和毛泽东一样，心虚的作者为了证明毛泽东的合法性，先拉出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断裂”、后拉出列宁对马克思的“断裂”这两个子虚乌有的东西来。这样，毛泽东的“断裂”的合法性就确立了。这就如同为了确立耶稣基督的权威，也顺便承认了亚伯拉罕的权威一样。而因为毛泽东断裂于最后，所以毛泽东的理论也因此更加正确。不过，他们又一次自相矛盾了，因为他们的“断裂”已经取消了一切判断正确和错误的标准。

事实上这就是历史创制学的全部结论。不同于其他理论，历史创制学与其说是个理论，不如说是个没有任何证明的证明过程，它唯一的结论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后，傅小正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又写下了这样的诗篇：“‘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发展的东西，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当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正是这些……话，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末世论和决定论色彩。历史的结局不是预先设定的，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完全取决于哪个矛盾的哪个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我们不主动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就不会成为主要矛盾；如果我们不通过正确的决策，那么我们就不会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中占据主要方面，历史就会改写。或者说，正是因为实践，我们才创造了历史。与其说先有一个理论，我们再照着做，毋宁说我们在实践中创造理论，然后再投入新的实践。矛盾论不仅仅是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它也是我们去认识和实践历史的方法。……在这里，本体论与认识论、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再度获得了统一。而这种再次统一恰恰是建立在矛盾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中断’（阿尔都塞的术语）之上。”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作者既不懂辩证法，也不懂毛泽东。作者在大谈矛盾的转化时，有意悄悄地忽略掉了“特定的条件下”这几个字。似乎矛盾的转化、矛盾各方的转化是无条件的，似乎这些转化是由人主观操纵的。这甚至都已经不是作者猛烈抨击的黑格尔的“最保守最反动”的“绝对精神”，而是更保守更反动的个人主观唯心主义。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否成为主要矛盾，根本不是什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的，这样说，**不啻重复日本侵略者的老调**；正相反，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才有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至于“我们”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的说法，把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说成是两个党派之间的矛盾，这既不会给中国共产党或者毛泽东增光，也不符合事实。对历史、事实和理论的认识都如此浅薄的认识，那么给予毛泽东的特殊荣耀，成色又会如何呢？很明显，既然一切都是主观操纵，那么傅小正及其

同道们没有任何理由主张毛泽东的，或者他们的个人主观操纵就一定比其他人的主观操纵优越——除非他们真的想回到黑暗野蛮的欧洲中世纪或者中国封建王朝。

而后傅小正关于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创制学和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种种论述都不必再多说了。作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歪曲了共产主义，也歪曲了毛泽东，把一切革命都归结为“创制”。这种创制学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韵味，通篇奢谈什么“解放”，却通篇看不到他们的“革命”有什么具体内容和具体对象，通篇看不到对资本主义哪怕最 ABC 的分析，——虽然这样，他们却声称马克思主义就是创制学！这不禁让人想起达赖喇嘛说他赞成社会主义。不过达赖喇嘛也只敢说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比历史创制学的好汉们要谨慎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民族



马宁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太子费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族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1914年7月28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随后几周内，俄国、德国、法国、英国、奥匈帝国等相继卷入战争。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有经典的表述：“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专门有一章讲述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的瓜分。

但是对列宁的这一论述往往有一种片面的理解，似乎帝国主义战争仅仅是围绕着争夺殖民地展开的。事实上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列宁本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定义的驳斥一样。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列宁对此反驳道，“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因为第一，世界已经瓜分完了，在重新瓜分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第二，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

瓜分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事情，早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前就在进行，只不过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进程最终采取了极端暴力的方式。事实上，如果仅仅是争夺位于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不可能在欧洲爆发这样一场战争的；而世界大战，也只能爆发于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区，即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索，如很多历史书上会反复介绍的，并不是争夺亚非殖民地，而是争夺欧洲，在欧洲争夺霸权、削弱对方。

19世纪，欧洲的政治版图充满矛盾。在法国与德国之间长期存在领土和边界纷争，德法两国始终追求所谓自然边界、绝对安全。普鲁士统一德国对法国造成了潜在威胁，导致普法战争爆发，以法国惨败、割地赔款告终。德国的统一把奥地利排除在外，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其国内民族矛盾丛生，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加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巴尔干地区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这一地区历史上不断遭受异族入侵，民族众多，民族间矛盾突出。6世纪后，斯拉夫人成为主体，但马扎尔人、保加尔人也长期活跃在这一地区。14世纪后，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迅速扩张，并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最终占据了几乎整个巴尔干地区和希腊。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巴尔干成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混居区域。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使欧洲的政治经济中心向西迁移，巴尔干逐渐成为欧洲最不发达的地区。

在 1853 年，恩格斯和马克思这样写道：非洲土耳其事实上属于英国，亚洲土耳其谁都无法征服，“问题的真正焦点永远是欧洲土耳其，即萨瓦河和多瑙河以南的大半岛。这个好地方不幸聚居着各不相同的种族和民族，很难说它们当中哪一个最缺少走向进步和文明的素质。1200 万斯拉夫人、希腊人、瓦拉几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等处于 100 万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而直到不久以前还很难说，在所有这些不同种族当中土耳其人不是最有能力掌握政权的，同时在居民这样混杂的情况下，统治权又不能不属于其中的一个民族。但是，我们看到，土耳其当局走上文明道路的一切尝试遭到了怎样可悲的失败——以几个大城市中的土耳其暴民为主要支柱的伊斯兰教狂热势力，总是在奥地利和俄国援助之下卷土重来并消灭任何可能取得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央即土耳其当局由于基督徒聚居省份的起义（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衰弱和邻邦的干涉，这些起义没有一次是毫无所获的）而一年年地削弱下去；我们看到，希腊取得独立，俄国占领部分亚美尼亚，而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相继归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存在是开发色雷斯—伊利里亚半岛的一切潜力的真正障碍。”他们称呼欧洲土耳其人为暴民，而且“同这些暴民相比，罗马帝国时代的暴民应该算是圣贤和英雄了。”

大部分斯拉夫人和希腊人信奉正教，部分斯拉夫人则信奉天主教。教派不同使这一地区的斯拉夫人陷入分裂，沙皇俄国就乘机在这一地区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来。恩格斯和马克思写道，“尽管阿格拉姆和布拉格的狂热分子作了种种泛斯拉夫主义的努力，可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的莱雅、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斯拉夫族农民，对俄罗斯人要比对讲同一种语言的信罗马天主教的南方斯拉夫人抱有更大的民族同情心，同他们有更多的接触点和更多的思想交往手段。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们总是指望从圣彼得堡来个救世主把他们从所有灾祸中解救出来，如果说他们把君士坦丁堡叫作他们的沙皇格勒或者说沙皇城，那么这既意味着他们期待正教沙皇从北方降临该城以恢复真宗真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怀念在土耳其人侵占这个地区以前统治该城的正教沙皇。”

因此，在 19 世纪，巴尔干地区最大的问题在于沙皇俄国的渗透。当时土耳其已经衰落，俄国借助民族和宗教的因素在巴尔干地区扩张势力。俄国的这一做法使其与西欧国家，主要是英国发生了矛盾。英国对亚洲商品贸易的快速增加，使其夺取了许多从前俄国的在黑海地区的贸易份额。如果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就等于关闭了英国货物进入这一地区的大门。此外，如果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还可以把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海，切断高加索与外界的联系，把土耳其分割成两块，从而便于俄国的侵略扩张。恩格斯指出，“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兼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兼并，所以俄国征服土耳其只不过是兼并匈牙利、普鲁士、加利西亚和最终建立某些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斯拉夫帝国的序幕而已。”恩格斯强调，“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一百年来就是这样，直到 1789 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族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维护土耳其的独立或在奥斯曼帝国可能解体之际粉碎俄国的兼并计划，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和英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让沙皇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的一个首府。所以我们将看到，如果被逼得无路可走的话，这两种势力将给沙皇以同样坚决的抵抗。”

除了欧洲土耳其，在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问题上俄国也与欧洲各国发生冲突。因为在耶路撒冷聚集了来自各个民族的各个教派的“宗教渣滓”，他们之间彼此仇视和斗争，“欧洲君主们认为这种宗教纠纷是一个有关自己在东方的影响的问题。”（马克思）“我们发现在圣墓周围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基督教教派，在它们的宗教野心后面隐藏着同样多的政治的和

民族的角逐。”（马克思）法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撒丁、那不勒斯等国都在寻求在耶路撒冷的保护权。圣地问题的核心是天主教会与正教会争夺对伯利恒的耶稣降生教堂和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的管辖权。1850 年路易·波拿巴支持天主教派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法国继续以中东地区基督徒的庇护者形象出现。就在 IS 占领伊摩苏尔后，法国政府 7 月 28 日宣布将会协助被迫流亡的基督徒以及给予庇护。），而俄国则支持正教。圣地纠纷最终演变成激烈的政治斗争，导致 1853 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在今天，我们同样能看到以各种宗教和教派的外衣掩饰起来的各种政治和民族角逐。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什叶派形成政治势力，以政治激进色彩和革命诱惑世人。沙特卖力推销瓦哈比的伊斯兰原教旨，实际上就是以宗教为掩护的沙特模式。梵蒂冈竭尽全力试图控制中国的天主教会，推动和支持中国地下教会的泛滥。藏传佛教加紧在内地渗透。孔教余孽到处宣扬新儒家和复古。在每一个宗教狂热的背后，都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

克里米亚战争以 1855 年俄国战败告终。1856 年巴黎条约形式上维护了土耳其的主权。但是正如恩格斯在 1853 年所写下的那样，“只要目前的‘均势’和维持‘现状’的体系继续存在下去，它[土耳其]还会继续腐烂下去。因此，不管有多少会议、议定书和最后通牒，它还是每年都要惹出一定数量的外交难题和国际纠纷，就像任何其他腐烂物体向四周不断放出沼气和其他‘芬芳的’气体那样。”“只要西方外交界仍然把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和维持土耳其目前状态下的独立这一传统当作他们的指导原则，欧洲土耳其十分之九的居民就始终会把俄国看作他们唯一的靠山，他们的解放者，他们的救世主。”

历史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1875 年，黑塞哥维那起义爆发。1876 年，保加利亚发生四月起义，同年 6 月塞尔维亚和黑山联合向土耳其宣战。临时拼凑起来的三皇同盟继续走老路，提交安德雷西文件催促苏丹进行多项改革，苏丹于 1876 年 1 月 31 日同意文件的建议。然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军领袖拒绝接受这份文件，指出苏丹曾经承诺进行改革，但从未曾履行过。在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之后，俄国于 1877 年 4 月 24 日对奥斯曼帝国宣战。这次战争迫使土耳其签定了非常苛刻的《圣斯特凡诺条约》，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取得独立。1908 年保加利亚独立，奥匈帝国则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这种格局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期望是不一样的。在恩格斯看来，巴尔干半岛应该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而不是多个国家，“土耳其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一起，都要留待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个乍看起来好象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入这个伟大运动的领域决不是一种武断。……历史和当前的事实都指明，必须在欧洲穆斯林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下一步的革命一定会使这样的事成为不可避免，因为它一定引发俄国专制和欧洲民主之间久已成熟的冲突。”

欧洲土耳其瓦解之后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正确。只有革命才能一扫各种历史污垢，在相互尊重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的国家。强行把巴尔干地区划分成诸多小国，并不能阻止地区大国（特别是塞尔维亚）寻求扩张和统一的步伐，也必然孳生出无数的事端来。巴尔干各国纷纷独立之后，领土纠纷不断。奥匈帝国在该地区的扩张（主要是波斯尼亚）与与塞尔维亚发生了矛盾，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就马其顿问题也有纠纷。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民族、领土矛盾之中，协约国集团和同盟国集团形成。最后在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终于点燃了导火索。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这不错；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的那样（恩格斯后来观点改变了），是民主的欧洲与专制的俄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为



了瓜分世界的战争。只要人类历史道路上的成堆垃圾还没有被社会主义革命扫清，这样的纠纷和战争就会永无休止。

民族问题就是人类历史道路上最大的垃圾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酝酿和爆发，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巴尔干、俄国外，德国与法国的民族矛盾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信中强调：

“1870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正如1866年的战争孕育着1870年的战争一样。

我说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除非有一种不大可能的情况发生，即在这以前俄国爆发一次革命。

如果他们夺去了亚尔萨斯和洛林，那么法国就会联合俄国共同对德国作战。这种战争的致命后果是没有必要加以说明的。”

在写于9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马克思写道：“如果德国在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驱使下要去宰割法国，那么它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充当俄国扩张政策的工具，或者是稍经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

到1887年，欧洲军国主义的发展已经使恩格斯做出了最终的预言：

“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哭泣的。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末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

恩格斯的预言在一切消极和残忍的方面都成真了。唯一正面的地方——无产阶级的胜利，只是部分的成为了现实，也是在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在全欧范围内取得胜利，相反，工人运动分裂了；因此，1789年开启的伟大革命运动并没有完成，民主、自由和革命并没有在欧洲全胜，更不用说全世界。欧洲的动荡仍然要持续多年，直到更加残酷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归于尽的恐惧才使欧洲平静下来。

从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一再指出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合理的解决之道。早在1851年,恩格斯就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强调:

“近七十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的,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以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为界的国家。当然,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比一年过时了;但是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么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末,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他们同情心的真实性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对一个从来没有一次证明它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应不应该把一批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它呢?这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在东方得到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其实,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一样重要的。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便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令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

针对当时已经露出苗头的泛斯拉夫主义,恩格斯给予了坚决的反对和揭露: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又一个斯拉夫族的分散的成员,他们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这两个民族都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民族所并吞)的作用而渐渐瓦解,它们要想恢复一定的独立性,只有和其它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波兰人有二千二百万,俄罗斯人有四千五百万,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有八百万;为什么不把这八千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从属于野蛮的东方,城市从属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从属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事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种族、尤其是这个种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在被俄国每个农民看做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察尔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的真正的驻节地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始终不能安定下来;过去一百五十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捷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独立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独立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而在这方面,波兰人应该受到赞扬,因为波兰人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泛斯拉夫主义是俄国反历史的用来扩张和侵略的借口，这正如今天的泛伊斯兰主义是沙特反历史的用来扩张和侵略的借口、泛突厥主义是土耳其反历史的用来扩张和侵略的借口一样。因此，回顾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分析和评述，不但对我们如何正确理解民族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帮助，而且对我们如何理解今天的泛伊斯兰和泛突厥等思想也同样有着重要作用。在写于 1855 年的《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恩格斯指出泛斯拉夫主义的极端反动性：

“现在问题已经不是谁来管辖君士坦丁堡，而是谁来统治整个欧洲了。斯拉夫人由于内部纠纷早就弄得四分五裂，他们被德国人逼退到东方，部分地被德国人、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所征服，但是他们用逐渐传播泛斯拉夫主义的办法在 1815 年以后又悄悄地把自己的各个支系联合起来，现在他们第一次声明自己的统一，并且进而向至今还统治着欧洲的罗曼-赛尔特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宣布殊死战。泛斯拉夫主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这是一种力图把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化为乌有的运动；这是一种只有把土耳其、匈牙利和半个德国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又只有通过征服欧洲的办法才能保证自己的未来的运动。现在泛斯拉夫主义已经从信条变成了政治纲领，它掌握有 80 万名步兵。它使欧洲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或者被斯拉夫人征服，或者永远消灭泛斯拉夫主义的进攻力量的中心——俄国。”

类似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是要声明自己的统一，抹杀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实质是沙特和伊朗的争霸，土耳其的野心。他们不接受历史发展的即成事实，不反思本民族落后时代的基本事实，而是力图以民族解放为幌子达成历史反动的目的。

但是，泛斯拉夫主义却并不是俄国的发明，而是奥地利境内四分五裂的、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力图不是在进步、民主和革命的基础上，而是在反动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发明。恩格斯解释道，“奥地利的波兰人倾向于俄属波兰，把它看做自己的自然中心，卢西人倾向于另一些同俄国合并的小俄罗斯地区，而塞尔维亚人则倾向于土耳其的塞尔维亚。所有这些同本民族分离的零星部分，每个都倾向于他们的自然中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他们中间文明的传播，并因此对民族历史活动的需要的日益增长，这种现象也就愈来愈明显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仅仅是 *disjecta membra*（分散的人，零星的部分），他们力图彼此重新结合起来，或者是各自同本民族的基本群众合而为一。为什么泛斯拉夫主义不是俄国的而是奥地利的发明创造，原因就在这里。为了保证各个斯拉夫民族的复兴，奥地利的各个斯拉夫民族就开始赞成欧洲所有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俄国本身是强大的，波兰则深深意识到自己民族存在的不可动摇的稳定性，而且公开地敌视斯拉夫俄国——显然这两个民族都不会要求创造泛斯拉夫主义。”“迄今为止，泛斯拉夫主义的一切真实的表述都是反动的。”“道地的斯拉夫民族即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已经这样认为：不是俄国人要向西方人学习，倒是西方人要向俄国人学习。这种说法听起来倒还十分天真，然而此外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西方已经衰老、破落、陈腐了，而斯拉夫民族则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斯拉夫民族必将征服欧洲，并将从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出发，建立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的千年王国。”

恩格斯的这个评价几乎可以一字不易的套用在目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之上。同样的蛮横和反动，同样的在存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共鸣，同样的把希望寄托于某个强大国家，也就是同样自觉的充当这些国家争霸的打手和冲锋队。

起初四分五裂的泛斯拉夫主义是没有多大威胁的，但是一旦俄国发现了泛斯拉夫主义的价值，事情就不一样了。

“把斯拉夫人的原有土地归还给斯拉夫人，把奥地利（提罗耳和伦巴第除外）变成一个斯拉夫帝国，这就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宣布近千年来的历史发展全部无效，砍掉德国的三分之一和整个匈牙利，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变成斯拉夫的城市——目前占有这些地区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是不能同情这种行动的。而且，各种斯拉夫方言的差别很大，除极少数外，讲斯拉夫方言的人彼此都听不懂。有一个可笑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1848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上，曾经想找出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共同语言，作了各种各样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最后与会者不得不讲他们所最痛恨的语言——德语。”

因此，我们看到，奥地利的泛斯拉夫主义缺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因素：群众和统一。所以缺乏群众，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派只掌握一部分受过教育的阶级，在人民中没有什么威信，因此要同时反抗它所敌对的奥地利政府以及德意志民族和匈牙利民族，力量就不够了。所以没有统一，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派的统一原则是纯粹理想的原则，在第一次企图实现这种统一原则时，就因语言上的差别而遭到了失败。只要泛斯拉夫主义一直是纯粹奥地利的运动，那末它不会有很大危险性，但它会很快地找到它所需要的那种统一和群众的中心。”

“本世纪初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运动很快就使俄国政府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土耳其的居民中大约有 700 万斯拉夫人，他们的语言是所有斯拉夫方言中同俄语最近似的一种语言，而宗教和教会语言（古斯拉夫语或教会斯拉夫语）则同俄国人的完全一样。俄国依靠自己的希腊正教教会领袖和庇护者的地位，正是在这些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当中第一次开始进行了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当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刚刚在奥地利生根的时候，俄国就立刻把它的谍报机关的分支伸展到自己盟国的地区。在它碰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斯拉夫人的地方，就根本不提宗教方面的问题，俄国仅仅表现为一个吸引一切斯拉夫人的中心，即团结各个复兴的斯拉夫民族的核心，它要使各个斯拉夫民族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利亚海到北冰洋的伟大的斯拉夫帝国。总之，这里已经找到了所缺乏的群众和统一！泛斯拉夫主义一下子就落入了圈套。于是，它宣布了自己的判决。为了重新建立想像中的民族，泛斯拉夫主义者表示愿意为维护俄罗斯—蒙古人的野蛮统治而牺牲八百年来实际参加过的文明生活。难道这不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动地反对欧洲文明发展进程和力图使世界历史开倒车的运动的自然结果吗？”

恩格斯敏锐地警告说：“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现在已经不仅是俄国，而是整个泛斯拉夫主义的阴谋有在欧洲废墟上建立自己统治的危险。所有斯拉夫人的联合具有显著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会日益增强，因此这种联合很快要迫使与它敌对的力量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形式行动起来。”

我们同样看到，沙特不遗余力在世界到处推行瓦哈比，渗透入当地穆斯林，援助修建清真寺和提供宗教书籍，力图从思想上臣服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从而扩大其势力范围。我们也同样看到，土耳其对他们的“突厥兄弟”频繁表示关切，同时有向宗教保守方向发展的趋势。不论是泛伊斯兰还是泛突厥，都是企图以否定历史和毁灭他国为代价，实现某些国家争夺霸权的野心。

泛斯拉夫主义以各种形式蔓延开来，甚至伪装成了社会主义，钻营到国际工人运动中去。在写于 1873 年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清算和批判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也包括他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巴枯宁，“就是这个从 1868 年以来一直伪装成国际主义者的人，在 1862 年为了俄国政府的利益宣扬种族战争。……所以他们只是在这些人面前把俄国描绘成一个能够把他们从外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把他们联合成伟大的自由联邦的强国。于是，泛斯拉夫主义就具有了各种不同的色彩，

从尼古拉的泛斯拉夫主义一直到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但是，这一切泛斯拉夫主义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实质上它们彼此之间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刚才引用的那段文字[指巴枯宁说尼古拉一世“曾想从一个独裁的皇帝变成一个革命的皇帝”]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存在着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因素，各种反动理论装扮成社会主义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天主教廷，泛伊斯兰运动，达赖喇嘛，无政府主义，后现代哲学，都可以轻松地把自己说成是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当革命退潮，马克思主义退潮，给所有这些沉渣留下了巨大空间供其泛起，而所有这些人类历史和人类思想史的沉渣都只会将人类引向野蛮、专制和战争。

当泛斯拉夫主义在欧洲东部挑动民族和种族战争的同时，欧洲西部又冒出了“民族原则”。这个“民族原则”是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大力提倡的，实际上是俄国发明的。恩格斯指出，“这个民族原则是为支持法国的拿破仑专制而炮制出来的一种波拿巴主义的东西。”拿破仑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声称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祖国合并。这实质上就是为了挑起民族纠纷，并以此作为侵略扩张和反革命的工具。恩格斯揭露这一所谓的“民族原则”，如他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反复强调的那样，于1866年再次强调只有历史证明了有生命力的大民族才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批判无条件的承诺和煽动所有民族的独立只是反动分子的政治策略：

“关于欧洲每一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在一切内部事务上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不管它的邻邦这一点，当然不会有两种意见，因为这并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这一权利确实是所有民族内部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

这种为欧洲民主派所承认的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对政治独立的权利，当然不能不得到特别是工人阶级方面的同样承认。实际上，这也就是承认其他生命力显然很强的大的民族具有那种正是各国工人为自己所要求的独立的民族生存权利。不过，这种承认和对民族愿望的同情，只是同欧洲那些大的、历史上清楚确定了民族有关；这就是意大利、波兰、德意志和匈牙利。而法国、西班牙、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它们没有被分裂，也没有处在外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它们只是间接地同这件事有关；至于说到俄国，它只能说是大量赃物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赃物。

……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s)的残余叫做民族，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法国境外有许多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法语，同样，德国境外也有许多人，他们说的是德语，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民族(people)的民族生活，已经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瑞士和亚尔萨斯的德意志人不愿再合并于德国，同样，比利时和瑞士的法兰西人也不愿在政治上再合并于法国。而这种情况最终会带来不小的好处：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这些异族成分同它们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原则’同民主派和工人阶级关于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有分离的独立的生存权利的旧论点之间，是有差别的。‘民族原则’完全不触及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民族（peoples）的民族生存权利这个大问题，如果说它也触及的话，那也只是为了混淆问题。民族原则提出了这样两类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些历史上的大的民族（peoples）之间的分界线问题；第二是关于一些民族（peoples）的为数众多的细小残余的民族独立生存权利问题，这些民族（peoples）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

（people）在欧洲的重要性，它的生命力，从民族原则的观点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在它看来，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的精力的瓦拉几亚的罗马尼亚人，同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意大利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威尔士人和曼恩岛居民，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像英格兰人一样地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而似乎这不是什么荒谬的看法。但所有这些都是绝顶荒谬的，它被套上一种通俗的形式，好用来迷惑轻信者；所有这些不过是一句便当的空话，需要时利用利用，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

事实也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法国与俄国正是两个在巴尔干地区、波兰和整个欧洲大陆充当民族搅屎棍角色最为卖力的两个国家，也是最为露骨地谋求各自的利益的两个国家。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也揭露了为波拿巴政府充当密探的福格特如何在吹捧“民族原则”的幌子下，鼓吹泛斯拉夫主义，主张俄国获得全部斯拉夫民族疆域，而法国获取意大利、占领奥地利和德国的部分领土。

这就是所谓的无条件自决的“民族原则”、宣扬每个与主体民族分离的部分都有权利回归主体民族的“民族原则”的真实目的。在今天，类似的主张也包含着同样类似的目的。大凡以民族自决为名义，不顾历史与现实，一味鼓吹任何民族都有权独立，任何民族分支都有权与主体民族合并，都包含着某些大民族或大国侵略扩张的野心，不论这个民族叫汉族（要求承认东南亚华人的双重国籍）、突厥或维吾尔（东突运动）、鞑靼（要求归还克里米亚）、阿拉伯（IS的大伊斯兰国），还是叫俄罗斯（克里米亚公投）。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的大民族才有独立生存权利，并不是说大民族可以压迫小民族。恩格斯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说，应“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为了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就需要有一场实现民主、平等的社会革命。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是，列宁主义承认一切民族都有直至分离的民族自决权。列宁主义这一无视各民族历史和现实差异的观点欠妥，因此这一观点经常被某些批着民族解放外衣的反动分子或者大国沙文主义者利用。人们常常有意无意的忽视了，列宁虽然承认民族自决权，但是坚决反对在任何条件下都支持民族分离的要求，始终强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为重要。在实践上，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政权恰恰是在承认各大民族独立之后，又努力将它们团结在一起，为共产主义共同奋斗。而且列宁还强调，“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分子和中世纪制度的代表者作斗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做斗争。”列宁主义承认所有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决不是为了支持各民族以独立的名义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而动。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时候曾尖锐指出，“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由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20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派。考茨基

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1789年开启的伟大运动远没有结束，革命多次失败又多次重现，民主、自由与平等还没有能够战胜专制、野蛮与压迫。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年后，我们看到类似一百年前的景象。IS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归顺，以伊斯兰的名义要将其势力扩张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更远。普京发表幽怨的演说，怀念起了苏联和沙俄，为俄国向东的扩张制造舆论声势，并如沙皇时期一样，在欧洲到处寻找和收买代理人。美国在全世界制造着摩擦和冲突，煽动着最危险的情绪做最危险的事情，即使烧了自己的手也再所不惜。以色列制造着种族屠杀。欧洲日益右倾，外来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成为了左右欧洲价值观和存亡的事情，右翼民粹利用民众不满心理冲锋陷阵，背后隐藏着革命没有斩尽杀绝的老贵族们和革命后爆发的大资本家们。中国的手伸向东南亚，非洲，甚至美国家门口的拉美，同时某些人把中国革命歪曲成一般的民族革命。日本修改宪法解释，军国主义再度登堂入室。印度谋求南亚霸权。整个世界都在动荡，民族、宗教矛盾日益突出，文化多元的破衣烂衫再也掩饰不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的现实。

最后，用列宁的话结束这篇文章，请所有人务必保持警惕：“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指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教育与就业：阶级再生产



：右边的基路伯

“再生产”通俗地说就是自我复制，“阶级再生产”就是屌丝和高富帅分别自我复制。这句话的重点是“分别”这个词，意思是说，屌丝只能再生产出屌丝，而高富帅永远是高富帅。

这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并不一致，我们的传统观念是“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然而这种观念正在资本主义现实面前瓦解，这种瓦解的表现就是屌丝文化和“负能量”。让我们先来读几个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段子：

“1、又一天过去了。今天过得怎么样，梦想是不是更远了？”

“2、只要是石头，到哪里都不会发光的”

“3、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别人的收获是成功与快乐，你的收获是认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与快乐”

“4、社会精英阶层一边啃着心灵鸡腿和心灵鸡胸，一边为我们送上了心灵鸡汤，说人生的价值并不在于你挣了多少钱和外在外是否美”

“5、我追逐自己的梦想，别人说我幼稚可笑，但我坚持了下来。最后发现，原来还真是我以前幼稚可笑”

“6、女生们宁肯做高帅富的备胎，也不肯接受屌丝的行为，从基因上保证了人类的进步。”

“7、老师您好，请问像我这样的，没有背景的北大毕业生应该如何定位自己？”
“社会底层群众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人。”

这一类负能量段子，普遍有两个特点：1、对梦想和个人奋斗信念的破灭；2、对心灵鸡汤式的“励志”的反感和嘲讽。

“励志”总是要告诉你你是有可能成功的，只要你足够努力。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这个社会至少有最起码的公平、个人奋斗上升的空间是的确存在的。

“屌丝们”对于负能量段子的推崇反映了中下层已经意识到了上升通道的堵塞，但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很多负能量段子把问题归结为基因。

义务教育的空心化：教育产业化的隐蔽形式

今天我们是从小教育和就业两个方面谈阶级再生产。对于教育问题的批评，很多对社会现实不敏感的、迟钝的左派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办）学校高收费、乱收费；二是教育资源在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之间不均衡。前者很符合早些年的情况，当时公立中小学择校费、赞助费明码标价，差多少分就捐多少钱“买分”，但现在已经整顿得差不多了。而后者其实都不算个问题，教育资源本身不能在短期直接提供社会产出，当教育资源有限的时候，

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将优秀的资源分配给优秀学生，较差的资源分配给成绩较差的学生理所当然，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这两年真正的问题是义务教育阶段，尤其在大城市中，公办学校的空心化。具体表现，在素质教育和减负的旗号下，公立小学、初中少教、不教很多知识，学生只能通过私立学校、补习班、家教等来学东西。

我们可以看下面几个报道：

凤凰网：内地拟废除小学书面家庭作业 四年级前取消统一考试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8/23/28923736_0.shtml

家长联名要求中学恢复寒假补课 称学校不负责任

<http://news.163.com/14/0101/04/9HFPBE2600011229.html#f=dlist>

英语退出统考难降温 家长称减课就报辅导班

<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3-12-10/0819403580.shtml>

一方面学校要减负，一方面家长进行抵制。如果实在不行怎么办，就自己掏钱补教育。公立学校的减负/教育缩水直接促进了课外辅导产业的繁荣。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补习需求的不断增长也使得补习价格节节攀升。根据京华时报 09 年的报道，类似于少儿英语口语的小班化培训课程，平均价格超过一万五千元每年。广州日报 2009 年的报道中，少儿英语的平均培训价格达到了 1.6 元每分钟。

这还是 09 年的数据，实际上本人也长期做家教挣钱，不仅大学期间做，大学毕业后干脆开起了私人辅导班。各种收入层次的人都见过，并不局限于富人。可以说，大城市中，只要你不是破罐子破摔，你还是会 在课外给孩子搞搞补习。其实道理很简单，减负在现有条件下是彻头彻尾的伪善。社会的竞争不会因为学校减负而弱化或者消失。我们这一辈那么努力读书拼死拼活学那么多硬功夫也才勉强混口饭吃，我们的孩子辈轻轻松松玩儿几年就能过上好日子？根本没人信。

所以，公立学校的减负，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新的、隐蔽的形式。

理论上来说，政府只需要对“基本公共服务”免费或少收费，教育领域也是如此。但教育领域政府提供了多少“基本公共服务”，并不仅仅看义务教育有几年，更要看具体教了什么。有的国家搞 12 年义务教育，但高中教的东西跟中国初中一样，他们在教育上并未提供了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

通过课内教学的缩水，教育领域原先的“基本公共服务”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市场上去。比如，在我开补习班之后，我发现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学生们任课老师开的双休日补习班，到底有多少老师把原先的课堂内容转移到了私人补习班上，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阶级再生产：富人的孩子注定比穷孩子优秀

这种通过公立学校空心化迂回进行教育产业化，日本、美国比我们先行一步，而所造成的后果也比我们更严重。

观察者上有一篇文章《教育“减负”梦已在西方碎了一地》
http://www.guancha.cn/guanzhe/2013_08_27_168300.shtml 里面有很多数据触目惊心。比如，东京大学 2009 级新生来源前十位的中学中只有一所是公立高中，而进入私立高中就意味着支付昂贵的费用。

东京大学 2006 年调查了入学率和家庭收入的关系，结果发现相关性非常高。年收入 400 万日元以下家庭的学生升入四年制大学升学率为 31.4%，而在超过 1000 万日元的家庭中，该比例为 62.4%。

在 1984 年，东京大学入学学生的家庭中，年收入为 750 万日元以下的家庭较多，这些中下阶层的比例约 50%，但 1995 年就降低为 19.9%。到 2003 年，来自 950 万日元以上的年收入富裕家庭的学生占的比例约 50%，450 万日元以下的家庭的比例仅仅是 13.9%。现在，东京大学入学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 935 万日元（2005 年的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年收入为 436 万日元，就是说，现在三分之二的东京大学入学者家庭属于上层阶层，而属于下层阶层的家庭仅仅占全体的七分之一）。

这里，大学资格被富人垄断并不是因为走后门，而恰恰是在“公平”的考试下出现的。教育的实质产业化决定了，有钱就能够买到优质教育资源，从小打好基础，在每一轮升学考试中都占有优势，进入更好的大学，培养起更优质的社交网络，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有更多的钱投入下一代的培养，成为一个良性循环。而没钱的就只能获得劣质教育资源，可能从小就培养了不好的习惯和较差的基础，每次都考不过别人，进入较差的大学，结交狐朋狗友，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收入低，最后在培养下一代时没有足够的钱，只要让下一代也重复这个循环。

总结下来就是屌丝文化中“穀种循环”。

上面我举的是日本的数据，实际上日本是个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相应地，即使教育产业化，国民教育水平、国民素质的差距也会小一些，毕竟大部分人都有点钱能上补习班。而像美国这种贫富差距极端分化的国家，教育产业化就造成了惊人的愚民效果。

很多交流或留学美国的同学都会反映美国人很蠢，但是具体有多蠢呢？

经合组织（OECD）有一个“成人能力测试”，综合考察一国国民数学、技术、读写等能力，美国不仅常年在测试国家中倒数，最有趣的是别的国家都是越年轻文化水平越高，美国人则是反过来，“美国年纪最大的一批测试者们比较接近国际水准，但到了年轻人这辈儿，就堪称是一个比一个差了”。

http://voiceofrussia.com/news/2013_10_08/US-Adult-Skill-Test-Results-Bad-news-for-Americans-7672/

这就是说，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美国人反而变蠢了。

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材料，译言网《2025 年，大学教什么？》

<http://select.yeeyan.org/view/395795/380523> 里面提到：约有 36% 的（美国）学生在就

读大学的四年时间里，知识上一无所获。另据《高等教育纪事报》及美国公共媒体市场的数据显示，过半的雇主称他们近年招聘不到合格的应届毕业生。

如此低劣的基础教育水平严重影响了美国劳动力的素质，所以美国这两年也开始反思教育，出现重新回归应试教育的倾向。比如这份材料，《美国 10 年来最重大公共教育改革进入课堂》<http://cn.wsj.com/gb/20130827/bus152247.asp>

“大多数州不仅开始贯彻更严格的数学和阅读标准，其中包括被称为“共同核心”（Common Core）的标准，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将教师评估与学生考试分数或其它衡量学生成就的指标相挂钩。”

就是说，当我们在搞减负、所谓“素质教育”的时候，美国在搞加负、“应试教育”。

于是就有人写文章提出这样的问题：《凯瑟琳·兰佩尔：为什么富家子弟反而有奖学金？》http://www.guancha.cn/KaiSeLin%C2%B7LanPeiEr/2013_11_25_188142.shtml

奖学金和成绩挂钩，成绩和家庭收入水平高度一致。当富人的孩子注定比穷孩子优秀，那么阶级再生产的循环就完成了。

这就告诉我们，“公平”和“奋斗上升的空间”是两回事，两者不一定一致。

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科举。科举是不是公平？至少发展到弥封誊封以后，科举本身还是比较公平的。问题是，农业社会识字率一般不超过 10%，建国初期大规模扫盲前，文盲率也有 80%，这还是在清末、民国兴办了一些现代教育的情况下。在一个只有 10%人口识字的社会，科举这个所谓的“上升通道”必然是跟剩下的 90%绝缘的。

那么我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 90%的人不识字？

供一个人读书识字就意味着占用他本可以投入劳动的时间，如果是有志考科举就必须“寒窗十年”。其实十年也算少了，考进士五十岁能考中也是不错的了。读书的时间如此长，读书的质量上则要求是全脱产，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其他人从生产剩余中匀一部分来供养他。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大多数家庭仅能维持温饱，长期供养一个全脱产的人，实在不可行。

这样一看我们就能够理解，科举为什么必然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游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工具，因为读书在当时成了检验一个人阶级的门槛。同样在今天，教育产业化就意味着，进入顶尖大学可能就是一个人的阶级门槛。

越穷越读，越读越穷：学历贬值比深造更快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教育不是穷人翻身的渠道，相反成为了阶级再生产的机制，但就算如此，普通中等收入群体也只能投资于教育，现代社会相比农业社会，大多数人普遍有点闲钱，但又不是特别多，投资别的都不够，就只能投资教育。

比如说你在大城市读私立中学，学费是一学期一万多，但贷款买房，还款一个月一万很常见，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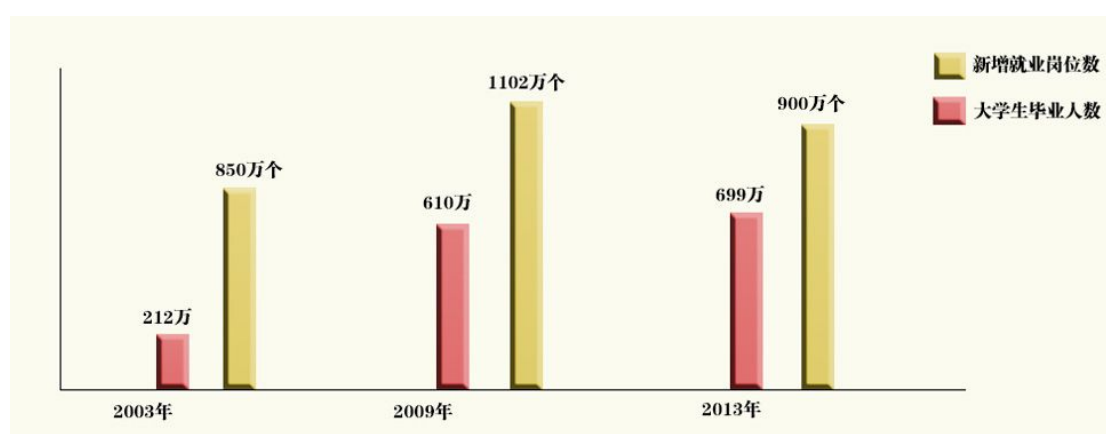
你可能很早就知道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充满了商机，但是你没有资本，最后只能做马云手下的程序猿。

甚至你可能是红极一时的大黄蜂打车的创始人，但是你没傍上大资本，所以很快被拥有巨额补贴的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干翻了。

所以没办法，最后你还是只能投资于教育。中等收入者热衷于投资教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统治阶级”的观念，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刚才我们说过，农业社会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只有地主阶级能供养子弟读书，反过来说只要是读书人几乎必然成为下一代统治阶级，必然是统治阶级预备队。几千年来，脑体分工和阶级分化确实就是保持一致的。所以中等收入群体积极投资教育，也是旧观念的延续，这和“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一样的思路。

这件事情其实很要命，大多数人有点闲钱但又不太多，只能投资教育，同时社会的进步又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这就造成了教育的大扩张、大爆炸。比如这份报道《699万大学生 900万个岗位 2013 史上最难就业季来临》

http://www.guancha.cn/Macroeconomy/2013_05_02_142063.shtml 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对比数据，2003 年全年新增就业岗位是大学毕业生人数的 4 倍，而 2013 年这个数字只有 1.29 倍。



这个比例关系某种程度上就是决定了大学生毕业第一份工作的起点，照 03 年这个比例关系，大学生毕业后按照统治阶级预备队来使用，但 2013 年这个比例关系，大学生去端盘子也不会有什么奇怪了。

从 2003 年到 2013 年正好十年，在大陆一个人从本科入学到博士毕业一般也是十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2003 年一个入学的大学生，按照当年的就业形势，必然觉得自己一毕业至少就是统治阶级预备队，起点不同凡响。四年后毕业，忽然发现差了一截，遂发奋读硕士，三年后发现差两截；遂发奋读博士，三年后发现差三截。学历贬值比深造还快，大学生就此“民工化”。

但大学生民工化也不能阻挡中等收入群体追加教育投资，形成了一个“越读越穷，越穷阅读”的死循环。

《美国 MBA 泡沫是否离破灭更进一步？》<http://wallstreetcn.com/node/70077>

“这篇报道指出，本世纪经济衰退以来，拥有 MBA 学位的毕业生收入减少 4.6%，可过去三年的学费增长了 24%。” 价格提高意味着供不应求，间接说明读 MBA 的变多了。

经济一旦不景气，大家就幻想用更高的学历让自己脱颖而出，每个人都这么做，便意味着依靠学历“鹤立鸡群”的门槛进一步提高。于是在教育市场上，MBA 的供给逻辑显得非常特别：文凭越贬值，对 MBA 需求越是上窜。众人明知是泡沫，也无可奈何，因为（在现有的生产关系内）似乎没有其他出路。

知识分子无产化：阶级不按行业分

这十年来，大部分人都预见不到学历贬值比深造快，首先这就产生了一大批科研民工。现在我们浏览社交网站，会发现很多反映研究生文化、抒发读博士苦恼的各类恶搞短文、图片，研究生文化逐渐出现。比如这篇《读博士和大便的相同点》：

1. 都是憋出来的
2. 肚子里有货才爽
3. 即便肚子里面有货 也得有 paper（论文）才行
4. paper 越多心里越踏实
5. paper 上的都是屎
6. paper 不能是别人用过的
7. paper 虽然是别人用过的，但是只要看不出来也可将就
8. 运气够好的话可以接到 paper
9. 没有 paper 的话 如果你很有钱也能解决问题
10. 实在没有 paper，拍拍屁股直接走人是很需要勇气的

研究生够多了，才有研究生文化，侧面反映了研究生多到什么程度。博士这么多，而学术界的坑就这么少，导师我就是把你当民工使又怎么样呢？爱干不干滚。而且学术界是绝对的学霸专制的体制，学术权威占有一切审判、决定和分配权，所以学霸高度剥削你们，科研民工也必须一个劲儿地抱住导师的大腿，以求传得衣钵（学术地位）。

教育大扩张、学历快速贬值，第二个结果是热门职业从业人口快速过剩。过去十年，收入增长最慢的就是外资企业和传统高薪行业。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德勤，03 年给应届生开出的工资是 5000 一个月，现在是 6000 一个月。这十年正是收入高速增长、通胀也较大的十年，结果你只增长了 20% 的收入，相当于实质降薪。为什么会这样？人才多了，不稀罕。

08 年入学时很多专业的学生还在羡慕软件学院的学生毕业起薪高，但是这批人还没毕业，IT 民工这个词就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可。没日没夜的加班，收入也不特别高，往往工作所在的城市房价也不低。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希望。

软件这个行业知识更新太快，新毕业的学生反而会比毕业一两年的要吃香，我有位同学在华为工作，他就承认在华为新招进来应届生的会比早一两年招进来的工资高。

软件行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天然的自动化倾向，比如华为内部大力推广工具化，就是自己写软件来代替自己的工作，反正自己的工人写软件也不需要额外付钱，按照这种趋势，

这些码农们干两年就把自己的工作干没了。如果不能升职或成为管理层，未来的前途其实黑暗得不敢想象。



知识贬值，白领工作流水线化，**脑力劳动者的可替代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一份脑力工作，换你来做也行，换他来做也行，利用产业后备军来强化剥削的这套办法对付白领甚至比对付蓝领还管用。

这两年公务员热、师范生热部分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既然干本职工作没有前途，何不找份稳定的体制内差事？可惜体制内差事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避风港。工作量越来越大、收入低、分配制度死板是通病。

对于公务员来说，社会管理日趋复杂，业务量不断增加，而不干活的老油条还不能赶走，任务都压在新人头上，薪酬制度又极端死板，收入和级别挂钩，但基层单位总级别就低，一个大学生可能到退休都不能提拔级别。

人民满意是公务员的最高荣誉 李克强对公务员提四点希望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17/c_118596327.htm

“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义无反顾，勇挑重担，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前列”

北京公务员：租房花了工资一半纠结要不要回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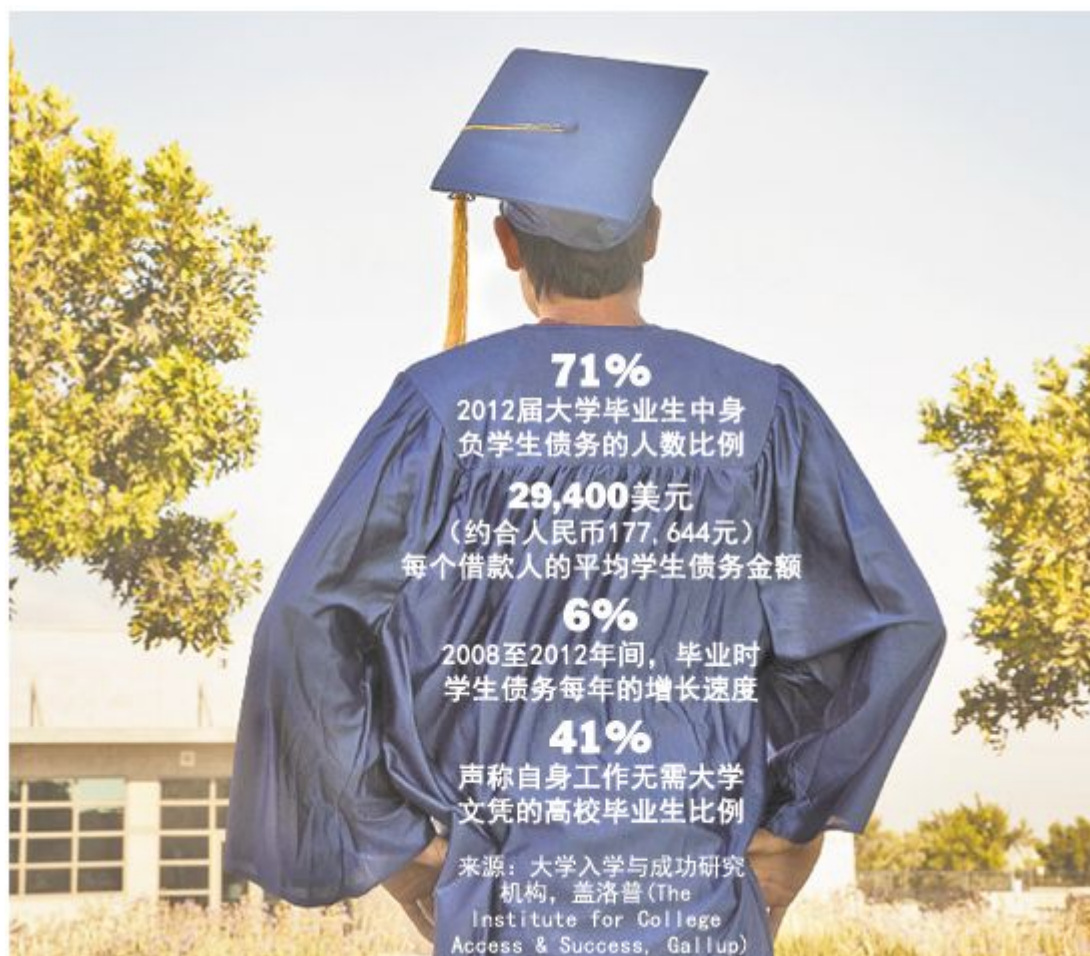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4_03_20_215550.shtml

当年国企改制时也曾大谈“壮士断腕”，然后就是国企工人“被断腕”。包括公务员，任何行业的中下层都远非统治阶级，最多是统治集团的走卒，更没有参与分蛋糕的权力。当统治集团需要他们推动自身利益发展，或者打手与走卒妨碍到统治集团利益时，他们会被毫不犹豫的挑选出作为炮灰。

学历贬值（比深造）快，不仅是造成大家收入低，如果在学费昂贵的美国，还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例如《有价值的文凭：让大学上得物有所值》

<http://cn.wsj.com/gb/20140127/opn083429.asp?source=whatnews2>

里面的一张图片：



现在, 阶级不按行业分、不按学历分, 必然就是其他的东西决定了你的前途和发展空间。比如我们看《中国“海归”一半为一年期硕士》这个报道
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3_08_02_163081.shtml

英美的学历定位, 本科通识教育, 博士搞科研, 硕士则是本科和博士的过渡阶段, 为正式进入科研学习做一年的准备, 单独学一个硕士回国是很成问题的, 而且其中很大比例是商科。商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国外好的商科硕士都要求几年工作经验作为入学条件, 但往往对中国留学生网开一面。大量的中国大学生一毕业就进入欧美的商科学个一年回国, 谁都知道这本质上就是我们镀金、人家赚钱, 镀金的要求也很简单, 至少三十万一年嘛。而且别人还嫌中国留学生不够多, 请看:

《卡梅伦盛赞英国华人贡献 对中国留学生人数不设限》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3/11-29/5561141.shtml>

当然一年制硕士三十万的花销一般中产也负担得起, 但是海归的贬值也是不容置疑的。

《去年“海归”增幅是留学增幅的八倍 国外就业难催生回国潮》

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4_03_13_213530.shtml



花了三十万却没有收益,对中产的确是打击,但对于出去镀金的上层阶级这就不是问题了。归根到底,镀金的关键是有人把你这个镀金的当作真金来用。

正所谓“二代学金融,操纵牛与熊;屌丝学金融,体会啥叫穷;二代学新闻,政府发言人;屌丝学新闻,熬夜累死人;二代学金工,回家当股东;屌丝学金工,阀门拧到疯;二代学经济,入股分暴利;屌丝学经济,敲门卖安利;二代学会计,操纵GDP;屌丝学会计,按烂计算器;二代学土木,买地盖别墅;屌丝学土木,搬砖打地铺。”。重要的不是学历,而是阶级,阶级可以改变你的学历,但学历不能改变你的阶级。

知识分子无产化的后果

现在,在每个行业的底层都汇聚着大量无产化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比父辈、领导更好的教育,经历了信息化的整个过程,拥有新思维、更开阔的视野,但就是没有未来。这就是知识分子无产化。无产阶级知识化就是知识分子无产化。

知识分子无产化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不稳定,二是啃老。

知识分子无产化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东西,其实中共和国民党早期也存在一个知识分子无产化的情况,因此两党党员的成分初期也都是小知识分子。清末新政的确办了不少教育,但是殖民地经济容纳不了这么多小知识分子,当时大学生造反的来自两类学校,一类是复旦这样当时的野鸡大学,二是交大这样的的确提供人才的学校,问题是没有对口的重工业。你学了船舶中国有多少造船业给你就业?你学了炼钢当时中国有多少钢铁业给你提供岗位?这批人没有奔头,就跟着国共两党搞北伐闹革命了,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到“结合产业升级开发更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说明中共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能不能解决,这还另说。

在中国早十年、二十年,其实是年轻人很有希望的时代,关键在于中国资本在国际上的大扩张,为当时的青壮年提供了大量的中层岗位,大城市的土著三十岁挣到二三十万一年很常见。现在这轮扩张已经停滞,中国的工业已经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都消灭光了,再扩张也没有空间,但是他们的坑不可能让你,而教育扩张大大降低了知识的稀缺性,年轻人知

识水平确实比老一辈、比领导高，但是跟同龄人比其实都差不多。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年轻人不断流动，却总是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知识分子无产化某种角度就表现为年轻人无产化，他们是一个单位中剥削最为残酷的群体，企业里最大的利润来源，但是收入最低。出于维稳的角度，政府必须撒钱，但是怎么撒呢？发养老金，发福利的最高形式就是直接发钱，发钱给老人也不只是冲着他一个人，而是发给全家的。养老金年年发年年涨，在职工人的收入可能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停止增长甚至下滑，但是政府发的养老金却是雷打不动地年年增长，这些钱哪里来？就是年轻人工作创造的，所以有工作的年轻人啃老其实算不得什么，无非是你自己创造的财富兜一圈通过你父母发还给你了。可是父母寿命的长短并不一致，子女干不干活也都可以啃老，收入再分配讲究公平性，大力度撒钱发养老金并不是收入再分配最好的方式。

补充阅读：

父亲反对女儿上大学 称浪费钱

<http://news.163.com/13/0901/19/97N7SVS800011229.html>

“捡垃圾比读书强” 考验大学回报率

<http://edu.people.com.cn/n/2013/0904/c1053-22808568.html>

42岁农民工读研究生轰动全国 毕业重回原点

<http://www.cnky.net/kaoyanxinxi/kaoyanxinwen/073088365.shtml>



知识分子无产化的另一面：无产阶级知识化

说这么多知识分子无产化，并不是鼓励大家少学点东西。教育水平提升，显然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物质财富增长，之所以反而造成多数个体贫困化，是在于生产关系的不合理性，而同时也就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与消费能力不断下降中酝酿着自己的经济危机。

但就算如此，知识分子无产化也能看到直接的益处。

首先是人民群众的统治能力。在阶级分化初期，脑体分工与阶级分化实际上是重叠的，只有剩余产品少且高度集中到少数手上时，才会有 10%知识分子和 90%文盲的巨大鸿沟。有一句话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农业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还真是“有”。大多数人既不可能幻想、也绝无法做到柴米油盐之外的事情。他们在能力上与统治阶级有天壤之别，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农民起义都只能“打击”旧王朝，最终建立新王朝的必然是地主阶级的另一拨。而工业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产生了教育大扩张，大多数人第一次发现自己与统治阶级的能力差距如此之小，于是各种不安的心便躁动起来，虽然生产关系本身压制着他们，但这是第一次，普通人有资格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人民群众有了自我统治的能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化也就会受到很大抑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化据说是因为政权长期把持在一小撮人手里。因此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群众的教育，教育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能指数级自我复制的教育体系。这才有自我统治的可能。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毕竟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是建立在非常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的。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在实践中非常幼稚，一半的原因在于文化革命的社会基础铺垫只完成了一半，但天不假年，只能早早发生出这个“早产儿”。

毛泽东手稿有这么一段：

“今年高中毕业生约有十五万人、初中毕业生约有一百二十万人不能升学，从中挑选三万到五万人，从今年下半年起，举办“抗大”式的政治学校，加以短期训练，派到农村参加工作或参加劳动，对加强人民公社工作有很大好处。这是一项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的措施。”

为什么说是“深刻的革命意义”？实际上是耐人寻味的。再看下面一段：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一九六八年八月）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08年以来，网络上自发的考据党、辟谣党很多，很多都是通过微博上批判专家教授的错误论调。这个时代是个很有趣的时代，微博提供了一个信息化的大字报、大辩论的平台。许多出版物里还算严谨的专家教授，一上微博就原形毕露，而他们放屁，群众能够及时发现有问题，并用自己的知识去打脸，亘古未有之事。教育大爆炸一方面导致知识廉价化，不断消灭各种高薪行业，日益将小知识分子抛入无产阶级中，一方面又使共产主义的可行性愈发凸显。可以说在黑暗中蕴含着希望。

正反两面的因素都告诉我们，这是个酝酿着巨大变革的时代。

文藝評論

Literary criticism



132

毛泽东

1893.12.26—1976.9.9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鲁迅

1881.9.25—1936.10.19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着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

《中国梦想秀》是个神马玩意



：刘知远

编者按：观看了 2014 年 5 月 23 日浙江卫视播出的《中国梦想秀》节目后，笔者决定必须当晚将本文一笔成稿。不为别的，只因参加这次节目的人员是笔者所供职的“工友之家”公益机构（驻地北京皮村——YCA 注）的同事和工友，只因他们错误地把展现新工人和进步青年良善形象、为工人发声的希望寄托在了一档极其虚伪的垃圾娱乐节目之上，只因这个节目的编排过程充满了商业、成功学和牧师精神控制术的元素。在此成一杂记，首先是为了展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如何以“娱乐”为名来压制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反抗意识的，这也毫无疑问地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课题——我们如何针对敌人的特征，构建出有效的意识形态反击的手段；其次也是要充分展示一下笔者同事和工友们的个人风采，要让他们被劣质节目掩盖的真实一面流露出来，塑造他们真正闪光和有特点的一面，让他们脱离节目编导所刻意追求的刻板形象，活泼起来。

一、缘起

“（浓厚东北腔）我们能去杭州了！OH MY GOD！我们要上电视了！OH YEAH……”

上述语句循环了八次，就是笔者得知工友之家同心文艺小组受邀参加《中国梦想秀》的事情开端，具体日期没记住，但肯定是在四月下旬。这位疯狂呼喊上蹿下跳的女主角之一，是隔壁工会的小 Z 姑娘，她是个热心公益和文艺的人，比起同龄人有着更深重的叛逆和较为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毕竟年龄还小，只有 17 岁。得知自己能够在收视率据说全国第一，重播收视率据说都能排进全国前五的节目中亮相，我想是个正常的未成年小女孩都会是这个反应吧。

另一位女主角，是辞去了网站编辑工作，在更换工作的闲暇档期来到“工友之家”义务提供艺术指导的 Y 姑娘，她同样极富青春活力，虽然年龄不小了，但在精神气质上不输小 Z 姑娘，她们俩人屋内屋外的二重唱立体声共振经常让笔者抓狂到爆。Y 姑娘几乎包揽了与节目组编导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主要对接工作，笔者也主要是通过她的描述，才得知了一些该节目编排的来龙去脉。

二、“上道儿”

自从听说能上节目之后，同心文艺小组在此后每天都进行了精心的排练，被选入阵容的两位焊工工友 W 大哥和 L 小哥积极性非常高，就连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队长”也按时参加每天的排练，还有经常戴着冒牌解放军帽的 B 小哥，事业有成即将回家创业的 A 哥等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演出阵容，由“新工人艺术团”乐手许多老师亲自指导。与此同时，小组也和《中国梦想秀》节目组的编导 X 小姐约好了前来皮村（北京）拍摄素材和访谈的时间。据说 X 小姐表示这次来取材，是要让节目组评判这个梦想题材“能不能打动人”，打得动就上，打不动就 PASS。

四月底，千呼万唤始出来的 X 小姐驾临了，由于笔者要负责网站的文字编辑工作，无法脱身去瞧热闹，所以第一现场没能目击。但忙活了一整天的同事和工友们，在第二天讲述了前一日工作的完整经过。

编导 X 小姐表示，梦想的项目——一套音响的要求已被接受，除此以外，每个受访对象都要做单独访谈，要聊“个人梦想”——给父母挣钱啦，给自己买房子啦——而不能聊“共同热心服务工友”的公益精神云云。Y 姑娘很意外，她认为同心文艺小组的宗旨是服务于工友的文化生活，大家是抱着一个高尚的目的走在一起的，怎么会被这种采访形式和采访题材予以“分割”和“涂抹”呢？如果按照 X 小姐的编排方法，同心文艺小组就不再是一个“服务工友的集体”，而是一个个狭隘自利的小白们勾连在一起的小团体。我这些现实中的同事和朋友们尽管不像保尔·柯察金那样“高大全”，但也绝不是资产阶级的文痞们惯于描绘底层群氓的那种自利无耻，X 小姐这种暗里对工人文化小组进行贬低和离间的做法，大家有权利表达不满。最终，大家坚持统一口径：“我们的音响坏了，工友们的文化生活被迫中断了，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购买音响，因此求助于《中国梦想秀》，希望能帮我们圆梦。”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能说得过去的流程，比如拍摄工友们那条件简陋得足以令有闲阶层错愕的住所，以及工友之家的社区活动中心，来展现一下皮村工人们艰苦的物质生活与相对充实的精神生活的反差。

三、风波

为了迎接 X 小姐的工作流程，一行人在笔者眼皮子底下忙得四脚朝天，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5 月 4 日，Y 和小 Z 两位姑娘突然愁眉苦脸地说道：“能不能去得成还不一定呢！”经详细询问，Y 姑娘说原本定于 5 月 8 日启程去杭州，可是 X 小姐突然表示“你们等消息吧”，很可能是 X 小姐在北京还要寻找其他题材，如果别人的题材更好，我们的小组就上不了节目了。于是众人在郁闷中度过了两天。

5 月 6 日一大早，看到小 Z 姑娘模仿羚羊跳跃奔进屋子，笔者就知道节目应该是通过了。大家上午开始激情澎湃地排练，可是到了下午，笔者趁着如厕的功夫到剧场附近转一圈时，发现大家情绪异常低落。原来是整个小组的灵魂人物许多老师可能无法随队前行，据说原因是许多老师不属于上台表演的演员，因此没有劳务费，这也就意味着他的食宿费用无法报销。这下让 Y 姑娘为首的八位连飞机都没坐过的小组成员慌了神，没有了艺术指导，很有可能在现场排练和录制中发生难以控制的局面。好在经过艰苦沟通，问题最终解决了，许多老师还是跟着一行人最终踏上了前往杭州的行程。

四、煎熬

5 月 13 日，一行人回到了皮村驻地，大家都回味着过去这几天来的演出排练和录制过程的点点滴滴，通过 DV 的录像片段，看得出大家在拍摄节目的前前后后还是很开心，尤其是清点四天劳务费（共计 800 元）的时候。但是在迎接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时，却出现了莫名的心理煎熬。

Y 姑娘表示，虽然忙活了四天，录制当天排队排到大夜里 2 点才排上队，录了 2 个小时

筋疲力尽，可是真正播出时只有 10 来分钟的时间，真害怕有些精华给删减了，而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却被留下来。

笔者纳闷，那作为“最终梦想”的大音响是跟着你们一起拉回来的，最大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还有什么可愁的呢？是担心自己表现不好？还是怕别人指三道四的？笔者直到那时，还都觉得这不至于，无非就是化妆造型可能难看点儿啦，是不是现场出了点儿什么糗？

5 月 23 日，也就是节目播出当晚的同时段，笔者在另一社区女工服务公益机构木兰花开探讨关于创办急救知识培训项目的事宜，该机构有名工作人员的手机接到了中国梦想秀的预告，得知了同心文艺小组的情况，于是负责人齐大姐感叹说：“你们真好，还真上了节目！我们上次也排练去了，白忙活了一个星期最后没让上……”

五、闹剧

晚上回到家，老爸笑嘻嘻地说：“你们同事上电视节目啦？你看看回放吧。”

数字电视回放功能真是贴心的设计，但这个设计在这个晚上让笔者感到了恶心。

开场亮相的《打工者之歌》没啥问题，现场互动的氛围也还算正常，到了个人亮相环节，果不其然开始出大岔子。

先是大波波（周立波——YCA 注）挑逗小 Z 姑娘说出“啥是好人，啥是坏人？”，小 Z 姑娘很天真地表示扶助工友的是好人，剥削工人的是坏人。字幕君很配合地在“剥削”二字上加了引号，根本上否定了这个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大波波也是一惊，说了句“在座的可都是‘企业家’啊”（好吧，请允许笔者给这群“企业家”也加个引号作为礼尚往来）。

为啥说剥削分子是坏人哩？小 Z 姑娘凭借着工作经验和感性认识说道：“因为很多工人辛苦地工作却拿不到应有的工资，医疗社保也没有保障，出了工伤事故也得不到及时和足额的赔付……”

对于这个观点，大波波显然无法直接反驳，只好祭出资本教牧师的杀招——“感恩天地”来堵小 Z 美眉的嘴：“是的，是有很多坏老板，但是也应该看到，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做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工人要体谅老板的艰辛并感恩他们给了自己一个工作的机会，老板也要理解工人的辛苦……”

“噗——”一口啤酒喷在了地上。虽说“企业家”们掏钱赞助的娱乐节目肯定要给自己的屁股维稳、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但拜托大波波咱们也不能这么露骨好伐？皮村很多木工师傅直到辞职离厂那一天都没见到老板长什么样，鬼知道老板上什么地方辛苦地逍遥去了？感谢老板给了自己一个工作机会？老板不给工人工作机会，他自己能干啥？锯木头刷油漆哪样活儿他自己能干？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说，资产阶级为了降低无产阶级的在岗工资，炮制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让无产阶级成员为了获取或稳定自己的工作展开野蛮的恶性竞争，自己则躲在旁边眉开眼笑，在搞出的恶性社会生态中苦苦求生的工人们“有幸”被占有了劳动价值和大量剩余劳

动时间，还得谢资本家的恩。这就好比把一个健康的人打断腿，再卖给他一根拐杖一样。资本家是怎么感工人的恩呢？这个被工人撑起的国家和社会，又是怎么感工人的恩呢？

或许谈到这个问题，会有金丝眼镜跳出来为据说是“创造了社会价值”的“企业家”们做辩护，说从缔结劳动合同关系的角度讲，确实是企业家“养活”了工人们，工人不感恩，天理不容。

好吧，根据二次元革命精神，我们用一个激进的笑话作为回复好了：

一个资本家和他的朋友穿过资本家的工厂。

朋友问道：你刚才跟那人说啥呢？

我叫他干活快点，资本家答。

你付他多少钱？朋友问。

资本家：一天 15 块。

朋友问：那你哪里来的钱付他？

资本家：我卖货得来的

朋友问：谁造的货？

资本家：他（工人）造的。

朋友问：他一天造多少钱的货？

资本家：50 块钱的。

朋友总结道：那么，不是你付他钱，而是反过来他付你一天 35 块钱让你叫他快点干？

“...”，资本家马上说：**机器可是我的啊！**

那你怎么搞到机器的？朋友问。

资本家答：我卖货的钱买的。

朋友继续问：那是谁生产的货物？

这一回资本家对着他朋友（以及媒体和学校）叫道：闭嘴！搞不好他就听到了。

人们只要对社会稍有常识性的了解，都清楚那多出来的“35 块”就是货真价实的剩余价值所在，而唯一能完成剩余价值提炼的动作就是“剥削”。剥削的存在，已经越发在人们的主观认识中成为一个共识，资本家的代言人越是想指责这个词汇是上世纪 70 年代“极左遗毒”，我们就越要指出他们的无力辩解是 19 世纪末的欧美学阀们已经嚼过的馍，他们当年连马克思叔叔这关都没过，其论点和论据放在当代，更没啥值得琢磨的价值。笑话的结尾，资本家怕工人们“听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也是意识形态骗局的关键，当“不是资本家在养活我们，而是我们在养活资本家一家”成为工人共识的时候，这些资本权力的维护者们就连说话的勇气也不会有了。

小 Z 姑娘在这个单元的表现还是比较英勇的，像一个揭穿了皇帝新装的小清新，弄得在场的“成熟精英人士”们一阵子不舒服。

大炸场出现在 W 大哥的一段自白，表达了让大波波曲解为类似“老板就没有好人”的观点。大波波不愧是老成持重而不失思维敏锐的优秀娱乐节目主持人，他立即要求小组成员是否同意 W 大哥的说法进行举手表决。凌晨三四点的时段难免头脑发懵，再加上小组成员确实是天真纯朴，没有进行过“政治化训练”，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意见分裂，大多数成员

出于保护劳动果实的心态没有举手同意，除 W 大哥本人给自己投票以外，仅有准备回家创业的“预备成功人士” A 哥举手表示同意，一个可能要成为老板的人，竟然对“老板”这个身份表达这样的情绪，这不能不说是一次超然于自身立场之外用公正之心考量社会的勇敢举动——谋生需要是一回事，内心真正的精神立场是另一回事，尽管要受制于谋生的现实需要，但是这并不足以阻挠人们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立场，这也许就是自觉的开端。

由于节目被严重剪辑，笔者不知道中途出了多少矛盾，总之播出节目的后半段是大波波继续摆牧师状，教化人们要懂得感恩，要维护和谐，他的话语表达实在匮乏得很，竟然出现多次的重复用词，这一点也不像是那个搞脱口秀的伶牙俐齿范儿。

梦想通关折在了 194 票，弄得大家泪眼汪汪，但是请相信，我的同事们绝不是因为认为自己拿不到音响而感觉悲伤，而是高压态势的道德说教和强势的资产阶级表演规范让他们感到无比委屈。身为工人和进步青年，不能在最高收视率的节目上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例如对艰辛生活的无奈（“你得奋斗啊！”），例如对黑暗制度的不满（“吃苦不能赖政府啊！”），以及对那些高高在上、油头粉面，以窃取他人劳动果实为生的蛀虫的憎恨（“人家都是有本事的人，不能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却反过来为了实现工友们继续精神文化生活的梦想，不得不随着那只无形的指挥棒进行舞动，被迫表演着“感恩”和“孝顺”的驯服姿态，W 大哥被迫也要和“大队长”进行致歉，虽然不知道他们俩之间是否也出现了相互炸场的被 CUT 片段，但是节目组塑造“工人不团结”、引诱工人个体表达“放弃阶级对抗”的目的算是达到了，虽然政治意义也不大。

最终在成员挨个“表孝心”的“政治正确”姿态下，在 L 小哥的母亲所做的馒头表面霉菌微生物的鞭策下，在工友们父母采访时那几乎可以称之为“家徒四壁”的凄惨背景刺激下，观众终于落泪了，“企业家”评委们也终于感动了，大波波小手一挥开动了“反转”程序，“时光倒流”了，需要重新投票！于是票数高升到 289，梦想终于通过了，大波波在最终礼送下台时给大家释放了最后一道咒语——“信仰祝福”，曰：“要选择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不要选择怀疑。相信只需要一秒钟，但怀疑要怀疑一辈子。”说的真不错，“只要相信了马克思一秒钟，就会怀疑资本一辈子。”——自行脑补了这段无厘头逻辑后，这出与笔者相关的慈善狗血剧也终于画了个句号。

读到这里，不禁设问《中国梦想秀》是个神马玩意？答，是一个披着娱乐外衣的政治维稳和精神驯服工具。虽然它的业务素质目前还处于低水平阶段，不过足以引起人们的警醒，就像赫胥黎通过《美丽新世界》向我们表达的警告，人类不要毁灭于自己迷恋的事物，尤其是近乎无限的娱乐需求，如果不能清醒识破附着在娱乐之中的剥削意识形态这条“附骨之蛆”，你无论翻多少次墙，充多少次电，照样还是被洗脑。

六、展望

“其实你不觉得让一个娱乐节目解决慈善问题很扯么？”

就是在获知要上节目之前的某一天，笔者对 Y 姑娘如此发问，Y 姑娘深以为然。

“就为了这么一个破音响，多大事儿啊，总共才多少钱的东西，还得折腾成这样。”

在配合先期准备工作被弄得焦头烂额时，Y姑娘也这么说过。

虽然大家有过抱怨和不满，但事后回来还是感觉很高兴，还是认为有收获的。可笔者站在一个实际工作的角度，却有点儿高兴不起来了。

对于没有政治意识的人们，这是个小教训，但对于整个进步事业而言，却应该以小见大。现在虽然中国新工人群体还处于一个自发性斗争的阶段，而且是水平不高的自发性斗争阶段，但是从声势来看已经有了不小的提升，这自然也引来了国家机器和社会领域各方面的关注，而工人们在这个知识和信息爆炸的年代，由于信息门槛较低，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比起以前的工人和平民又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新工人的劳动价值文化在工人圈内蓬勃起来，以后更多的资产阶级娱乐节目自然也会顺着气味找上门来。

总结这次活动的得失，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具体的技术环节和演技环节，那是舍本求末，关键是要找到真正无产阶级文化和政治意识建设的着力点，这也是所有同志共同追求的。

首先，是精练价值观的表述要具备“攻击性”。仅强调“劳动光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剥削”、“剥削阶级”、“剥削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彻底撕掉，让工友们达到A哥那样的“即使被迫要靠剥削求生，也依然在立场上否定剥削”的思想基础，哪怕出几个红色资本家也是好的。所以欲立先破，而不能只立不破，否则意识形态的构建就不符合科学精神，也不能彻底，这样的反意识形态是虚弱的，不能说服人的，也必将在对面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侵蚀面前丢盔弃甲。

其次，应当普及社科常识来加强话语的逻辑性。还是以“剥削”为例，应当启发工友“难道老板不欠工人工资，工人出了工伤得以及时补偿，加班绝对给付加班工资，剥削就不存在了么？那只是剥削的幅度下降了，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占有，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将自身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来获取生活资料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样至少就能把一些诸如“坏老板剥削工人，好老板不剥削工人”这种低级别的错误观念化解掉，从而解开工人的疑惑，既将知识扩展开来，同时又能取得工友进一步的政治信任。

而后，是要结合现有人员条件锻造一批基层政工队伍。当然结合现阶段的社会形势，这支队伍的主要工作任务并不是无原则地调动工人的斗争积极性，挑动工人打无把握之仗，而是先以政治启蒙为主，尽可能让工友们先在个体层面上明白起来，即便此时此刻不能成为觉悟分子，至少也可以成为积极分子（是开始有政治懵懂的追随，而不是仅限于对工会娱乐的喜爱），但是假以时日，至少可以成为“汪洋大海”的一颗水滴。

最后，要继续巩固和扩大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阵地，塑造“精神割据”。例如工友之家编排的“打工春晚”，以及重D音等工人乐队在工地的演出，现已逐渐成型，应当抓住有利于文化宣传的历史时期，在工人阶级力量强大而资本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如工人社区）进行无产阶级话语霸权的塑造，例如隐蔽地降低“成功学”、“玄学”或反动“国学”在工人报纸、图书馆书籍和影像资料当中的出现频率，更多将反映工人、社会现状并带有政治启蒙意识的视听资料比例逐渐上升。将无产阶级自身的立场、价值观，上升为该区域无可争辩的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割据的“精神赤区”，在此“割据”期间。应当尽量避免陷入白色舆论强势阵地，而应当从相对尊重工人阶级的弱势阵地下手，以期尽大限度表达自身观点，为公众所知。假以时日，白色势力的文化对这些“赤区”无解，而“赤区”分子却可以深入“白

区”进行话语权的延伸，例如公然批判白色主流强势文化的精神符号——有些左翼学者长年孜孜不倦批判央视春晚中反动的政治内容，与工人运动对反动物质形态国家机器的“硬杀伤”相配合，着手改变主流信息或节目中对工人的描绘和塑造手法，将工人真正的阶级意志表现出来并成为无法封杀的民意基础，这就是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的“软杀伤”。

夜已深，言尽于此，就用另一则激进的笑话作为结尾，与左翼诸君共勉：

一群工人进了老板的办公室，宣称他们已经接管了厂子。

老板说：你没有权这样做，厂子是我的。

一个工人问道：那你是怎么拥有这个厂的？

老板说：我老爹留给我的。

工人继续问道：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厂的？

老板说，那是从他的爹那继承的

工人继续：那他爹呢？

老板说：还是从他爹的爹那里拿来的。

工人不依不饶：他爹的爹呢？

饱含着家族荣誉感，老板叫道：他是战斗得来的！

所有工人都笑了，齐声说道：是啊，我们这次也一样。

就这么办

LET'S DO IT



140



无法忽视的声音——新工人艺术团

印象



碎岁

编者按：作为近年来中国工人文艺的代表，新工人艺术团无疑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十年来，新工人艺术团不仅赢得了官方的认可，也吸引了自由派维权人士的关注。在为工人歌唱之外，他们的身影也出现在环保、救灾等各种公益领域之中。这篇来自艺术从业者的评论文章，正是他们超出意识形态之影响力的一种表现。“劳动者最光荣”的朴素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而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功绝不仅仅来自对这一观念的坚守，更来自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广泛参与，以及在实践中对民主话语的重新定义——这是任何激进的批评者和新一代的实干家都不可忽视的。

短短二三十年，经济发展、节奏加快、高楼林立、垃圾围城、道德崩溃、人性迷失……很少有一个时代像现在一样，歌舞升平又危如累卵。人们的价值观空前的多元起来，它们互相衍射、辩难、对立，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多数声音已经丧失了对常识的基本意识——这当然也是生机，但是真的抱歉，它的底线实在被拉得太低了。普遍的价值贫困，正是这个时代的基本事实。

比如，对劳动的认识。无论是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咏史之叹，还是百丈怀海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修身准则，在传统文化中，对劳动的肯定是一以贯之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对劳动价值集体性的贬低与无视。到了毛泽东时代，劳动光荣更是几乎成了第一社会公理，一张劳模奖状，就是工人们的至高荣誉。这不仅是一种精神鼓励，更重要的，是对人们劳动价值、身份地位、社会贡献的肯定。不难看到，这一朴素观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仍然有着重要地位，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沉沦，而到了九十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建立，它才被以飞快的速度彻底颠覆。劳动从一个理直气壮的词，变成了人所不齿的词——这从侧面反映了劳动者地位的一落千丈——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结果。

劳动者被无限度地边缘化，压在社会底端，权力与资本呼风唤雨，被人们顶礼膜拜——这是新工人艺术团诞生及生存的社会、思想背景。无须讳言，尽管发行了七张专辑，他们的作品在艺术的复杂性与完成度上，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一些歌词过于直白、部分编曲线条简单缺乏细节等，都让歌曲的艺术性打了不少折扣），但他们依然值得重视，他们重申劳动的价值，捍卫劳动者的尊严，表达弱势群体的诉求，真实记录着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群人（媒体称为“农民工”，后部分媒体称以“新工人”）的生活、尴尬与情感状态。新工人艺术团不仅将被当代文艺忽略的一个重要阶层及他们的历史引入了艺术现场，更为中国歌坛贡献了一种稀有而重要的价值观。是他们，第一个响亮地喊出：为劳动者歌唱——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新工人艺术团，一个立场最鲜明，气质最纯朴，创作力持久而质量均匀的，中国歌唱史上少有的拥有清晰而坚定的价值观的民间歌唱团体。

孙恒

孙恒的很多演出都是以唱谈的形式出现的，他经常强调一段这样的话：如果现在没有我们的历史，那么就没有我们的未来（大意）。——这句话可见其对新工人缺乏关注的痛心，也可见其对话语权重要性的认识。自然，这也流露出了他的抱负，他歌唱，是抱着为被称为“农民工”的几亿人作史立传之雄心的。让别人知道真实的他们，不被无耻的媒体所扭曲所遮蔽，这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

劳动光荣！《打工打工最光荣》、《劳动者赞歌》等歌曲大义凛然地歌唱劳动者，首先在价值层面，把颠倒已久的事实给予了拨乱反正。究竟是谁养活谁？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其答案却长久地被主流媒体所模糊。孙恒则大声告诉新工人，也告诉世界：“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劳动在这里得到了肯定，回到了应有的地位，即，劳动创造世界。

孙恒当然明白，在现实中，世界的创造者与世界的主人，二者是严重错位的——本应在社会中心位置的创造者却被压在底层，挤到边缘。所以重申劳动价值之后，下一步便是要唤醒劳动者的权利意识，传达他们的诉求与梦想，以及对窃取劳动果实者给予决不妥协的痛斥声讨。《团结一心讨工钱》、《开胸验肺》、《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样的歌曲，它们简洁明快，短促有力，是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呐喊之一。如果你觉得唱得有道理，欢迎加入这个队伍。

《彪哥》、《打工子弟之歌》有同样的诉求在里面，但在抒情性上作了更深的延展。《彪哥》应该是第一次让一个具体、鲜活的民工进入了音乐，在口琴、手鼓和吉它的简单编配下，孙恒给我们介绍了憨厚的彪哥和他的希冀、无奈与起早贪黑的沉重，歌曲低回婉转，让人心如坠铅。《打工子弟之歌》则明亮激越，如一道射入黑暗的阳光。留守儿童与随父母进城子女的上学问题，是这个大问题中最迫切的子问题之一，同心学校的孩子们用清澈的童声唱出了的小伙伴们的心声：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他们是相对幸运的，因为还有同心学校，而绝大多数的打工子弟，却没有这份幸福。政府和教育部哪里去了？没人知道。只有这首流畅得惊人、传唱度极高《打工子弟之歌》一次又一次地响起，戳着人们的泪点，提醒着吃着国家俸禄的所谓公仆们。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孙恒的怀乡歌曲，它们数量很少，却因情感的炽热和无法回避的撕裂感让人铭心。对于每一位背井离乡的人，离开家乡的時刻都是心中永远的痛。在异乡的每一个夜里，慈祥的母亲、心爱的姑娘、上涨的河水与门前的桃花都会出其不意地在梦中出现，告诉你的最初模样以及现在与家乡的距离。而等你回头、返身，故乡已不是故乡。拖着满是泥水的脚步，看着衰败的村庄，越是春天，越是无法面对，于是回忆中的每一声鸟语虫鸣，都成了惊心的追问：世界在奔跑时，在哪一步走错了路？被挟裹着向前的我们，失去了什么？从《想起那一年》到《春天 故乡》，孙恒和我们一样，思念从未得到抚慰，纷争从未得到平息。

许多

许多是个愤世嫉俗的小伙，身上有股像他那一头卷发一样不停跃动的活力，他的歌曲也像他本人一样血气方刚。与艺术团中多数成员的严谨低调不同，许多平时在网络上极为活跃，嬉笑怒骂，针砭时弊。这种性格也灌注到了他的歌曲之中，活泼、激昂、《打工号子》《走南闯北》等歌曲还明显有军歌特征。

如果调查一下北漂们对北京的印象的话，“大、人多、高房价高租金、没有归属感……”这几条应该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许多一直追问并寻觅着在北京的“家”，他自己给这个问题以形形色色的回答：“北京没有我的家”、“北京就是我的家”、“六里桥，俺们的根据地”、“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这些不断变换的答案，正是无处安身的写照。《北京、北京》是一首优秀的歌曲，对比强烈、构思奇特的首段歌词极具冲击力，遗憾的是许多给它安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而这种一厢情愿最终在残酷的现实前幻灭，在艺术团发第七张专辑的时候，大家不得不起发问：家在哪里？伤感而不亢不卑。

《城市的生活》是许多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歌曲一改他的惯常曲风，变得低沉而静缓，在声声断断的吉它声中，加班女工、地摊小贩、站在楼顶上讨要工钱的人们、彩票和超女一起出场，两极分化的世界慢慢显像，一切都被叫卖出售，不同的是，一些商品是暴利骗局，一些商品却是被廉价甩卖的劳动力。许多不认同这个规则，他大声戳穿了令人致幻的包装：“别以为你们的把戏真能将人给糊弄，让一切虚伪和不公都统统地滚吧。”许多是决定战斗到底了，他意识到了《生活就是一场战斗》，如果你一无所有，那么你别无选择，你只有“用尽一生燃烧照亮那征程”。

段玉

段玉的嗓子和她的马尾一样漂亮，是艺术团的鲜花。她的作品质量不一，有几首歌都有曲子过于欢快从而与主题不够合拍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成熟。但她的好歌的确好，它们或来自挣脱黑暗束缚的撕裂，或来自忽然打开天窗的久违畅快。这些歌有《电梯姑娘》、《地下室》、《我在北方看了一场雪》等。

无论是电梯还是地下室，都是幽闭阴暗的空间，对于囚徒般生活于此的人们，分清白天和黑夜居然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段玉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极具寓意的场景，然后精心编进了和弦，当她在长久的低语后忽然爆出“青春就消失在这上上下下的锁链中，我看不见飞鸟也看不见天空”，那种力量甚至让人有些害怕，但这只是人们本身的所蓄藏的能量而已。段玉是希望人们走出牢笼的，当然，如果门锁着，就需要打破：“在弥漫着奇怪味道的迷宫里，眩晕的寻找着通向阳光的彼岸。”

董军

董军参与演出不多，发表作品也数量甚少，但寥寥几首，却直指人心，他的歌中透着中年的沧桑与欲说还休的荒凉。我想如果他经济状况好些，他应该会写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他的艺术感觉是毋庸置疑的。

《男工宿舍》是一特别放松的歌，表面上全是嬉笑与自嘲，然而听着听着，一种辛酸却在不请自来，小人物的爱情和生活都如此艰难。《再见吧，朋友》伤感而透彻，董军深感一切都逃不过这无奈的生活，所以这一声再见沉重而复杂，既是与朋友道别，也是出走与反抗的冲动。而在《木头人》中，董军已心如死灰，他将肉身化为木头，虽站在稻田，却与世隔绝，他没有感觉，不知时间，也没有人在意，一切意识都在这里寂灭，仿佛是一件悲观哲学的行为艺术。《有你在身旁》与《梦一场》是对这些辛酸、无奈与绝望的解救，方式简单，却意味深长“也许只是擦肩而过，可你却向我伸出了手。”这或许概率很小，但却是一种祈愿与安慰：“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醒来之后就会是一个阳光的早上。”

姜国良

一般来讲，微胖的人都是让人放心和放松的，姜国良给人的印象便是这样。他的作品，也透着放松的节奏与轻盈的质感，其精神指向，也更多是积极乐观，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没有怒发冲冠，也没有绝望自闭，他相信行动的力量，相信改变的到来。

《不再迷茫》《拥抱生命》《边缘年代》《未来时代》……从生命意识的觉醒，到走向团结共进之路，这些励志色彩浓郁的歌曲，不断地扩大视野，提高层次，如果说现在的我们正“在经济的绞索里被宰割变卖”，那么未来何在？姜国良的回答是：“手和手握起来心连起来，去开创正义与公理的时代。”对于残缺的世界与无家可归的事物，姜国良的态度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放进我们的手掌》，得不到承认的劳动价值，褴褛的底层、被拐卖的孩子，漫天飞舞的蒲公英，这些都应该得到保护的，我们只能认真对待、主动改变，而后细心收集、放进手掌。

此外，孙元、张磊、全桂荣、同心学校学生等也是新工人艺术团创作力量的重要部分，民谣歌手洪启也偶有参与。篇幅所限，不再评述。从打工青年艺术团到新工人艺术团，这个团队不断发展壮大，创作力持久丰沛，作品的形式也渐渐多样化，与此同时，其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开始波及多个社会层面，他们主办的“打工春晚”，以其鲜明的立场与工人艺术特色，已几次成为文化热点。

真正的文明，都是共生的，而不是牺牲一部分去成全另一部分。而在当下，谁是被牺牲掉的一部分，大家心知肚明。在中国每个城市的街头，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穿着最脏的衣服，吃着最差的饭菜，干着最危险最累的活的民工，但天天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我们，有几个人曾真正走近他们，了解他们？在声色犬马的文艺圈，又有多少关心民瘼的作品？而大多数农民工题材的东西，不是消费苦难，便是回归和谐。新工人艺术团填补了这个空白，对混浊、混淆、混乱的价值观努力做着澄清，正如他们倡导的，他们实践理想的过程与成果，已经书写了自己的历史。

新工人艺术团是受工友欢迎的，因为他们唱出了劳动者的心声。新工人艺术团是不受音乐圈欢迎的，因为傲慢、势利、只知娱乐、充满铜臭交易的主流音乐圈是容不得这样的异类的，他们的专辑总是被有意无意忽视。但2010年的宋庄，一个民间音乐机构却将新工人艺术团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评为了2009华语音乐十大专辑的第二名。颁奖词写道：这是一张几乎被所有榜单忘掉的一张唱片，这张充满底层关怀与进取精神的佳作，宋庄音乐则将其评为年度唱片的亚军，不只是因为打工青年艺术团对阵地的坚守，更是因为他们身后数以亿计打工的兄弟姐妹。

没错。那是我和朋友搞的。自从听到他们的首张专辑，我就知道自己会一直关注下去，因为我知道音乐不能只有好听，还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与思想。无论世界经济结构怎么变化，历史大周期如何演进，对于新工人地位的改变，自身的努力都是最重要的，而话语权与文化的力量，正是其关键的一环，新工人艺术团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开创性的，是对得起掌声的。

劳动者的休憩时刻



：张承志



(一)

此刻是大年初一的中午。

昨夜，本想看看是不是还有例行的骂日本节目，对脑残制造工程“春晚”也忍不住好奇，于是打开电视。虽在意料之中但还是出乎意料：居然它能这么低俗，全然不怕脑残者也会忍不住跳出洗脑程序破口大骂。就这样，不仅出马不利，我简直是体验了一次恐怖。

今天早起瞟了一眼年历，我第二次吓了一跳：这个马年居然是一个甲午年！也就是说，距离那个先是莫名其妙地狂妄、接着丑不堪言地惨败的甲午年，历史已经巡回了两个甲子。距离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灭战舰被俘——整整两次循环、一共一百二十年过去了。

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短信，说她实在受不了“春晚”，明年春节要躲到外国去过。但就是她，前几天在呼家楼看过“打工春晚”后说：“看了演出，觉得中国还有救。”

那场“打工春晚”我也去看了。我当时的感觉是：粗糙的艺术无生命，也难以战胜流行的精神毒品。但我很留意年轻人的这个信号。因为，挑剔的年轻一代并没有太在乎打工者们是否韵正腔圆。因为人们已处在忍受的极限，所以一旦有新鲜事物出现，只要有一丝真情实意就立即会被人们接受。哪怕它再粗糙，只凭那一点真诚，就会被认为远胜豪华舞台上的猴戏！

（二）

不知多少年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专程跑去在剧场看演出。

那是一个拥挤而闷热的场地，一些简陋的塑料凳，几排铺了布面的台阶。不用说，即便这样的场地，为获得它也一定经历了艰难。但这种场地意味着将有一种久违的围坐；这种自家伙伴式的围坐，需要演出者拿出人们期待的内容。

我一直想呼吁他们克服粗糙，就像我禁止自己的粗糙与短浅一样。但是在此刻，在经历了粗俗至极却又居高称霸的“央视春晚”的次日，我寻找出简陋的“打工春晚”的视频，浏览看过的一幕一幕。突然间，感动清晰地在我心中升起来了。

我意识到这感动珍贵无比，不能让它一纵即逝。

——从开场，从那些从皮村坐公交车赶来的孩子们欢叫着跑上场开始，一种在中国已经难得一见的朴实，就使人心里一热。在皮村孩子的脸上，没有“大院”幼儿园给小孩涂上的那种“从小作假”的矫揉伪彩。

经过昨夜的恐怖体验再看一遍，一个个我为它粗糙而遗憾的作品，开始显得有滋味了。

比如相声的开头与春晚的比较。经过了昨夜的体验，再听王德志自信的台词就觉出锐度了：“要是央视春晚好，现场的观众，今天的观众，他能来这儿吗？”无论如何，它在恢复讽刺与针砭的相声原则。而这种原则，早就在电视上荡然无存了。小品《咱们结婚吧》和调侃英语的《还谁自由》，即便粗糙，针砭与讽刺的精神也确实在复苏。通观全场，显然工人艺术家们已相当成熟，他们谨慎的话语，甚至使我联想莎士比亚关于分寸的名句。但呐喊同样是必要的，于是“重D乐队”就振聋发聩地一吼为快。主持人也不再是一些作态的花瓶和一种话语的权势，而是点题者，是热烈的思想导引者。沈金花的存在是重要的，她无声地平衡着弱势与受苦的群体容易倾向的激烈。杨锦麟更令我刮目相看，他的正直与大义，他在全场演出中不断强调的工人的尊严、劳动的权利，以及打工者演出春晚这一行动的价值，每次都是点睛之笔。他的主持台词，否决了下里巴人自娱的误解，庄严地宣告了——劳动与人，乃是中国的新命题。

当然压卷的，还是孙恒的歌曲《劳动者赞歌》。它无疑是最合适也最有力的结尾曲。我尤其喜欢他们的手臂动作。我在那一霎那不仅兴奋地加入了合唱，甚至发生了幻觉——我幻想自己在和各个时期的朋友们一起，用六十年代的语言、用冰雪草原的蒙古语、用黄土高原的陇东话、用我们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使用的阿拉伯语，随着孙恒的领唱，竭尽全力地唱，如同国际主义者唱《国际歌》一样，纵情地唱，挥动我们的手臂，把誓言的拳头举向天空。

（三）

被年轻一代认为“因为他们中国还有救”的新工人，寄居在北京远郊一个叫皮村的聚落。皮村是一个象征，几乎所有的大都市都有这种城市边缘的村庄、市民之外的市民。它就是今天的底层，生存充斥艰难。但是，就在那城乡交壤的编外地，已经诞生了崭新的艺术，诞生了一代正在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的生存、权益、尊严、素质而奋斗的新人。

粗糙与否不值一提，他们直面着巨大的历史关口。

就像以前因历史的养育，我们这一代也曾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祖国苦难丰饶的历史被推上社会前台一样——转瞬之间，一些打工者的艺术家、一个崭新且不断扩大的都市工人社会共同体、一群被时代大潮推上历史的青年、一种勇敢地宣布自己是“最光荣的劳动者”的新工人——已经诞生于中国大地。

对我们这些——昨天曾在中国的底层生存与奋斗的六十年代人来说，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一种认同。这是一种阶级与立场的认同，永远都不能背叛。

在大年初一的下午，关上电视，打开电脑，找到他们的视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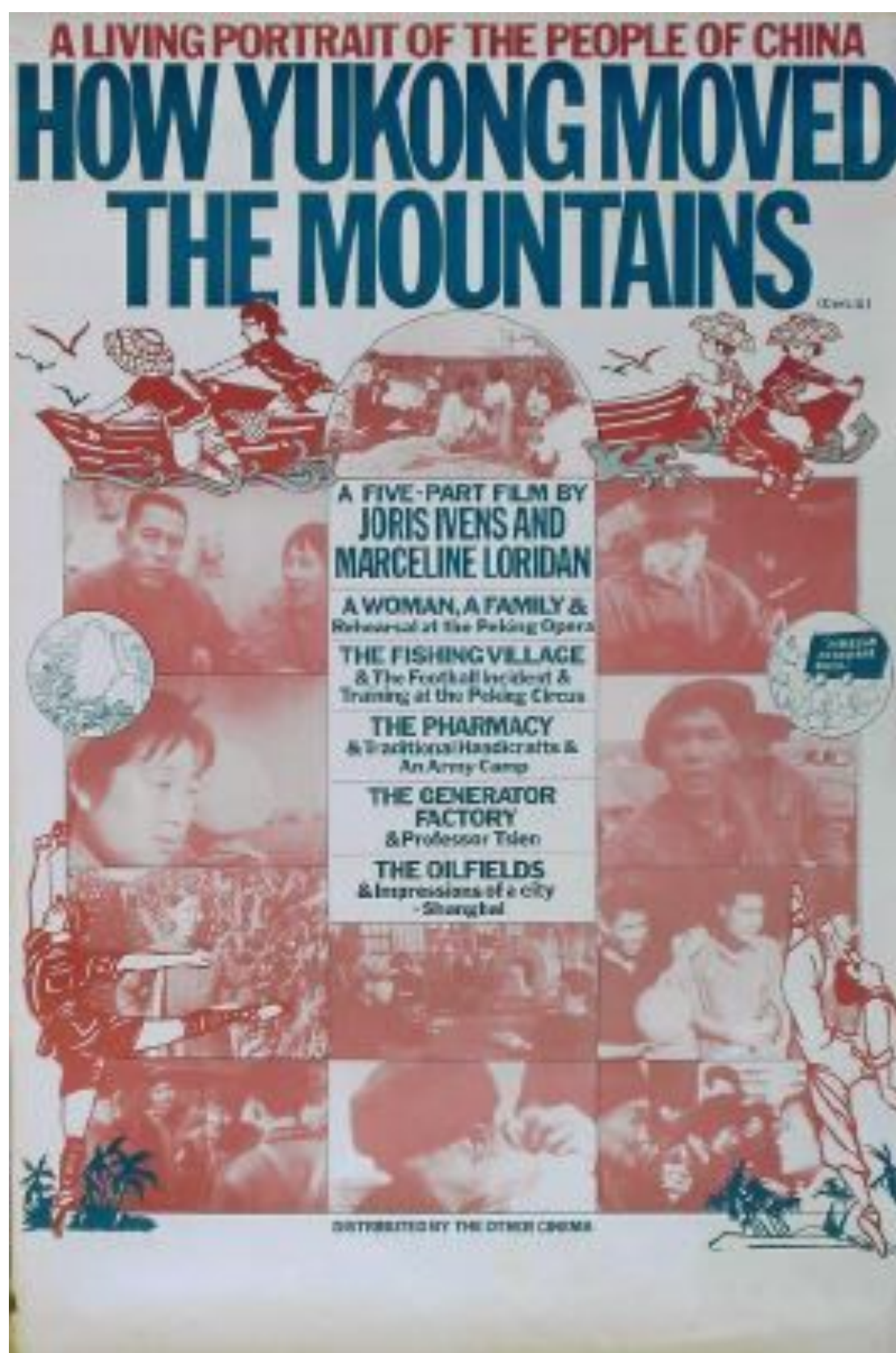
“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在一派健康的歌声中，我们享受古老的节日，度过这一个春节。像审视自己一样，我注视着视频中的他们，感觉着他们决意，也揣摩他们的步子。这是甲午国耻一百二十年之后的、2014 甲午年的春节，选择与危机并存，反思与庆贺同行。

劳动者们在享受休憩，数亿的人群返乡归国，回到家中。我们在一起享受春节，打工者艺术团在为我们演出。

看过他们之后，我又重新注视自己。这是劳动者的休憩时刻，不久奋斗就又要开始了。



148



• 伊文思 《愚公移山》

“我想将你们尽可能地引向远方”—— ——伊文思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吕新雨



2002年夏天我曾去北京参加一次纪录电影的论坛，会上邂逅荷兰学者 Kee Bakker，他来自伊文思的故乡，是 Joris Ivens and the Documentary context 一书的主编。Bakker 先生把这本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文集送给了我，并且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希望纪录片在中国能够和故事片一样重要。我相信，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来自伊文思，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也是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纪录片导演。这本书收录的文章来自不同的国家，主题众多，包括讨论伊文思与意大利，伊文思与法国，但是书中没有来自中国的学者，也没有文章来讨论中国与伊文思的关系。

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伊文思在中国拍摄《愚公移山》之后，一直问自己：在我们走了之后，中国人会怎么评价我们？中国，这是一个与伊文思的生命、信仰和追求血肉相连的国度，他把自己最后一部自传性和总结性的电影《风的故事》选择在中国拍摄，并且用大量的中国意象作为他自我理解的展开。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的伊文思一辈子却信仰和投身于社会主义，在晚年，他这样总结：

“我还要回到我在苏联的年代的，这里的回顾不过像是一处路标，它确定了我的观念范畴。1930 年在古朴的列宁墓前，此一程也。1980 年在毛泽东纪念堂前，彼一程也。我在这两点之间，在历史中穿行往返：荷兰、比利时、美国、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古巴、智利、越南和一切反抗凄惨、邪恶及奴役的人们所在的地方。共产主义是这场战斗的先锋队，我相信共产主义，昨天在苏联，今天在中国，如果体力允许，明天再到别的地方。”

在《风的故事》中，荷兰作为风的国度，是伊文思生命的开始，但是“风”却最终把他带到了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伊文思生命的终点。《风的故事》完成后的第二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也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一个遗嘱。一个没有中国内容的伊文思其实是无法想象的。

在今天的中国，对伊文思的理解却重新成为一个挑战，我指的是伊文思和中国七十年代的关系，它集中体现在《愚公移山》。它拍摄于1972年至1974年，完成于1975年。当它于1976年开始在欧洲放映的时候，中国宣告文革结束。这使得这套系列电影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这不仅仅是指它的时代内容，更是因为它包含了伊文思对这个特定时代所涉及的具体内容的独立观察和思考，并因而使之成为长度接近12小时、包括十二部影片的鸿篇巨制，这也是伊文思电影生涯中最宏大的作品。但是，我们今天讨论伊文思似乎更愿意谈他早期的先锋电影《雨》和《桥》，以及晚年的《风的故事》——只是因为它的寓言和象征似乎与直接的政治无关，而似乎只是形式的问题。我们故意遗漏和回避的恰恰是伊文思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这自然不是偶然的現象，它是冷战后的整个世界以及今天中国“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结果。但是，大凡在当代中国研究伊文思就很难使自己避免挑战，这个挑战既来自伊文思，也来自今天的时代。

在《愚公移山》的整个拍摄过程中，伊文思始终忠于自己的感受，并尽一切努力保持拍摄的独立性，——这是整个拍摄过程中他所关心的最大的事情。影片的资金来源于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以及后来他们个人的追加款，拍摄的方法是以“民主”的电影方式让“人民”说话，“在这个意义上，影片超越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直毫不妥协地与中国行政机关对他们拍摄与剪辑的干涉进行斗争，拒绝拍摄完美无缺的“大寨”和被排练的喀什街景，宁愿把不能用的胶片扔到垃圾桶里去，拒绝执行文化部提出的61条修改意见。他们坚持要让在摄影机后面的必须是一个中国人：“他们中的一个”，而不是一个欧洲人，为此不惜耗费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和八千米的胶片来培养中国的摄影师。在无法被西方商业渠道所接受的情况下，他们自己组织和完成了一切影片的发行和放映。因此，不能认为《愚公移山》是宣传，因为在《愚公移山》中我们看到了与当时的宣传完全背道而驰的立场和观点，它包含了对当时中国的很多怀疑和不认同，比如他对清华大学生的批评：“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们是在这种空白的环境下长大，生活的。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或所知甚少，他们只会依照学到的教条来和我们谈论长征、延安、解放前的中国、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等。”但是完全不同与同一个时代拍摄中国的安东尼奥尼，在伊文思看来：“对于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人们有这么一种印象，中国人与我们相比是‘另类’的。但我们的影片通过录音和翻译所展示的，他们的言谈和思想就像任何一个人。通过‘逐字逐句’的翻译，我们在影片中保持了说话的中国人的‘立体’形象，而安东尼奥尼对他们的表现则是平面的和非个性化的。”这个比较是尖锐的，也是准确的。

但是我们的研究者往往一方面描述了伊文思和罗丽丹对“真实”的尊重，同时又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揭批文革，用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受和具体的历史材料来说明为什么伊文思拍到的东西往往是“表象的真实”，这个论证方式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在纪录片美学背后的社会和政治的力量，从而揭示出纪录片研究的复杂性，它需要被置放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中。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问题所在，因为文革研究是一个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它很难仅仅用个体感知的有限视角可以涵盖，也是很难简单地用肯定或者否定所能够界定的。如果只是从目前既定的盖棺论定的话语出发，其实很容易封闭多种读解《愚公移山》意义的可能性，比如关于平等、大民主、缩小三大差别等等。比如，在《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中，伊文思表现了药店为农民服务的场景。第三药店的职工送医送药下乡，他们按照固定不变的价格在农村销售药品，这是为了响应当时的毛泽东的指示：“在

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这的确不符合市场的原则，可是当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差不多快三十年后的今天，城乡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加剧扩大为社会断裂，为此中央政府已经连续数年出台1号文件，我们再回头去看当年毛泽东的指示和当年上海第三药店的行为，是否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愚公移山》里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渔村》，它表现的是山东大鱼岛的集体化道路，有研究者表示“当我初次接触伊文思所提供的有关大鱼岛的经济信息时，本能的反应就是怀疑”，但是“在我仔细地研究了伊文思的电影和相关的资料之后，我开始相信这是可能的”，“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大鱼岛的富裕在文化革命中不是偶然的现象（尽管不多），而且，大鱼岛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走集体富裕道路的信心和理想，也是当年许多共产党人所赞同和拥有的。他们不仅有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且在想方设法地实践自己的理想。”而且有证据表明大鱼岛的集体化道路抵制住了八十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浪潮的压力，在今天依然成功地以集体经济的模式存在着。这是否应该成为开启对那个时代新的理解的可能性呢？

伊文思出生在1898年，一生都在二十世纪的风口浪尖上，逝世于1989年，——特别富于历史意味的一年，它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的提前终结。因此，他的一生及其电影镜头都和这个世纪的革命纠缠在一起，这就决定了读解伊文思是无法与理解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和中国革命相分离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文思及其镜头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在八十年代的欧洲，在中国政府宣布要彻底断绝和七十年代的关系的时候，他因为《愚公移山》失去了长达十年的工作，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为标志的二十一世纪拒绝了他，以作为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同情与参与的惩罚。但是当我们把伊文思与里芬斯塔在二战胜利后也曾失去十年的工作机会相提并论的时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个应该认清的最基本的界限是：法西斯主义是反人类的种族主义，而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反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却是为了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它再一次证明纪录片的美学和意识形态立场不可分割的重要性。如果说任何群众集会的仪式都是“神话”的仪式，而不去分辨不同的集会的意识形态之动机，其实是否定和取消了任何社会反抗和变革社会的可能性。我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博里纳奇矿区》里的工人游行和《意志的胜利》里的涌向街头向希特勒行举手礼仪式的“群体的聚集”等量奇观呢？构成今天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又该如何理解呢？在三十年过去的今天，当重新清理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成为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内在要求的时候，重新去看待伊文思对中国七十年代的描述会是一个重启历史的契机，我相信。

在这个意义上，《风的故事》如果仅仅从形式和先锋艺术的角度其实是无法读懂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读解是把“风”翻译成“理想”，但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想”本身还是会遇到很多无法读通和贯穿的障碍。《风的故事》一开始，字幕说道：“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位老人。他出生在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们致力于驾驭海和风。他经历了二十世纪，用手中的摄影机拍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暴。”在我看来，这个理想其实应该由具体的历史的内容来充实：这就是社会主义理想，它是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潮流，是由“风”所推动的。用伊文思的话来说：“一部不可能的电影是生命中最好的电影。我一生中所有的尝试都是为了拍摄风，驾驭风。如果它来了，我们就要用摄影机抓住它”。但是在投身于这个历史的过程中，“历史有无情的齿峰，我可以说曾被历史‘咬伤’”，这体现在影片中是他在沙丘上苦苦等待风的到来，终于昏倒。但是他依然保持着对这个来自底层、民间、历史和传统中吹来的风的信仰，影片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一位典型的西北乡村妇女，但她却是最具有力量的能够呼唤风的巫婆，——西北正是中国革命诞生的地方，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西北的窑洞里，他找到了被锁在箱子里的“风”，一个鼓着腮帮子吹风的图腾面具，面具的制作者将其送给了伊文思，伊文思则回赠了自己早年的拍摄的爱情影片，用爱来换回“风”不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吗？从1938年拍摄中国抗战的《四万万人民》开始，他不无自豪地说：在“无人能决断中国革命是

否成功的今天，我一直与他们站在一起”，“我深信无任何一西方人有像我这样同中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风的故事》里会出现《四万万人民》的镜头：长满庄稼的大地作为人民的隐喻支持着抗战的将士们。在他的晚年，他对拜访的年轻人说的是：“我想将你们尽可能地引向远方，直到你们能理解我的疑虑与信念”，虽然“事实是无情的，有时是难以承受的，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终生投身于社会主义和革命斗争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是要有立场，这是我的信念。”这个信念不是别的，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因为社会主义的信念就是人民推动了历史，如果说伊文思的电影具有政治性的话，这是他最大的政治，而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支持，正是基于其上的。“人民”，这是一个无法被“市民”和“公民”所取代和消解的政治概念。

从先锋电影走向人民电影的一个转折点，是1930年应普多夫金的邀请去苏联，“在那里，他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是无产阶级的天下，所有的人都戴鸭舌帽。人们坚信工人阶级有伟大的才能，人类已经赢得的东西，工人阶级能把它推到最高水平。这是最有朝气、最自觉的阶级。”之后，1946年因为拍摄《印度尼西亚在召唤》，在自己的祖国和其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之间，他选择了第三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因为这部电影，他被驱逐出祖国长达四十年。然而，一个在今天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当纪录片倒向政治的时候，也是纪录片离开艺术的时候。1933年的伊文思在比利时拍摄《博里纳奇矿区》时，曾安排再现一场已经发生过的游行，结果却成为一场真实的示威，不断有工人参加进来，并且遭到了警察的干预。对此，我们的典型分析是：当观众为了争取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不是为了拍电影）而站出来的时候，艺术的殿堂为之轰然倒塌，因为艺术欣赏所需要的间离的心态在观众那里已是荡然无存，他们看到的是生活直接而又具体的一面，他们可以为之激动、为之慨叹、为之愤怒等等，唯独不会去欣赏其中的韵律和节奏。但是这却正是伊文思需要的，“我现在而且将来一直都是艺术家兼社会活动家”。这里包含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艺术与干预社会的关系，这也是纪录片的独特之处。什么是纪录片的美学和艺术？艺术是只包含在韵律和节奏中吗？只有形式感才是艺术吗？如果是这样，纪录片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正是在《博里纳奇矿区》中，伊文思反省并放弃了早期先锋电影的对形式感的美学追求，而走向现实的政治。那么，纪录片导演介入社会和历史是否也是属于艺术本身的行为呢？“我坚持以我的职业干涉社会”，伊文思的艺术是用来干预社会的，他让自己投身在历史中，全身心地沉浸在时代的氛围之中，去触摸和打探时代的脉搏。伊文思到底是一个“因为政治而浪费了自己才华”的艺术家，还是一个在政治中实现了艺术才华的导演？其实，艺术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意识形态的豁免权，虽然它曾经宣称过如此，但那不过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述。

今天，当纪录片导演对自己的文本进行干预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先锋艺术。相比之下，伊文思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对整个世界，对整个社会文本进行干预，他用艺术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事业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最彻底的艺术先锋。不能理解这样的纪录片大师，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悲哀。二十世纪的整个世界历史，如果离开中国革命是无法想象的，作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是否还能够分享伊文思这样的历史视野？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总是选择让自己处于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心脏地带和风暴眼。这个追风的人，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体验革命风暴所带来的激动、痛苦以及悲伤，哪怕它是难以承受的，哪怕它导致自己伤痕累累，——这这也是一个艺术圣徒者的所为。在这个意义上的艺术和“人民”的关系，是值得重新理解和讨论的话题，它需要建立在由伊文思所激励出的对真实和真理的信念上。

今天的艺术该如何参与到建构和介入历史的洪流中去呢？

譯文選編

Selected translation



153

弗拉基米尔·列宁

1870.4.22-1924.1.21

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是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组织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之间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些环节而已。

罗莎·卢森堡


1871.3.5-1919.1.15

不是通过多数实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策略达到多数。只有一个懂得领导也就是懂得向前推进的党才能在风暴中争取到追随者。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OMAS
PIKETT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对皮克提“资本论”的事后思考



: 大卫·哈维

郭鹭（译）

马秀英（校）

托马斯·皮克提的新书《21 世纪资本论》最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主张采取累进税制和全球财富税的手段，作为遏制资本主义趋向于“世袭”式状态的唯一途径，这种“世袭”形式的特点在于他所谓的“可怕的”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他还通过翔实的、无可辩驳的细节，证明了在过去两个世纪，财富与收入两者间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演变的，其中特别强调了财富的地位。他摧毁了人们关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普遍观念：认为它广布财富，认为它是保卫个人自由的坚强壁垒。皮克提向我们表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没有受到国家大的再分配干预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反民主的寡头。他的论证令自由主义者义愤填膺，让华尔街日报暴跳如雷。

这本书往往被视作卡尔·马克思 19 世纪那本具有相同标题的著作在 21 世纪的替代物。皮克提实际的论述确证了他没有这种意图，因为他的书根本不是一本关于资本的著作。这本书没有告诉我们 08 年金融崩盘的原因，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耗时那么久来摆脱长期失业和房产绝赎这双重负担。它无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现在美国经济增长如此迟缓，与中国情况完全相反，也无助于我们理解欧洲陷于经济停滞的和财政紧缩政策的原因。皮克提在统计学上向我们表明了（我们应当对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资本在其整个历史中，趋向于产生程度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恐怕不是新闻。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已得出了同样的理论性结论。皮克提没有提到这一点并不奇怪：面对那些将他称作一个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右翼媒体的指责，皮克提声称他并未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皮克提搜集了很多数据来支持他的论述。他关于收入和财富之间差异的说明是令人信服的，对我们很有帮助。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建议：将遗产税、累进税制和全球财富税等措施，作为应对财富和权力进一步集中的一剂可行的良药（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但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的这种趋势为什么会出现呢？从他的数据中（同时也掺进了一些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的美文学典故），皮克提得出了据以解释所发生状况的数学规律：那著名的 1%（“占领华尔街”运动使得这个术语通行），他们的财富的日益积累是起因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的回报率（ r ）始终超过收入的增长率（ g ）。皮克提说这现在是在而且过去一直是资本的“核心矛盾”。

但这种统计上的规整还并不构成充分的解释，更别说是成为一个规律了。照他所言，那么是什么力量产生并维持了这样一个矛盾呢？皮克提并没有说。规律归规律，原因归原因，互不相干。马克思则旗帜鲜明地将这种规律的存在，归因于资方和劳方之间权力的不平衡，而这种解释依然成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资方动用技术、失业、外包和反劳方政策（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来压垮了所有反资方势力，劳方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下降，从而劳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持续下降。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经济顾问艾伦·巴德，在

某个不经意间承认了 80 年代的反通胀政策已被证明是“增加失业的绝佳方式，而增加失业是减弱工人阶级力量的绝佳方式……增加失业所做的事情，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种危机重建劳动后备军、让资本家获得更高的利润。”在 1970 年，工人平均薪酬与 CEO 薪酬之间的比例约 1: 30，现在稳超 1: 300，而在麦当劳则达到了约 1: 1200。

但就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皮克提也没读过，甘愿拒斥它），马克思指出了资本倾向于压低工资会使得商品销售市场在一定时候出现萎缩。亨利·福特很久以前就承认了这种两难局面，而与此同时他对雇佣工人实行日薪 5 美元的 8 小时工作日制度，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为了刺激消费需求。许多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 30 年代出现大萧条的基础。这在二战后激发了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而在强劲需求所带动的增长当中，收入之于财富的不平等状况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虽说收入相较于财富而言并不算多）。但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有赖于劳方权力的相对扩大、有赖于“社会国家”（皮克提的术语）的建设，累进税制为这种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皮克提写道：“1932 年-1980 年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美国联邦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平均达到 81%。”而这种税率并未抑制经济增长（这是皮克提驳斥右翼理念的另一项证据）。

到 60 年代末，许多资本家都开始意识到需要对劳方权力过大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把凯恩斯逐出伟大经济学家的庙堂，包括转投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供给学派，包括稳定税率（即使不能减税的话），而这最后一项就可以解构“社会国家”、约束劳方权力。1980 年后，美国的最高税率下降，资本收益的税率更是低得多（资本收益是超级富豪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就极大促进了财富向最上层 1% 的流动。皮克提向我们表明，减税对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所谓利益在社会阶层中自上而下传递的“涓滴效应”（这是右翼所挚爱的另一个理念）并不成立。上述一切情况都不是由数学规律决定的，这都是政治问题。

经历轮回之后问题变得更加迫切：需求在哪里？皮克提的体系当中忽视了这个问题。90 年代的信贷巨大扩张，包括拓展次级市场的抵押贷款，蒙混过了这个问题。但由此产生的资产泡沫注定要破裂，就像 07-08 年那样，那次泡沫破裂就击垮了雷曼兄弟公司及其所牵涉的信贷系统。然而在 09 年后，利润率就迅速恢复了，私人财富的进一步集中也恢复了，尽管与此同时其他的人们其他的事业都还限于困顿。美国现在的企业利润率是史上最高，企业积压了大笔现金而不愿花出去，因为市场环境不旺。

皮克提对数学规律的阐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数学规律所蕴含的阶级政治，但更多的是掩盖了这种政治。如同沃伦·巴菲特所指出的：“这里无疑有阶级斗争，我所属的富人阶级制造了这场斗争，并且不断赢得这场斗争。”说他们获胜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顶层的 1% 所据有的财富和收入，较之其他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然而，在皮克提的论述中存在一个核心难题，这是建立在他对资本的错误定义基础上的。资本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物【编者注：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归纳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它是一个流通过程，在流通过程中常常是“用钱生钱”，而限于通过对劳动力的剥削来生钱。皮克提将资本定义为私人、企业和政府所持有的所有资产的股份，这些股份可以进行市场交易而无论这资产是否正在被使用。这样定义出的资本还包括土地、房地产和知识产权，以及我的艺术类和珠宝类收藏品。如何确定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在技术上是一个难题，没有公认的解答。为计算出一个有意义的回报率 r ，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确定初始资本的价值。不幸的是，要确定初始资本的价值，总得依赖于用这资本所生产出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或者依赖于这资本在市场上的能卖出什

么价。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这是皮克提思考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一个循环论证基础上的。资本的回报率取决于增长率，因为资本的价值要通过它生产出的产品来确定，而不是通过用以生产出它本身的东西来确定。资本的价值深受投机环境的影响，还会被著名的“非理性繁荣”所严重扭曲，格林斯潘就指出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的特征。如果我们将房地产——更不用说对冲基金经理所投资的艺术收藏品的价值——从资本的定义当中去掉（将其包含在内本身根据就很薄弱），那么皮克提有关于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就将完全失败——尽管他对过去和现在的不平等状况的描述仍然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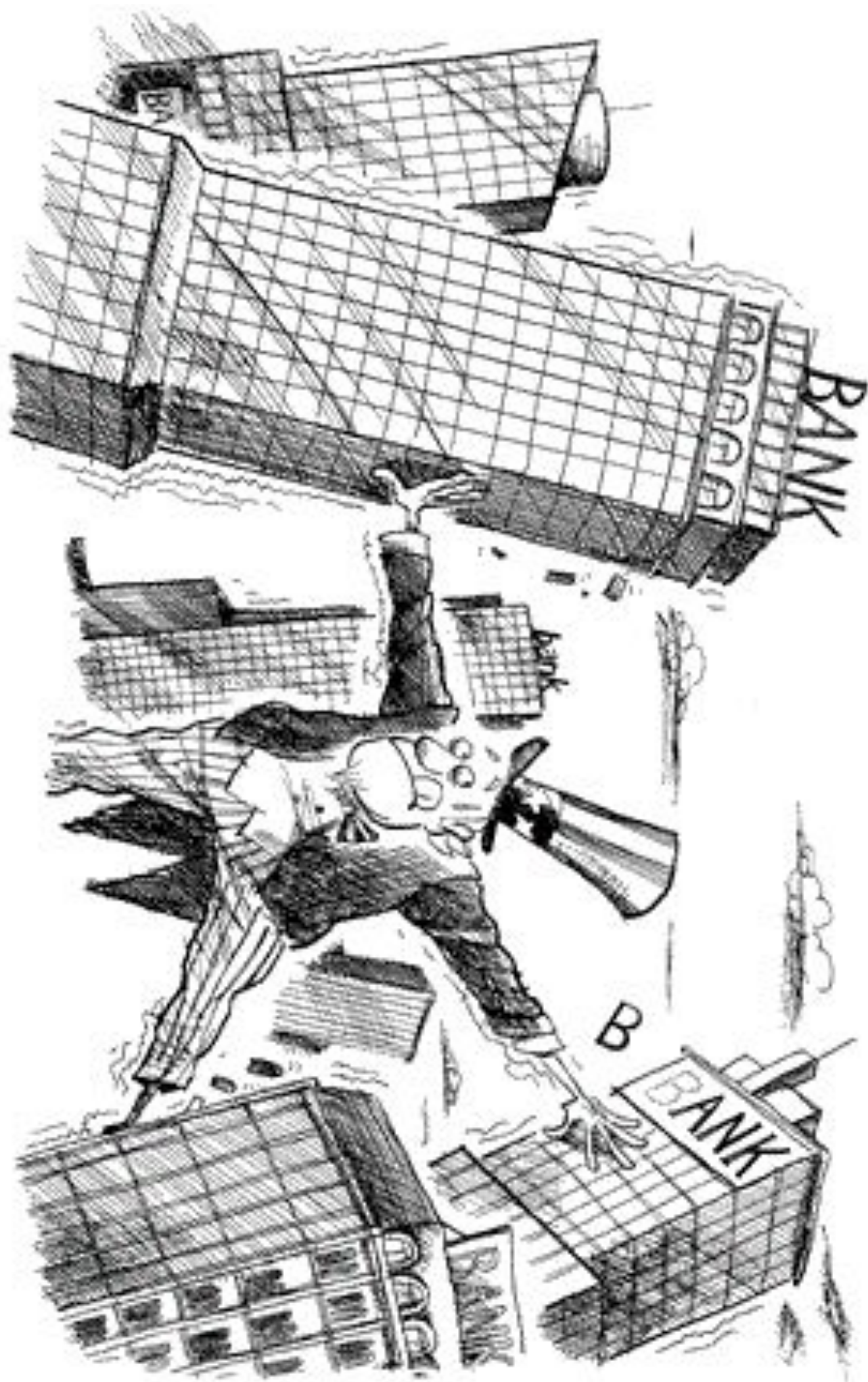
货币、土地、房地产和未用于现时生产的厂房与设备都不是资本。如果现时正在使用的资本的回报率较高，那是因为资本的一部分被从流通中抽出而不再投入。限制新投资的资本供应（我们现在正看到这种现象），确保了流通中资本的高回报率。创造这种人为的稀缺性并不只是石油公司用以确保其高回报率的专利：一旦有机会一切资本都会这样做。这就是资本回报率（不管它如何被定义和衡量）总是超过收入的增长率的那种趋势的基础。这就是资本确保其自身再生产的方式，而丝毫不顾其后果会引起人类其他人何等样的痛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生存方式。

皮克提的数据富有价值，但他对于不平等和寡头化趋势出现的解释则有着严重缺陷。他关于补救不平等状况的建议，如果不说是空想的，那么也是幼稚的。当然，他就也没有为21世纪的资本提供出有效模型。因此，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或者马克思的当代化身。

原文：

Afterthoughts on Piketty's Capital

<http://socialistworker.org/blog/critical-reading/2014/05/18/david-harvey-reviews-thomas-pi>



停滞与金融化——矛盾的本质



：周颖（译）

饱受谣诼李天师、

马秀英（校）

本文译自美刊《每月评论》66卷，2014年5月号

弗雷德·马格多夫是一位在美国佛蒙特大学专攻植物学和土壤学的荣休教授，也是一位资深的政治经济话题的评论员。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每月评论》编辑，同时也是俄勒冈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们两位是《金融大危机》（2009）和《每个环保人士所要了解的资本主义》（2011）的合著者，两书均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

但是在如今这样交易长期停滞的时期，如果工人除了维持现有雇佣关系之外看不到更好的前景，我们能对他们作何评论呢？是否资本和雇佣劳动体系就得继续存在下去呢？

——威廉·莫里斯¹



现在离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爆发已经六年多了，离官方所声称的萧条结束也有近五年了，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经济体仍然危机重重。在美国经济衰退时期的减少的就业岗位还没有完全恢复，经济依旧保持萧条状态。在欧洲，危机程度并未减轻，大量欧盟二线国家的经济依旧低迷，特别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²。日本是最后一个挤进发达资本主义核心圈的，成为了三巨头之一，它已经度过了所谓“失去的二十年”的缓慢增长和通货紧缩时期，并且努力尝试着把日元贬值和赤字开支相结合，以此来激发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恶劣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即使是某些主流的保守经济学家，也开始更多地谈论说目前的经济是处于低迷时期，而不是处于一个过渡阶段或者商业周期的扰动。在 2013 年 11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演讲上，前任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提出，现在是时候去回顾一下经济史上某些久不流行的“陈旧观念”了，“这些观念当初终结了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阶段”——长期停滞这个术语出自凯恩斯在美国的早期追随者阿尔文·汉森，指的是在投资机会逐步消失的饱和经济体中，增长缓慢的内在趋势。在最近的评论中，萨默斯指出，尽管金融泡沫如此之大，但在 2007–2009 年间的泡沫破裂之前，事实上却并没有经济“大繁荣”：“即使是大泡沫也不足以满足总需求。”³这表明，经济停滞的因素早已根深蒂固。几个月后他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为什么停滞有可能成为新的常态》说：“我们需要改变这样一个假设，即假设常态的经济政策和条件总会收获成果。”⁴

萨默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评论被保罗·克鲁格曼收录整理并发表在《纽约时报》的博客上。对于保罗·克鲁格曼来说，“经济面临长期停滞……已经不只是暂时的状况，而是已经成为常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只是为了经济的增长，总体来说还是需要金融泡沫和经济浪费的。用他的话说：“我们现在知道 2003–2007 年间的经济扩张是由泡沫所驱动的。在 90 年代后期的经济扩张你也可以认为是这样，事实上你可以说‘里根扩张’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失控的储蓄机构和商业地产的巨大泡沫所驱动的。”⁵

换句话说，根本问题是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引力，把经济引向缓慢增长或者停滞，萨默斯强调说，正因为如此，2007 年之前的巨大地产泡沫也“只能够驱动温和的经济增长”⁶。

萨默斯和克鲁格曼都未能对长期停滞做出理论性和历史性的解释。不仅如此，他们仅仅关注了流动性陷阱即利率几乎到达零的情况——流动性陷阱使得将来通过降低利率的货币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变得愈加困难⁷。然而，他们心理非常清楚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会导出什么样的政策结论：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要增加各种支出，从而使经济运作起来，首先是要扩大政府开支，但要以激发私人投资的支出为目标。从这些方面来考虑，不仅政府大量的赤字开支能够帮助实现更快的增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私两方面的“奢侈”开支，甚至是金融泡沫（到目前为止泡沫并没有给整个体系造成不稳定），也都能够帮助实现更快的增长。在此借用克鲁格曼的一句话：“私人支出不管完全的还是部分的浪费都是件好事，除非它会以某种方式给未来积攒麻烦。”⁸想要摆脱危机，就要给整个经济一种人为的刺激——即使冒着未来会带来远期麻烦的危险。

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个体系先前的一些经济辩护士如今却给出了消极的评价，即停滞深深扎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之中。而浪费和金融泡沫在这个背景下，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合理的”了。上述这些情况，很自然地促使人们去寻求更深刻的解释，解释清楚长期停滞，解释清楚长期停滞与当代金融扩张之间的关系。

停滞和资本的金融化

为了更加全面地找到“停滞-金融化”这对矛盾的根源，我们就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关注资本积累。保罗·斯威齐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篇演讲中的论证可以作为一个有益的历史起点，这次演讲作于 1980 年 5 月，是在罗纳德·里

根的当选总统 6 个月之前。当时斯威齐宣称美国陷入了资本积累的长期危机中，这个结论背后的论证逻辑是：

“理出一条思想线索：由米契尔·卡莱茨基所开创——在约瑟夫·施泰因德尔 50 年代早期的作品《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中完整地加以表述——在保罗·巴兰与我的书《垄断资本》（1956 年开始写作，1966 年出版）中给出了简化的版本。

我认为这个理论的最佳表述是‘积累过剩’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发展出了垄断资本主义，而在垄断资本主义当中存在着一种强劲的、持续性的、不断增长的趋势，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要多于所能找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就会是像凯恩斯的一些追随者如阿尔文·汉森在 30 年代所提出的那样，产出与收入的增长速度会下降或放缓，同时失业率上升，产能利用率下降。这种情况反过来会抑制投资、抑制经济增长。我刚才说这样的趋势是持续性的且不断增长的，理由是垄断的过程——马克思所谓的“生产的集中”——本身是持续性的，它是资本主义在整个本世纪的历史特点，今后也还会如此。我们可以总结说：经济越是被垄断，停滞的趋势就越强。”⁹

这意味着关于资本主义和增长的传统观点，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需要被完全改变，不再是把急剧增长当作常态、把经济危机当作例外，相反，“停滞是常态，好的时期则是例外”。因此，最需要在理论上加以解释的，不是经济危机和缓慢增长时期，而是“被支撑起的扩张和上涨时期。”¹⁰

造成停滞趋势的核心矛盾，是由于生产中产生的巨大剩余价值无法被吸收。这首先体现在资本积累过程的延宕，资本积累过程面临着投资获利渠道的持续缺乏，而这种缺乏则是由于经济中垄断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这种垄断程度加深对价格、利润、产出、收入和需求的影响。¹¹

导致停滞趋势的不仅仅是垄断资本，还有汉森所提出的工业的成熟度的问题。汉森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后来被斯威齐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进行了扩展。工业化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发展建成了生产的两大部类：第一部类（制造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制造消费品）。因此，积累起来的巨大资本存量在很少的净投资（即超出厂房和设备的折旧的投资）的情况下，就足能满足几乎所有常态的经济需求。正如汉森所说，这标志着“资本匮乏”社会到“资本充裕”社会的变迁。长期的影响，则会恶化剩余吸收（surplus absorption）的总体环境。¹²

因此，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原本外在于私人积累过程的刺激因素加以推进，包括政府开支、经济浪费和重大科技创新（特别是划时代的科技创新比如说汽车）。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斯威齐总结出了 6 个因素，这 6 个因素对于私人积累的常态运行而言是外在的，但在二战后初期它们对经济起到支撑作用：

- 1) 美国至高经济霸权的崛起，这为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扩张提供了平台，并导致了跨国公司的发展；
- 2) 在战争期间美国所形成的巨大的消费者流动性（储蓄）；
- 3) 对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经济的重建；
- 4) 由于战时经验而产生的新技术，包括电子设备和喷气式飞机；

- 5) 随着 50 年代州际高速公路网的建设而出现的美国经济第二次汽车化浪潮;
- 6) 冷战期间军事化和帝国主义的加速, 其中包括在亚洲地区的两场大的局部战争。

这些都是吸收剩余资本、并在一段时间内提升私人积累的强大外部力量, 但都“必然都受制于收益递减规律。或者换句话说来说, 这 6 个因素为全球资本积累过程独自或共同提供的刺激, 迟早是会衰减的。”经济趋势正好在“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转向下行, 这不只是巧合, “合乎逻辑的结论是, 1974-1975 年的周期性衰退比战后任何一次衰退都要更加尖锐”, 并且这次衰退表明停滞作为一种持久的力量, 再度出现在美国和世界经济当中。¹³

当斯威齐 1980 年的春天演讲《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时, 还没有迹象表明存在某种在短期内迅速解决停滞(当时称为滞胀, 因为同时出现的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办法。虽然在里根当选后不久开始了所谓的“第二次冷战”, 搞军力扩张, 但这还不足以加速积累引擎; 像大萧条所导致的那种提升了德国和美国经济的全面战争, 在核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时代, 即使是像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种大的帝国主义战争, 也无法实施了。

其他有可能经济刺激的来源, 就只能是 FIRE (“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 的扩张了。根据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所阐发的理论, FIRE 的扩张能通过部分吸收剩余资本来刺激经济体系。¹⁴然而, 在 1980 年的春天通过金融的快速增长来大力刺激经济看来不太可能。讽刺的是, 斯威齐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引用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艾伦·格林斯潘的话, 格林斯潘一个月前在《挑战》杂志 3 月-4 月号上论述说, 经济体系已经濒临连锁的债务违约, 非常危险, 并且预测房地产市场在价格飞涨之后会有一次暴跌。¹⁵

然而在接下来几年当中, 有越来越多迹象表明, 美国经济发生了一次巨变。美国发生了一次金融爆炸, 这标志着经济体系运转的一次质变——斯威齐在 90 年代称之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¹⁶从马克思主义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的角度来看, 这个过程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十分清楚的。¹⁷面对投资渠道的短缺, 企业和财富所有者获得的剩余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入金融部门, 寻找与使用价值之生产无关的投机的机会。金融机构提供出花样繁多的金融工具, 期货、期权、金融衍生品, 被日益增长的海量债权杠杆所放大的货币市场计划, 都可以进行各种打包, 这样金融机构就可以吸纳增加出来的投机需求。中央银行是最终贷款机构, 人们普遍预期, 只要整个孱弱的金融体系一有信用紧缩或金融崩溃的危险苗头, 央行就会干预。这个新的金融体系迅速推广到全球, 它凌驾于生产之上, 按自己的一套逻辑运行。

在 1983 年的 5 月, 哈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 题目是《生产和金融》, 该文认为当时所发生的金融爆炸是抵消停滞的主要因素, 金融爆炸表明历史进程当中有了一次质变——因为在经济减速(与商业周期的顶峰正相反)的条件下从未发生过大的、长期持续的金融扩张。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 当时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基础之上, 正在出现一个庞大的“金融上层建筑”。并且, 上述这整个过程很可能会持续很久。

¹⁸

两人也提及了日后人们谓之曰“财富效应”的那种现象, 也就是金融资产升值对奢侈品消费产生刺激, 他们指出:

“近几年来……金融部门能够在生产部门持续停滞的情况下处于繁荣状态。
当出现这种现象时, 金融部门对生产部门的有利影响, 就不局限它通过自身更

多的就业和更多的利润来为后者的产品提供更多的需求，它对后者还可以有直接影响，这种直接影响来自于整个经济体中家庭和企业所持有的金融资产的升值。

《摩根担保研究》的三月号中估算，‘消费者手中持有的股票、债券和流动资产的价值在1982年后半年间升值了至少5千亿美元。’这明显是金融部门的运作的结果[因为那个时候经济依旧不景气]。这应该会对消费需求造成一定的刺激影响，尽管在当前的整体经济环境下这种升值也会慢慢下降而不会按部就班上升。”¹⁹

财富效应带来的促进作用既刺激了财富所有者的消费需求，但也得看到它会增加个人负债——大多数工人的实际收入停滞，但房屋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和学生债务等等可以使得他们的支出增加。各式的债务如果量少的话，当然是保持经济体系运行顺畅的必需，但它们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各类债务在1980年占GDP的150%，到“大衰退”【编者注：Great Recession，指2008年所爆发的那次衰退】开始前，已经增加到GDP的350%以上。²⁰在此期间，家庭负债占GDP的份额从大约45%升至95%。为增加投机工具而产生的债务杠杆的巨大扩张，其份额已经远超过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这是这些年来发生的金融化过程的本质。

对萧条与金融化之间辩证关系的所有论述都被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收录在1987年出版的《萧条和金融爆炸》一书当中——就在这一年，里根总统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²¹就在这一年，发生1987年股灾，整个世界经济为之震动，濒于全球性的崩盘，金融局势面临背水一战，格林斯潘所领导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的第二天早上发表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声明，指出“美联储已经准备好提供流动性，来支撑经济和金融体系”。²²美联储用印钞权来为之背书，避免了市场全面崩溃。

然而这意味着未来问题会变得更严重。这一点天数已定，因为金融化是對抗停滞的一种途径，但它会加剧经济体系的结构危机，它没有消除停滞的根源。在1987年股灾一周年之际，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说：

“现在看来，金融体系再发生一次崩盘显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你也或许会问，当局就不会挺身而出在危机得逞之前就把它扼杀掉吗？对，当局当然会出手。现在当局出手已经是标准的操作流程了，我们不能排除当局再次出手可以像87年股灾后一样取得成功，但这种成功本身是在很含混的意义上说的。就算有这种所谓的成功，我们也会再次经历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会更加严重、更加不稳定。这样，在下次崩盘或者再之后某一次崩盘，当局出手终究会不再成功……到那时，就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况，我们就会面临从这前所未有的境况当中产生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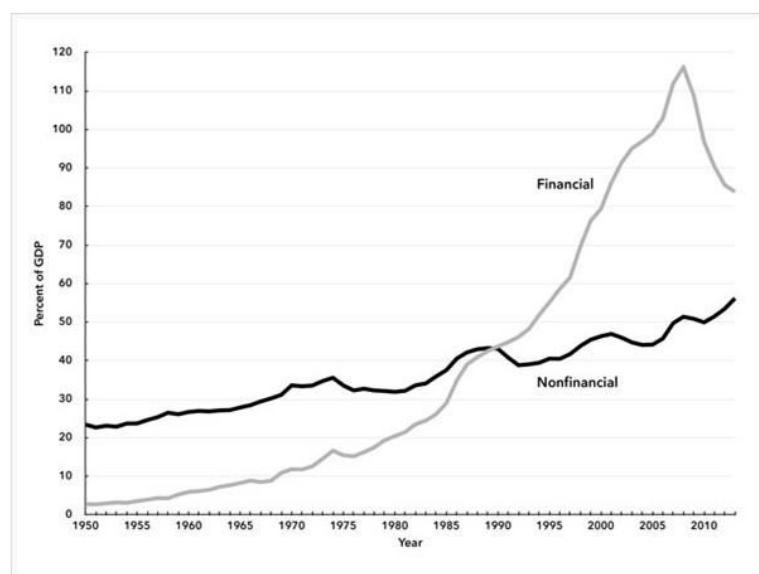
今天，无可否认上面的论述已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扩张是由金融泡沫所推动的，这种扩张会导致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但在危机遍及整个体系之前基本是被包藏着的。从1987年股市崩盘到金融大危机的20年中，已经有了严重问题的迹象：80年代末的储贷银行丑闻；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期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还有2000年网络经济的泡沫²⁴。来自预算和政策要务中心的贾里德·伯恩斯坦在描述近几十年的经济状况时提到：“最近几个商业周期的特点是无法摆脱洗发水周期——一起泡沫，泡沫破裂，重新起泡沫。”²⁵

由于 2000 年网络经济泡沫已经破裂过，由于美联储和其他国家央行多年来向经济体系中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从而扭转了大部分财产所有者的危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军事开支激增和房地产泡沫增长的助力，当时还只是美联储委员的本·伯南克在 2004 年开始鼓吹“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的概念。这个概念代表着中央银行驾驭商业-财政周期的显著能力²⁶。两年后，即 2006 年，伯南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他立即上调利率，导致了 2007 年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并终结了人们对“大缓和”的所有幻想。

结果就像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所预先警告的那样：“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况，……从这前所未有的境况当中产生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尽管在把大量纳税人的钱被投入企业的口袋之后，彻底崩盘得以避免，金融财富总的来说被保护下来，但损害毕竟已经造成。金融体系最终稳定于一个高位，固定资产得以维持，但银行放贷减缓，并且由于资本形成【编者注：Capital Formation，即投资生产出新的生产资料】持续疲软，这就阻碍了再度出现大泡沫来推动经济。货币政策在零利率（流动性陷阱）的条件下是极度失效的。结果就是在“实体经济”中的潜在停滞逐渐浮出水面，看来只有进一步的金融泡沫能施以援手，但目前的金融泡沫本身已经陷入困境。

金融化浪潮的大小可以见图一，图一展现了非金融和金融企业债务占 GDP 百分比的变化趋势。即使非金融企业债务占美国 GDP 的百分比在 80 年代开始有大幅度的上升趋势，但金融企业债务（就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代理机构、抵押贷款机构、对冲基金而言）的飙升，才是 1980 年到 2007 年间金融化浪潮的主流，并且主要是后者才促进了经济缓和，这期间多数年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下降的。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金融公司债务从 GDP 的 20% 增加到令人震惊的 116%。而 2007 到 2009 年间金融负债占 GDP 百分比的急速萎缩，则使得能够矫治停滞的金融化自身变得弱化，这种情况持续至今。

Chart 1. Nonfinancial and Financial Corporate Debt as a Percent of U.S. GDP



Source: Outstanding debt of financial and corporate nonfinancial business from U.S. Federal Reserve's Flow of Funds; GDP from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FRED Database.

图一：非金融和金融企业债务占 GDP 的百分比

浅色线：金融企业债务

深色线：非金融企业债务

我们所谓的“停滞-金融化”陷阱，它作为近几十年经济史的特征，正是由上述这种情况所导致的。²⁷过去几十年里要是没有金融泡沫的话，资本主义的增长无疑会减缓。但是就像所有的泡沫一样，金融泡沫也会一直扩张，直到最后破裂，并且当这些泡沫破裂的时候，停滞就会再次出现。

长达几十年的金融化浪潮看来目前已经急剧减缓。特别是金融企业已经减少了它们的债务杠杆和贷款占 GDP 的份额。因此，尽管金融体系几乎完好无损地得以幸存，财富也仍然在金融部门继续积累，但这可以看作是金融化过程一个相对的下滑，减轻了其近几十年来作为经济的主要刺激者的作用。正如我们在 2009 年的书《金融大危机》中所说的那样，2007-2009 年的崩盘所揭示的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金融化的总危机”的问题，在这个总危机之外还“隐藏着停滞的幽灵”。

上述这一切说明，这个过度积累、不平等、危机和停滞的体系之中，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内部机制。从这一方面来说，金融资产的膨胀作为近几十年经济史的一个特征，可以看作是由生产本身停滞的趋势所导致的——因此，停滞才是今天我们需要关切的主要经济问题。²⁹

如今的停滞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如今由于金融化过程的减弱或至少暂时减弱，其陷入停滞这一点已经是很显然的了，那么，我们还有必要来更深入考察一下停滞意味着什么。虽然金融危机在最近的经济文献中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人们对经济停滞及其影响，还理解得很不到位。

从工人阶级的视角来看，停滞表现为就业困难，工人不涨工资或工资涨得慢，但要注意，企业的上层职员和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情况与此相反，这一点我们在《美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作过讨论。³⁰就业市场的变化表明经济停滞的回归。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美国官方失业率平均是 4.6%，而 1970 年到今天，失业率平均达到 6.4%。除了失业增加，不充分就业也增加了，职工总数的增幅也更加不稳定。

既然经济体系的趋势是要扩大流向企业和财富所有者的剩余（价值），那么可以想见，收入和财富将会更加集中。事实上就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

- 1) 由于企业和富裕家庭所持有的剩余不断增加却无法被吸收，从而就降低了增长率，导致了停滞。
- 2) 既得利益者为了应对经济放缓，就会竭尽所能提高他们占有社会产品的份额，以维持其个人资本的回报率。
- 3) 这就导致了在经济金字塔顶端的剩余集中变得更大，从而加剧了剩余吸收的总问题。

经济放缓——或者某些人所谓的“大停滞”，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 80 年代初期——就这样使得财富所有者占有了更大块的经济蛋糕，而工人只得到很小块。³¹这一点不仅可见之于收入和财富的统计数据，而且饥饿人数增加、健康状况下降、无家可归人数增加、个人破产和抵押贷款违约增加、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失去房子等等，也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对大部分工人阶级，特别是作为劳动后备军的大量的失业者和未充分就业者来说，这些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经济衰退期间所减少的就业岗位要恢复起来非常慢，这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

题，导致所谓的“缺少就业岗位的复苏”（见表1）。最近几次衰退之后，经济都增长了，但并没有很快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满足想要工作和需要工作的人。每个恢复阶段，都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来恢复衰退期减少的就业岗位，这个现象在过去三十年中愈演愈烈。

Table 1. Years to Recover Jobs Lost During Recession

Year recession starts	Years to recover lost jobs
1940s–1970s	< 2.0
1981	2.3
1990	2.8
2001	3.9
2007	6.1+*

* Lost jobs not fully recovered at time of writing.

Sourc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 “Nonfarm Employees,” series CES0000000001, <http://data.bls.gov>.

表一：恢复经济衰退期间所减少岗位所用的年数

左栏：经济衰退开始的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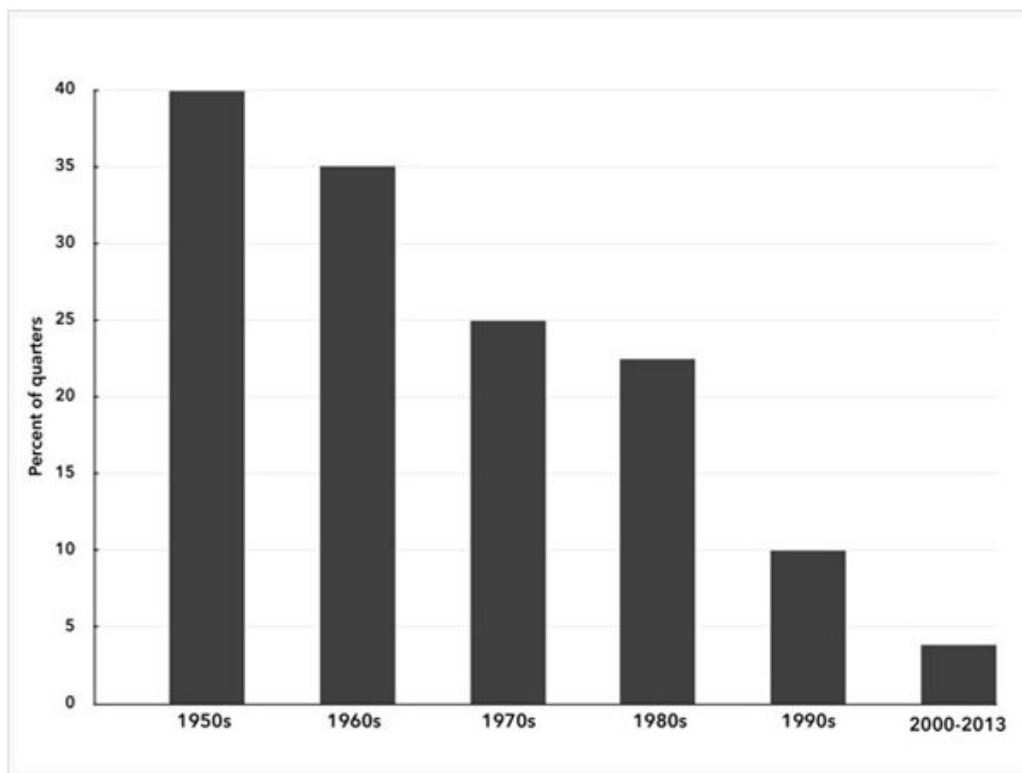
右栏：恢复就业岗位所用的年数

注释：在写作本文时，所减少的岗位还未完全恢复

如果比较衰退期之后 GDP 的增长，可以看到相同的趋势。在二战后的二十五年间，三大经济体从衰退中迅速恢复，也使得工作岗位迅速恢复。但在最近三次衰退以后，经济恢复迟缓，这三次恢复分别开始于 1990 年（存贷银行危机之后）、2001 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2007 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

比较 20 世纪 50、60 年代和随后几十年里的经济增长，实际 GDP【编者注：按可比价格计算的 GDP】的增长率在 50、60 年代高于 4%，到 70 至 90 年代则下降到 3% 左右，在 21 世纪头十年下降到不足 2%。（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 30 年代实际 GDP 的增长率平均为 1.3%。）GDP 是每季度都有报导的，这样就可以从中分辨出短暂的急剧增长。因此我们可以确定，GDP 的年度增长率下降，并不是因为这些年增长缓慢的季度变多了，而是由于增长急速的季度变少了，在那些增长急速的季度当中，资本能够高速积累。实际 GDP 的高增长率在 20 世纪的 50 和 60 年代是非常常见的，其间有 35%–40% 的季度是急速增长的，而相比之下 70 和 80 年代只有 20%–25%，90 年代是 10%，在 21 世纪头十年不到 4%（见图二）。

Chart 2. Quarters with 6 Percent or Greater Real GDP Growth (Annual Basis)



Sou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Table 1.1.2. Contributions to Percent Change in Real GDP.

图二：实际 GDP（与上年同比）增长大于等于 6% 的季度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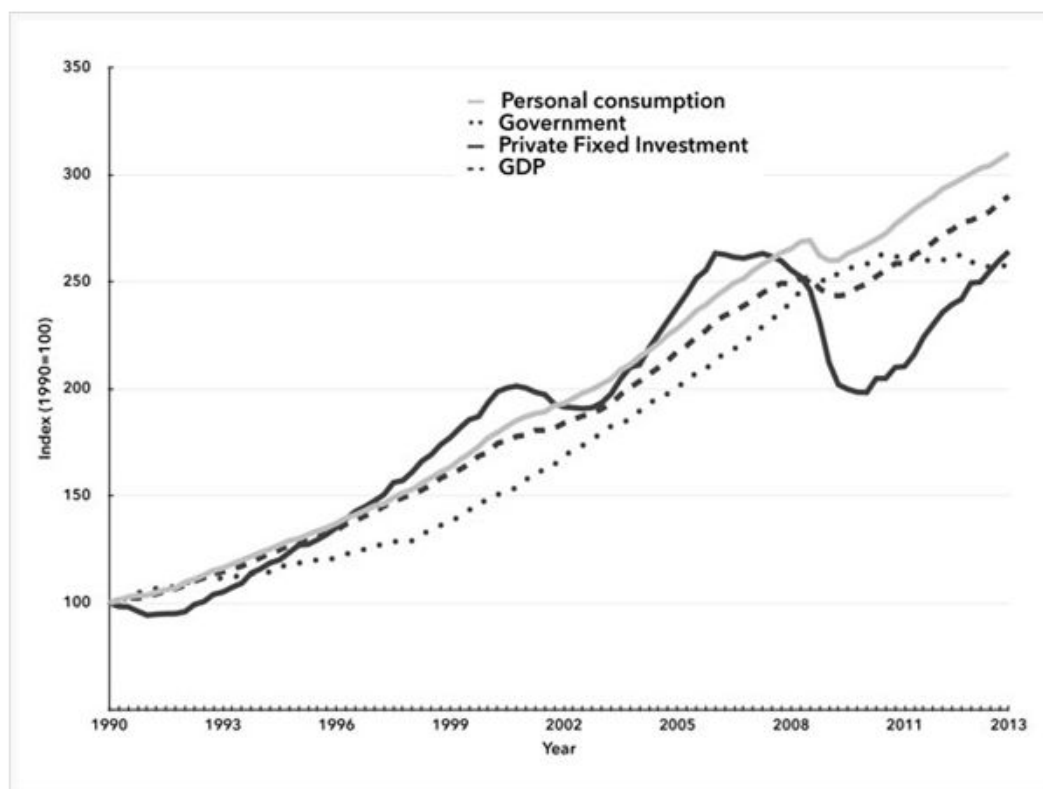
美国经济分析局估算了各领域对 GDP 变化的贡献。为了使下一个时段生产出比此一时段更多的商品和服务（GDP），下列这几个领域的总的效应必须为正（增加）：

- A. 企业在工厂和设备方面投资的资本（投资本身创造就业岗位，而投资本身具有乘数效应，为了利用新增的生产力，会相应地有扩建或新建的企业来雇佣工人）和存量资本的总和。
- B. 民众在日用消费品、服务和住房等方面的个人花费。
- C. 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
- D. 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消费和投资支出。

换句话说，GDP 的变化是 A+B+C+D 变化的总和。总需求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C 项净出口除外）可以见图三，图三涵盖了从 1990 年至今最近三次经济衰退期所在的时段。按当年价格计算的 GDP（图三中各线都依据当年价格）很少下降，但扣除通胀因素之后实际就是下降的了。正是实际 GDP 的下降才能界定衰退。但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即使是名义 GDP 也下降了。我们可以区分出没有增长、缓慢增长、温和增长和急速增长的时段，并估计出三个领

域对 GDP 的贡献。（特别需要注意，这些统计数据都是事后给出的，因此我们无法事先从中得知因果联系，例如不能指导我们采取和实际的储蓄/投资相反的做法。）

Chart 3. Index of GDP and Government*, Personal Consumption, and Private Fixed Investment Expenditures, 1990–2013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and gross investment.

Sources: Indexes derived from Bureau of Economic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s Accounts (NIPA) Table 1.1.5 and GDP.

图三：GDP、政府支出*、个人消费支出、私人固定投资支出指数（1990 年-2013 年）

浅色实线：个人消费

深色实线：个人固定投资

点状虚线：政府支出

线段虚线：GDP

注释：政府支出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总额。

尽管个人消费非常庞大，约占 GDP 的三分之二，但它在各个时段变化不大，与之相比投资则变化很大（图三和表二都清楚表明了这一点）。政府支出（地方、州和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贡献垫底。然而，这个“底”从大衰退以来占 GDP 的比例却还降低了，因为紧缩削减被用得越来越多，限制了公共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增长。（需要注意，包括失业补偿在内的转移支付，是不含在图三所示的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里面的，因为他们只是从私营部门的一部

分转移到另一部分，不属于政府自身支出。但是，这种转移的存在有助于支撑消费，从而对经济低迷时期的总体有效需求有所帮助。）

Table 2. Percent Contributions to Real GDP During Quarters with Varying Growth Rates, 1947–2013 (expressed as annual values)*

Real GDP growth range (annual basis)	Gross private domestic investment	Personal consumption	Net exports	Government (federal for defense)
<0%	-3.8	0.2	0.4	0.2 (-0.2)
0–1.9%	-0.7	1.6	-0.2	0.3 (0.0)
2.0–3.9%	0.6	2.0	-0.1	0.5 (0.1)
4.0–5.9%	1.6	2.6	0.0	0.6 (0.1)
>6%	4.3	3.5	-0.5	1.3 (0.6)



* Of the 267 quarters, from second quarter 1947 to the fourth quarter 2013, 15 percent had <0 percent real GDP growth; 17 percent had from 0 to 1.9 percent real GDP growth; 29 percent had from 2 to 3.9 percent real GDP growth; 17 percent from 4 to 5.9 percent real GDP growth; and 22 percent were >6 percent in real GDP growth. During the entire period real GDP growth averaged 3.2 percent on an annual basis and the contributions to this of gross private domestic investment was 0.8 percent, personal consumption averaged 2.1 percent, net exports averaged -0.1 percent,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veraged 0.6 percent (of which federal spending for defense was 0.2 percent), and change in private inventories averaged 0.1 percent.

Source: Calculated from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Table 1.1.2 Contributions to Percent Change in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表二：实际 GDP 季度增长的百分比（1947 年–2013 年，以当年价格计算）

第一列：实际 GDP 增长范围（与上年同比）

第二列：国内私人总投资

第三列：个人消费

第四列：净出口

第五列：政府支出（联邦国防支出）

注释：从 1947 年第二季度到 2013 年第四季度 267 个季度中，有 15% 的季度实际 GDP 增长 < 0%，有 17% 的季度实际 GDP 增长在 0~1.9%，有 29% 的季度实际 GDP 增长在 2%~3.9%，有 17% 的季度实际 GDP 增长在 4%~5.9%，有 22% 的季度实际 GDP

增长>6%。按当年价格计算，整个时段内实际 GDP 增长平均达 3.2%，其中国内私人总投资的贡献为 0.8%，个人消费贡献平均为 2.1%，净出口贡献平均为-0.1%，政府支出贡献平均为 0.6%（其中联邦国防支出为 0.2%），私人存量资产变动贡献平均为 0.1%。

虽然个人消费和政府支出非常重要，但私人投资对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变化最大，是影响其未来增长前景的最关键因素。在经济衰退期间私人投资的下降也就拉低了 GDP 的增长。反之，在经济复苏期间急速增长的个人投资刺激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急剧增长。

剩余吸收和资本投资

企业投资或曰资本积累虽然几起几落，总的说来也还是放缓了，普遍低迷许多年的一个原因是经济中的闲置产能。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一段时期，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保持在 85% 左右。但在 80 年代下降至约 80%，而在 90 年代只是略微上升到大约 81%。在过去的十年里（至 2013 年）跌至平均 75%。产能大量闲置的企业与通常不会对新产能进行大的投资。³²

因此，美国企业在国内外坐拥万亿美元（海外美国跨国公司估计持有 2 万亿美元，因为税收的关系这些钱不会流回国内）。美国公司手里的这堆现金或相应额度的资产从 1995 年到 2010 年每年积累 10%，产生了近 5 万亿美元的储备，大约相当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³³2013 年第四季度，各公司的税后利润占 GDP 的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 11.1%，大约是 90 年代平均占比的两倍，这已经使得《华尔街日报》出来表态，高利润率伴随低投资是经济的一个大问题。³⁴

有一点可以说明剩余吸收、特别是涉及到投资机会的剩余吸收的问题现在已经变得有多严重，即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的私营企业经济的营业净盈余（扣除了大部分成本和折旧）平均占 GDP 的 24%，在 2012 年已经超过 4 万亿美元。³⁵

当企业真正来用这笔钱而不是简单地积累现金，它通常会去向股东分红，会去收购其他公司，要不然就怀着抬高股价的目的来购买公司股票：这纯粹是投机。2013 年各企业动用了 7550 亿美元来回购股票。³⁶巨大的经济剩余未能被吸收而被用来做投机，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会比其可能的增长率来得低。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如果企业仍继续投资的话，是会使劳动力闲置、单位生产成本降低、企业所拥有的总剩余增加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资本形成，是无法使经济摆脱整体低迷的。

资本的过度积累使得资本本身成为阻碍自己发展的屏障，但过度积累是一个总体趋势，而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因此很自然可以得出说，作为经济引擎的投资，它在此期间增长趋势会大幅减缓。实际非地产固定资产投资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从 60、70 年代到现在都在下落，特别是在建筑和设备上的投资（见表三）。

Table 3.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in Real Gross Private Nonresidential Investment, 1960–2013 (percent)

	Total	Structures	Equip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ducts
1960s–1970s	6.4	4.7	7.6	6.9
1980s–1990s	5.2	1.3	6.4	8.5
2000–2013	2.3	0.4	3.4	3.3

Sou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Table 1.1.1. Percent Change From Preceding Period in Real GDP.

表三：实际私人非地产投资总额的平均年增长率，1960 年–2013 年（百分比）

第二列：总值

第三列：建筑

第四列：设备

第五列：知识产权产品

应该强调的是，上表所指的是非地产投资**总值**，其中的资本支出包括折旧基金和新增净投资。同时，投资**总值**总的来说已经停滞，非地产固定投资**净值**的占比下降，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平均要占总值的将近 40%，在过去（有案可查的）十年（2003–2012）下降到了不足 16%——这个现象被称为“净投资萎缩”。³⁷投资总值越来越多地是被用于折旧基金，仅仅是为了替换消耗的旧厂房和设备，用于新增净投资的是越来越少了。由于替换性投资所带来的新厂房和设备肯定比旧的更有效率，其结果是在新增净投资很少或根本没有的情况下，生产能力就扩大了，大大限制了新增净资本形成的渠道。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过度积累的总问题在恶化。³⁸

有出路吗？

现在还根本无从知晓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在什么时候、通过何种方式来突破停滞–金融化陷阱，可能根本就突破不了。萨默斯在 2014 年 1 月的《华盛顿邮报》上说，“以长期经济停滞为特点的经济，可能本身就是倾向于出现泡沫。”³⁹这意味着如果缺乏其他外部推动力量，经济的趋势就是会在完全停滞和金融繁荣之间来回摇摆，金融繁荣伴随着猖獗的投机，会产生一段时间的温和增长，直到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而这时原先被一定程度上搁置的停滞就会再次登场。

新增的资本形成是经济中最能动的部分，是能对未来增长发挥最大影响力的部分，但它萎靡不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企业把大部分开支用于折旧基金，而不太愿意新增产能。尽管一种或一组新技术可能会导致停滞的突破，但这样的新技术必须得是足够重大，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必须足够广，这样才能造成大幅度的经济内驱式增长，大幅度地创造就业。

电脑和数字时代的其他创新无疑改变了我们交流、工作和购物的方式。然而当着新型企业在此类技术基础上逐步形成，这些企业却并不会雇佣大量的员工，这和以前的变革性技术（例如如汽车）形成了对照。泰勒·考恩在《大停滞》中写到：

“大多数网络活动不会创造像以前的技术突破所创造出的那样多的就业岗位和收益。当福特和通用汽车在 20 世纪早期逐步壮大时，它们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并把底特律建设成了美国一流城市。今天 Facebook 创造了许多窥探的快感，但该公司没有雇佣很多人，也并没有为 Palo Alto 【编者注：Facebook 总部所在的小城】作多大贡献，大量‘工作’或多或少都是由软件和服务器自动运作的。甚至可以说，真正的工作是由用户来做的，他们在空闲的时间以休闲的方式做了这些工作。”⁴⁰

2013 年苹果在全球已雇佣了约 80000 名员工，谷歌（其主体企业，不含摩托罗拉和其他子公司）雇佣了约 40000 名员工，Facebook 雇佣了约 4600 名员工。⁴¹ 2014 年初，Facebook 花了 190 亿美元买下 WhatsApp 公司，后者是一个拥有五十五名员工的移动信息公司。事实上，电脑、智能手机和先进的机器人消灭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要么直接取代人，要么是通过业务外包来取代人），而为了生产这些东西所直接创造出的就业岗位，多数都是位于其他国家的。大型电子零售商也会造成就业岗位的大量净流失。“地方自力更生研究所”

（Institute for Local Self-Reliance）对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最新研究表明，在华盛顿，实体零售商要获得一千万美元的收入需要雇佣 47 人，亚马逊则只需雇佣 14 人。”⁴²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估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移动机器人的发展，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就业岗位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受到威胁。⁴³ 无论这些技术创新对就业的净效应如何——现在看来是负效应，而且是变得越来越负——它们都无法使得经济增长再次走上快速轨道，力度广度不够，作用形态也不对路。

德国经济相对比较强劲，部分原因是德国成功实现了净出口。但是不可能所有国家都成为净出口国，这在逻辑上和数学上都是不可能的。美国自 80 年代初以来，除了 90 年代早期一个很小的时段（那时正好赶上经济衰退），一直都是商品和服务的净进口国。

前文已经说过，停滞的某种临时性的“解决办法”是金融体系的再次扩张，但是危机的影响仍挥之不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金融问题的主流观点是：一段时间的“紧缩”是必要的，有了紧缩，“实体经济”中的现金流就会重新系统性地流回金融部门，增加金融部门的流动性，同时金融会在一段时间内缓慢地去杠杆化，资产负债比会增加。这样一个总体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是需要减少政府债务，从而加强国家的能力，发挥金融精英眼中国家的主要作用：作为企业的最终贷款人，并被认为是“规模够大不会倒闭”。假设总的资产负债比发生的这种变化最终能够给经济带来又一段时间的金融性扩张，但是，这样的金融重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会以多种方式造成消极影响，加剧体系中的过度积累趋势——同时未来的泡沫可能会比以前更大、更危险。

改革派则倾向于认为，金融改革是对这些问题的直接解决办法，改革包括对金融体系进一步监管——这种观点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认为最近的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过度投机行为，而不是在于资本积累过程本身的弱点。这种观点未能认清金融化浪潮在 80 年代到 2007 年间对提升经济所起的作用。在这个时期，放松金融监管并非如某种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单纯的贪婪和腐败的产物，同样，放松金融监管也不是简单地基于错误的经济原理，毋宁说，放松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把现有的金融泡沫进一步扩大。没有哪个金融监管者希望

有大的金融泡沫在他们的监管之下破裂——因此当金融机构要求放松监管以便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允许他们向新的、以前受限制的市场发展时，它们得到了所有想要的，而且常常比它们所要的还多得多。

托马斯·帕雷在《从金融危机到停滞》中把这种情况叫作“金融改革悖论”，因为这种改革实际上“过度地依赖于停滞的趋势……通过限制[金融]繁荣……来来稳定[金融]体系……”克鲁格曼直言不讳地说，“即使改进后的金融监管也不必然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可能会在增加支出无论如何都对经济有好处 的情况下，抑制不负责任的借贷”。这些都造成了对放松金融监管的制度性偏好，抵制了有效的改革。⁴⁴

那么，我们的意思是说什么都做不了吗？远非如此。我们的观点是说，在总体的结构性危机恶化、减弱了纯粹改良性的解决办法的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存在能对体系适用的简单选项。尽管一些人倡导凯恩斯主义的增长路径，政府提高有效需求从而引导促进就业——如今最受欢迎的版本是政府支出于环保岗位和替代能源技术上——但这种路径从今天高度金融化的资产阶级和世界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不再是一个可接受的政策了。⁴⁵

今天的财阀体系就是食利者获胜（毋宁用凯恩斯的话说，是被安乐死）的体系，这个体系统治着国家和经济。⁴⁶正是在这个体系当中，跨国公司所实施的全球劳动力套利

（global labor arbitrage）成了全世界的生产规则——这种套利是说，把工厂搬迁到世界上单位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地区，而这就使得帝国主义租金【编者注：imperial rent，指发达资本主义凭借其垄断地位，从资本主义外围（落后国家）攫取的超额利润】被少数巨头公司所占有。⁴⁷在这种条件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就业增加导致总需求和总利润的增长，总需求和总利润的增长导致充分就业的经济——很少有用武之地。

持续充分就业的经济被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的威胁，因为这增强了工人的力量。⁴⁸这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是一个不祥之兆，凯恩斯的年轻同事、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有一个著名的评论：“有能力和意愿改良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缺陷[例如持续失业]的政府，就一定会有意愿和能力去完全废除这个体系。”⁴⁹

国家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则构成了另一个改革策略，人们通常是根据凯恩斯的理论从促进有效需求和经济增长来论证这个策略，但这个策略也是面临着许多同样的矛盾的困扰。低收入家庭所要花费的收入比例通常要比非常富有的家庭高，因此如果通过税收和社会工程或通过增加工资（这将减少流向富人的利润份额，但如果经济扩张则不会减少总利润），让钱从富人手中转移到低收入工人手中，经济从理论上说就能够受到刺激。尽管增加最低工资在政治上似乎是可行的，并且这会帮助约 1600 万工人，但这种增加就算实施了，和经济总量比起来也规模太小，无法对收入分配造成显著影响，更不用说刺激总需求了。试图经由现有秩序来实施改良，例如增加高收入群体税收并把这些资金用于社会，就只能对体系作温和改革，完全避开核心问题即具有阶级性根源的资本积累。因此，即使采用了这些改良，最终也无法成功——除非去关注过剩吸收的问题。不用说，试图达到收入平等的任何举措，都是和工资-利润体系不相容的。

资本主义的矛盾则是这个体系可以接受的，或者说矛盾是符合体系的逻辑的。但现在矛盾无法摆脱，并不是说由下层反抗所造成真正彻底的变革就无法实质性地提供一个更好选项。事实上，正如伊斯塔法·梅萨罗斯在《超越资本》所评论的，在当今社会中我们所需要的“建立社会控制新制度的那条路”，“必须经过从资本力量中获得彻底的政治解放”。

这意味着与体系不一致的其他政治-经济逻辑也要被纳入考察范围。那么，这种彻底的措施，它们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非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会是什么样子的呢？⁵¹

托马斯·皮克提在其颇具影响力的新作《21 世纪的资本论》中，把他所认为的当今经济的关键矛盾，（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称为“无限积累的原则”。正是这个原则推动了资本主义当中无尽的积累，而这种积累导致了今天“高度集中的财富”和因此而产生的所有不合理现象。皮克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用的乌托邦”就是设计一个“全球资本税”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个人财富的年度累进税”。⁵²米哈尔·卡莱斯基在 1937 年首次全面论证了用财富税来对抗垄断积累。⁵³今天皮克提认为，要代替反资本主义的实际革命，资本税的策略是唯一可能。他主张这样一种全球资本征税——或者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类似的税收——不仅将抑制在经济金字塔顶端聚集越来越大的财富，抑制这种不良趋势，而且会创造一个满足社会需要的“社会状态”。⁵⁴

要达成这样的结果，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径直关注原初的社会目标，即把人和环境的最基本需要置于利益之上。而上述“替代停滞的方案”，即是指“为失业的人们提供工作，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为我们所有人提供足够的医疗保健、收入保障和良好环境”。要实现这部分人、那部分人以及全民的目标，是其他的一些利益只能是处于从属地位。⁵⁵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其后期出现过这样的要求，罗斯福新政当中比较激进的部分即“经济权利法案”，就是这沿着这种思路提出来的，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当中，1963 年的向华盛顿进军也导致了 1965 年通过“自由预算”（Freedom Budget）。最近保罗·勒布朗和迈克尔·耶茨在《为所有美国人服务的自由预算》一书中，试图在当初那个预算的基础上复活这种思路。他们提出了十二个基本目标，这些目标必须得要求一个我们时代的“新自由预算”：“（1）充分就业；（2）所有雇员具有充足的收入；（3）那些不能或不应该工作的人具有稳定的适量的最低收入；（4）充足和安全的住房；（5）所有人获得卫生保健；（6）所有人获得教育机会；（7）安全和广泛的交通基础设施；（8）安全和广泛的社会治安；（9）所有人获得食品安全；（10）可持续发展的环境；（11）所有人具有自由而不断丰富文化（艺术、公园、体育、娱乐）；（12）减少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以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⁵⁶很明显，这就要求需要社会非军事化，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制度。

勒布朗和耶茨认为，在美国的环境下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单纯从财政上说完全可以。他们援引经济学家琳达·比尔默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估算说，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上花费了 3 万亿美元；而他们指出，为了应对大衰退所作的财政刺激，联邦政府的支出是数千亿美元；他们还指出，美联储因为金融大危机，通过高效率地印钱，向金融部门的口袋里注入了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此外，还可以改变几十年来对削减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做法。⁵⁷

然而，今天的力量对比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偏向资产阶级，这就保证了不会发生自上而下推进上述目标的举动。沿着那些目标方向上的彻底变革，必将主要源自底层，并且必须要有斗争，要有具备了革命性思想的斗争。

全人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再现为一种世界历史力量的，所以实际上从资本主义本身所提供的更广泛的历史视角来看，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也是可预见的，这种变革来自于由普遍必然性所驱使的群众性行动。这种针对体系的激进反抗可能最初源于南方世界（汤因比所谓

的“外部无产阶级”)。但中心的广泛高潮(“内部无产阶级”)也是必要的。如果通过这些斗争使游戏规则得以改变,或者游戏本身被取代,那么,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将会出现,这个世界中的社会具有以前无法想象的可能性。

不过我们需要补充说,在当今世界,这样的大的社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将不得不受到限制,变革必须受制于地球环境所决定的增长极限。在资本主义“要么增长要么灭亡”的体系当中,积累必须快速扩张,以便对劳动力保持充分需求,从而实现近乎充分就业的经济。然而,经济增长给地球造成了额外的压力,并且正因为这个原因,永远增长是不可能的。一个增长率对“健康”的经济来说**太低**,同时对维持和地球的可持续关系来说又**太高**,这之间存在一个矛盾,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分析有矛盾,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这个矛盾也向我们强调了一个事实,唯一摆脱世界当前困境的出路,是彻底的体系变革。⁵⁹

因此,我们的时代危机有两个来源,我们把这两个来源放在一起考察,世界历史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必需的了,这个变革不仅解决经济停滞对工人的影响,也解决对所有生物来说最紧迫的问题:人类和无数其他物种居住的地球正在快速毁灭。在这种情况下,为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无限积累原则**,就要让位于为所有生物服务的**充分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enough)——这一原则将会贯穿“人类世世代代”。⁶⁰

注释:

1. William Morris, “The Depression of Trade,” in *The Unpublished Lectures of William Morri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3.
2. 有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详见 Costas Lapavistas, *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 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 (London: Verso, 2013), 288–300.
3. Lawrence Summers, Speech to the [IMF Fourteenth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 November 8, 2013, <http://larrysummers.com>; Alvin H. Hansen, *Full Recovery or Stagnation?* (New York: W.W. Norton, 1938), 289; and “The Stagnation Thesis,” i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ed., *Readings in Fiscal Policy* (Homewood, IL: Richard D. Irwin, 1955), 540–57. See also John Bellamy Foster, “What Is Stagnation?” in Robert Cherry, et. al., *The Imperiled Economy: Macroeconomics from a Left Perspective* (New York: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7), 59–70. On the origins of the stagnation debate in the 1930s see William E. Stoneman, *A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Garland, 1979).
4. Lawrence Summers, “[Why Stagn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5, 2013, <http://ft.com>.
5. Paul Krugman, “[Secular Stagnation, Coalmines, Bubbles, and Larry Summers](#),” *New York Times* blog (November 16, 2013), <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
6. Summers, “Why Stagn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
7. 克鲁格曼讨论了汉森的理论,这个讨论显得汉森理论似乎只是强调人群因素,而没有涉及工业成熟度、垄断和不平等问题。萨默斯和克鲁格曼都认为,流动性陷阱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停滞主要是部分投资者对负利率的长期预期的结果——这并没有给出真正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把问题往前追溯了一步。克鲁格曼还提及了罗伯特·戈登关于创新削弱的论述
(Robert Gordon, “[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 [Headwind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8315, August 2012, <http://nber.org>.)。上述论述当中，都没有论述资本积累这一基本的历史问题。
8. Krugman, “Secular Stagnation, Coalmines, Bubbles, and Larry Summers.”
 9. Paul M. Sweezy, “[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32, no. 5 (October 1980): 2–3.
 10. Sweezy, “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3.
 11.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Henryk Szlajfer, eds., [The Faltering Economy: The Problem of Accumulation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12. Hansen, “The Stagnation Thesis,” 551–52; Paul M. Sweezy, [Four Lectures on Marx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36–39.
 13. Sweezy, “The Crisis of U.S. Capitalism,” 4–6; Paul M. Sweezy, “Why Stagnation?,” *Monthly Review* 34, no. 2 (June 1982): 7.
 14. Paul A. Baran and Paul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139–41.
 15. Sweezy, “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6–7; Alan Greenspan, “The Great Malaise,” *Challenge* 23, no. 1 (March–April 1980): 37–40.
 16. Paul M. Sweezy, “[More \(or Less\) on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49, no. 4 (September 1997): 3.
 17. 哈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早在 60 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关注美国经济中流动性的长期降低，并关注其同垄断资本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整个 70 年代，他们二人将这种分析写成许多预见性的文章，这甚至要早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大金融化”，大金融化开始于 80 年代的最初阶段。关于他们对这个现象的早期分析，详见 Paul M. Sweezy and Harry Magdoff, [The Dynamics of U.S.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and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The End of Prosper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18.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Production and Finance](#),” *Monthly Review* 35, no. 1 (May 1983): 1–11.
 19. Magdoff and Sweezy, “[Production and Finance](#),” 11. 财富效应这个概念——或者用马格多夫和斯威齐书中的说法，是伴随着财富增加的消费减少（以资产价值衡量）——在解释实际金融泡沫对 GDP 增长的影响、特别是解释近年来基于房产财富效应的房产泡沫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 Dean Baker, *The End of Loser Liberalism*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2009), 18; Christopher D. Carroll and Xia Zhou, “[Measuring Wealth Effects Using U.S. State Data](#),” paper presented at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 Using Geographical Data, March 18, 2011, <http://frbsf.org>.
 20.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 Magdoff,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121–22.
 21.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22. 美联储声明，引自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The Irreversible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8), 44–45. 根据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这里的注释，他们的术语“崩盘” (meltdown) 是用来形容 1987 年股灾后可能造成的金融危机的效应的。

23.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The Irreversible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8), 76. 类似的观点激进转变出现在海曼·明斯基对 1987 年股灾的回应中, 这种观点转变使他引入了“货币经理资本主义”(money manager capitalism) 的概念, 将之作为体系发展的一个新的危险阶段。见
Hyman P. Minsky,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The Crash of ’87—What Does it Mean?,” in Mark Gottdiener and Nicos Komninos, ed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Crisis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89): 391–403.
24.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2), 4.
25. Jared Bernstein, “[Structural Stagnation, Bubbles, and the Volcker Rule](#),” *On the Economy* blog, December 10, 2013, <http://jaredbernsteinblog.com>.
26. Ben S. Bernanke, “[The Great Moderation](#),” Address to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February 20, 2004, <http://federalreserve.gov>; Thomas I. Palley, *From Financial Crisis to Stag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2–33, 195.
27. Foster and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4.
28. Foster and Magdoff,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99.
29. 关于金融膨胀, 见
Jan Toporowski, *Why the World Economy Needs a Financial Crisis and Other Critical Essays on Finance and Financial Economics* (London: Anthem Press, 2010), 43–61.
30. Fred Magdoff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Plight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Monthly Review* vol. 65, no. 8 (January 2014): 1–22.
31. 据我们所知, 用来描述经济长期放缓的“大停滞”这个术语, 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首次使用的, 见
Lester C. Thurow, “The Great Stagnati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7, 1982. 虽然瑟罗指出了传统观点长期以来都未能考察停滞之可能性, 但瑟罗自己(除了一些非常含混的凯恩斯主义理念之外)并没有为停滞现象提供一个理论解释, 也没有追溯关于长期停滞的早期理论。相反, 马格多夫和斯威齐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 已然指出了“70 年代[代表着]大停滞十年的开始”的现实; 并且他们还指出, 历史表明通过瑟罗所鼓吹的单纯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方案, 是不可能克服停滞的。见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Listen, Keynesians!](#),” *Monthly Review* 34, no. 8 (January 1983): 1–11. 马格多夫和斯威齐那篇文章里认为, 比起用赤字开支刺激经济, 私人债务的巨大扩张更重要, 然而后者不可能使经济摆脱根本难题。最近, “大停滞”这个术语在大衰退之后变得非常流行, 因为泰勒·考恩以和瑟罗相似的方式用了这个术语, 见
Tyler Cowen, *The Great Stagnation* (London: Penguin, 2011).
32. 产能利用率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投资决策中的所发挥的作用, 可见
Josef Steindl, *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10–11, 127–37. 并参见 Foster, *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107–27.
33. Richard Rubin, “[Cash Abroad Rises \\$206 Billion as Apple to IBM Avoid Tax](#),” *Bloomberg News*, March 12, 2014, <http://bloomberg.com>. See also Juan Sánchez and Emircan Yurdagül, “[Why Are Corporations Sitting on So Much Cash?](#),”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st*, January 2013, <http://stlouisfed.org>, and “[Huge Cash Pile Puts Recovery in the Hands of the Few](#),”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1, 2014, <http://ft.com>.
34. Justin Lahart, “[The Next Problem: Too Much Profit](#),”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8, 2014, <http://stream.wsj.com/>.

35. 根据经济分析局（BEA）的定义，营业净盈余是“一个类似于利润的指标，表示从所增加的价值当中，扣除员工（实收）报酬、生产税、进口税减补贴、固定资本消耗（CFC）这几项成本后，得出的业务收入，但其中还没有扣除融资成本和业务转移支付”（BEA 术语表）。
36. Cardiff Garcia, “[Birinyi: authorised US share buyback amount finished 2013 up 58%](#),” January 14, 2014) *Financial Times*, *Alphaville* blog, <http://ftalphaville.ft.com>.
37.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Table 5.2.5. Gross and Net Domestic Investment by Major Type; Harold G. Vatter and John F. Walker, *The Inevitability of Government Spend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6–22.
38. 折旧基金和投资见
Baran and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99–104; Vatter and Walker, *The Inevitability of Government Spending*, 6–8, 113.
39. Ezra Klein, “[Larry Summers on Why the Economy Is Broken—And How to Fix It](#),” *Washington Post* blog, January 14, 2014, <http://washingtonpost.com/blogs>.
40. Cowen, *The Great Stagnation*, 49–50.
41. “[Apple’s 2013 Annual Report](#),” October 30, 2013, <http://macrumors.com>; Google Investor Relations, “[Google Inc. Announces Third Quarter 2013 Results](#),” October 17, 2013, <https://investor.google.com>; “[Facebook Will Grow Headcount Quickly in 2013](#),” January 30, 2013, <http://techcrunch.com>.
42. George Packard, “[Amazon is good for customers. But is it good for books?](#),” *New Yorker*, February 17, 2014, <http://newyorker.com>
43. Aki Ito, “[Your Job Taught to Machines Puts Half U.S. Work at Risk](#),” *Bloomberg*, March 12, 2014, <http://bloomberg.com>.
44. Palley, *From Financial Crisis to Stagnation*, 76–78; Krugman, “Secular Stagnation, Coalmines, Bubbles, and Larry Summers.”
45. 见
Robert Pollin, et. al, *Green Recovery: A Program to Create Green Jobs and Start Building a Low-Carbon Economy*,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September 2008, http://peri.umass.edu/green_recovery.
46.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73), 376.
47. Foster and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137–43; Samir Amin, *Three Essays on Marx’s Value Theo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 67–76.
48. 米哈尔·卡莱斯基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见
Michał Kalecki, *The Last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75–83. 又见
Paul Krugman, *End This Depression Now!* (New York: W.W. Norton, 2012), 94–96; 以及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 Kalecki, and Socialist Strategy](#),” *Monthly Review* 64, no. 11 (April 2012): 8–12.
49. Joan Robinson, “Review of R.F. Harrod, *The Trade Cycle*,” *Economic Journal* 46, no. 184 (December 1936): 691–93.
50. István Mészáros, *Beyond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 893.

51.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与“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对立，见
Karl Marx, *O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3), 5–12. 【编者注：出自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52.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11, 336, 515–17.
53. Michał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35–42. 对卡莱斯基之财富税和垄断积累论证的讨论，见 Foster, [*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6), 133–36.
54.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471–92, 531–32.
55. Magdoff and Sweezy, [*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 88–90.
56. Paul Le Blanc and Michael D. Yates, [*A Freedom Budget for All American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 224–25.
57. Le Blanc and Yates, [*A Freedom Budget for All Americans*](#), 232–33; Linda Bilmes and Joseph Stiglitz,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New York: W.W. Norton, 2008).
58.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 1 (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11–13, 375–79.
59. 见
Fred Magdoff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37–60.
60.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754. 【编者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脚注中说：“各独特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全体的利益。”】

· 伊拉克共产党党徽



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哈 米德·马吉德·穆萨访谈

——“基于宗派—种族分权的政治体制损害着民主制度。”



: sovietlijie (译)

埃内斯托·戈麦斯·阿瓦斯卡尔

编者按：伊战十年，一个独裁政权被推翻了，但伊拉克人民身上的苦难却变得更多。除了外来帝国主义的粗暴干涉，伊拉克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逊尼派、什叶派和北方库尔德人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难解，行政腐败也日益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整个中东乃至第三世界的缩影——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支配下，宗派、种族矛盾的交织往往迷失了群众运动的方向，争取民主的斗争变成恐怖主义和帝国主义分裂人民的工具。在此背景下，伊拉克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坚持、他们同库尔德共产党人之间基于国际主义的合作，都显得格外宝贵。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复杂的运动，但不容置疑的是，这场运动给弱小的中东共产党人提供了锤炼自己的难得机会，让他们在组织化、群众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哈米德·马吉德·穆萨 (موسى مجيد حميد)

问：对伊拉克的侵略犯罪已经过去了十年，对于当前局势，伊拉克共产党有何评价？

答：战前，伊拉克共产党就在“反对战争、反对独裁”的口号下活动了，而当战争爆发、萨达姆政权垮台后，党站在反对占领的立场上，并号召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的伊拉克。我们认为，

那场战争不会使伊拉克成为一个让人民的意志，人民对体面的生活、民主以及建立平衡、灵活的经济的愿望得以实现的国家。因此，党在战后和其他民族政治力量一起活动，以驱逐占领军，争取民主、独立和民族主权。

在独裁统治垮台后的这几年里，伊拉克人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确实，伊拉克推翻了可憎的、犯罪的独裁统治，并且解除了国际封锁，但是伊拉克人民并没有取得与他们牺牲相称的生活水平和公共自由上的提高。许多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仍然有独裁统治的残存，恐怖主义和破坏势力（包括宗教极端主义者、基地组织和前政权分子）横行依旧，行政和财政腐败则日益严重。所有这些都使伊拉克无法发展到新的高度——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自由以及法制的国家（后者能够使我国免于官僚主义横行，并防止独裁制度的死灰复燃）。

2003年后，伊拉克建立了宗派-种族分权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经常导致社会紧张、政治碎片化以及相互对立，这些阻碍着政治进程的发展、政治公开、民主制度和司法机关的巩固。

总之，伊拉克被占领后的十年所导致的结果是消极的、非常令人失望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要为此承担巨大的责任，尤其是在2011年末伊拉克人民的意志把占领者和他们的军事力量赶出伊拉克领土后。但是民族独立的巩固，在很多方面都要求基于民族民主计划和民主公民国家的民族统一；机构国家（a state of institutions）和依法治国。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人民会起来改变政治进程，会提出能够使政治现状变得符合伊拉克人民的更高利益和愿望的状态的激进主张。

问：许多人认为，伊拉克之所以无法控制，是因为伊拉克中央政府和伊朗以及美国相勾结，也由于海湾地区国家和土耳其的旨在将伊拉克一分为三的干涉，它们的干涉推动了宗派内战。除此之外，还有对群众的不断的恐怖袭击。伊拉克共产党是如何分析这一情况的？

答：前面提到过的政府以及政治关系建构方面的宗派-种族分权政策的有害结果自然激化了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出伊拉克统治阶层的阶级社会利益是分化的。这种冲突对立必然会加强这样一种政治趋势，它无益于伊拉克稳定、和平和安全，只会加剧对立、紧张并使对立各方采取非民主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建立民兵组织，并利用他们战胜对手，或者诉诸束缚对手、扭曲国家机构的性质、剥夺自由、侵犯人权以及鼓励宗派歧视的实践。

另外，敌对各方为了增加自己胜利的机会，便向外国势力求援，他们和这些外国势力有着密切的利益、意识形态以及宗派关联。这就为地区势力和其他势力干涉伊拉克事务、危害人民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试图通过培育宗派主义和宗派冲突来将伊拉克拖入本地区不断的对立冲突中。卡塔尔、土耳其、海湾国家和伊朗就对此非常上心。

内部敌对、宗派关系紧张以及宗派不宽容的增长正在撕裂这个国家以及它的民族团结，同时也在破坏公民原则、分裂伊拉克。我们作为共产党人，相信联邦制如果尊重群众意志和民主方法的话，便是和宪法相协调的。我们也相信，伊拉克的分裂，或者将本地区构建于宗派基础上会导致内战，并且与民主以及人民所期望的公民原则和祖国统一不相符。因此，它所服务于的是地区和国际势力的阴谋，并且和拜登所推介的以所谓“联邦伊拉克”的名义将伊拉克分裂为三个小国的计划并无二致。这会使伊拉克人面临持续不断的流血冲突和糟糕的内部混战。没有哪个阶层或宗派能从这一犯罪生意中获益。

问：两年来，在叙利亚出现了一场反对复兴党统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西方国家及其海合会盟友和土耳其在军事和财政上组织起恐怖分子（主要是萨拉菲分子和圣战分子）。伊拉克共产党对这场战争有何看法？

答：我们，作为共产党，很早就呼吁尊重叙利亚人民的意志和他们的选择，以建立一个能够符合叙利亚人民的意愿并且为建设叙利亚服务的民主体制，与此同时，还需要正常的民主发展以及宪政生活，并且放弃一切暴力主张。

我们对这一立场的理所当然和必然性充满自信，并且支持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没有外国势力干涉的、尊重群众意志的叙利亚的改革和变革。现在发生的事情违背了叙利亚的友人和人民的意愿，我们只能指出这样的事实，许多恐怖分子和破坏势力在叙利亚起义之前就已在叙国内发展起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穿过叙利亚国土涌入伊拉克，并且据叙利亚情报部门的情报，他们杀害、屠戮无辜的伊拉克民众。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上述因素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性质，使他们与一些帝国主义势力、反民主的政党和势力相勾结，屠杀叙利亚人民，并破坏叙利亚。

我们注意到了叙利亚境内恐怖主义活动的增长、极端势力与恐怖主义势力（比如基地分子和努斯拉阵线）的滋长所带来的危害。对于这场已经具有了基地组织和土耳其希望培植的宗派性质的战争会带来的后果，我们是担心的。

我们关注这场战争以及它对伊拉克国内局势的消极影响，另外，我们相信，战争的持续完全无益于叙利亚人民。因此，我们首先号召叙利亚政府以及民族和民主反对派政治力量举行对话。其次，实行能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民主民族计划。

第三，我们反对任何政党采取暴力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完全并且坚决反对任何形式（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秘密还是公开）的外国干涉。这是重建叙利亚的和平与安全，并给叙利亚人民提供安宁和稳定的唯一方法。

问：伊拉克共产党和库尔德斯坦的共产党人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答：我们生活在共同的祖国里；拥有共同的诉求和宏观战略。我们在伊拉克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他们一起制定宏观战略。库尔德斯坦的同志们；库尔德斯坦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库尔德斯坦的具体事务中享有自决的地位，并且以两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决定的比例和方式参与伊拉克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与其他不同民族的伊拉克同志一道，参与讨论党的文件，提出自己的看法，采纳党的文件并加入党的领导机构。他们占据着伊共中委 20% 的名额，同时库尔德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是伊共政治局委员。在中央委员会前后相续的两次会议之间、中央特别委员会间的咨询会议上以及两党的政治局（有时是两党中委）之间，会相互咨询并制定出适当的策略计划，尤其在事关共同的伊拉克事务时。

同时，库尔德斯坦共产党有它自己的纲领，这就使得该党在工作和地区中保持了独立地位。它有自己的党内规章，这些规章在一个独立组织内管理着库尔德斯坦地区党组织的工作。库尔德斯坦共产党表现了伊拉克共产党前“库尔德斯坦地方组织”伴随着伊拉克政治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库尔德斯坦建立了联邦制）而发展壮大。

为了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人民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且代表库尔德斯坦劳工，库尔德斯

坦共产党根据当下现实，制定了自己纲领的细则和具体策略。而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之上，建立在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一般原则上。这是一种强大、可持续、灵活的关系。

问：伊拉克共产党是如何看待中东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局势的，您又如何看待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呢？

答：中东正处于转变和斗争之中，这些转变和斗争的基础是，阿拉伯世界人民和劳工要求自己国家给予自由和富足的生活。阿拉伯各国拥有自然资源财富以及相当的物质和人力潜能，但人民却生活在不发达、贫困、饥饿和疾病之中。

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们要求重建当今的政权，建立能够反映他们的利益并且与他们的愿望与合理要求、时代本质以及世界的客观变革的要求相符的政权。享有更美好的、有尊严的、自由的生活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基本权利。

另外，剥削阿拉伯世界财富的全球反动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背后支持着不民主的、暴政的、独裁的反动政权。这些反动政权依附这野蛮的势力，并且窃取本国财富。

这是阿拉伯世界斗争的真实本质，也是正在进行中的剧变的根基所在。阿拉伯各国人民处于国内外发展变迁之中，他们与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争取获得自己的权利。我们因此相信，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起义并不是人造的运动和革命，不是从外国进口的运动和革命，也不是由国外阴谋所策划的运动和革命。它们有着客观基础，即阿拉伯人民对建立人民能够享有体面生活的权利的自由民主政权的期望。这是阿拉伯人民所期望的。但不幸的是，与这一运动相伴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漏洞，例如有明确政治倾向的有组织的力量作用微弱（这是独裁政权镇压——包括恐怖、死刑和虐待——所致），普遍的自发性和广泛传播的教条、理念与理论并不能将这一数百万人参与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导向安全的海岸，并获得所期望的成果。这些缺点和漏洞被那些在前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内部力量加以利用。

一些势力因此能够主导政治舞台，因为他们比那些缺乏清晰纲领的新领导层以及一些作用已被削弱的进步和革命力量拥有更好的政治表现，而且拥有物质和媒体力量。这些主导着舞台的势力获得了国外支持。抗议运动的规模、激进趋势和即将实现的目的的本质令许多国家和外国机构大吃一惊。因此，他们努力控制和削弱这些运动，试图将他们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以保证新政权控制在自己手上，并且剥夺这些国家的资源（capability）（尤其是自然资源）。

这是阿拉伯之春革命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崇敬并且尊重人民的意志和他们对解放的向往。另外，为了保证这次群众运动的方向，我们早就指出了这次广泛的群众运动的问题和缺陷，并且警告存在一些会被反革命力量以及与他们合作的国内外势力加以利用的缺陷。

除此之外，我们相信，事情还没完，这次斗争还没有结束。阿拉伯之春各国的革命力量正在战斗，正在重新组织自己以防范反革命势力、反动和反民主势力，防止这些势力主导政治舞台并将起义和革命导向他们自己的目的。

问：伊拉克共产党当前主要的工作有哪些？

答：伊拉克共产党致力于巩固伊拉克的民主体制，并试图通过消除宗派—种族分权制度（我们视之为扭曲伊拉克政治生活的根源）来改善局势。消除它是为了巩固民主——这一民主体现为价值、机构、制度和政府体制，它会重建伊拉克经济并使伊拉克的资源服务于伊拉克的发展，并且只有通过民主，伊拉克人民（尤其是劳工）才能过上更好、更高、更富足的生活。我们通过捍卫社会结构的团结、公民原则的有效性，通过反对地区歧视和排挤、反对外国干涉来达到我们的诉求。它为重建伊拉克的完整主权（经济的和政治的）以及消除一切占领和统治伊拉克多年的独裁的残余奠定了基础。

伊拉克共产党参与了选举斗争。它在选举联盟候选人名单上的代表所采用的是与伊共的民族民主纲领相符的纲领。他们致力于捍卫伊拉克人民的这些权利——保障平等的工作机遇，反对歧视，获得服务，保障人权和稳定，结束混乱的安全状况，打击恐怖主义，在健全的经济基础上重建伊拉克，科学地运用石油收入来重建经济。这是在竞选联盟内党的代表在2013年4月20日的省级选举时所为之斗争的诉求。

按照这一路线，我们已经能够沿着一方面消除独裁统治残余，另一方面消除伊拉克的占领和战争的遗迹、进而建设一个团结、独立的民主的联邦的和公民的伊拉克的路走很远。



红色孟加拉邦的兴衰



: 赫亚·巴格 [Kheya Bag]
Sovietlijie (译)

编者按：译自《新左翼评论》第70期（2011年7/8月号），作者克赫亚·巴格（Kheya Bag）。本文梳理了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政治生活中的起伏兴衰，试图向读者揭示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长期掌权和最终下台的原因。作者认为，执政初期所推行的有限的农村改革以及西孟加拉邦政治体制（尤其是选举制度）的特点使得印共（马）能够长期掌权。但是，由于该党内部缺乏讨论、腐败现象以及讨好资方的修正行径，印共（马）最终丧失了政权。作者最后认为，印共（马）几十年以来的执政成果在全印范围并不突出，而这个党也是前途惨淡。需要提醒读者的时，这个党，尤其是它在西孟加拉邦的所谓执政成绩曾在某些国家被大肆吹捧。透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某国共运专家大肆吹捧的东西到底有几分真实。所以，读者在阅读本文时在参照某国共运专家们就此问题写的相关文章一读，会收获别样的趣味。

由于已被广泛地预料到，掌权34年的西孟加拉邦共产党政府的下台就不仅仅是一道分水岭了。在超过一个世代的时间里，印共（马）塑造了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之一（9100万人）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并且在连续七届邦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西孟加拉邦也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大量印度议会（人民院）的代表；在1990年代中期，该邦首席部长乔蒂·巴苏被认为可能成为一个中左翼联合政府的总理。印共（马）的下台便因此表现了全印政治层面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向右转。西孟加拉邦见证了反对印共（马）过去十年里北京式的征地活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尽管源于该邦极端保守的国大党，但玛玛塔·班纳吉所发起的运动却根植于被印共（马）极端危险的资本主义发展政策（尤其是党在辛格乌尔〔singur〕和楠迪格拉姆〔Nandigram〕以臭名昭著的野蛮方式对待贫苦农民）所驱逐的人。此外，共产党人还指责她对待毛主义者的态度是温和的。

位于加尔各答的邦政府所在地作家大厦的门卫的变更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疑问。首先，为什么是西孟加拉邦？也就是说，为什么印共（马）能在这个人口稠密的东北邦中成功地建立如此广泛、有效的统治，而同时它在印度其他地区（喀拉拉邦部分除外）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其次，在1970和80年代，印共（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首先夺取而后巩固政权的？第三，如何评价他们执政时所取得的成就？第四，如何解释该党对待作为自己天然基础的被压迫阶层的不计后果的野蛮行径？最后，是哪些因素瓦解了它长久以来经由选举而对西孟加拉邦政府的控制？下面我将尝试着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些可能不成熟的答案。

孟加拉邦的特点

首先，是什么导致了印共（马）能在西孟加拉邦上升到它在印度其他地区所未能达到的显赫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独立后该邦国大党的相对弱小，以及这里独特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土地方面）。历史上，印度共产党产生于反殖民斗争，尽管它从未获得全国层面的普遍支持，但却在印地语地带（这里是国大党的支持力量的中坚）之外的一些邦中（安德拉邦、孟加拉邦、喀拉拉邦、旁遮普省）有着稳固的基础。其中，孟加拉邦最为重要。20世纪初印度的反英起义便诞生于此，它也是次大陆的重要产业中心，并为文化复兴、民族党

醒、农民起义以及工人的战斗性（而这些也是共产主义牢固的根基所在）提供了温床。^[1]共产党人在该地区密布的革命团体的和活跃的地下组织中工作。担任西孟加拉邦党委书记将近半个世纪的普罗莫德·达斯古普塔（Promode Dasgupta）就成长于1920年代的自主文化联盟（Anushilan Samiti）比他稍微年轻的乔蒂·巴苏和哈里·克里希纳·科纳尔（Hare Krishna Konar）则作为工会和农民组织家而活动，并常常遭受英国人监禁和毒打。

相较于当时印度的其他地方，这里的氛围更为激进，就连国大党也是如此。在鲍斯兄弟（沙拉特·鲍斯（Sarat Bose）与苏巴斯·鲍斯（Subhas Bose））的领导下，该邦国大党试图通过一个世俗、社会主义的纲领将分别占人口多数和少数的穆斯林和印地语社区联合起来。资助甘地的马尔瓦里商人们对此是深恶痛绝的。1937年，在百万富翁甘·达·比尔拉（Ghanshyam Das Birla）的要求下，当时以加尔各答为基地、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中央从甘地那儿得到指示，禁止该邦国大党与亲农民、占有政治优势的穆斯林农民人民党（Muslim Krishak Praja Party）在孟加拉邦立法院结成联盟。这一预示着国大党后来的印度教沙文主义的宗派主义决定，使国大党在随后十年靠边站了，并迫使农民人民党与孟加拉邦的地主组织穆斯林联盟走到一起。由此，穆斯林联盟获得了更大的影响，而农民人民党也从社会经济问题转向宗派问题。当甘地反动一场混乱以反对苏巴斯·鲍斯（他在1939年通过民主选举而成为国大党主席）并以最专断的方式将他驱逐出党时，孟加拉邦的国大党便再无可能接近农民运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政策所造成的饥荒在孟加拉邦导致了大概200万人的死亡。战后，当英国人发觉他们不得不撤离次大陆时，国大党（印度教徒占97%的党）在穆斯林占人口多数并掌管邦政府的孟加拉邦地位脆弱。随着印巴分治，沙拉特·鲍斯和该邦穆斯林联盟的领袖苏拉瓦尔迪（Suhrawardy）为了一个独立、统一的孟加拉国而联合起来，反对怒气冲冲的印度大会党（现今人民党的前身）。国大党全国领导层（尼赫鲁尤甚）联合印度大会党（大会党领导人因此在尼赫鲁内阁中谋得一席），阻止孟加拉独立，并强行推动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罪恶地瓜分孟加拉邦，以确保印度教精英能够至少控制孟加拉邦的西部大概三分之一的地区。不过，一旦印度独立，西孟加拉邦就在权力体系中迅速边缘化，在政治体制（它的重心落在印度北部的圣牛带^[2]）中的作用也大大降低了。当地国大党虽然紧随中央，但在尼赫鲁的统治架构中，也不过是个局外人。

社会状况

分治重塑了孟加拉邦的经济和社会，它灾难性地切断了西部工业区和东部农业区之间的联系。1947年之前，孟加拉邦是一个急速成长的国际黄麻产业中心，但现在，加尔各答周边的工厂与东巴基斯坦的粮食供应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西孟加拉邦的农田改种黄麻加剧了独立后出现的严重的粮食短缺。最大的地产和最肥沃的土地划归东巴基斯坦，数百万难民——首先和最首要的是前印度教乡绅，他们由于分治而丧家落魄——涌入西孟加拉邦，并在能定居的地方定居下来。那些想拿回财产的人被落魄的亲戚所拖累（根据《利亚格特-尼赫鲁协定》，孟加拉邦难民有权要回自己的财产，因此没有接受像旁遮普省那样的邦政府的支援）。西孟加拉的种姓结构尤其富有地方色彩并且支离破碎，因此并不像圣牛带那么突出，不过仍然影响到了阶级结构；如果婆罗门并不是那么根深蒂固，那么受教育的种姓就比在其他地方占有更加主导的地位（尤其在政治领域），而农村资本家依赖马尔瓦里人（据信是18世纪末拉贾斯坦商人种姓移民的后裔）的家族贸易和信贷网络。无地和贫穷的通常是低种姓农民和穆斯林。西孟加拉是印度贱民比例最高的邦之一，达到邦人口的23%，同时穆斯林占到了总人口的25%，并主要集中于沿1947年边界的邦东南部。

直到土地所有问题得到关注，允许占有大片土地的柴明达尔制才在1947年后被尼赫鲁政府在名义上废除了，而印巴分治使得这一点在西孟加拉邦成为现实。尽管封建地主不再是一种势力，但乔特达尔（过去的工头，占有中等面积的土地，是印度国大党的基石）却存留下来了。大部分家庭仅占有不过1英亩的土地，仅够维生和再生产。土地所有制度便高度分散了。在占西孟加拉邦很大一部分的稻产区，常见的是临时性、季节性的雇佣方式（一年少则仅有三个月）。尽管也种植经济作物（比如黄麻和高地的茶叶），但稻米还是基本的粮食和主要的食物来源，除此之外还有豆类、油籽和蔬菜。有一般的田地是由分成佃农（或称巴加达尔）耕作的。这些人一般只拥有一小块所有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土地，还常常困于债务。土地不足导致了次级分封和复杂的雇佣模式：境况较好的人从穷人那里租来土地，而农民则能够依季节或环境靠受雇劳动、家庭劳作或者工资劳动维生。独立时，农业生产停滞了将近一个世纪，虽然这里是印度最肥沃的地区之一。电气化在城市之外无人知晓，道路也大部分没有铺砌。

独立后，西孟加拉邦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激进分子一道为饥荒和援助难民而奔走呼号。在1950年代，随着圈占公地运动的胜利，加尔各答附近进行了一些土地的重新分配。在这之后，党便开始壮大了。西孟加拉邦的工会入会率已经比印度其他地区高了，而在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又翻了一番。失望的中产阶级移民，住在加尔各答市郊，被迫进入劳力市场。工程、化工以及文职工作的熟练工人不得不面对高失业率：这一阶层构成了印共的工会基础。同时，印共的基本方面是选举向的：在西孟加拉邦的选举中，得票率从11%（28席）上升到1951年的25%（50席，全部席位的将近1/5），到1962年则成为邦议会中国大党的反对党。

左边的敌人

西孟加拉邦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以及几乎印共的所有的工会分子和基层激进分子，都站在党内“左”派一边。当1964年印共分裂时，该派在其加尔各答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1962年的印中边境战争加剧了对立：达斯古普塔、巴苏和其他人反对尼赫鲁的沙文主义并被监禁，而其他中央委员则支持国大党的“卫国战争”。这些对立的立场，根本地涉及到党针对国大党的策略方向，要么属于反对“封建”印度统治阶级的广泛联盟的策略（印共），要么属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策略（印共马）。[3]在阶级斗争高涨、经济危机加深的时期，两大共产党都不断注重选战。在1967年的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中，印共（马）赢得了18%的选票，占有43席，并加入了执政联盟——由孟加拉国国大党（一个短命的、从国大党中分裂出来的党）领导的联合阵线。印共（马）的乔蒂·巴苏成为西孟加拉邦的首席部长，而哈里·克里希纳·科纳尔则成为土地部长。

当年5月，大吉岭地区的纳萨尔巴里村爆发了一场由印共（马）农民阵线领导的农民起义。科纳尔试图从中斡旋，让农民放下武器，但未果。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派安全部队去镇压起义，这在随后几个月里导致了极端残酷的冲突。联合阵线政府对印共（马）的一部分基层组织实施了报复行动，而党的领导层却继续参与该政府。这便使党又一次分裂了，建立起遵循毛主义路线、诉诸农村游击战策略的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纳萨尔巴里成为印共（马）的分水岭：在普罗莫德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恶毒的、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运动（这一运动还时常退化为武装冲突）。与此同时，由于卢比贬值而恶化的食品危机和经济衰退在城市中引发了骚乱和群众抗议。在加尔各答北部，人们抢劫米店，并将里面的东西瓜分一空——这便是广为人知的开达姆达姆药[4]。左翼激进分子领导了总罢工，帮助推广了非常有效的围困策略（gherao）。联合阵线联盟瓦解了，中央政府命令邦长借机实行总统管制（President's Rule）。

1969—1971年间，前后两次的邦议会选举——时不时受到总统管制的打击——见证了印共（马）在巴尔达曼（西孟加拉邦的煤钢产业带和最大的稻米生产区）的农村和城市扩大自己根基：沿达莫德尔河、散布于阿散索尔、杜尔加布尔和巴尔达曼城之间的矿业-制造业带，使这里成为恒河三角洲之外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1969年，印共（马）赢得了20%的选票，拿到了80个邦议会席位；1971年则是33%的得票率和113席。再次加入联合阵线联盟（由孟加拉国大党领导）的印共（马）决心不再重蹈纳萨尔巴里的覆辙，推行切实的土地改革。随着人口增长，西孟加拉邦的人均土地占有率变得非常低：人均占有土地少于1/3英亩。科纳尔的策略是将群众运动和邦法律批准的土地再分配手段结合起来。^[5]农业工人、分成佃农和小农被号召起来，认领无主土地和非法占据的超额土地（benami holdings），并乐于成为见证人。这次脚踏实地的努力使得印共（马）的干部能在农村站稳脚跟，并赶走了支持国大党的统治精英。贫农和无地农民被发动起来夺取土地，他们还带着竹竿、斧头和长矛进行武装游行。^[6]

与此同时，乡间爆发了毛主义的印共（马列）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而东巴基斯坦省实行的戒严以及随后的孟加拉独立斗争，使得东西孟加拉的统一（以及赤化？）成为可能。为防止上述可能成为现实，并镇压1947年边界线两端的起义军，新德里的国大党政府调派印军。虽然此间对自己的兄弟纳萨尔派进行了袭击，但印共（马）还是又一次陷入了中央政府的镇压。总统管制的另一后果是1972年国大党重新掌权，而科纳尔的土地改革也迅速遭遇复辟。首席部长悉达多·山卡尔·拉伊（Siddhartha Shankar Ray）实行恐怖统治，对印共（马）和印共（马列）的激进分子一视同仁、加以镇压。除此之外，工会分子、农民组织家以及激进学生也在被镇压之列。1973年，在西孟加拉邦的监狱里，有18000名政治犯。镇压是如此严厉，以至紧急状态（由英迪拉·甘地在1975-77年实行）的子弹和警棍仿佛不过是国大党正在领导的镇压运动的继续。^[7]

执政

当拖延已久的人民院选举终于在1977年举行时，国大党遭遇了独立后的第一次失败，将权力移交给人民党（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大资本家以及印度教极右翼组成的松散联盟）。同年夏举行的邦议会选举中，英迪拉的党在全印各地遭遇失利：在北方邦、哈里亚纳邦、奥里萨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和喜马偕尔邦，人民党的得票率都超过了46%。在西孟加拉邦，全国反英迪拉浪潮的受益者是印共（马），它的干部在担任领导职务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印共（马）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释放所有政治犯，为穷人提供基本的救济。由于在邦东部的豪拉和胡格利，以及邦西部的比尔布姆、班库拉、普鲁利亚和米德纳普尔所获得的支持，印共（马）的得票率达到了35%，赢得了西孟加拉邦议会294个议席中的大多数——178席。人民党在西孟加拉邦的得票率仅有20%，所获得的议席则是29席。国大党的得票率降至23%，席位减至20席。

通过在一系列选战协议（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以印共[马]西孟加拉邦老书记命名的“普罗莫德方案”）的基础上建立起左翼阵线，印共（马）在1977年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根据该阵线的宣言，各选区中的左翼阵线各党不再相互攻击。除此之外，无论左翼阵线中是哪个党在选举中得票率最高，它的地位在以后的选举中都将不受其他党的挑战。印共（马）在左翼阵线中最重要的盟友是全印进步联盟（All India Forward Bloc）和革命社会主义党（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这两个党都在西里古里走廊和部落密布、相对落后的邦北部得到了巨大的支持。^[8]1977年的邦议会选举中，进步联盟赢得了5%的选票、25个议席，革社党则获得4%的选票、20个议席。印共（马）的盟友们被邀请加入左翼阵线政

府（巴苏任首席部长）。左翼阵线总共控制了230个议席，是邦议会全部议席的将近五分之四，得票率则为45%。

虽然有着1960和1970年代的经验，但由于执掌中央政府的国大党不断施行总统管制，以及对印共（马）干部的监禁、殴打，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无论受到多么广泛的支持，印共（马）领导的西孟加拉邦政府总会是短命的。达斯古普塔、巴苏和其他人决心不再重蹈联合阵线的覆辙：国大党对土地重新分配的反动使得农村地区的成就丧失殆尽。镇压之下，印共（马）的党员数在1977年选战时只有4万。面对迫在眉睫的风暴，党的领导层决定进行一次大变革，以在政治上和选举中巩固党在农民中的地位。^[9]左翼阵线政府迅速实现了自己土地纲领的三大支柱：登记分成佃农权利的佃农行动（Operation Barga）；土地再分配纲领；激活潘查雅特（乡村评议会）民主制度。这在策略上是要通过运用已经颁布的进步（当然，还没实行的）法律来避免中央政府的拖延和阻碍，因为邦一级法律必须经由总统批准才能通过。

乡野的巩固

佃农行动又一次通过动员群众来使法典中的法律条文得以落实。依照法律，分成佃农拥有了永久的、可继承的耕种权，以及75%的收成（如果地主提供了种子之类的东西的话，则是50%）。事实上，由于大部分契约都是口头的，因此面对地主的驱逐和剥削，巴加达尔^[10]并不能从法律上得到多少帮助；而对自己所收获的粮食，他们所能分得的份额也很少能超过半数，少的只能达到四分之一。甚至在英国统治时期，就存在要求登记分成佃农的运动。而对左翼阵线所领导的这场运动，群众带着由衷的喜悦参加进来。1978—1982年间，印共（马）及其盟友在各地乡村设立了8000多个革新营（reorientation camp）。在革新营举行的公共集会让人们表达不满，并向租种土地的农民进行权利教育。村民们被登记在案，明确了自己的所有权。尽管佃农行动更多的只是登记造册而非强制行动，但邦政府现在让地主买单，以表明他们无权侵犯佃农的权利。在这场运动的头三年，有约120万分成佃农进行了登记，占分成佃农总数的约2/3和耕地农民总数的30%。他们登记了110万英亩土地的租种权。

在左翼阵线的土地再分配方案中，对于超过法律限额的土地，会经过漫长的赎买程序，转归邦政府所有。按照法律，被占用的土地会做上标记，分给或者无地或者少地（所拥有土地不超过1英亩）的农民。印共（马）首要的是巩固人们（首先是少地农民和小农）对自己的支持。个人必须向自己所在的潘查雅特提出申请，通过后者的资格审查，才能被颁给帕塔（patta，土地权属证书）或订立契约。到1982年佃农行动的第一阶段结束时，左翼阵线已将80万英亩的土地分给了1572531名户主。而每户分得的那一小块土地，虽然其收成并不能富余到进行市场买卖，但维持一家生计还是足够的。^[11]

不过，正是潘查雅特改革导致了西孟加拉邦农村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变化。乡村自治是甘地的想法，并在独立后得以正式确立，但真正落实的却寥寥无几：在西孟加拉邦的许多地方，已经有近二十年没有进行潘查雅特选举了；裁决村内纠纷的评议会一如既往地操控于当地豪强世家之手。左翼阵线的改革为潘查雅特建立了任何政党都能参与的普遍、比例代表制的直接选举制度。所有会议均向公众开放的潘查雅特负责制定发展计划、分配邦和国家基金。它们由三级组织构成：村潘查雅特，由从大概10个村、12000人中选举的代表组成；潘查雅特委员会，代表了10倍于村潘查雅特的人口；区潘查雅特，所代表的人口还要多20倍。在1978年的潘查雅特选举中，左翼阵线在三级组织中分别获得了69%、76%和92%的席位，打破了一——或者至少限制了一——富农、磨坊主和放债人对潘查雅特的控制。

佃农行动成效几何，是颇具争议的。一俟引进，现金地租便替代了分成佃农制——地主不需要投入任何东西，便能获得一笔稳固的收入，或者也可以通过季节性地变更租户而提高租金。登记本身并不能使佃农免于驱逐或对收成的低份额占有；受影响的土地面积太小，以致无法对整个生产力产生任何巨大的影响。尽管占全印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的20%，但左翼阵线的土地分配计划还是小规模。但是，将潘查雅特制度和土地再分配结合起来，从而动摇了地主在收获时节震动乡村生活的争斗中曾具有的无可置疑的支配地位，佃农行动便促进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变革。尽管这些改革是温和的，但是分权管理和社会经济稳定性的增强促进了投资（对如此碎片化的土地租让制度进行投资，曾经是不赚钱的），为农业工人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并且减少了农村债务。

在执政的第一个十年里，由于左翼阵线的改革，在西孟加拉邦进行的绿色革命比起大部分印度其他各邦更具平等主义色彩。对于生长期更短的稻种（这样就能使粮食一年几熟，并延长收获季），雨水并不能满足需求，还需要灌溉系统。中央政府为道路、管井灌溉之类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便在农业生产的淡季为人们提供了工作）拨出了资金，而潘查雅特在这些资金的分配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来，西孟加拉邦农业劳工的总工作日跃居全印之首。在最初两届印共（马）政府的任期内，不断扩大的生产力和全年就业使得实际工资出现增长。曾在该邦盛行的债务束缚切实减少。历史上曾饱受饥荒之苦的西孟加拉邦变身为印度的粮仓。在这十年里，人均消费翻番，农村贫困率从近60%下降到80年代末的35%。党的干部参与平息工资争议，而后者是地方斗争的关键所在。例如，工资谈判之前会进行短暂的仪式性罢工：地主同意印共（马）所设定的稍微低于官方最低标准的工资所占比；至少能够支付基本工资的中农便不会输给更有钱的地主。印共（马）因此就能够通过调和不同阶层的利益来巩固自己的选票基础。它的农民阵线（全印农民联盟）的成员由1978年的120万增长到1987年的700万。

印共（马）所获得的政治回报则是高效的农村机构，一架或许在世界其他地方无可匹敌的选举机器。在间隔几年的三级选举——地方选举、邦选举以及全国选举——的选战中，全天候的印共（马）党员定期用自己选举基础的需求来交换选票。传统的宗派主义和庇护主义在潘查雅特（作为西孟加拉邦选票银行的分支）中仍然活跃。就像在印度其他地方一样，地方领导人在自己的圈子（亲戚、种姓和经济关系户）里分配土地和政府援助。另一方面，潘查雅特制度使得地方的势力掮客参与其中：要从之前被排除于决策之外的人那里获得支持，而党员身份成了给穷人中分发物品工作中论功行赏的工具。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潘查雅特成为了金字塔式的庇护制度的中坚，而阿里姆丁大街上的印共（马）总部则踞于塔尖。[\[12\]](#)

城市中的影响

在城市中，左翼阵线的出现结束了悉达多·山卡尔·拉伊（Siddhartha Shankar Ray）统治时期的混乱与近乎城市战争的暴力冲突。尽管加尔各答交通依然拥堵，电力依旧短缺，但在印共（马）的协调下，公共管理总归得以重建。在此期间，印共（马）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导权。到80年代中期，学校教师的工资几乎翻了两番，可与中央政府的雇员相媲美。警察的工资也上涨了，并且很大一部分普通警察被组织进了工会；整个警方成了支持印共（马）的堡垒。印共（马）下属的工会对公共部门工人、银行雇员以及机场工作人员照顾良多。党的知识分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重塑和管理大学以及文化机构；在一片欢歌中，新任公共事务部长贾汀·查克拉波尔蒂将烈士纪念碑（Shaheed Minar）的顶部染成了红色。公务员的工资占据了邦预算的80%；公共部门雇员开始成为城市中支持左翼阵线的选票支柱，与左翼阵线在潘查雅特的堡垒遥相呼应。但不同于后者的便宜，公务员的工资耗资不菲。这样一来，

就只剩下很少一部分资金能够用来改善其他群体的社会服务。

在西孟加拉邦的产业中心，印共（马）面临着为国大党时代补漏的艰巨任务。在分治前，统一的孟加拉邦占据了印度制造业产量的30%。1947年后，西孟加拉邦根本无法为自己的竞争优势获取原材料、工厂和港口：通过限制执照审批和投资、实行“运费均等”的关税制度（以提高向内陆地区运输的费用），尼赫鲁政府系统地打压了西孟加拉邦。1960年代以来，长期的电力短缺使得投资乏力、利润降低。虽然劳工的战斗性——孟加拉邦是班德（bandh，一种持续数天的总罢工）的故乡——无疑加速了资本外逃（就像惯常据说的那样），但到70年代末，它变成主要是防御性的了。不过，印共（马）的选票在这里却是很有保障的。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改善；组织良好的农村票仓和城市公共部门的支持的巩固；与左翼阵线内部小党结成的帮扶联盟；群众对国大党专制主义的记忆——这些显然是因反对紧急状态的选票而导致的印共（马）1977年在西孟加拉邦的胜利能在接下去的选举中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虽然这在其他邦也发生过，但是却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尽管1980年代，光是这些因素并不足以保证印共（马）在国大党的选票回复后继续保持优势。外国人常以为，左翼阵线在1980、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西孟加拉邦赢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并且一如既往地赢得了那么多（或者更多）的邦议会的比例和议席。事实上，从1982年以来，国大党以及后来的草根国大党的得票率就基本上与印共（马）持平，有时甚至高于它（见表1）。但是，由于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的奇特的赢者通吃的选举体制，国大党的选票所换得的席位却只有印共（马）席位的一半以及四分之一（有时甚至更少）。

换句话说，国大党在西孟加拉邦有着稳固的选票支持（考虑到它那糟糕的记录，这一点就有些令人惊讶了）。但是，它那比印共（马）支持者略少的选民一般要么是高度集中于一小部分选区（主要在加尔各答市内或邦北部），要么分散于许多选区之中，但在印度“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中，这些算不了数。在更具代表性的制度中（比如在喀拉拉邦），印共（马）受到严峻的政治竞争、甚至下台的可能性的刺激；而在西孟加拉邦，反对派的缺场腐蚀了邦中央行政大楼作家大厦的文化。虽然印共（马）保持了自己在1977年赢得的35%的得票率，但在接下去几十年执政期间所实行的改革，并没有把它的得票率提高多少百分点。

表1. 西孟加拉邦邦议会选举，1982—2006年：得票率与所获席位

	1982		1987		1991		1996		2001		2006	
	%	席位	%	席位	%	席位	%	席位	%	席位	%	席位
印共（马）	38	174	39	187	37	189	38	157	37	143	37	176
国大党	36	49	42	40	35	43	39	43	8	26	15	21
草根国大党									31	60	27	30
进步联盟	6	28	6	26	6	29	5	21	6	25	6	23
革社党	4	19	4	18	3	18	4	18	3	17	4	20
邦议会总席位：294席												

来源：印度选举委员会

限制与停顿

应该怎么评价左翼阵线执政的第一个二十年呢？印共（马）正确地指出，党在西孟加拉邦的改革努力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限制——首要的是中央政府的敌视。作为国大党的对手，印共（马）与联邦歧视的斗争日甚一日，并且得不到其他由国大党统治的邦所享有的援助。英迪拉·甘地政府以“安全”为由，驳回了一项在加尔各答的卫星城市建设电力联合企业的申请。巴克利什瓦尔火电站项目（Bakreshwar Thermal Power）和哈尔迪亚石化（Haldia petrochemicals）的发展便被迁延十年之久。随着拉吉夫·甘地政府于80年代末着手结束印度的发展主义模式，中央政府采取了惩罚性的紧缩政策，并在随后对借贷进行了严厉限制。此外，西孟加拉邦经历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并由此成为联邦中人口密度最大的邦。资本外逃是关乎生死的问题。但是，就像前所述及，劳工的战斗性很大程度上已经是防御性的了：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就在下降，该部门在邦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滑，现在则低于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在左翼阵线的统治下，由老板为抵制罢工、挫败工人而采取关厂措施所导致的工作日的丧失甚于罢工。

需要注意的是，印共（马）自身的内部文化也是使得这一发展受限的原因之一。本地的个人崇拜和家长制的习俗进一步巩固了印共（马）那僵化的斯大林主义；对僵硬的党的纪律的服从有力地抹杀了一切内部争论。在公共部门、大学、公立医院以及其他等等机构，党内人士能够优先得到升职。当然，这种对朋党的偏爱在国大党治下也是存在的；但一个左翼政党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左翼阵线领导层内的这种风气最终败坏了道德、瓦解了纪律。对于非党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态度是这种“政治化”或曰派别主义的一部分：你要么支持、要么反对印共（马）（在非政府部门以及街头收保护费时也是如此）。虽然在其同情者中包括一些印度最明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但是印共（马）却未能继承印共丰富的思想遗产。加尔各答不再是文化中心；政治的僵化以及获得更好资助的诱惑，慢慢地使孟加拉邦的学者和出版商流失德里。^[13]西孟加拉邦党的主要宣传形式是它的孟加拉语日报《人民力量报》（Ganashakti），这份报纸每个工作日发行23万份，并且能在遍布加尔各答的布告板上读到。在反智主义和日益严重的狭隘的地方眼光的束缚下，孟加拉邦的印共（马）一方面对左翼阵线盟友所持的不同理念抱持着剪除异己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以冷漠的沉默对待党外对自己发展政策的批评。对纳萨尔主义欲置之死地的敌视也深深地腐蚀了印共（马）。

由于党的士绅^[14]领导层充斥着社会保守主义和家长做派，印共（马）对于给普通百姓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既缺乏政治意愿又没有计划蓝图。它并不像拉美左翼那样，对群众识字运动充满热忱。从90年代起，西孟加拉邦的初等教育出现退步，入学率是全印倒数；而二十年前，它还是全印的佼佼者。女童的小学入学率从1986年的43%下降到十年后的40.5%。雪上加霜的是，左翼阵线以鼓励孟加拉语基础教育的名义，从邦课程中去掉了英语，这就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制造出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代人缺乏科技修养，而席卷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的信息产业也避开了加尔各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喀拉拉邦的印共（马）则在同一时期动员志愿者开展了一场非常成功的群众识字运动；较高妇女识字率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西孟加拉邦的医疗预算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比率也低于印度的平均水平，在最大的十个邦中垫底。^[15]

由于大量邦预算用来支付警方和公务员工资，剩下用来改善公共服务的资金就少之又少了。道路的建设、水的供应、社会住房以及电气化没能赶上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去工业化和人口迁移降低了生活水平——过渡拥挤、糟糕的公共卫生，这使得左翼阵线在加尔各答所获得的支持日益减少，不满的资产阶级将选票投给国大党。小额勒索——“为党筹款”——

一成为寻常事；印共（马）雇人经营的大型流氓团伙由于和警察相勾结，便肯定会免于制裁。无论是在国大党得票一般都超过印共（马）的城市，还是富农坚定地支持国大党的乡村，印共（马）将非党人士排除于公共部门、晋升、社会服务等之外的政策都使得民愤剧增。[\[16\]](#)

农村的成果也陷于停顿——绿色革命和土地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消耗殆尽。自1990年代起，无地农民的数量开始增加，而贫困率也不再降低（尽管28%的农村贫困率相较于1992年全印的43%是个大进步）。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变得更小，但也更平均（不过这主要是由市场销售或分家，而不是由规模相对更小的土地再分配造成的）。[\[17\]](#)随着越来越多农产品的商品化，耕种者从依靠磨坊的商业精英那里得不到多少保护，而这些精英则靠着稻谷和稻米之间的巨大差价过活。随着肥料、杀虫剂和借贷成本的增长（因此回报减少了），边缘农民和小农背负债务并失去土地。大磨坊主和商人由于在地主制中没有特殊的利益，所以也就不会妨碍土地的再分配。事实上，在印共（马）治下，他们的力量变强了：70年代，电力磨开始取代传统的木制脱粒机和数百万为其工作的妇女。由于90年代初监管的撤销，稻米磨坊不仅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还能挤掉小型中间人；这就使政府能够为印度拜占庭式的公共分配制度节省收获稻米的成本。[\[18\]](#)

从标志性的政府职务配额来看，左翼阵线并没有对于种姓、宗教和种族的社会歧视；土地改革的受益人是所谓的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穆斯林，这样他们在这里就比在印度其他地方获得了更多的保障。尽管他们的地位仍然是不稳。[\[19\]](#)在孟加拉邦社会几乎没有上升空间的极端边缘的群体中，原住民（adivasis）状况最糟糕。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年龄都低于15岁，并长期遭受着营养不良的折磨。该邦部落人口主要集中于西米德纳布尔（与奥利萨邦和贾坎德邦接壤）；其中桑达尔人（Santhals）最多。糟糕的医疗和教育对少数族裔（他们加在一起构成了西孟加拉邦人口的多数）危害巨大。几乎三分之二的穆斯林是文盲；在表列部落中，几乎为零的妇女识字率严重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健康。左翼阵线每年都在加尔各答的马坦广场组织纪念阿约提亚冲突受害者的活动，但是这从未发展为在西孟加拉邦废除种族歧视的运动（西孟加拉邦的穆斯林在文化和市镇生活方面几乎没有自己的代表）。西孟加拉邦所谓的表列与退步族群并不用对付印度其他地方有的大屠杀，但是左翼阵线对消除不平等的懒惰和公共服务的缺乏使这些人非常容易接受毛主义或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召唤。结果，西孟加拉邦开始通过例行的警察骚扰来提升自己的暴力水平，而在社会公益方面则更进一步退步了。

一种后共产主义模式？

在1991年连续第四次选战胜利后的僵局中，垂垂老矣的印共（马）领导层不得不面对两个创口：苏联共产主义的终结和（随着曼莫汉·辛格的财政部长在全国实行经济自由化）印度的发展主义模式的终结。印共（马）在人民院对辛格的政策给予了口头批评；但是在随后三年里，它在西孟加拉邦的领袖们却很好地遵循着这一路线。巴苏在1994年宣布了第一次公私合作。印共（马）转而效法中央政府，将西孟加拉邦重新打造为投资友好型的东南亚门户，并吹嘘本邦无组织的产业部门在印度规模最大（也是最便宜的之一）。[\[20\]](#)新闻标题中的数字是惊人的：1996到2003年间，西孟加拉邦吸引了超过13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其国内投资在邦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仅次于古吉拉特邦。邦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在邦内生产总值中，出口所占比例超过了1/10，与中国和东亚四小虎相比毫不逊色：2001年达到280亿美元。

不过，制造业的腾飞并没有使得西孟加拉邦重新成为产业中心，增加的只有裁员和紧缩。左翼阵线所追求的是“飞地经济”：一种规模小、效率高，并且能够稳定地获得资本、交通、

电力和水的经济部分，一成不变的农业劳动力群体和传统经济则围绕其左右。^[21]印共（马）领导层与其说是想恢复工业（以及工人的战斗性），还不如说是要在一片处女地上建立经济特区。在美国顾问的建议下，印共（马）按照世贸协定重新调整了农业的结构，并建立起加工水果和番茄农业出口区（大磨坊和承包商则准备为之服务）。著名的投资商里面包括了小吃制造商菲多利。不仅工会权利可以忽略不计，涉农企业还在销售农业投入品方面享有垄断地位；合同允许他们预先确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并且迫使农民改种经济作物。农业出口区被归为工业区，因此不受制于常规的土地限额。物价上涨使得印共（马）长期以来的天然支持者（小农和产业工人）的生活日益艰辛。

在转向北京模式的市场改革的同时，印共（马）领导层实现了世代交替。2000年，86岁的乔蒂·巴苏从首席部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将它交给了自己的门徒巴德哈德卜·巴塔恰吉（Buddhadeb Bhattacharjee），以此为下一年的邦大选做准备。权力交接酝酿了十年。长期以来就有谣言称，生活殷实的商人詹丹（Chandan），作为巴苏的儿子，从自己的家族关系和偷税中大获其益。1993年，巴塔恰吉向邦内阁请辞，以抗议行政部门和党的腐败，却没有招致任何责难；后来，由于他的清廉的公众形象，领导层便将巴塔恰吉视作卫道士。印共（马）上一代领导人——巴苏、达斯古普塔、科纳尔——曾是劳工组织家、地下工作者，常常受难入狱。而巴塔恰吉和比曼·波瑟（Biman Bose）（新一任西孟加拉邦党委书记和左翼阵线主席），都生于1940年代初的加尔各答，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作家大厦的走廊里度过。巴塔恰吉代表着印共（马）“温和”、“现代化”的一面：世界主义、第三条道路。他最初作为文化部长进入邦内阁——他曾经还是剧作家和翻译家，但后来又掌管警察事务。人们希望他会使党焕然一新，以击败一位危险的新对手。

复仇女神

当左翼阵线在仿佛不可动摇的选票支持下，开始加速自己的新事业时，化身为恶毒的国大党政客玛玛塔·班纳吉的复仇女神出现了。玛玛塔1955年生于加尔各答一个温和的中产阶级婆罗门家族，孩提时代就跟着父亲参加了国大党的集会。紧急状态时期，她由于在加尔各答包围迦亚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的汽车，并在引擎盖上跳舞而臭名昭著。在此之后，她便从国大党的学生（纠察）组织学生大会（Chhatra Parishad）中脱颖而出。1984年，她拿下了印共（马）加尔各答贾达沃普尔选区的人民院议席——这是印共（马）最稳固的议席之一。1991年，她加入纳拉辛哈·拉奥的内阁。在人格方面，她既可以是知心大姐，又能成为煽动家。尽管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但玛玛塔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则饱受争议——她的那些表演就包括在人民院当场掐住另一位议员的脖子，和在一场集会上威胁用自己的围巾上吊自尽。

由于多变的性情，玛玛塔·班纳吉成了近些年来国大党政客中不同寻常的人物。她在90年代中期和国大党分道扬镳，这主要是因为从拉吉夫·甘地和桑贾伊·甘地时代开始，她就将顽固的反共立场贯彻于自己的事业。1990年，印共（马）干部把她狠狠地揍了一顿，使她由于颅骨骨折而住院三个月，这就使反对印共（马）的战斗成了她的个人事务。1993年，她在作家大厦前组织了一次示威活动，警察开枪打死了13人，这就进一步地刺激她对抗左翼阵线。1996年，陷入腐败丑闻的国大党开始与印共（马）进行磋商，以期组成一个由小党组成的、将人民党排除在外的联合政府。如果联合政府成立，国大党将作为在野党加以支持，而乔蒂·巴苏则可能出任联合阵线政府总理。玛玛塔反叛了，她激烈抨击这种全国联盟的政治权术，这会严重削弱西孟加拉邦国大党旨在将印共（马）赶下台的斗争。她抨击孟加拉邦的国大党政客由于全国性的野心，而抛弃了草根阶层的利益。这样一来，便导致了最后的分道

扬镰。

1997年末，玛玛塔领导那些心怀不满的孟加拉邦国大党活动分子反叛出来，组建了受她掌控的草根国大党。90年代中期，她开始接触国大党的传统支持者之外的群体，例如印共（马）以复兴城市的名义而赶走的加尔各答街头小贩。同时，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失业率不断攀升，血汗工厂数量激增，但印共（马）下属的全印工会中心却由于“保护产业”而无法独立活动。1998年西孟加拉邦的人民院选举中，玛玛塔和最有可能给她的竞选活动提供启动资金的人民党就席位分成达成了协议。这是一个妥协的联盟：为了维持受压迫者斗士的表象，她不得不向人民党表示自己不会容忍地方自治主义。1998年的选战对印共（马）来讲是一次警示，它表明不稳定的城市各部门中不断滋长的犬儒主义和变革情绪。尽管印共（马）的得票率并未滑落至34%之下，但在加尔各答市郊的工业区，草根国大党和人民党却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在印共（马）自1952年以来只落败过一次的达姆达姆，党吞下了苦药：得票率低于10%，席位则被人民党夺去了。次年，草根国大党加入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玛玛塔登上了全国政治舞台。

在西孟加拉邦2001年的邦议会选举中，草根国大党拿到了31%的选票和60个席位，几乎将正牌国大党（得票率降至8%，虽然由于赢者通吃的制度还能弄到26个议席）扫除干净了。巴塔恰吉成为新任首席部长的印共（马）拿到了37%的选票和143个议席。巴苏和达斯古普塔建立的选举大厦——农村的潘查雅特的支持，城市的官僚俸禄和工会赂金，左翼阵线内低级盟友的山区票仓——显得岿然不动。2006年的邦议会选举使和国大党联盟的草根国大党的得票率降至27%、议席减半至30席，这就令阿里姆丁大街对自身的生存能力大为满意。由于和人民党共事，玛玛塔的形象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反穆斯林骚乱后受到了损害。因为她曾退出人民党内阁，而后和国大党联盟，但后来又和国大党闹翻了，人们便攻击她在政治上朝秦暮楚。

满意与危机

仿佛无敌的巴塔恰吉和他的工业部长尼拉帕姆·森（Nirupam Sen）纵容印共（马）手下的流氓分子强拆贫民窟、征购土地，尽其所能地推进他们事业的发展计划。加尔各答市郊小农贱卖的土地被用来建设停车场、购物中心和房地产。由于缺乏一个有力的政府反对派，人们的怨声载道并不管用。长期以来，印度的政党不仅有自己下属的工会和社会团体，而且还有自己的武装分子。西孟加拉邦政治文化中的暴力和腐败并不比印度其他地方更猖獗，但却有一些独特的表征。在印共（马）高层，当选的政客很少收黑钱：首席部长租住在公家的房子里，比较低调失意的党的领导人则居于惬意的乡间别墅。地头蛇（Local fiefdom）越来越成为火药桶，这是一个靠政治关系来捞取商业利益的阶层。对于任何挡在自己新生财之道上的人，他们会除之而后快。

汽车巨头塔塔汽车用2亿美元的甜头诱使西孟加拉邦为它新的“大众汽车”提供一间工厂。2006年，由于事先没有和将要搬迁的2万人协商，在胡格利区的辛谷尔镇，人们在预定作为厂房的997英亩基本农业用地周围垒起了障碍物。草根国大党将自己选区中的不满转化为全邦范围的抗议活动。12月，在媒体的保卫下，玛玛塔开始在加尔各答绝食。当积极而年轻的抗议者塔帕西·玛丽克（Tapasi Malick）被印共（马）党工和印共（马）当地党委头子（他们和建厂项目的施工活动有利益瓜葛）杀害，而后被烧焦的尸体在封锁区内被发现时，矛盾加剧了。

紧随2006年12月辛谷尔的抗议活动之后，印共（马）的罗什曼那·悉特（Lakshman Seth）

[22]公布了一项计划：邦政府和一家印尼集团将联合开发霍尔迪亚港（新的化工和石化产业中心）附近楠迪格拉姆的14500英亩土地。由于担心自己的安置问题，村民攻击了当地的潘查雅特办公室，并和警察发生冲突，随后封锁了道路。计划中的土地大约有65000人居住，其中主要是穆斯林以及低种姓农民和渔民。在封锁活动中，草根国大党领导起一个联盟。现在是左翼阵线的干部造反了。相当一部分干部退出左翼阵线，加入反对党。在2007年3月与塔塔集团签署合同前一个星期，邦政府耀武扬威，派出4000名武装警察，并在随后与20000人发生冲突。结果，14人被射杀，超过100人重伤（这很可能是由参与行动的500名印共（马）干部造成的）。

不像辛谷尔事件时那般强硬，在印共、革社党和联盟阵营威胁退出内阁后，左翼阵线政府不得不暂停楠迪格拉姆计划。从那时起，斗争便不再是产业领域的，而是为了争夺土地。这次屠杀后的几个月里，又有更多人死于零星的冲突和交火。该地区所有的印共（马）办公室都被捣毁了；党员和支持者的房屋和店铺被洗劫焚毁。当地印共（马）策划了一次行动，以重新夺回这一地区，并宣称得到了党的领导人的首肯。11月，数百名武装干部扫荡了该地区。巴塔恰吉公开宣称，要对抗议者“以牙还牙”。尽管他被迫撤回了这一言论，但却拒绝道歉。[23]政府的新政策是将烫手山芋一般的施工项目转移到更贫瘠的地区，比如西米德纳普尔和普鲁利亚（Purulia）——那里远离加尔各答周边的草根国大党基地。

2008年11月，从萨尔卜尼（Salboni）规划中的金达尔钢铁厂（Jindal Steel）回程的首席部长车队在西米德纳普尔遭到了地雷袭击。在毫无凭据的情况下，警方报复了附近拉尔噶尔赫（Lalgarh）的村民。村民又一次用障碍物将自己围了起来。桑达尔鼓（dhamsa madal）和手机将消息从一个村庄传向另一村庄。在附近原住民的协助下，村民们将运动带到了班库拉（Bankura）和普鲁利亚。由于担心重蹈楠迪格拉姆的覆辙，政府撤出了警察。但就像在楠迪格拉姆一样，随后几个月里充斥着派系冲突。与此同时，成立于一支当代纳萨尔组织基础上，并且迄今在西孟加拉邦并不活跃的印共（毛）也给予援手，并开始在当地招兵买马。当地青年接受了来自附近贾坎德邦和安得拉邦的组织家的训练，以保卫自己先前进行的绕开党和传统家长制的自治尝试。抗议者捣毁了印共（马）的办公室，和当地党组织头目阿努依·潘迪（Anuj Pandey）与他有钱的农用物资承包商兄弟新建的别墅。毛主义者将这片地区宣布为“解放区”。他们试图替代邦政府，向残存的政府行政部门“征税”，并且打压竞争者。巴塔恰吉召集邦和中央政府的安全部队，对该地区进行围剿，使数千人逃离家园。随后，草根国大党、毛主义者和其他独立活动家在拉尔噶尔赫发表联合起来，抵抗政府的镇压行径。

另一支左翼

这些农村骚乱风潮可以和中国类似情况相提并论。但在印度，极端贫困和政治自由（却被弊端重重的选举和繁琐的法律体制所败坏）的结合却产生了更为暴烈的结果。毛主义者不仅惹人注目地攻击了西孟加拉邦的警察哨所，还控制了被称为“丛林区”（Jungle Mahal）的贫瘠的西部高地（包括普鲁利亚、班库拉和西米德纳普尔）。[24]但这不过是毛主义所影响到的印度部落地带的一个小角落。那些毛主义影响最甚的邦里，部落原住民（他们常常居住于将待开发的矿藏之上）被孤立于原始森林之中。而西孟加拉邦的独特之处则在于，早先的运动——暴力镇压以及其后的农村改革——已经让农民放下武器几十年了。现在的毛主义者在这里和主流政治圈也有着更多的联系，并和其他抗议者以及一个主流政党保持着对话。在2011年邦大选中，他们甚至支持过一位独立候选人——被捕下狱的活动家恰哈特拉德哈尔·马哈托（Chhatradhar Mahato）；然而，在邦北部——纳萨尔主义就是从那儿得名的一

一廓尔喀和拉杰班希（Rajbanshi）分离主义者及其武装在80、90年代就非常有名。

印共（马）为何如此不顾一切地陷入辛谷尔、楠迪格拉姆和拉尔噶尔赫的灾难？2006年邦大选后，反对派变得支离破碎、软弱不堪。早先以“发展”的名义将贫民从家里赶走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在新的媒体环境中，手机或网络图片能激起舆论冲击波。由于党内缺乏政治论争，印共（马）便忽视了公众舆论。如果印共（马）能给基层更多的民主，草根国大党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靠着它的背叛者发展壮大。当然，大部分印度政党都被作为家族事业来经营，于是印共（马）的整齐划一也就合乎常理了，而它独具的斯大林主义纪律为执行邦委员会的决策提供了更坚实的支持和更盲目的执行。印共（马）最终做出了让步——他们把附近的1万英亩土地分给了骚乱者，并且保证不再强征土地，但是损害已经造成。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印共（马）与不受自己控制的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印共（马）在执政期间接受的第一次炮火洗礼是它在60年代联合阵线时期对纳萨尔主义的镇压。因此印共（马）真正具有的经验不是动员群众，而是镇压一场农民运动。这就使他它对自己标志性地坚决抵制“左倾冒险主义”颇为自豪。但是，和四十年前相比，印共（马）的干部在最近的冲突中所起的作用比邦政府的力量更大，后者几乎只是辅助性的；由于缺乏相应的研究，邦领导层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地方党员就不得而知了。受到威胁的并不只有“法律与秩序”。就像他们的指挥官罗什曼那·悉特在2008年初的一次采访中说的：草根国大党的政治竞赛计划是要“夺取我们的地盘，我们的政治领地。他们企图将我们印共（马）赶出楠迪格拉姆。如果这次成功，他们就会在其他地方如法炮制。”^[25]他大概在担忧草根国大党的工会对哈尔迪亚的工厂的渗透。

走向终结

在2008年5月的潘查雅特选举中，草根国大党——他们的新口号是“Ma, Mati, Manush”（母亲，土地，人）——在辛谷尔和楠迪格拉姆获得了胜利。在2009年的人民院选举中，它将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广阔的恒河三角洲：草根国大党赢得了42席中的19席，而印共（马）的席位则降至9席（所获席位仅为个位数，这在几十年里是头一遭）。2011年5月至至关重要的邦议会选举更是前景不妙。2011年1月，印共（马）的干部令人震惊地在尼塔伊村（Netai）附近杀害数人。草根国大党支起救助营，赢得支持并获得席位。

邻近2011年5月，巴塔恰吉引人注目地缺席了竞选活动，而玛玛塔则带着自己的“变革”纲领在全邦各地的大规模集会上抛头露面。印共（马）发誓会维持西孟加拉邦的稳定，并改善自身的领导和效率。他们的竞选活动注重实效：印共（马）致力于游说东南部的中间选民，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有四分之一是穆斯林，并且大部分是第一次参选的年轻人。在西米德纳普尔发生暴行的同时，印共（马）宣布进行了一次“整风”：为根除腐败，去年开除了24000名党员。^[26]印共（马）确实增加了穆斯林和所谓其它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在政府职务中的晋升名额。而另一方面，要促进西孟加拉邦的发展，就得从农民那儿取得土地；但他们以后不会如此“霸道”。简言之，对于自己试图争取的选民，印共（马）什么也没提供。印共（马）从右的方面攻击玛玛塔，说她是“个隐匿的毛主义者”。玛玛塔则反驳说，贫困是毛主义的根源。她在自己的孟加拉邦文宣言中承诺，改善丛林区、孙德尔本斯地区和北方的基础设施以及福利。英文版则打算进行第二次绿色革命，复兴工业并发展旅游业。由于反对邦政府的压迫和对穆斯林的边缘化，玛玛塔还得到了阿訇们的支持。

结果毫无悬念。草根国大党赢得了39%的选票和184个议席；它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则获得了48%的得票率和邦议会294个议席中的227席。印共（马）只获得了30%的选票和40个议席；

左翼阵线全部加起来也只有41%的得票率和62席——其中一半的席位留给了在册部落和种姓（Scheduled Tribes and Castes）。进步联盟和革社党则输掉了大部分席位，只在库奇比哈尔和杰尔拜古里（他们在那儿的主要对手是廓尔喀民族主义者）保住了些许议席。全邦的投票率是85%——许多人是第一次去投票，他们从不知道还有左翼阵线之外的政府，但也不知道往年的伤痛。在25岁以下的选民中，草根国大党以55%的得票率领先得票率37%的印共（马）。在即将离任的左翼阵线内阁（包括首席部长），34人中有26人失掉了自己选区，这显然是要印共（马）下台。大部分草根国大党的选票来自城市——加尔各答，胡格利和豪拉——以及北部和南部24区县中的大部分穆斯林区。说孟加拉语的穆斯林农民一般都是左翼阵线的支持者，但辛谷尔和楠迪格拉姆穆斯林农民的揭竿而起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支持。传统上受乌尔都语精英阶层支持的国大党拿下了以穆斯林为主的穆尔希达巴德[27]。印共（马）的选票大部分来自巴尔达曼和北/南部24区县。它在主要城市中并没有赢得任何席位——无论阿散索尔还是杜尔加布尔，更不要说更大的加尔各答了（它在那儿只拿到了66席中的1席）。在其曾经的堡垒巴尔达曼、班库拉和西米德纳普尔，尚存些许残迹。草根国大党的胜利并不完全由于公众参与；在巴尔达曼，他们就召集了曾经印共（马）的打手攻击党的办公室和支持者。[28]

资产负债表

印共（马）执政34年有哪些社会和经济成果呢？就大部分指标而言，西孟加拉邦基本上与全印平均水平持平（见表2）。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别日益扩大。由于印共（马）征地，失地人口越来越多：从1987年占农村人口的40%增长到2000年的半数（那年全印的百分比也只有41%）。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农村劳动力中只有一小部分从事耕种。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的多元化，许多人去市中心（常常是街头）找工作。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较90年代（那时，西孟加拉邦的经济增速仅次于卡纳塔克邦）有所下滑。虽然邦内生产总值仍然位居前列，但人均邦内生产总值却排名第6，夹在旁遮普和卡纳塔克之间。自90年代以来，西孟加拉邦的贫困率就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左翼阵线执政之初起，人类发展指数就基本没有多少变化：从1981年在印度主要邦中的排名第7降到第8。在医疗方面，新的独立的农村救护车和诊所带来了一些变化。婴儿死亡率位于全印最低之列，产妇死亡率也得到了降低。在教育方面，西孟加拉邦的资金投入比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和旁遮普要多，但辍学率仍然惊人。

表2. 西孟加拉邦与全印的发展

	西孟加拉邦	全印
邦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01-2010	6.7	7.6
贫困率（%），2009-2010	32.5	32.2
产妇死亡率（每千人），2004-2006	141	254
婴儿死亡率（每千人），2009	33	50
儿童营养不良率（%），2005-2006	37.6	40.4
初等学校辍学率（%），2007-2008	63.9	43
7岁以上人口识字率（%），2011	77.1	74

来源：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展望和政策挑战》（Prospects and Policy Challenges in the Twelfth Plan），载《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11年5月21日。

选举结果公布后，印度和西方媒体用幸灾乐祸的冷战语词来描述印共（马）的失败——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衰退后，选民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枷锁。但玛玛塔的政纲是什么样的，这甚至连她的发言人都不是很了了。为助玛玛塔一臂之力，印度财长普拉纳布·穆克吉（老政客，孟加拉邦国大党的首领，曾经是英迪拉·甘地的副手）向西孟加拉邦投入中央政府的资金，解决了印度最大的邦赤字问题。玛玛塔·班纳吉自编自导的个人崇拜（令人想起北方邦的玛雅瓦蒂）拿下了关键地区的农村选民。国大党30多年来在这些地区保持着相当的得票率，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印共（马）是从左边被选下去的，这是对他们1977年掌权的历史性逆转。巴塔恰吉和波瑟正拖着这个全国性政党的后腿：印共（马）在2005年反对通过《经济特区法案》和2008年反对印美核协定与西孟加拉邦党委的实践绝然对立。^[29]但中央委员会却未撤换孟加拉邦的领导人。他们奋力挣扎——选票还没有完全蒸发干净。他们坚称自己清白无暇：比曼·波瑟拙劣地表示，他们的纲领将重新建立起与人民的联系并改正本党干部的错误。^[30]尽管和国大党的糜烂相比，印共（马）已经表现出相对的清正，但下层的腐败和暴虐决不能只当作陈规陋习来处理。

成为反对派或许会使印共（马）重生；但是这似乎不大可能。比较有可能的景象是，到2016年下一次邦大选时，印共（马）的资金网会枯竭，从而进一步遭受损失。印共（马）正在步入脱离于国际和群众运动的政治荒原，而只有国际和群众运动才能使它的党员改头换面，并使它的领导层更新换代。在基层，党员的流失已经开始产生组织上的后果了：全印农民联盟（the Kisan Sabha）的成员数已经从2008年的1590万下降到2009年的100万。^[31]议会外组织从属于选票路线：工会和农民联盟、学生和妇女组织并不是根据党的路线来提高公众利益。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荒谬场景：在和同一个老板的斗争中，不同的工会自己也相互激战起来了。印共（马）未能成功将社会运动和执政结合起来。相反，他们安于空洞的胜利，而这种胜利所仰赖的邦议会议席数与自己的真实得票率极不相称。赢得选区（而不是获得更多的支持并为进步而斗争）成最终的目的。

在阵线内其他各党（尽管它们在政府内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参与下，左翼阵线这个联盟所得的票数和席位常常是名实相符的，这就形成了印共（马）的群众支持的海市蜃楼。经历了多年的选举联盟后，它们越来越严重地囿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在整个邦内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身份。尽管印度是垂直型社会，但小党常常能在赢者通吃的政治中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大选后，进步联盟和革社党抛弃了印共（马）的领导，但这又产生了它们接下去跟着谁的问题。对于印共和印共（马）的重新合并，争论由来已久，而现在看来则愈发可能：印共一般是国大党在议会中的垫背，现在印共（马）也是这样的命运。如果从左翼阵线那里抢救不出什么的话，那新一代人就必须自己去建立起独立左翼政党、社会运动的无党派激进分子和部落地带极左翼的联盟。

注释：

^[1] 孟加拉邦的历史概况，可参见普里曼·阿迪与伊卜讷·阿扎德：“孟加拉邦的政治与文化”，《新左翼评论》第1编第79期（1973年5/6月号）（Premen Addy and Ibne Azad,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Bengal”）。巴巴拉·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s-White）和亚齐·瓦纳伊克（Achin Vanaik）对该文进行了富有洞见的评论，为此我向他们致以谢意。

^[2] 圣牛带（Cow Belt），指印度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

^[3] 1964年分裂后，印共自称全国共有106000名党员，而印共（马）则有119000名党员，

而不久后的再次分裂削弱了印共（马）的党员数。关于此问题的批判性的历史考察，参见克·达莫达兰：“一位印度共产党人的回忆”，《新左翼评论》第1编第93期（1975年9/10月号）（K. Damodaran, ‘Memoir of an Indian Communist’）

[4] 1962年粮荒期间，在西孟加拉邦达姆达姆地区，人们攻击了囤积粮食的商人，并扩散至其他地区。这一运动就被称为“达姆达姆药”（Dum Dum dawai）。——译者注

[5] 根据宪法，17个邦的司法当局被授权按户口处置本邦土地。在西孟加拉邦，1953年的《地产购买法案》规定了占有（“授予”）土地和进行补偿的程度；1955年的《土地改革法案》规定，分给每个家庭5至7公顷（大概相当于12至17英亩）的受灌溉的田地，个人则是2.5公顷（大约6英亩）。

[6] 苏曼塔·巴纳吉：《印度蓄积已久的革命：纳萨尔起义》（Sumanta Banerjee, *India's Simmering Revolution: The Naxalite Uprising*），伦敦，1984年，第137页。

[7] 见邦内政部数据；在一份不久后大赦国际发布的报告中，这一数字为2万人，其中大部分被认定为纳萨尔分子，但也包括许多印共（马）党员；“西孟加拉邦的监禁状况”（Detention Conditions in West Bengal），重印于《经济政治周刊》（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1974年9月21日。由于支持紧急状态，认为它是对付反动势力的必要手段，印共便陷于声名狼藉之中，并最终走向衰落。

[8] 全印进步联盟：由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建立，现在很大程度上退化成了对他进行个人崇拜的组织，只在西孟加拉邦有影响，主要集中于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和库奇-比哈尔（Cooch Behar）地区。革命社会主义党：可追溯到阿努什兰·萨米蒂（Anushilan Samiti），与印共（马）类似，但是却从未加入共产国际；在贾尔拜古里和印度其他地区茶场的原住民工人中有很大的影响。

[9] 见莫诺比那·古普塔：《孟加拉邦的左翼政治》（Monobina Gupta, *Left Politics in Bengal*），海德拉巴，2010年，尤其是第2章。

[10] 即分成佃农。——译者注

[11] 见当时土地改革专员德·班蒂欧帕迪阿伊：“西孟加拉邦的土地改革：回忆哈里·克里希纳·科纳尔和本诺伊·乔杜里”（D. Bandyopadhyay, “Land Reform in West Bengal: Remembering Hare Krishna Konar and Benoy Chaudhury”），《经济政治周刊》，2000年5月27日。

[12] 对该问题批判性的概述见罗斯·马利克：《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发展策略：1977年以来的西孟加拉邦》（Ross Mallick, *Development policy of a Communist government: West Bengal since 1977*），剑桥，1993年。

[13] 印共（马）中央在德里经营着一家英文出版社“左翼文字书屋”（LeftWord Books），并出版一份理论季刊《马克思主义者》（The Marxist）；但其中能见到的基本都是党的路线，真正的讨论则难觅踪迹。

[14] 薄陀罗卢迦（Bhadralok），“受人尊敬的人”，“体面人”，包括婆罗门、卡雅斯塔以及拜迪雅等高等种姓；这些前士绅鄙视体力劳动者、商人和贫民。

[15] 对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记录的系统对比，见亚齐·瓦纳伊克：“印度的左翼战略”，《新左翼评论》第70期（2011年7/8月号）（Achin Vanaik, “Left Strategy in India”）。

[16] 从普拉纳卜·巴德汗就这些问题的看法中，我受益颇多，在此致谢。见巴德汗：“印度左翼可以避免采用的策略（二）”，《经济政治周刊》，2011年6月11日（Pranab Bardhan, “The Avoidable Tragedy of the Left in India - II”）。

[17] 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不多于2.5英亩的家庭所占比从1980年的28%升至1995年的43%，据《西孟加拉邦农业人口普查》（West Bengal Agricultural Census）。

[18] 巴巴拉·哈里斯-怀特：《农村商业资本：西孟加拉邦的农业市场》（Rural Commercial Capital: Agricultural Markets in West Bengal），德里，2007年。

[19] 1960年代末，仍然留在东孟加拉地区的印度教贱民脆弱无力，在政府暴力之下求生图存：在自己的许多社区被中央政府所破坏后，他们被遣送至不说印地语的其他邦；他们最后试图回到西孟加拉邦。在今天恰蒂斯加尔邦的丹达卡兰雅森林（Dandakaranya）中，一批试图回归西孟加拉邦的印度教贱民安营露宿，却悲剧性地被当地原住民当成入侵者驱赶出去。70年代末，孙德尔本斯的红树林中，就有长途跋涉而来的大约3万低种姓难民。左翼阵线政府以保护生态保护区的理由，禁止他们定居，并派警察驱赶。在新建的马里齐雅皮村（Marichjhapi），最后导致了236人死亡。见马利克：“森林保护区的难民定居点”，《东亚研究杂志》第58卷第1期，1999年2月（Mallick, “Refugee Resettlement in Forest Reserves”，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西孟加拉邦低收入人群所占比也超过了全印平均水平。

[21] 关于“飞地经济”，见弗朗辛·弗兰克尔：《印度的政治经济：1947—2004年》，第二版（Francine Frankel, *India's Political Economy: 1947-2004, 2nd ed*），德里，2005年，第14章。

[22] 前印共（马）国会议员，哈迪亚发展局局长，曾因在工会鼓动中成效显著而引人注目。

[23] 后来，由于允许伊斯兰主义暴徒在一份反对孟加拉文小说家塔斯丽玛·纳斯琳（Taslima Nasrin）的宗教裁决后，将她逐出加尔各答，巴塔恰吉进一步疏离了知识分子。在这些暴徒中，还包括为楠迪格拉姆事件中受害穆斯林申诉的抗议者。

[24] 孟加拉语中的“丛林”指森林或者灌木丛，含有“未开化”的意思。

[25] 维·喀·沙什库马尔：“楠迪格拉姆行动内幕”，《印度防务评论》第23卷第1期（2008年）（V. K. Shashikumar, “Operation Nandigram: The Inside Story”，in *Indian Defence Review*）。

[26] 巴鲁恩·高什：“1000人被印共（马）开除党籍”，《加尔各答电讯报》，2011年1月16日（Barun Ghosh, “1000 Face cpm Axe”，in *Calcutta Telegraph*）。

[27] 在莫卧儿帝国时期，该地是孟加拉地区纳瓦布的府邸所在地，即该地区行政中心。（纳瓦布，Nawab—，乌尔都语音译，莫卧儿帝国各邦/省区总督的称号，后演

变为尊称。——译者注)

[28] 斯米塔·古普塔：“巴尔达曼：被包围的左翼” (Smita Gupta, “Bardhaman: Left under siege”), 《印度教徒报》，2011年4月12日。

[29] 曾有计划在哈里普尔 (Haripur) 建设一座核电站。哈里普尔的海岸线是全球气旋最高发的海岸线。这一计划由于当地渔民的抗议而被搁置。

[30] 见印共 (马) 西孟加拉邦邦委官网: www.cpinwb.org.in。

[31] “全印农民联盟领导人承认印共 (马) 基础动摇，”，《政治家报》 (“CPM Losing Base, Admits Kisan Sabha Leadership”, in *The Statesman*) , 2010年12月30日。相关文章还有：玻利瓦尔·埃切维里亚的《“波将金”共和国》 (Bolívar Echeverría, *Potemkin Republics*) 和亚齐·瓦纳伊克的《次大陆的策略》 (Achin Vanaik, *Subcontinental Strategies*) 。

鲁哈尼政府代表谁的权益？



: Siegfried (译)

编者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一定的政权、一定的政治结构是服务于一定的社会集团并受到后者的支持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神权政权也是如此。作为特定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它必然地服务于一定的资产阶级集团，并受到它们的支持。所以，伊斯兰共和国并不因为它的神权性质，而超脱于生产关系内部的社会阶级之上，受到它自诩的真主的护佑。下面这篇文章将告诉我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神权政权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哪些集团，并受到哪些集团的支持的。就此来讲，它撕破了神权政权虚伪的神圣面纱。

社会研究者和政治分析师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政治实践不应该，也不能被归结于这个或那个人的个人行为。他们进一步认为，这些实践是在一定时期掌握政治权力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的行为的产物，这些阶层和阶级运用政治权力维护自己短期或长期的利益。

如果考察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权力机构和制定政策的核心部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阶层和阶级的权力分配和影响。通过密切关注伊朗资本和财富积累的主要中心，并研究它们对伊斯兰政权的政治权力结构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衡量其他社会阶层（比如工人、农民以及社会边缘阶层或他们的政治代表）在伊朗政治和经济决策实体中的真实面貌和影响：边缘甚至中等阶级或他们的政治代表在决策实体中是非常没有地位的。事实表明，社会的边缘阶层不仅被排斥于权力结构之外，而且甚至他们在政治结构之外的社会领域中——在这些领域中，社会阶层和阶级的运动在实践上会导向各种利益的冲突——的作用和影响也由于政治压迫和镇压而在组织上极其分散。本文将试图勾画出资本集中、金融机构以及信贷机构这三根权力支柱的真实图景，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这三根支柱在统治我国的现政权的结构中的作用。

第一，“最高领袖办公室”控制了主要非政府部门中最重要的组织：“伊斯兰革命受压迫者基金会”（前身为“受压迫者与伤残战士基金会”）、“伊玛目霍梅尼救济基金会”、“烈士与退伍军人事务基金会”（ ）、“伊斯兰革命住房基金会”、“霍尔道特月15日（1963）基金会”^[1]、“伊斯兰发展组织”（ ）、“圣战纳斯尔机构”（ ）、“圣战独立机构”（ ）、“促进教育、文化与研究学术中心”（ ）、“圣战发展机构”（ ）、“伊斯兰宣传协调委员会”（ ）、“阿亚图拉玛拉什图书馆”（ ）和“执行伊玛目指令总部”（ ）。所有这些金融和经济机构都在伊朗经济中相当活跃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在伊朗神权政权的“最高领袖办公室”的指导和监督下运作，从当前经济食利制度中获益。必须指出的是，伊斯兰革命受压迫者基金会拥有103家子公司。而执行伊玛目指令总部（它雇佣了一大批高级主管和官员）则在最近宣布自己的资产总额超过了950亿美元。

第二，经济和军事组织的另一部分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抵抗力量”、“警察”、一大批金融和信贷机构、银行、投资和承包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下属机构，比如

“哈塔姆建筑指挥部”（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法力量合作基金会”（ ）， “伊斯兰革命卫队合作基金会”（ ）， “迈赫尔金融与信贷机构”^[2]（ ）， “迈赫尔甘投资公司”^[3]（ ）， “伊朗迈赫尔经济投资公司”（ ）， “安萨尔银行”（ ）等。

第三，不过，最重要的所谓“金融与经济团体”是：“礼萨圣陵基金会”（ /Astan Quds Razavi）、“圣洁的马苏玛圣陵基金会” Astan-eHazrat Massoumeh）、“默萨拉-内贾德文化基金会”（ ）、“码头基金会”（ ）、“阿拉维基金会”（ ）、“阿里·哈默达尼安与侯赛因·哈默达尼安慈善基金会”（ ）、“拜因-阿尔·礼萨慈善基金会”、“穆萨维健康护理组织”，“巴赫曼月22日慈善基金会”^[4]、“穆斯林福利基金会”、“伊玛目萨迪克社会研究所”和数十家或在“最高领袖办公室”或在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门控制下的金融和信贷机构。这些机构不受政府控制，也不纳税。他们靠自己的地位获取经济利益（经济租金），并活跃于各经济领域。他们还利用内部消息炒股，并打着私有化的旗号侵吞公共和国有财产。伊朗的日常决策严重地受制于这些机构。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私营部门意味着腐败的亿万富翁，比如萨迪克·马赫苏利（ /Sadegh Mahsouli）、巴巴克·赞贾尼（ /Babak Zanjani）、沙赫拉姆·贾扎耶利（ /Shahram Jazayeri）、拉菲赫杜斯特兄弟（ /Rafighdoust）、甚至阿斯贾洛拉迪兄弟（ /Asgaroladi）以及其他栖居于商会中的寄生虫。过去三十年里，所有这些一夜暴富的亿万富翁之所以能攫取经济利益正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参与寄生性的投资活动，而这些投资活动并不能带来生产性的（或者按他们的话说是创造就业的）资本主义。如今，伊朗那些最大的经济垄断部门不是在“最高领袖办公室”的控制下，就是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以及安全和警察力量所有。如果考察整个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内掌握权力的机构，并分析这些机构与社会阶级的关系，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垄断的和官僚的^[5]大资本完全控制了权力杠杆。

问题是，鲁哈尼政府在当前局势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在维护哪些部门和社会阶级的利益？它是否代表着上面所描述的权力和财富三大支柱？对这些问题，统计数据的答案是，当前政府的首脑代表了倾向于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他代表了官僚资本主义中的这一部分人：由于最近几年经济制裁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在当前的局势下，试图通过解决与欧美的关系危机、修复与全球资本的关系来寻求自己的利益。正是在这一关头，右翼改革派和哈什米·拉夫桑贾尼集团之间建立起强大的政治联盟。事实上，作为伊朗的新自由主义教父，拉夫桑贾尼可以通过结合官僚资本主义与右翼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来领导这一联盟。在这个联盟形成几个月之后，发生了这些事：2013年6月总统大选，最高领袖对拉夫桑贾尼大加赞扬，拉夫桑贾尼的儿子从英国回来清理拉夫桑贾尼家族的事务，拉夫桑贾尼本人不声不响地重新控制了阿扎德大学。如此一来，右翼改革派的立场和他们为赢得大选而做出的承诺便大可怀疑了。

伊朗官僚资本主义对于两套不同政治方案的追求，使得一些政治力量无法确定以致误读了鲁哈尼政府的本质。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采用的冒险主义的和镇压方式制造出虚假的危机，以掩盖真正的危机，也即由于社会运动而导致的政权内部的危机。事实上，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本身就是一届危机政府，旨在将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挽救于社会运动导致的政治危机中。为推动这一政策，当政政权打出了最冒险的牌，严厉压制社会与政治抗议运动浪潮。

鲁哈尼政府实际上也是一届危机政府。面对最近两年凄惨的形势，当政政权正试图通过玩弄政治手腕、操控偶然的危机并利用2009年大选中被镇压的社会运动提出的口号，来玩弄社会运动、稳固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并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是“大棒”政策的工具，而鲁哈尼政府看来则是“胡萝卜”政策的工具。前者镇压社会运动，后者则试图窃取社会运动的口号，使之归于无用。

在此必须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相当一部分政治力量误以为资本主义在一切情况下都会政治上以同样的方式行动。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不同的情况下，由于不同的原因，资本主义在政治上会以不同的方式行动。这些情况可以是转型的危机，可以是资本主义自身特有的危机，或者也可以是与资本积累和集中的具体方式相关的危机，以及等等。这些情况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当中创造了自由主义的、法西斯的、波拿巴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以及其他的政治形式。伊朗的官僚资本主义，既由于自己的立场也由于自己的经验，能够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将自己拉出危机的泥沼。根据我们对35年来统治伊朗的神权政权的认识，我们决不能让这个政权在伊朗发展的紧要关头搅混社会运动、分化进步力量。这一政权之所以在最近几个月里改变自己之前制定的策略，是为了维护在这一体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腐败的、压迫性的集团的利益。有一点很值得深思：虽然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共和国在过去的35年间相互关系起起伏伏、对立重重，但有两件事本可以改变社会力量对比，并使伊朗的发展朝向进步方向，却没有发生。第一，是在稳固的、并且能适时形成相应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稳定的、民族的、生产性的经济。1979年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政治阶段的戛然而止，以及它最终灾难性的失败造成了资本主义以一种官僚的、寄生的、食利的、非生产性的和腐败的面貌得以重建。这种资本主义的根源是伊斯兰共和国腐败的官僚体制。第二，政权内部的冲突（尤其是改革派内部的）并没有产生出致力于社会公正的民主的和革命的力量。新自由主义思想渐渐地改变了一部分进步力量（无论这些力量是改革派内部的还是左翼谱系中的），并腐蚀了他们的革命的、民主的和追求公正的理念。群众运动脆弱的原因之一，正是一大批社会知识分子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思想。

如果革命的、民主的进步力量幻想能够依靠阿克巴尔·拉夫桑贾尼集团以及鲁哈尼先生的现政府来使社会朝向公正与进步，那将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这些政权内部的集团和个人既不能也不会做出如此重大的举动。无论是拉夫桑贾尼的行动、鲁哈尼的政府还是伊朗新自由主义者的计划都不会朝向进步。只有通过在反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反对种族、宗教和性别歧视的斗争中发动一场有着自己独立要求并追求公正的社会运动，才能够实现社会进步。事实上，即便鲁哈尼政府并不是一届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府，而是有着进步倾向，但由于根本上服从于最高领袖，它还是没有能力发动群众参与社会运动，并推进大众的、追求公正的事务。因此，我们必须说，鲁哈尼政府既没有权力，鲁哈尼本人也没有意愿进行根本的经济社会改革。为了击败官僚资本主义（前面所描述的它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使它能够采取各种镇压方法），只有一条现实的进步路线，那就是动员和组织人民和劳工群众。在这条道路上，伊朗的民族民主力量的团结是急迫而且重要的。

编者注：

[1] 霍尔道特月是伊朗新历的3月，霍尔道特月15日即公历6月5日。1963年6月5日，霍梅尼因斥责当时伊朗国王巴列维所进行的具有进步性质的改革而被拘捕，从而引发伊朗各地的暴动。

[2] 迈赫尔月是伊朗新历的7月。

[3] 迈赫尔甘（ ）是伊朗的秋节，该词的本意是“光明、友好、爱情”。

[4] 巴赫曼月系伊朗新历的11月，巴赫曼月22日相当于公历2月11日。1979年2月1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5] 原文为 **tenderpreneur**，是指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通过官商勾结，利用政府招投标而发财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就是官僚资本。



德国共产党与世界革命危机[1]



：优素福·蒂姆斯〔Yusuf Timms〕
Sovietlije (译)

译者按：本文译自《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第140期(2013年秋季号)。作者优素福·蒂姆斯梳理了德国共产党在从建党伊始至1923年秋在德国酝酿和发动革命的尝试及其失败。在叙述中，作者分析了德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认为未能把握足够的群众是德共失败的原因之一。除了对德共自身的分析，本文还涉及了共产国际和苏俄领导层与这次失败的关联，以及这次失败激化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斗争，并使十月革命之后一直存在的世界革命前景归于破灭。作者最后认为，德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初的这次失败对于当今西方左翼面临经济危机时采取怎样的策略是由巨大的借鉴作用的。

今年是“德国十月”九十周年，这场流产的社会主义革命标志着冲垮了大部分中东欧君主制政府的战后革命浪潮的终结。在1923年秋，一度存在着这样的现实可能性：六年前在俄国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将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对于陷于困境的苏俄领导层来说，在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起工人政权，不仅会使国际社会主义的前景发生实质性的转变，而且还能将他们从国内危机中解救出来。

成立于1918年11月的德国共产党迅速成为苏俄之外最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它始终未能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将持续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转化为推翻国家政权的革命。要理解事情为何如此，就必须考察德共为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革命目标而采取的不同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判断这个组织是否相信自己确实被赋予了在德国进行一场革命的机会。

在这段时期，恰恰是那些构成革命形势的因素导致了德共的分裂。争取工人群众，使之由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向革命的共产主义，这是公认的革命前提。但是，不同于布尔什维克，德共不是和起点相当的孟什维克争夺规模微小的工人阶级的心灵与头脑，而是面对着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并且在政治上拥有数百万工人支持的社民主义组织。为赢得对那些工人政治领导地位而确定并实行的相应策略——具体来讲则是对党与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由社民党的反战派别别建立于1917年）以及工会的关系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导致了党内关系持续不断地紧张。

自建党伊始，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老练的德共领导层就努力抑制异常缺乏经验、最近才激进化的党员的革命热忱。这些党员将参与工会和新国民议会的选举视为从直接行动上的倒退，而正是后者结束了战争，并摧毁了帝国。在基础广泛的革命行动的背景下，德共仍旧是工人阶级运动中微弱的少数派这一事实仿佛无足轻重。革命行动，以及党如果要发展就必须吸引那些参与行动的人的想法，影响了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对斗争的消长敏感地多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一些人寻求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理解之下发展革命组织，另一些人则表达着冲动、自发的革命热潮，正是二者间的张力使得德共试图将自己置于1919年柏林起义的先锋地位（虽然领袖们知道这是一次挑衅，并且在某些方面类似于18个月前彼得格勒的

七月事件，注定会成为一场灾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在党内“右”翼和“左”翼的裂痕（产生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死后）中找到了更加显著的表现。党内左右翼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领导层的持续不稳，这就使党无法制定贯彻始终的政治信条从而作为一个整体与工人阶级打交道。

只有结合国际背景，才能充分理解德共对革命策略的探讨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部裂痕。因为德共是俄国革命浪潮推动下迅速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从 1919 年春开始，这一运动通过共产国际加以组织。由于德共和其他党是被作为组织和领导世界革命的工具，因此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共产国际便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德国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经过一个复杂的进程，俄国革命的命运和共产国际的命运之间建立起了内在关联，而德共也越来越服从于共产国际和苏俄领袖的指导权威。

钉入风中：1920—1923

在我们的运动史中，很少有党会历经德共所遭受过的火的洗礼。在成立一周年时，因为柏林和巴伐利亚起义，德共最老练的领袖被政府军杀害了，一起遇害的还有数以百计（可能数以千计）支持和同情它的人。在德国的许多州内，党被定为非法，而它的党员则面临着警察和雇主的镇压。党以惨重的代价满足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向群众展现自己的革命热忱以及自我牺牲精神。

对于仍留在德共中的人来说，1919 年的灾祸带给他们的印象虽然深刻，却绝不一致。许多缺乏经验的新党员能够看到党的弱点在自己的血腥失败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但他们也看到，正是参与了反对共和国的革命行动，党才能在 1919 年吸引鲁尔区和其他地方的数千工人武装抵抗“自由军团”^[2]。除此之外，社民党政府的举动也使他们确信德共一大做出的抵制大选、不参与工会的决定是正确的。

不过，幸存下来的领袖们却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结论。新领导集团中的保罗·列维、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以及其他开始相信，正是党的行动使自己孤立于工人群众。在 1919 年秋召开的德共二大上，列维决定改变党的策略，参加选举并全面参与工会，这就使他与党的激进极左翼分道扬镳，从而导致 10 万党员中将近一半人被开除出党。

虽然开除这些人使党在组织上更加虚弱，但列维希望政治统一性的提高和路线的变更能够使党在稳固得多的政治基础上发展壮大。不过，许多仍留在德共内的党员对那些被开除的人抱有强烈同情——虽然他们并不准备让自己也被开除。列维或许在党代会上获得了支持，但党的新领导层仍要想方设法使党在实践中遵从他们的路线，更何况党的左翼在柏林依然非常强大。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描述德共左右翼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袖们之间复杂的作用关系。但是，1920 年 3 月未遂的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和 1921 年 3 月德共未遂的全国性进攻，这两件事尤其不仅显露而且加深了在整个革命时代伴随着党的裂痕。

在保守官僚沃尔夫冈·卡普的带领下，一部分军人和“自由军团”企图通过政变推翻社民党政府。这场政变激起了由社民党右翼工会领袖所领导的全国总罢工。罢工的规模和鲁尔区工人的武装抵抗迅速击溃了政变。虽然德共在一些地区试图将自己置于运动的领导地位时，但党的领导层最初却谴责罢工的号召是在将工人拖入两个统治阶级集团之间的争斗。这造成了广泛的误解，尽管列维和布兰德勒的尖锐批评能将党拉回更有前途的路线，但对德共来说

为时已晚，它已无法从这些事件中获益。独立社会民主党反而成为这次政变的主要受益人，它的影响在此后迅速增长。

在此之后，应该组建哪种类型的政府成了中心问题。社民党领导层的行动严重损害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除非新政府的事宜得以解决，否则工人不准备停止罢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会领袖们提出了由工人阶级政党（社民党，独立社民党以及德共）和工会共同组建“工人政府”的想法。经过一些争论，德共决定不加入这样的政府，因为大多数工人并不认同它的目标。但是，它明确表示，自己会把这样的政府视作一种积极的发展。1920年3月26日的《红旗报》[3]概述了德共的立场：

党宣布，它的工作将继续保持忠实的反对派的性质，直到政府不再违背对于工人阶级政治活动自由的保证……党并不准备进行一场革命政变，但将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直到对自身理念的政治宣传得到重视。[4]

这表明，在与其他工人阶级组织的关系方面，德共明确转变了自己的看法。“忠诚的反对派”路线类似于1917年8、9月相应事件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基础上，德共能够在不进行妥协退让的前提下，通过参与仍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框架内运作的政府，来与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掌握的工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行动。[5]

“工人政府”的理念最终被独立社民党拒绝了，该党左翼认为这一提议不过是1918年11—12月社民党艾伯特-哈泽政府的翻版。不过，由于转变了对其他左翼的看法，德共便能够提出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倡议，通过联合非共产党工人发起运动而使之更加接近党。

通过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条新路线进一步获得了列宁的支持。这本小册子是列宁在1920年春为即将到来的共产国际二大而撰写的。在他首先对德共左翼的批评中，列宁攻击了这样的观点：革命者不应该在争取个别诉求的斗争中与社民党共事。因此，虽然指责德共无批判地接受“工人政府”的理念（列宁斥之为完全的误导），列宁还是支持制定“忠诚的反对派”路线：“这篇声明，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6]

列宁写作这篇小册子的动机不仅在于警告左翼带来的危险，还在于制定策略，以将欧洲各国中派政党（例如独立社民党）的普通党员引向共产党人（约翰·罗斯在《国际社会主义》第138期上对此有详细论述[7]）。这项工作于1920年12月取得了巨大成果——当月，独立社民党投票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并与自己的右倾领袖决裂。大部分党员随后并入德共。这场共产国际希望在法国和意大利加以复制的壮丽胜利，让人觉得共产党人占据斗争领导地位的新时代开始了。

与独立党人的合并使德共在一夜之间由数万人的小集团变成了拥有45万工人阶级成员的党，成为苏俄之外第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在党获得的新力量的鼓舞下，由保罗·弗勒利希和来自柏林党组织的两位年轻知识分子——鲁特·费舍尔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所领导的左翼开始主张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

但列维不为所动。他坚信，列宁对“左派”的攻击和成功分裂独立党人证明了自己路线的正确性。借助斯图加特当地党组织的倡议，列维与共产国际驻德代表卡尔·拉狄克一道起草了一封致所有其他工人组织的《公开信》，号召联合起来为争取个别诉求而行动。这些组织

的领袖们坚决拒绝了这份倡议，尽管它在普通成员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8\]](#)而其他地方发生一些的事件将决定列维的命运并使德共的路线发生激烈转变。

三月行动的发动声名狼藉地卷入了德共内部不同集团、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层之间的利益纠葛。对于保罗·列维、他的德共领袖地位的终结以及之后事件的详细考察可以在《国际社会主义》第 136 期中塞巴斯蒂安·泽厄特迈尔与约翰·罗斯合作的精彩文章中找到[\[9\]](#)。我们在此只需提一下，一旦列维及其支持者由于失去信任而从领导层辞职，左翼便能毫无阻碍地实行他们的“进攻理论”了。

3 月 16 日，警察占领曼斯费尔德矿区，这激起了当地工人的武装抵抗，并迅速波及整个德国中部。中央[\[10\]](#)觉得这是一个实行自己计划的机会。次日，德共号召工人武装起来，宣布举行起义。结果是灾难性的。[\[11\]](#)经过与军队和国家警察一个星期血腥而毫无结果的冲突后，“进攻”显示出自己不过是一场可怜的冒险，它所获得只是最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的死亡。德共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立，在政府的攻击下蹒跚而行，共产国际代表贝拉·库恩则启程回到莫斯科，留下中央收拾残局。列维随后透过独立报章（也就是说不通过党的出版物）抨击了三月行动。这招致了党和共产国际领导层的严厉批评，并最终使他被开除出党。不过，一旦尘埃落定，党遭受了一场严重失败已是显而易见时，列夫·托洛茨基和列宁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和德共左翼。六个月后，共产国际正式声明转向“统一战线”，这有力地表明了对列维政策的回归（而由于承认这一点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才延期发表声明）。

在德国，始于 1922 年 6 月并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导致了产业领域战斗精神的复兴，促使工人进行斗争，以争取与价格上涨一致的工资涨幅。共产党提出了提高工资、对关键商品实行价格管控的要求。那时的形势不仅使这一诉求在非共产党工人中赢得了同情，同时也让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的基层领导层对此更加难以拒绝[\[12\]](#)。此外，德共还积极领导政治运动（比如瓦尔特·拉特瑙被极右翼分子刺杀后的反法西斯运动）。不管这些个别运动取得了怎样的成功，正是统一战线帮助重建了德共已告瓦解的干部队伍并加强了它在非共产党工人中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统一战线实行一年后，德共党员数从三月行动后的大约 15 万增长到 328613[\[13\]](#)。党内仍有阻碍稳定的政治派别，其中最重要的是由费舍尔和马斯洛夫领导，并在柏林、汉堡以及鲁尔有着相当基础的“左翼反对派”。但在 1922 年末，中央至少能对组织层面的工作感到满意，1921 年 3 月党遭受的巨大创伤正在迅速愈合。不过，事情将发生戏剧性的转变。

1923 年的十月：命定的日子？

1923 年是德国糟糕的经济状况恶化为灾难的年份，它将饥饿和困苦加于德国工人阶级。这一年还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危机，极左翼和极右翼组织的支持率也急剧攀升。引发这些事件的是法军在 1923 年 1 月为报复德国未能按时支付赔款而对鲁尔区的占领。右翼的库诺政府号召进行“消极抵抗”（包括它所称的“爱国罢工行动”）。在占领事件引发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浪潮中，这一号召这赢得了广泛支持。

德共面临着复杂的政治难题。它知道，虽然政府、产业家和极右翼可能从爱国情绪中获益，但他们对工人阶级行动的热忱却是有限的。此外，当全德工人承受着《凡尔赛和约》和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痛苦时，产业家们却越来越富。德共的反应是加强统一战线政策，以将为克服经济困境的斗争与反对民族团结情绪以及法西斯右翼的思想运动相结合，这一策略被归结为党的口号：“在鲁尔、在施普雷，与庞加莱和库诺作斗争！”[\[14\]](#)¹³

1923年夏，恶性通货膨胀达到了天文数字的规模，这就不仅把工人阶级，还把下层中产阶级拖入了穷困和破产。当德共声明要在争取提高工资和价格管控的战斗中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时，社民党继续支持库诺，并运用自己在工会中的影响力拖斗争的后腿。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工人开始寻求更激进的替代者，并愈发积极地参与德共所组织的倡议活动。工厂委员会（它为工人提供了除工会之外的组织方式）的重现或许是这一点最重要的表现。1923年夏，在德国为共产国际通讯社（《国际通讯》）报道的维克多·谢尔盖写道：

德国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这一点或许最好地表现于共产党影响力显著而迅速的增长。在好几个月的印数保持于2万5千份后，柏林的《红旗报》现在的印数超过《前进报》[社民党的日报]，达到了6万份。而这也不过是德共30份日报中的一种。党员数的增长、党在工会中的影响力以及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的道德领导力的扩大同样引人注目的。[15]14

不过，在工人阶级愈加靠近共产党人的同时，传统上保守的下层中产阶级却以令人担忧的数量被引向法西斯主义。战斗性的反法西斯行动（例如建立工人的准军事武装“无产阶级百人团”，以保卫左翼的会议和示威游行）成了德共统战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党相信，自己的现实力量在于能为一切被抛弃和践踏的社会阶层提供希望。拉狄克声名狼藉的“史拉格特演说”或许是为赢得下层中产阶级的支持而做出的最勇敢和最富争议的倡议。在这次演说中，拉狄克试图直接向右翼准军事分子发出呼吁：只有通过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才能争取到他们准备为之斗争和牺牲的更美好的未来。

不过，实行“史拉格特路线”的同时，却在进行最为积极的反法西斯行动。因为即便对那些谨小慎微的人来说，事态也是愈加明朗的：德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灾难性状况实际上正发展为一场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信任危机。这就要求德共做出更具战斗性的回应。7月12日，布兰德勒在《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党！》的倡议书，标志着激进的转向：

只有成功地将社民党和无党派工人争取过来与我们并肩作战，我们共产党人才能赢得与反革命进行的战斗……我们党必须将自己组织的战斗力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以确保在内战爆发时不至措手不及。[16]

这一倡议在中央引起了些许惊愕。但是，布兰德勒能够说服自己在党内右翼的传统支持者。而对一直要求更具进攻性策略的左翼来讲，布兰德勒提出的这一策略现在几乎是无可指摘的。《红旗报》的同一版还号召7月29日在德国各地举行由示威和集会组成的“反法西斯日”活动。在布兰德勒文章的语境中，反法西斯日为德共提供了一次动员党外力量并检验自己在非共产党工人中日益增长的影响的机会。[17]16

计划中的示威被舆论攻击为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序幕，并在德国各地（由社民党左翼控制的萨克森和图林根除外）迅速被定为非法。风险加大了。被1919和1921年情景所萦绕的布兰德勒不知如何是好。这是一个通过坚决地展示力量来提振对党的支持并威吓对手的时刻吗？还是说德共正走向又一个旨在摧毁党的陷阱？左翼希望按计划进行。布兰德勒则举棋不定。由于自身的分裂和对自己的决断力缺乏信心，中央希望莫斯科能给出答案。

然而，3月再次中风之后，列宁不得不永久性地退出政治生活。当布兰德勒向莫斯科发电报时，暴露出苏俄领导层深刻裂痕的布尔什维克十二大刚刚闭幕。当前经济发展方向上的问题（即所谓“剪刀差危机”[18]）显露出托洛茨基和“三驾马车”（由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列夫·加米涅夫和党的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组成）之间不断增长的政治派别对立。布兰德勒的电报发现莫斯科空无一人——大会闭幕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全都在放假，只有拉狄克

留守值班。和布兰德勒一样，自 1921 年犯错以来，他就尽量避免胜负难料的交锋。但是，自己过去的表现并没有使他敢于做出如此的决定，他于是电告季诺维也夫和尼古拉·布哈林，而他们都认为反法西斯日活动应该进行。但是，拉狄克没有完全信服，于是联络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斯大林希望做事有保障，认为行动应该取消。只有托洛茨基一人坦陈自己缺乏关于德国的即时消息，因此无法给出答复。7 月 26 日，拉狄克回复布兰德勒：“共产国际主席团建议取消 7 月 29 日的街头示威……我们担心这是一个陷阱。”^[19]¹⁸

中央据此取消了计划中的示威游行，以便进行室内集会。即便如此，全国还是有数万人参加了集会。《红旗报》自信满满地说道：

如果共产党人像政府宣称的那样，想在 29 日展开内战，没人能阻止他们。但是他们并不想在敌人选择的时机投入战斗。^[20]¹⁹

不过，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面对政府的镇压，党退却了，并由此丧失了一次检验自身实力的宝贵机遇。显然，它本可以很好地动员党外人士，但是一场运动的成功需要的不仅是不断增长的人数。运动必须鼓舞起参与者对自身力量 and 他们的领导层的不断增长的信心，同时使自己的敌手相应地丧失信心。这只能发生在一系列的力量对比得以检验的交锋对抗中。但是，由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党的领导人不愿走出这关键的一步，而当几周后，德国遭遇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潮时，党仍然无法确定自己掌控的实际力量。

和历史关节点上的许多革命党一样，1923 年夏在德国各地爆发的罢工和怠工的规模令德共大吃一惊。尽管所有罢工都有自己特殊的（很大程度上经济的）要求，德共还是迅速行动起来，试图将这些罢工发展为反对库诺政府的总罢工。前一年，党已经在地方和全国工厂委员会不断扩大的网络中建立了自己的影响。作为阶级斗争的机构，工厂委员会的地位有些尴尬地处于苏维埃——建立于俄国，旨在组织全体工人阶级——和工会之间。类似工会，它们也是以工作场所为单位组织起来的。但是，它们却由群众代表组成，没有常设的官僚机构，并横跨不同行业，从而能将某一工厂内所有工人集合起来。这样，它们就成为了一支能够替代雇主和官方工会的产业力量，却不必然是一支以苏维埃曾采用的方式替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力量（就这一论题足以使人们另写一篇文章）。

虽然如此，共产党在工厂委员会中的影响还是巨大的，并且增长迅速。德共是否能够运用自己通过防御性的统一战线斗争而取得的在委员会中不断增长的优势，以实现争取国家政权的进攻性的斗争，许多事情取决于此。

面对坚决而富有战斗性的罢工行动，库诺政府垮台了，替代它的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这让苏俄领导层明白了德国运动的规模。8 月 13 日，俄国的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革命危机的来临”。^[21]托洛茨基坚定地认为，德国正处于期盼已久的工人革命的萌芽期，这场革命能够拯救苏俄于孤立状态。因此，托洛茨基提出，德共必须开始为武装起义做必要的政治和技术准备。虽然起草过一系列声明，季诺维也夫还是更加谨慎。尽管同意托洛茨基对局势的总体分析，但他还是倾向于革命会在几个月而不是几星期内爆发。斯大林依旧更加小心，认为在六个月或更长的时期内没有爆发革命的可能。但是，迄今为止都对胜利做出最审慎的估计的拉狄克，面对自己比较亲近的托洛茨基和不太亲近的季诺维也夫所达成的共识，抛弃了自己的怀疑主义。于是政治局决定着手构造德国革命。^[22]

德共和苏俄领导层内的准备工作迅速展开。整个 8 月，《红旗报》以类似这样的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让无产阶级做好准备！》、《准备进行新的战斗》（讨论获取武器的策

略问题）。8月24日，《红旗报》发表公开呼吁书《致社民党内的劳动人民》，号召他们为了最后的斗争而与社民党领袖们决裂，加入德共。[\[23\]](#)

8月末，共产国际将德共两翼代表召至莫斯科，商讨为即将来临的革命所做的准备工作。抵达莫斯科后，他们发现俄国人显然一致认同自己对局势的估计，并且热衷于制定详细的计划。最初，似乎没有公开的观点分歧。但不久之后，布兰德勒和托洛茨基发现他们在确定起义日期这个麻烦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托洛茨基希望确定下起义日期，并在9月29日《真理报》上一篇名为《能按计划制造一场反革命或革命吗？》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一问题：

显然，不可能人为制造有利于反动政变的政治局势，更不要说给它确定一个日期了。但是，当拥有构成这种局势的基本因素时，先锋党（就像我们曾目睹过的）就要预先选定一个好时机，协调好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技术力量，接着——如果计算无误——发出致胜一击。[\[24\]](#)

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说的是反动的反革命，但他同时宣称：“这更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他的观点得到了德国左翼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考虑到完成准备工作所必须的时间，托洛茨基建议将起义的日期定在富有象征意义的11月7日。不过，拉狄克所支持的布兰德勒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只能由德共根据自己对政治形势的判断来选择日期。季诺维也夫建议把起义的日子大概地定在未来四至六周内，在他的周旋下，达成了妥协。[\[25\]](#)大家似乎对此都满意，于是讨论继续。不过，被作为风格差异而摆在一边的东西实际上却显示出一些更令人担忧的事情，即无论布兰德勒还是拉狄克都没有完全认同俄国人对即将到来的革命胜利的乐观分析。

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布兰德勒、苏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及德共党内左翼之间的上述分歧。俄国人提出的基本计划是德共进入在共产党人支持下由左翼的社民党政府统治的萨克森和图林根州政府。他们认为，这能为德共提供获得武器的机会，而一旦政府转而反对，便集合工人阶级夺取州政权。

尽管不喜欢“工人政府”的理念，但德共左翼还是准备接受这一策略（作为发动革命的手段）。不过，最初支持联合政府（作为统一战线政策延续）的布兰德勒，却反对这一动议，认为当党的领导层在莫斯科为革命做军事和技术上的准备工作时，他们还没有在群众中为这一进攻行动做好足够的政治上的准备。布兰德勒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的支持，他在柏林写道：“我们还不得不在政治和组织层面上走很长一段路，之后我们才能遇到将保证工人阶级胜利的局势。”[\[26\]](#)

此外，就像25年后布兰德勒对托洛茨基传记作者伊萨克·多伊彻所说的那样：“我不断地向他们解释，萨克森政府无法武装工人，因为自卡普暴动以来，萨克森和临近各州的所有武器都被移走了。”季诺维也夫“大发雷霆、用拳头敲着桌子”，而托洛茨基“试图说服我遵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据布兰德勒说，只有拉狄克“相信这些决定的不现实性”。最后，虽然保留意见，布兰德勒还是遵从了俄国人的权威，接受了对自己观点的驳回。[\[27\]](#)

计划和时间表定下来后，就剩下了一个重要问题——左翼。尽管他们宣誓支持中央的决定，但布兰德勒并不信任他们，而且希望他们能在接下来关键的几周里离开领导层。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就已经亲眼目睹了党的两翼之间的关系状况，并且倾向于支持布兰德勒。但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感觉敏锐的季诺维也夫并不准备和德国革命未来的领袖布兰德勒以

及俄国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结盟。最后，达成了更进一步的妥协。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而费舍尔和其他左翼则随布兰德勒返回柏林。

事情迅速走向高潮。10月10日，共产党人拿到了萨克森州政府的三个部长职位，尽管没有关键性的内务部长（他们本希望以此取得武器）。在莫斯科，领袖们屏住呼吸，等待消息。但是，直到10月12日，布兰德勒还在向中央报告：“进入萨克森政府使我们能够为内战重新集结、做好准备……但是武器的状况却很糟……我们的职责是拖延时间。”[28]

局势确实有些不妙。还在9月4日，政府就对《红旗报》颁布了一周的禁令。在9月末，这份报纸又一次被中止发行，只能在10月11日和20日两次合法发行。不像布尔什维克，它的报纸被临时政府取缔后能在亲布尔什维克的士兵的帮助下重新面世，德共似乎不想挑起可能打乱时间表的对抗，后来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就此说道：

必须明白，库诺罢工之后，敌人用一系列手段全面打击了工人运动，而党却没有反应，因为它不想在个别斗争中浪费自己的力量。这就使党失于联系其余群众、在群众中培植自己能够控制的力量。[29]

全德宣布戒严，同时米勒将军在萨克森掌权。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社民党—共产党政府组织起被禁的无产阶级百人团成员，举行群众性的示威抗议，尽管他们所展示出的力量并不令人生畏。虽然有将军的武力威胁，但百人团并没有做多少事来获取武装。因此，在10月20日，当米勒将军对萨克森的蔡格纳政府签署要求解散百人团的最后通牒时，萨克森工人无力保卫自己的堡垒。虽然如此，米勒的最后通牒还是被拒绝了，于是他的部队开始进军。用爱·哈·卡尔的话来讲：“国家防卫军作了布兰德勒未能做到的事情。它定下日子，在那一天共产党人要么行动，要么为自己的无能而后悔。”[30]

随后的事情只能被描述为一场溃败了。10月21日，在萨克森的开姆尼茨召开了一次工人组织的大会。意识到时机来临的布兰德勒和共产党人号召举行总罢工，以抵抗不断逼近的军事进犯，但号召落空了。社民党显然不准备和国防军进行内战。共产党人惊慌失措。如果在一场保卫自己政府的斗争中，萨克森的社民党都不准备加入共产党人，那么革命在德国其他地方还会有什么机会呢？布兰德勒和中央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仿佛只有数小时之遥的起义被取消了。次日，拉狄克和他的那帮共产国际官员抵达萨克森首府。布兰德勒解释了自己的理由，拉狄克表示支持。不幸的是，由于一个其原因从未得到合理解释的错误，到开姆尼茨集会的汉堡德共代表在决定取消起义之前就走了。在回去的路上，他们以为原计划不变，于是在汉堡举行了孤立无援的起义。经过24小时的血战，共产党人被打垮了。“德国的十月”完了。

世界革命的危机

尽管德共领袖（或者共产国际）没有马上意识到，但萨克森的溃败标志着德国战后危机会产生革命性后果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压倒了共产党挑战的德国资产阶级立即乘胜追击。11月2日，由于施特雷泽曼采取严厉措施（废除八小时工作日；紧缩信贷，使批发工厂关门，直到有28%的工会成员失业，42%的工会成员不足工时），社民党退出政府。[31]

由德共的失败而产生的责难成为德共和苏俄/共产国际领导层内日益尖锐的争论的主题。前途未卜的不仅是德国的命运。1917年10月以来，布尔什维克就期盼西方，尤其是德国，能成为世界革命下一个关键环节。几年来的失望和孤立使苏俄领导层士气低落，不得不在一个经济上已然退步和破败的国家中做出无数妥协让步。1923年夏的一段时期，共产主

义幽灵仿佛神助般地及时归来，以将布尔什维克拯救于国内困境，党内争吵也由此平息下来。简言之，最后关头，面对德共夺取政权的尝试，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团结起来了。但这种团结并没有持续下去。

10月末，看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驾马车正在破坏自己的地位，托洛茨基向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写下两封指责官僚结构兴起的信，从而将党内斗争公开化了。紧随其后，在10月15日出现了46位知名共产党人联名信（《46人声明》），这封信以同样的措辞抨击了苏俄领导人的政策。一旦莫斯科接受了德国失败的结局，对其原因的详尽分析就让位于激烈的派别斗争。在描述1923年的情况时，塔尔海默将俄国党内的斗争视作决定性的时刻，那时季诺维也夫执掌的共产国际开始与布兰德勒中央做出的决定拉开距离。在论述拉狄克的一篇声称国际中的各主要党都支持托洛茨基的演讲时，塔尔海默谈道：

几天后，季诺维也夫给德国党的领导层寄来一封信，他在里面彻底变换了方向，激烈攻击德国党。由此开始了对德国党领导层的普遍的政治迫害。[32]

作为这些事件的结果，季诺维也夫（代表他在俄共党内的派别）周密计划，试图在共产国际各党（首先是德共）内找寻自己的盟友。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德国十月溃败中的战线相互交织、并不是界限分明。即便如此，还是有两种基本立场。第一种是布兰德勒、拉狄克和德共右翼的立场，他们认为虽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德国正经历一场革命危机，但公开夺取政权的时刻还未到来。党已经在工人阶级中赢得了群众性的支持，但还没有获得卢森堡所认为必需的“明确无疑的多数”。数年后，布兰德勒将这样说到：“我当时并不觉得形势是极端革命的，而是抱着革命形势仍然能够形成的看法。”[33]塔尔海默持有类似看法：

1923年[党]并没有赢得工人阶级的多数，从而能够通过统一战线而夺取政权。但是，这只是部分事实，因为如果没有之前通过统一战线策略而取得的胜利，1923年夺取政权的问题就甚至都不会被提出来。[34]

这条思路所隐含的结论在指责，为革命行动制定计划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国的政治局，而非采取更谨慎路线的德共领导层要为失败负责。

在十月事件后不久发表的一次讲演中，拉狄克作了大量自我批评。在对基本上失败的党从防御向进攻的转变进行反省时，他指出：

我们在[一月]莱比锡大会的决议中曾说过：现在这一时期将结束于内战。理论上讲我们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得出实践的结论。我们本应该从五月起就推进不断增长的群众斗争，因为鲁尔行动[库诺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社会解体的因素在滋长……我们说我们首先必须争取群众。这一阶段持续到了鲁尔斗争。后来我们就根本无法做宣传鼓动，不得不转而行动。但是我们做的不够快。[35]

第二种看法是托洛茨基提出的，他是德俄两方领导层内对德国的革命前景最为热忱的人。托洛茨基明确表明哪一方应受责备，然后迅速写道：

如果[德国]共产党迅速改变自己的工作步调，利用历史赋予它的五六个月时间，进行直接的政治、组织、技术准备，以夺取政权，那么事件的结局会与我们现在看到的迥然不同。[36]

这便在暗示，是德共中央而不是苏俄领导人犯了错误。这与德共内部左翼的观点非常相似。德共左翼一方面在 1923 年初支持托洛茨基提出的需要更具进攻性的路线，另一方面指责布兰德勒、塔尔海默和拉狄克要为溃败负责——虽然左翼承认在当时形势下必须取消起义。即便如此，托洛茨基也从未与左翼站在一边，而是认同拉狄克的想法：虽然右翼领导人有错误，但不能用左翼替换他们。我自己则认为，这个外在的矛盾表现了托洛茨基观点中更加深刻的张力。一方面，他不断攻击德国领导层，称他们在十月仓皇退却，而且由于未经公开交锋就将主动权让与资产阶级，他们理应受到惩罚。但在德国失败后几个月里所写的两篇重要文章（《新路向》和《十月的教训》）以及这一时期的演讲中，他也重申了在上述引文中的观点：无法将自己从防御性转向进攻性，这损害了德共的工作，而这一转变本应该在十月之前的几个月中实施的。换句话说，党没有为自己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做充分准备，以公开夺取政权，这就仿佛支持了德共领导层的结论。

于是，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场景：布兰德勒、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站到了一边，虽然他们对事件的评价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在另一边，左翼越来越接近季诺维也夫，并由此靠近斯大林，尽管季诺维也夫最初的观点多少介于布兰德勒和托洛茨基之间，斯大林则更谨慎。但是，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首脑，季诺维也夫难辞其咎，他无法使自己令人信服地与整个政策脱开干系。除此之外，为了捍卫最初的策略，他不得不捏造出这样的理论：错误在于德共领导层在执行策略方面的拙劣。^[37]1924 年 2 月 4 日，他在《国际通讯》中攻击德国领导层：

这次政治失利是你们高估政治和技术方面准备程度的必然结果。你们必定也很清楚，我们在莫斯科是把共产党人进入萨克森政府当成军事—策略上的机动。你们把它变成了与“左翼”社民党人的政治联盟，这就束缚了你们的手脚……你们把参与萨克森内阁变成了陈腐的与社民党结成的议会联盟。结果便是我们的政治失败。^[38]

季诺维也夫的论述，虽然就部分而言，或许碰巧是对的，但看上去也不过是一篇费尽心机的幻想小说，以使自己与德国党内反对托洛茨基盟友的力量结合起来。随后，苏俄官僚对德国的右翼和俄国内部“反对派”愈加强硬的立场仿佛坐实了这一点。

不过，虽然存在分歧，有一件事却是各方多少都同意的，即 1923 年德国社会内部的危机包含着发生推翻现存秩序的革命并代之以工人政权制度的可能性。至于这种可能性是否能精确到特殊的日期而那时被德共错过了，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诚如塔尔海默所言，德共在反法西斯日行动上的退却以及在回击对自己报纸的攻击方面的失败揭示出更具一般性的失败：无法将保卫党免受攻击的斗争和工人发动的更广泛的斗争结合起来，从而深化党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虽然太切近的对比未必有用，但就这一方面而言，科尔尼洛夫进军失败后的布尔什维克是如此之成功。

可以说，从 1918 年 11 月的基尔暴动到 1923 年 10 月的开姆尼茨溃败的革命时期的终结，不仅对德共，而且对苏联的国内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就像托洛茨基将在许多年后写到的那样：

德国共产党的仓皇退却或许是最令苏联劳动群众失望的事了。苏联官僚立刻开始了一场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运动，对左翼反对派发起了第一波残酷打击。^[39]

勃鲁埃同意这一观点，他在自己研究的结尾部分这样论述道：“在共产国际内，从俄国共产党自己开始，1923 年的失败即便不是开启了，至少也是决定性地加快了堕落的进程。”^[40]

终于，德国革命时代的失败导致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而这一事件又决定性地塑造了 20 世纪。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而言，德共当年所面对的问题比起布尔什维克在许多方面更具相似性。他们试图形成一种进一步发展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战略（这一战略在今天对我们也非常重要）的策略，以使党能够既和群众性的社民主义组织共事又反对它，在联合它们的成员一起行动的同时又试图打破改良主义的束缚。当然，无论是促进英国工人对紧缩政策的反抗，还是联合参加埃及革命行动的数百万人，德共 1920 年代初的经验对于 21 世纪的革命者来说，都是价值非凡的。这是一次既有辉煌胜利又有惨痛失败的经历。就像卢森堡在她已知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写到的那样：“革命是一种独特的‘斗争’形式……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能通过一系列的‘失败’为最后的胜利作好准备。”^[41]

参考文献：

[1] 维尔纳·安格勒斯：《流产的革命：德国共产党人为政权的奋斗，1921—1923》，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 年。

〔Werner Angress, *Stillborn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 1921-192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2] 皮埃尔·勃鲁姆：《德国革命，1917—1913》，约翰·阿彻 译，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 年。

〔Pierre Broué,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trans. John Archer,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

[3]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第 3 卷，纽约：麦克米兰，1953 年。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ume 3*,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4]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过渡期，1923—1924》，纽约：麦克米兰，1954 年。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Interregnum, 1923-1924*, New York: Macmillan, 1954〕

[5] 伊萨克·多伊彻：《一篇与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讨论记录，1948 年》，载《新左翼评论》，第 1 卷，第 105 期，1977 年。

〔Isaac Deutscher, “Record of a Discussion with Heinrich Brandler, 1948”, in *New Left Review*, Vol.1, No.105, 1977〕

[6] 克里斯·哈曼：《失落的革命：德国，1918 至 1923》，伦敦：书签出版社，1982 年。

〔Chris Harman, *The lost revolution: Germany, 1918 to 1923*, London: Bookmarks, 1982〕

[7] 约翰·罗斯：《重探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国际社会主义》，第 138 期（2013 年春季号）。

〔John Rose, “Lenin’s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Revisited”,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138 (spring 2013)〕

[8] 维克多·谢尔盖：《见证德国革命：来自德国的文字，1923》，伦敦：红字出版社，1999 年。

〔Victor Serge, *Witness to the German Revolution: Writings from Germany, 1923*, London: Redw
ords, 1999〕

[9]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一次错过的机遇？德国十月的传说和 1923 年的真实历史》，载《革命史》，第 8 卷，第 4 期，2004 年。

〔August Thalheimer, “1923: A Missed Opportunity? The Legend of the German October and the Real History of 1923”, in *Revolutionary History*, Vol.8, No.4, 2004〕

[10] 列夫·托洛茨基：《能按计划制造一场反革命或革命吗？》，载《共产国际的最初五年》第 2 卷，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96 年。

〔Leon Trotsky, “Can a Counter-Revolution or a Revolution Be Made on Schedule?”, in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ume 2*, New York:Pathfinder, 1996〕

[11] 列夫·托洛茨基：《新路向》，载《左翼反对派的挑战，1923—1925》，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80 年。

〔Leon Trotsky, *The New Course*, in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3-1925*, New York: Pathfinder, 1980〕

[12] 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77 年。

〔Leon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 New York: Pathfinder, 1977〕

[13] 塞巴斯蒂安·泽厄特迈尔、约翰·罗斯：《德国失落的布尔什维克：重探保罗·列维》，载《国际社会主义》，第 136 期（2012 年秋季号）。

〔Sebastian Zehetmair and John Rose, “Germany’s Lost Bolshevik: Paul Levi Revisited”,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136 (autumn 2012)〕

注释

[1]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第 140 期（2013 年秋季号）。

[2] 协助军队镇压国内起义的极右翼准军事武装。

[3] Die Rote Fahne，德共的主要报纸。

[4]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约翰·阿彻译，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 年，第 369 页。

[5] 列宁：《论妥协》，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2 卷。

[6]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86页。

[7] 约翰·罗斯：《重探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8]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472页。

[9] 塞巴斯蒂安·泽厄特迈尔与约翰·罗斯：《德国失落的布尔什维克：重探保罗·列维》

[10] Zentrale，德共相当于中央委员会的机构。

[11] 爱·哈·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第3卷，纽约：麦克米兰，1953年，第336页。

[12] 哈曼：《失落的革命：德国，1918至1923》，伦敦：书签出版社，1982年，第234页。

[13]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628页。

[14] 庞加莱时任法国总理。关于这一口号存在一些争议。维尔纳·安格勒斯和爱·哈·卡尔在引用它的时候都标明是《红旗报》1月23日的头条，而勃鲁埃那儿却是2月23日。很可能是勃鲁埃弄错了。关于这一口号，鲁斯·费舍尔和埃里希·沃伦贝格（Erich Wollenberg）还讲过一段掌故，说拉狄克将负责此文的记者调离了《红旗报》，然后将头版重写为《在施普雷和鲁尔与庞加莱和库诺斗争！》，也就是说改变了重点。但是，据勃鲁埃将讲，此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15] 谢尔盖：《见证德国革命：来自德国的文字，1923》，伦敦：红字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16]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736页。

[17] 安格勒斯：《流产的革命：德国共产党人为政权的奋斗，1921—1923》，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359页。

[18] 爱·哈·卡尔：《过渡期，1923—1924》，纽约：麦克米兰，1954年，第21页。

[19]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741页。

[20] 同上。

[21]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756页。

[22] 爱·哈·卡尔：《过渡期，1923—1924》，纽约：麦克米兰，1954年，第202—203页。

[23]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760页。

[24] 托洛茨基：《能按计划制造一场反革命或革命吗？》，见《共产国际的最初五年》第2卷，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96年，第347页。

[25] 安格勒斯：《流产的革命：德国共产党人为政权的奋斗，1921—1923》，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402页。

[26]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774页。

[27] 多伊彻：《一篇与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讨论记录，1948年》，见《新左翼评论》，第1卷，第105期，1977年，第51—52页。

[28]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798页。

[29] 塔尔海默：《1923：一次错过的机遇？德国十月的传说和1923年的真实历史》，见《革命史》，第8卷，第4期，2004年，第116页。

[30] 爱·哈·卡尔：《过渡期，1923—1924》，纽约：麦克米兰，1954年，第221页。

[31] 哈曼：《失落的革命：德国，1918至1923》，伦敦：书签出版社，1982年，第293页。

[32] 塔尔海默：《1923：一次错过的机遇？德国十月的传说和1923年的真实历史》，见《革命史》，第8卷，第4期，2004年，第103页。

[33] 多伊彻：《一篇与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讨论记录，1948年》，见《新左翼评论》，第1卷，第105期，1977年，第80页。

[34] 塔尔海默：《1923：一次错过的机遇？德国十月的传说和1923年的真实历史》，见《革命史》，第8卷，第4期，2004年，第102页。

[35] 引自哈曼：《失落的革命：德国，1918至1923》，伦敦：书签出版社，1982年，第257页。

[36] 托洛茨基：《新路向》，见《左翼反对派的挑战，1923—1925》，纽约：开拓者出版社，1980年，第1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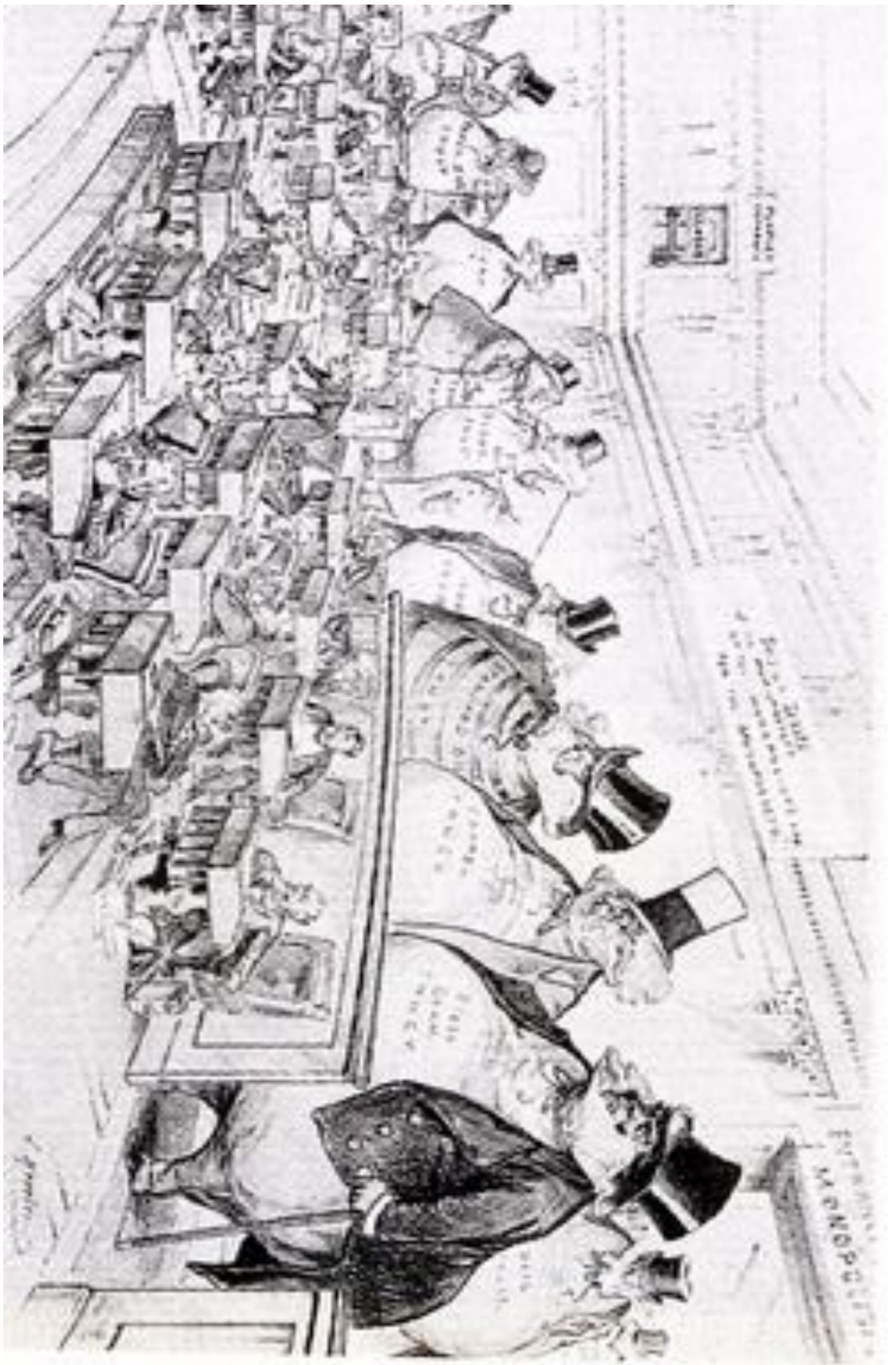
[37] 爱·哈·卡尔：《过渡期，1923—1924》，纽约：麦克米兰，1954年，第228页。

[38]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821页。

[39]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参见《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柴金如译，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第65页。

[40] 勃鲁埃：《德国革命，1917—1913》，莱顿、波士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 年，第 899 页。

[41] 卢森堡：《柏林秩序井然》，见《卢森堡文选》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7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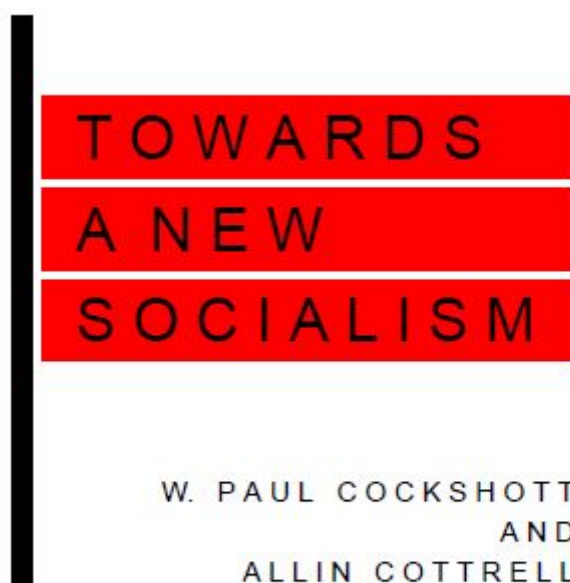
《走向新社会主义》导言



：黑夜里的牛（译）

保罗·科克肖特 / 阿林·科特爾

译者按：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苏联解体之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这一点。反对计划经济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把计划和社会主义绑在一起了，而坚持计划经济的人却也找不到失败的原因。“市场社会主义”越来越流行。英语世界的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保罗·科克肖特和阿林·科特爾对这一潮流表示异议。苏东巨变后不久的 1993 年，他们合著的《走向新的社会主义》一书出版（实际写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深刻地批判了各种左翼中流行的错误经济思想，详细地建构了一套基于民主高效的后苏联计划经济系统，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低潮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本书中的计划经济思想尤其契合中国左翼中的讨论。征得作者同意，本站试译出该书导言，供感兴趣的同志参考。文中的错误之处，请读者朋友指正。译者后续还会陆续翻译该书全部章节，敬请关注。



“社会主义已经试过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年之后，历史的判决是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对于这一被广泛持有的观点，所有那些在 1990 年仍想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

有义务给予某种回应。本书就是我们的回应。无论如何，先辨明我们的观点和左派中有的一些观点之间的差别，也许会有用的。

大多数社会主义想要说的或许是，他们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模式是明显不同的。但这一断言的理由却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首先，要区别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那些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前者可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能说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这也许是真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出现危机的时期，碰巧遇到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猛烈攻击，在英国和美国尤甚，但并不限于这两个国家。但是，有人会说，这种联系即便不是偶然的，也至少算不上逻辑上的必然：也就是说，哪怕苏联模式的危机没治了，也可以料想“政治钟摆”在西方又向社会民主主义摆回。然而，我们后面将会谈到，质疑这一点是有道理的。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又倾向于宣称苏东的失败不能说就对马克思主义不利，因为苏联体制与其说是马克思理想的实现，不如说是背叛。社会民主主义者说苏联社会主义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社会主义，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却说苏联（也许后列宁的苏联）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可能接受苏联体制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但他们拒绝马克思主义；而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忠于他们的理论，宣称理论尚未付诸实践。

我们的立场与这两种观点不同。首先，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卖空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理想；它代表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疾病不够激进的解决方案。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相反，我们相信经典马克思的激进社会改造方案很有价值。另一方面，我们拒绝理想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企图以与历史真实相脱离为代价，来保持社会主义理想的纯洁性。我们承认，苏联型社会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他们并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宁的理想的现实化，但哪种具体的历史上的社会曾是某种理想在世间的化身呢？当我们把“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当作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来使用，以其特殊的生产方式来辨别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宣称苏联体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会主义；或者更一般地，把任何他们觉得最想要的特征都塞进社会主义的定义中。这种说法是非常不科学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 1, 苏联的确是社会主义的。
- 2, 这一社会有许多不良和成问题的特征。

3, 苏联社会的问题部分地与布尔什维克开始试图建设社会主义的极端困难的历史环境相关，但这并不是全部：犯了重大的政策错误（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一样是可能的），此外，苏联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严重缺点。

4, 因此，苏联体制的失败绝不是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关。我们必须认真地反思这些教训，从失败中学习。

5, 虽然如此，不像那些兴高采烈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完全的历史性溃败的人，我们相信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显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已经极大地被重新修订了——是可能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但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可能的。

6, 要维持这一论断，就当前所说的是不够的，只有靠在细节上更加详细地阐明那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实现的各种经济机制，以及政治宪法的形式。这正是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做的。

7, 在导言中, 我们开始提供对从这些声明中产生出来的某些问题的回答: 为什么社会主义是不适合的? 在何种意义上苏联式社会主义的? 就目前从政策错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缺漏中产生的苏联社会的缺点而言, 这些错误和缺漏是什么? 宣称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可能和可取的, 这一宣称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不能在这详细回答这些宏大问题; 我们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 并将其指向让梗概充实的章节。

1, 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是不适合的?

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上一直代表着“混合经济”, 借助累进税制和社会福利体制来减轻资本主义的不平等, 以及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他们最成功的时候, 相对于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情况下的, 社会民主党的确在改善工人阶级状况方面有所作为; 在英国, 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仍是这类改良的最持久的纪念碑。虽然如此, 非常重大的问题仍然存在着。

首先, 资本经济体制倾向于产生收入、财富和“生活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第一章有讨论), 而社会民主主义对这些不平等的影响甚微, 在最近十年左右中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只有在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激进变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才能提供消除严重的不平等的真正前景。其次, “混合经济”在两个重要的方面是成问题的。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混合经济中, 社会主义因素仍然是从属于资本主义因素的。更确切地说, 商品和工资形式仍然分别是生产组织和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社会主义”行动必须依靠从资本主义部门中取得的赋税收入提供资金支持, 这就意味着扩展“福利”措施和“自由”分配基本服务的机会依赖于资本主义部门的健康和税基的强度。只有当资本主义部门强有力地发展之时, 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才能够“履行诺言”。这样, 社会民主主义政府重塑社会阶级结构的能力是内在的自我限制的: 激进再分配的尝试总是会造成摧毁资本主义财富创造发动机的威胁, 而这些政府最终是依赖于这一发动机的。

联系前面提到的内容, 如果混合经济是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的混合的话, 那定义社会主义部门运行原则的严肃尝试就太少了。这就使得整个混合经济的思想在计划经济解体的世界背景下显得非常脆弱。不受限制的市场的倡导者可以争辩道, 事实上, 如果计划已经在其中心地带被拒绝了, 那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 即便是作为体制的从属性因素。目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计划和无商品的生产形式根本上说的是什么, 以及它们的有效性如何衡量, 他们对自己钟爱的“混合”的保卫, 除了形式是模糊和道德化的, 地方也没用对。

从这一点看, 我们定义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原则的尝试, 可以被视为提供在当前社会民主主义中所缺乏的社会主义骨架: 甚至那些不同意我们的完全计划经济倡议的人, 也能够我们的论证中找到一些价值, 只要他们要阐明混合经济的“混合”中未发展的成分。

2, 苏联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

在这里, 我们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出发。在马克思看来, 不同社会组织模式的最基本的区别特征是这一模式确保从直接生产者手里“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这里需要做一点解释。在这一理论中, “必要产品”是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自身所需要的产品。必要产品表现为工人极其家庭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形式, 以及仅仅维持社会产生方式正常运转所需的在工厂、设备和其他方面的投资。“剩余产品”则是指社会产出中用于维持非生产性社会成员(组成复杂, 从无所事事的富人, 到政治家, 武装力量, 以及退休劳动群众等)的部分, 加上投入到生产方式存量静扩张的部分。任何能够供养非生产性成员, 或者产生净投资的经

济扩张计划的社会，都必须有某种机制迫使或者引诱直接生产者生产超过维持其自身所需的東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机制的确切本质，是理解社会整体——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国家和政治的一般形式——的钥匙。我们断言，苏联体制实施了一种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榨取模式。为了把这一点放在背景中理解，一些更一般的历史背景可能是有用的。

先考虑一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在封建制度下，剩余产品的榨取是所有人都明显“可见”的。具体的形态多种多样，但一种典型的方法是让农民每周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几天，而其余时间在地主的地里劳动。或者，农民必须交出自己地里的产品的一部分给地主。如果这样的社会要再生产自身，直接劳动者必须被束缚在某种形式的直接从属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平等是不可能的。一种宗教意识形态，说起把分配的不同“位置”分配给世上的人，谈到懂得自己恰当位置的价值，并且向那些在神的尘世规划中完成了自己使命的人允诺天国的回报。这样的宗教会是非常有用的。

在资本主义下，剩余价值的榨取却以工资合同的形式变得“不可见”了。契约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每一方都带着自己的财产来到市场，进行自愿的交易。工厂里不会有铃声响起来宣告用于生产相当于工人工资的劳动日部分的结束和为雇主生产利润的工作日的开始。虽然如此，工人的工资比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价值要少得多：这就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基础。剥削实现的程度依赖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斗争：围绕工资水平的斗争，围绕生产速度和工作日的长度的斗争，以及关于决定生产给定量的工资-产品所需劳动时间的技术变革的斗争。

苏维埃社会主义，特别是斯大林在1920年代后期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推行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剩余榨取模式。这一点有些模糊不清，因为工人的工资依然以卢布支取，而计划性产业中继续使用货币作为账目单位。其实，这些“货币”形式的社会内容已经彻底变了。在苏维埃计划之下，社会产品的必要份额和剩余份额的分配是政治决策的结果。中央计划机构把大部分产品和劳动以实物的形式分配给企业，而中央计划机构始终会保证企业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些分配给他们的实物产品。如果一个企业“亏”钱了，就必须给点“补贴”以保持资金平衡。这无关紧要。另一方面，拥有货币本身并不能保证能够弄到实物产品。根据同样的理由，进入消费品生产的资源是由中央计划结构分配。假设某些工人获得更高的卢比工资：但仅靠这个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消费品生产流并不会响应消费品支出的货币数额。更高的工资仅仅意味着商店里货品更高的价格或者货品短缺。在计划者分别分配资源到重工业投资和消费品生产的时候，剩余生产的比率就固定下来了。

在计划经济中，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分配是有意识地社会决定的结果，而笼统地说，苏联这种向计划经济的转换，也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期望。只不过马克思设想的这一“社会决定”是激进民主的，所以剩余的生产会具有内在的合法性。人民做出决定，把这么多的共同劳动分配投入到净投资和用于赡养非生产者，就会愿意实施他们自己的决定。因为内外部的原因，苏联社会在推行计划经济的时候是远远算不上民主的。那么，又是如何引诱或者强迫工人去实施计划呢？（这一计划虽然应该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确不是工人们的决定。）

我们知道，这些计划总体说来都实施了。1930年代是重工业基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时期。这一基础在成功抵抗纳粹侵略的过程中受到了严苛的检验。我们也清楚斯大林时期的特点，这是一种奇特的混合：一方面是恐怖和强制劳动，另一方面是真挚的首创精神。在一个计划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余产品如何可能？从这一问题出发，对斯大林的个人

崇拜就似乎不仅仅是“错误”，而是构成体制所必须的特征。斯大林：既是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虽然缺乏口才和促进人们在历史性努力中的参与感的能力，却用决心和毅力弥补了这种不足；同时又是任何没有参与进来的人（还有许多其他的人）的严厉的和绝对冷酷的清算人。斯大林崇拜，它的民粹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对于榨取剩余产品的苏维埃模式来说，都是核心的。

3，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失败中能学到些什么？

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危机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存在着对不民主的和专制的老式苏维埃政治实践的普遍厌恶，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自 1930 年代以来一直运行的基本经济机制已经过时，再继续保持这些机制会使得（过去的）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停滞和长期缺乏消费品。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明显持续的活力一相比较，人民就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样的状况了。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系的。随着苏联从斯大林时期进入到赫鲁晓夫时期，之前的恐怖和强制的体制缓和了。然而，在苏联建设早期和抵抗法西斯的过程中激发过苏联人民中广泛阶层的首创精神，却被腐蚀了。换句话说，（在计划但不民主的制度中）剩余产品榨取的苏维埃模式的两个支柱都被侵蚀了。还应注意的是，斯大林并不反对把巨大的工资差别作为刺激工作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迈向了更加平等主义的政策。社会主义者当然可以为平等主义欢呼，但要是个人主义的金钱刺激被削弱了，仍然会需要提倡其他类型的激励——比如起因于在共同努力中的民主参与的意识。而如果不以更高的报酬作为好好工作的回报，那总得以发展和晋升机会作为回报（以及被看作是回报）。在勃涅日列夫时期腐败和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这些替代性的激励完全不存在。前一代人懂得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尚的理想——在苏联实现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严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拥护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整代人却把苏联和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就像这一制度自己宣传的那样。如果他们憎恨苏维埃制度，那他们就讨厌社会主义。

分析到此，似乎导向了有点模棱两可的结论。我们对苏联作为一个非民主计划制度所面临的问题的强调，似乎暗示深刻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让苏维埃社会和经济起死回生。换句话说，如果用民主的计划取代不民主的计划，人民就会热情地支持的经济现代化，而这一现代化仍然是在计划的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框架之内的。当然，这种观点现在已经广泛地看作是被近期俄国历史的残酷事实所证伪：改革并没有至于公开化，甚至未能止于重建政策，而是继续往前，显然无情的走向了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的毁灭，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

对这段历史的各种解释都是可能的。有一种观点是简单的反社会主义，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央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高压一消失，可以自由选择的人们不自觉地会选择市场。民主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拒绝。这本书有一系列专门规划的论证来证明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的，换言之，一种有效率的富有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既是可能的，（从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的立场上来看至少）也是优于资本主义的。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如何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和其他地方被摈弃？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特别指出过的，社会主义对于许多人来说，只不过意味着勃列日涅夫体制。这是他们被没完没了地被告知的，而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另一种非常不同的社会主义是可能和可欲的理念，依赖于社会主义创始者们的经典论证、建议和理想；而那些熟悉这些思想的人却是一些乏味的官方辩护士，他们自然不太可能待见这种理念。其次，毋庸置疑的是，困扰苏联最后时期的经济停滞并不能简单地仅仅看作是缺乏民主

参与的结果。这一机制有许多技术/经济问题；但我们要论证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本身所固有的。

那么，我们的观点是，从原则上讲，彻底的民主化加上计划经济的实质性改革可以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复苏创造机会。虽然很不幸，低效和独裁统治的黯淡年代的经验，在意识形态上又为僵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所加强，看起来已经排除了其作为当前实际政治选择的可能性。某些苏联人民可能会发现这种想法很吸引人，但太多苏联人已经准备要求跟共产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了。

4. 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后苏联社会主义的首要基础必须是激进民主和高效计划。现在已经清楚了，民主因素不是奢侈品，或者某种在条件特别顺利之前可以推迟的东西。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论证的那样，没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为了保证剩余产品的生产，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压。而如果政治高压减弱，体制会趋于停滞。同时，没有各种思想的公开竞争，一种高效的计划体制也是极其不可能的。在近些年来，苏联共产主义者未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建议，这显示了服从和遵守在其中受到青睐的体制的恶性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在政治专制之下实现经济发展，因为甚至在这种专制统治下，私有经济活动的领域也是相对不受约束的，正常的竞争过程仍然起作用，而对工人阶级组织的镇压还可以允许高剥削率。社会主义没有这种镇压性国家和“自由”经济的分离；如果意识形态“正确性”准则支配了经理的晋升，甚至主导了经济理论争论，那么增长和效率的长期前景的确是黯淡的。

关于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计划机制的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在苏维埃的例子中所出现的问题，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种薄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要强于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正面理论设想。而关于民主机构，布尔什维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放，偏爱这一形式。虽然在策略上，这可能是敏锐的，但我们必须在别处寻找社会主义民主宪法的原则。至于计划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些有意思的建议，但这些建议都未超出相当模糊的一般性水平。苏维埃计划者临时创制出他们自己的体制，这一体制服务于同时代的一定的目的，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机制却考虑得不多。他们的思想受到限制。符合马克思主义准则被他们看作是必须的——避免、甚至公开批判任何理论方法，比如边际分析，因为它看来似乎污染了“资产阶级”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倾向是基于一种对马克思的误读。很有可能是这样，但事实是马克思并未试图尽可能地详细说明计划经济的运作原则，这就让误读变得可能。除非我们能在细节上合理地阐明这些原则，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无论如何不会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5. 本书内容介绍

自引言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介绍一下将要谈到的主要论点的内容。这些论点依据的是上面已经发现的问题。第一章和第二章处理有关平等和不平等的问题。第一章提供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基础的概况——就像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无法根除这些基础。第二章显示一个严密的社会主义付酬制度是怎样大大消除不平等的。第二章中勾勒出的付酬制度依赖于这样一种思想，即每一产品和服务所包含的总劳动量是可以计算的。第三章证明这一论断是合理的，发展了认为按照劳动时间进行经济计算是理性的和技术上进步的论断。

高效的计划系统可以保证经济发展受民主地构建起来的人民的需要所控制。第四章到第九章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各个方面。第四章确定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和优先事项，却分了计划的许多不同“层次”，即战略性计划、详细计划和宏观计划。第五、六、七章分别详细研究这几种计划。第八章概述一种具体机制，这种机制保证生产详细的模式与消费者偏好一致，同时又避免过度排队和短缺。第九章详细考察我们设想的这种计划系统对信息的要求，并把精确信息和个人所面临的激励处罚这两个问题关联在一起。在这些章节中，我们把我们提出的这种制度，跟一般认为已经在苏联失败的那种制度做了许多对比。

第四到九章处理孤立的单一经济体的计划，而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则将拓展讨论，考虑由于与其他国家贸易而产生的问题。在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增长的世界，这是非常实际的考虑。

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将超出经济领域，进一步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第十二章将联系社会主义目标和女性主义者揭示的顾虑。该章研究了作为核心“家庭”替代的家庭公社的可能性，并且表明这样的公社怎样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运作。第十三章考虑政治领域，提出一种能够让普通人实际掌握他们生活的民主宪法的激进形式。就像早先提到过的，我们批评苏维埃民主模式。我们同等地批评议会民主制度。而我们自己的提议则源自在当代语境下对传统的（雅典）民主再审视。第十四章研究财产关系的问题，详尽阐述了作为此前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基础的特殊财产形式。

在最后一章，我们处理了充满怀疑的社会主义者近年来提出的一些反对观点。在这方面，对赞成把“市场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倡导的计划经济的替代这一论断，我们作了回应。

我们希望，鼓舞全书的总的观点通过它的各种详细论证，应该是清晰的。那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最大可能地实现每个人作为单个人和作为社会一员的潜能。这一实现需要自尊、安全和实质平等（当然不是千篇一律），以及高效的生产。还要求人类能找到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以与地球的总体环境保持平衡。我们认为在激进民主政治宪法之下，通过合作和计划的社会经济形式——一种后苏联社会主义——可以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

注释

在此书中，我们从最初原则发展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提议，并没有大量参考已经存在的文献。关于对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详细讨论和批评，请参看科特雷尔和科克肖特（1993a）；关于苏联式经济计划的理论和时间的更详细的考察，请参看科特雷尔和科克肖特（1993b）。

新书推荐



新工人群体虽然平时默默无闻，但他们却是中国式网络社会这部大机器里“无声转动的小小的连接齿轮”。他们被忽视得太久。现在终于是时候好好了解一下他们的发展历程了，终于可以好好倾听一下他们的声音，好好讨论一下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动态，好好思考一下他们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和全球南方的重大影响。

全球网络社会有个重要特征，就是“全球联系但地方分隔”这一悖论。随着通讯手段的进步，中国大城市高楼里的人们可能随时随地、毫不费力就可了解美国华尔街的股市行情、法国巴黎的潮流时装、南非开普敦的足球赛况。但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家楼地下室里住的家政工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每天经过的城中村里发生了怎样有意思的事？他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最低工资是多少？他们持股、每天紧盯着股价的那家大公司

就在几公里外，最近那里又有几个员工自杀了？他们不但不知道这些事，而且可能不想知道、不愿知道，虽然这些社会现实离他们非常近。因为它们现在有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了，可以更容易地忽视身边发生的事，把时间和精力投放到远方世界里。因为那里有资本、有美人、有怪兽，而且好像那些都可以由他们的指尖来控制，不用走出自以为安逸，但其实非常狭隘的信息肥皂泡。

“中下阶层青少年到底能凭借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得到什么？是有用的技能还是没用的摆设？是更多的自由还是更严格的控制？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见得是家长想怎样就怎样的。有时越是投入大、越是期望高，孩子反倒越有反抗心理，结果也越适得其反，特别当问题涉及新媒体的时候。用起电脑和手机来，往往孩子比家长懂得多，这在世界各地也很常见，越是中下阶层家庭往往越会如此。所以，要想找到问题答案，前提是要学会用青少年视角看问题。到底他们用新技术工具来做什么、怎么做，是学习还是娱乐、社交，这些都应该在家庭成员良好沟通、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解决。特别对中下阶层青少年而言，他们不仅成长在家庭和学校的环境里，更要学会面对来自日益商品化的主流社会的压力，寻求自我身份认同。”

（《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邱林川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9 月）

马克思问我哪里痛

【韩】柳东民◎著 季成◎译



一部承载爱与希望的人文讲读，洞见现实之真
一封介绍马克思的请柬，希望青年欣然赴约

中信出版社 CHINACORPRESS

这本书让我回想起青春时节……我希望年轻读者能够通过此书摆脱自我异化，在现实的关系中认识爱情和友情的真谛。这本文字清新、言语真挚的书一定会给年轻读者带来乐趣。

——洪世和（韩国进步新党代表，《我是巴黎的出租车司机》作者）

此书风格相当之混搭。里面既有毛派的革命激情，又有阿兰德波顿那浓浓的鸡汤风；既有早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又有晚年阿尔都塞的偶然相遇唯物主义。刚刚说完脏汉齐泽克，马上又涌出导演洪尚秀。不得不承认，作者继承了他最崇拜的理论家柄谷行人的某方面风格，就是人名和书名的驳杂，犹如江西诗派一般典故如云。

如果你经常有机会面对文艺清新系的萌妹纸，却不知道应该向她推荐哪一本引起话题的

书，那不妨请她入手一册。妹子读后也许会写一篇名为《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逼格》的豆瓣置顶文。

作者很多方面都有犹如闲谈中春风化雨使人习惯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魅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用异化理论和偶然相遇唯物主义探讨爱情。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们谈论的是爱情。

韩国电影《错过爱情》中，男女主人公是大学同学，女主对男主虽然有好感，却将感情深藏心底，她害怕因主动求爱而错失爱情。毕业多年后重逢，但男主还是未能理解她的爱意而错失了爱情。电影最后以他们在朋友婚礼现场再次偶遇而结束。能否相爱已经不重要，电影告诉观众的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沟通的障碍。比起很多皆大欢喜洞房花烛夜的爱情喜剧，《错过爱情》更接近生活的本质。

读完这个故事后，再重看书页上引用的马克思名句：“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本书在理论书籍中的角色，或者就类似与苦情偶像韩剧在影视界中的角色吧。

书里说：所有的革命，都从人类的自爱之中孕育而生……

（《马克思问我哪里痛》，（韩国）柳东民 著 季成 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 5 月）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 / 别再为祖国担忧 / 你们的血照亮着路 / 我们会继续往前走 / 你们真值得骄傲 / 更令人惋惜悲伤 / 冬天有凄凉的风 / 却是春天的摇篮 / 安息吧死难的战友 / 别再为祖国担忧 / 现在是我们的责任 / 去争取民主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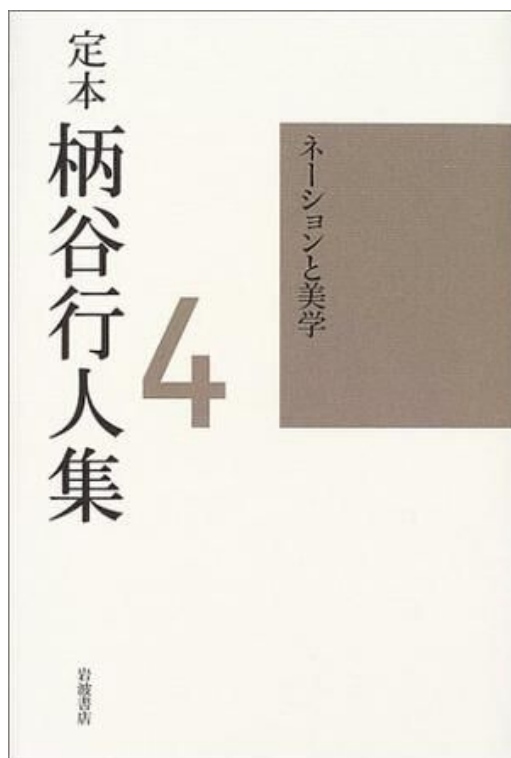
黑暗历史时期，一家三口的悲剧故事。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白色恐怖下，牺牲者的群像，一个时代的悲凄怅然。日本殖民地台湾回归中国以后，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与败退，恰恰是从张志忠抵达台湾而展开并以张志忠的牺牲为结束的、整整长达八年的斗争史。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共产党机构曾组织过暴力起义、武装割据等活动，但是实力悬殊，抵抗数年后终被血洗。一部分台共党人或投降、或卖党，但领导人之一张志忠夫妇却从容赴死。《台共党人的悲歌》

详细描写了张志忠夫妇的一生，以及那个时代里怀有信仰的台共党人群像，更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段缩影。

蓝博洲的写作以报告文学（台湾学者称为“报导文学”）和历史调查为主要形式，诉诸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这一以“信史”的形式展开的叙述是论辩性的，它同时针对了蓝绿两个阵营的主导叙述，即“台独”叙述与国民党的正统叙述及其变体。对于前者，他的立场是反对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对于后者，他的立场是反对白色恐怖和专制统治的大众民主的左翼运动。通过漫长的调查，在他的笔下，日据时代台湾民众和革命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战后台湾民众和革命者反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左翼进步人士的奋斗和牺牲，渐渐以具体可感、清晰真实的方式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他勾稽其间的连续与变化，又将这些连续与变化置于与中国革命及建国运动的关系之中，展开了一幅生生不息、广阔深厚的历史画卷。

（《台共党人的悲歌》，蓝博洲 著，中信出版社 2014 年 8 月）





柄谷行人深受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的启发。他认为，自由主义是霸权国家采取的政策。帝国主义则是霸权国家衰退，众多国家继续争夺霸权地位的状态。于是，形成了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这一循环。要把握帝国主义，既不能仅将其看作是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线性的发展阶段，又不能将其看作是非历史性的国家政策。而应该将其放置在历史性的循环之中来考察。

目前的“帝国主义的”状况是，随着美国的衰落，开始围绕后续的霸权而竞争。主要的争夺者，便是中国和印度。换言之，亚洲成为了世界史的主要舞台。这点特别类似于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特征。只不过中日的攻守形势发生了变化。

日本的资本=国家妄图挑起对外的危机，对宪法进行实质性的废止。但这样又会导致“历史的反复”。

在《死亡与民族主义》一章中，柄谷饶有兴味地分析了康德到安德森的民族主义观。康德的《永久和评论》把看似实体的问题，赋予了形而上学的意义。民族作为一种超越论的假象，绝非是依靠启蒙就可以消解的。民族在想象中，是作为平等而非支配的关系而存在的。所以当国家和资本出现不公正的问题时，希特勒式的浪漫主义者就用民族情感进行消解。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与其批判民族这个幻觉，不如批判非要这个幻觉不可的现实。从马克思的观点来读康德，来分析康德扬弃资本和民族国家的设想，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面对民族主义时，往往毫无招架之力。因为自由主义者的启蒙话语，根本不能回答为什么民族这个幻想非有不可。

《作为美术馆的历史——冈仓天心与费诺罗萨》也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不仅仅是日本。在殖民地威胁下的积极民族主义，后来转化成帝国主义的不在少数。对于日本如何走向这条道路，有政治和经济上的讨论，但很少从美学角度进行论述。其实美学意识形态是与民族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冈仓天心对日本作为“东方博物馆”的想象，毋宁说是资本主义时代对前现代的心理补偿。日本凭借西式武器脱亚入欧后，却使《茶之书》这样宣扬“脱离西方的东方”的理论在西方赢得市场。冈仓天心虽然爱东方，却对朝鲜漠然无视。

柄谷行人独树一帜的理论风格，正在全世界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在中国，阅读柄谷的潮流方心未艾，但对柄谷理论问题式的严谨深入研究却极为少见。华东师范大学陈诗雨在2014年的学位论文《柄谷行人：他者和他性》中提出，柄谷在各个时期各个学科领域的批评都贯穿着一个相同的问题，即探索主体性问题的过程中界定和思考“他者”与“他性”（外在性）。这一判断对于我们把握《民族与美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视角。

（《定本柄谷行人集》第四卷《民族与美学》（ネーションと美学，岩波书店，2004年）中译本收入西北大学出版社“精神译丛”，即将推出，译为薛羽。）

回归马克思的核心论点

——评介左大培新著《解释资本雇佣劳动： 突破企业理论的前沿》

●边家村扯淡的人



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四十四卷386页

如果我们愿意遵循阿尔都塞的教诲，应该理解，那些主流经济学“看到却没有看到”的关节点就是它的症候。尝试修复主流经济学家的有空缺、空白的表述，就可以发现他们“视而不见”的机制，也由此可以接近意识形态维护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真正奥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许多命题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生产过程统治关系的分析。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核心内容是揭示资本如何通过企业中支配和统治劳动而剥削劳动。企业是一个科层结构，这个等级体系的最下层是工人，处于最高领导者地位的是“人格化”了的资本，即资本家。这就是资本统治劳动的生产关系。资本是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是指挥和强迫工人劳动的生产关系，是使工人超出为生产其生活资料而劳动的手段。

新古典经济学的庸俗本质就在于完全抹杀了存在于现实中的生产关系。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企业不过是一种得到优化利用的生产函数，企业内的生产过程不过是从可行的技术中选择出的投入产出关系罢了。新古典经济学总是假定，企业所使用的劳动和资本都是从要素市场上购入的，也就是完全平等的，所以萨缪尔森说，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资本与劳动“谁雇佣谁没有任何关系”。新古典经济学脱离实际的假设，使其理论体系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

正是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脱离实际的“问题式”不满，资产阶级新制度经济学才着力编织了关于企业的理论。深受古典经济学影响的杨小凯等人，还试图重新回到斯密-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企图以此建立统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资产阶级经济学一方面不得不回到马克思那些被新古典主义有意无意遮蔽的出发点上去。科斯通过引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的著作中对社会分工和手工工场分工的区分，阐发了企业内协调和市场协调的区别。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也明显与《资本论》第二卷的“流通费用”概念完全吻合。科斯的企业理论甚至不止一次被鼓吹计划经济的人士当作逻辑前提。80年代后，在斯蒂格利茨等相对进步的经济学家推动下兴起了“效率工资”假说。

“效率工资”假说终于承认了马克思的两个基本论点：企业购买的是工人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失业工人构成的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企业有效运行的条件。

但另一方面，死硬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始终无法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科斯认为，企业的管理者同时指挥他人的劳动和资本。后来的“剩余索取权”假说和“剩余控制权”假说都强调企业管理者的最高权力地位，而否认他对资本所有者的从属性。他们为了让经济学更有阐释力必须不断回到马克思开始的地方，但作为资本主义辩护士的天职让他们又必须论证与马克思完全相反的命题。

但是，就如伽利略所感叹的，“地球仍然在转动”。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家统治劳动者，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铁的事实。任凭资产阶级辩护士怎样巧舌如簧，都无法摆脱这个幽灵如影随形的骚扰。之所以“资本雇佣劳动”成为一个难题，那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对资本性质做了错误的解释。庞巴维克、希克斯到萨缪尔森，都把资本说成是“中间性的资本货物”，“一种本身就是由经济过程产出的耐用投入品”，也就是理解成生产中所使用的物质投入。在微观分析的模型中，甚至经常假定不存在货币。

直到1989年，埃斯瓦瑞和科特威的模型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责任公司，出借人面临着借入者可能在偿还他的借款上违约所造成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这种风险足以驱动资本所有者去自己从事生产和入股企业，直接监督资本的使用，而不是将自己的资本贷给全债务筹资的企业，或者放弃对企业管理的最终决定权。他们的模型相对于前人，更加符合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史。埃斯瓦瑞和科特威的模型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资本家会成为管理者，还可以解释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产生的根本原因。最近三十年来，全球范围内产融结合、出资人与管理者融合的潮流兴起，改变了冷战时代的资本治理格局。这个模型对于这样的潮流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解思路。

埃斯瓦瑞和科特威能够取得这个成就的奥秘，在于他们采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定义。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是不断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形态中循环的。而资本在每一个循环的环节中，都有可能出现贬值甚至完全损失的风险。资本使用者借入的货币资本，本身未必带来利润，必须化为生产资本。生产资本能否保值增值，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组合，也取决于商品资本的价值实现。

但是埃斯瓦瑞和科特威的模型是有严重缺陷的。他们讨论的影响预期资金回报率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努力，仅仅强调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努力对企业经营回报的概率分布的作用。而且他们忽略了雇佣职业经理的可能性。他们对自己模型的局限性也是有所认识的，所以他们自认为讨论的是产业革命发生以前的情况。连他们引用的《资本论》名言，也是出自马克思讨论早期协作的章节。

西方企业理论引介到中国以后，持不同立场的国内学者也开始讨论资本雇佣劳动的问题。一开始理论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劳动管理型企业的可行性上。

经济自由主义者张曙光认为，管理者分享利润，就代表委托权的重新分配，也就是劳动雇佣资本，而非资本雇佣劳动。但这个论点的逻辑自相矛盾，有玩弄诡辩为私企戴红帽子之嫌，而且更无法证明委托权的重新分配可以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常态。

卢周来杨瑞龙2005年的论文、张晓山苑鹏的2009年的专著等等，都花了大量篇幅对现有的理论进行综述。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力图寻找劳动者管理型企业（包括合作社）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理论根据。但是，倘若没有能够回答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必然成为主流，劳动者管理型企业的讨论其实并未破题。

左大培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左翼经济学家。他不仅仅熟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而且有着敏锐的经济学实感。笔者至今记忆犹新，他讲解自己如何从师弟樊纲换外汇上当受骗的经历中获得启发，提出了后来在《混乱的经济学》中展开论述的“事前防范”理论。多年来反对国企私有化的论战，不断加深了他对企业理论的思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左大培这部著作立意不仅远远高于国内大多数研究者，而且在埃斯瓦瑞和科特威模型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突破。在这部耗时七年心血写成的厚书中，牢牢紧扣“为什么资本家统治企业”这个主题，左大培大大发展了早年在《混乱的经济学》《不许再卖》中提及的很多思想。

左大培证明了，资金所有者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借钱给全债务筹资企业，是因为全债务筹资的企业可能采取风险过大的经营方针，而这个方针可能引起总回报率过低，而引起债务筹资型企业破产率过高。全债务筹资企业最高领导者获取个人收入的方式，通常都不是最有利于出资人的方式。除了医生、会计师和律师等一些特殊行业之外，全债务筹资企业都是罕见的例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穆德·尤努斯的小额贷款项目之所以能持续，首先是由于它向每一个筹资企业发放的贷款都相当少。

劳动者管理型企业也有巨大的生存困难。尽管证据表明，劳动者管理企业生产率比资本主义企业中还要高，但是劳动者对企业政策具有分歧的偏好，更容易接受投资方的购买，所以合作社往往不能长久，而且控制权成本可能更高。劳动者本人的财产有限，又必须规避风险而要将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多样化，导致在市场上劳动管理型企业缺乏资金来源。很多通常人们认为的“劳动者管理型企业”实际上也还是广义的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甚至用传统的工资契约雇用了一些非成员工人。比如美国的奥利匹亚装潢胶合板合作社、中国的南街村。

出资人通常会把资金投入至少在法律上企业的出资人是最高领导者的企业。即使实际经营管理企业的董事长或者职业经理人没有向企业投入自己的资金，由于企业最高经营者在法律上是出资人的雇员，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营者的激励方针都是根据出资人利益设计的，也就避免了全债务筹资型企业的各种问题。所以，即使在那些企业管理者没有像本企业投入资金的企业里，通常实行的也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统治秩序。

左大培的这些结论，除了揭露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固有矛盾之外，恐怕也打破了很多左翼改良主义的幻想。如果小额贷款项目的持续，必须以出借资金的保持微小数额为前提，那么除了对极贫困人群或许有帮助之外，对于社会的重塑几乎于事无补；如果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雇佣劳动的传统企业具有规避若干风险的优势，那么合作社运动（包括柄谷行人推动的新合作运动）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方案的可行性也就值得怀疑了。但是，熟悉经典著作的人会发现，这些结论，在马克思恩格斯与蒲鲁东杜林等人的论战中，其实早已有过提及。

在劳动价值论等若干问题上，左大培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渐行渐远。但是在资本雇佣劳动这个核心命题上，他却用严谨的经济分析重新回到了马克思。

（《解释资本雇佣劳动：突破企业理论的前沿》，左大培 著，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4 月）